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彭明輝 教授



清嘉道咸時期士人的時代關懷

研究生：唐屹軒 撰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一月

本論文撰寫期間獲得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98年教育部人文領域人才培育國際交流計畫

2009年度財團法人日本交流協會

99年度廖風德先生學術研究培育獎

補助

謹此特致謝悃



清嘉道咸時期士人的時代關懷

唐屹軒

摘要

本文嘗試回答：清嘉道咸時期，士人如何掌握時代脈動，及其時代關懷為何？然本文並非嘉道咸年間，士人言論總集或百科全書，因此，無意也無法兼顧此時士人涉及的所有內容。即便如此，與此相關之議題極為龐雜，甚難一一細述，故以鳥瞰方式呈現其中較為關鍵的部分，希冀凸顯清中葉以降的時代變化，並以實例進行解說，捕捉嘉道咸年間的風貌，與士人的時代關懷。綜觀嘉道咸時期，士人關懷時代的焦點仍以內政為主，故本文借用多旋律線的概念，呈顯士人對人滿之患、官箴吏治、鹽漕河大政與銀錢經濟等議題的討論。其後，因爆發鴉片戰爭，涉外事務成為士人關懷時代的另一條主軸。部分士人亦進行若干外國事務的引介工作，卻有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看世界，且戴上厚重的儒家眼鏡，以傳統中華思想理解世界，排列世界秩序。士人認為根絕夷務問題的解決之道須從內政著手，徹底改革的方式，當以人心風俗為要，回歸人性與天良。此外，士人時代關懷的另一條重要途徑，乃師友網絡的連結，及其形塑之輿論。士人網絡在平時透過宴集、題寫詩文序跋等方式聯絡感情。一旦遭遇重大事件，群起發聲，表達立場，縱論時事，形成輿論風潮，左右國家政策方向。嘉道咸年間的士人再三強調人心風俗之重要性，以編纂經世文章和詩文總集的方式，冀期轉化風俗，端正人心，此時代世風，猶在士人間繼續傳承。

關鍵詞：嘉道咸時期、士人網絡、時代關懷、內政、涉外事務、人心風俗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一、研究動機.....	2
二、研究回顧.....	5
(一) 清代學術文化史研究.....	7
(二) 嘉道咸時期的相關研究.....	9
三、基本史料與研究途徑.....	17
四、章節架構.....	20
第二章 詔諭所見帝國之殤.....	23
一、京都八旗俗習改，漸廢舊業就倦怠.....	26
二、內政疲弊積習重.....	34
(一) 災荒.....	35
(二) 吏治蠹壞.....	37
(三) 鹽漕河三大政.....	40
(四) 銀貴錢賤.....	43
(五) 礦務.....	44
三、涉外關係的對應之策與態度.....	46
四、風俗人心與學術文化.....	55
(一) 官多玩愒難敷化，民半滴澆未返淳.....	57
(二) 教化與書籍纂修.....	63

五、小結.....	67
第三章 士人多旋律線的自改革.....	71
一、天下之患在人滿.....	75
二、官箴吏治與政府革新.....	86
三、鹽漕河錢與經濟發展.....	98
四、小結.....	109
第四章 涉外事物的清議與人物品藻.....	113
一、士人眼中的鴉片戰爭.....	115
(一) 士人的英國觀.....	115
(二) 鴉片戰爭過程.....	118
(三) 戰敗咎責的討論.....	121
(四) 頌揚英靈激發忠義之氣.....	123
二、戰和人物的神化與妖魔化.....	130
(一) 主戰人物的造神運動.....	131
1. 從未有之曠典到遠戍伊犁.....	132
2. 殺俘冒功？臺灣冤獄？.....	137
(二) 主和人士的妖魔化.....	143
1. 穆彰阿.....	143
2. 琦善.....	146
三、天朝真的崩潰了嗎？.....	148
四、小結.....	155
第五章 化民成俗與詩文救國.....	157
一、整厲風俗與矯正人心.....	160
二、文以載道與經世思潮.....	171
(一) 賀長齡、魏源與《皇朝經世文編》.....	173
(二) 經世文章的浮現與復活.....	176
(三) 士大夫之學的動態樣貌.....	182

三、革新詩風與詩史映世	185
(一) 鐵保與《熙朝雅頌集》	187
(二) 符葆森與《國朝正雅集》	193
(三) 張應昌與《國朝詩鐸》	197
四、小結	205
第六章 結論	209
徵引書目	217
一、檔案	217
二、專書	217
三、論文	235



表次

表1 鐵保門生故舊詩文集題序.....	192
表2 《國朝詩鐸》卷次類目.....	200



第一章 緒論

1924年2月3日，廣州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禮堂內再度聚集無數群眾，聆聽孫中山(1866-1925)宣傳三民主義思想。演講內容為〈民族主義·第二講〉，孫中山慷慨激昂陳述：「中國人從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為很耻辱，殊不知實在的地位還要低過高麗、安南。故我們不能說是半殖民地，應該要叫做次殖民地」¹。這段話成為國、共兩黨中國近現代史的主要論述，影響深遠。為詮釋中國何以淪落為次殖民地，許多史學研究者努力在歷史洪流中尋求解答。岡田英弘教授指出：1937年中國共產黨為了否認日本侵略戰爭對中國造成的影響，轉而強調西歐對中國的衝擊，將「鴉片戰爭」視為中國近代的起點²。其後在革命史觀的指導下³，諸多論著以革命為歷史論述主軸，不斷強化革命的正統性與合法性，並據此批判晚清以降的歷史發展。部分以「中國近代史」為書名的著作，甚至從鴉片戰爭開始談起，如李鼎聲(本名李平心，1907-1966)與范文瀾(1893-1969)之《中國近代史》，將鴉片戰爭視為西方帝國主義

¹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二講〉，收入：黃彥(編)，《孫文選集》，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418-432；所引在424。對於孫中山「次殖民地」論述的相關研究討論，可參閱：潘光哲，〈孫文の「次殖民地」イメージ〉，《孫文研究》，45(神戸，2009.03): 40-60；潘光哲，〈「奴隸地位」和「半獨立國」：孫中山對中國「國際地位」的論述〉，《孫學研究》，6(臺北，2009.05): 33-59。

² 岡田英弘，〈世界史のなかの大清帝国〉，收入：岡田英弘(編)，《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59-73；所引在68。

³ 有關「革命史觀」影響史學研究的相關討論，可參閱：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侵略中國的開端和歷史轉捩點⁴。日本學者今井駿、野沢豊(1922-2010)與田中正俊(1922-2002)等撰述的《中国現代史》，亦以鴉片戰爭為起點⁵。

長久以來，歷史學界略有將鴉片戰爭過度抽離清朝時代脈絡的趨勢，且視之為重大轉捩點，賦予重要的歷史解釋。但這樣的論述是否恰當？身處於鴉片戰爭前後的士人，是否明確感知鴉片戰爭乃清朝盛衰之分水嶺？誠如井上裕正教授云其撰述《林則徐》一書的初衷，是為重新釐清林則徐(1785-1850)的形象。舊有論述，大抵將林則徐與鴉片戰爭相連結，視其為對抗英國的民族英雄。但這樣的評述方式是否恰當，值得吾人重新思考⁶。岸本美緒教授在《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經濟變動》，深入考察康熙年間(1662-1722)之士人，並非一味謳歌當前繁榮盛世，而是遭逢經濟不景氣的艱困大環境，與過去強調康熙朝歌舞昇平的既定印象略有出入⁷。顯見當時士人之觀察與後人的理解，容或存在些許落差。因此，回到時人立場，重新審視其觀察，應為掌握真實歷史脈動的重要方法之一。

一、研究動機

1905(光緒31)年鄧實(1877-1951)在〈國學今論〉指陳清朝學術嬗變有三：一變，順康之世(1644-1722)，明朝遺儒講學於野，為懲前明儒者空疏無用，強調讀書以大義、經世為先，不分漢宋之學；二變，乾嘉之世(1736-1820)，考據學風盛行，學者實事求是，鑽研訓詁，號為漢學，與治古文辭之宋學家，相互詆訛；三變，道咸之世(1821-1861)，常州今文學派興起，藉用西漢今文學講求微言大

⁴ 李鼎聲，《中國近代史》，收入：《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民國叢書》第四編，78(上海：上海書店，1992)；范文瀾，《中國近代史》，收入：《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民國叢書》第四編，78(上海：上海書店，1992)。

⁵ 今井駿(等著)，《中国現代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84)。

⁶ 井上裕正，《林則徐》(東京：白帝社，1994)。

⁷ 岸本美緒，《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經濟變動》(東京：研文出版，1997)，239。

義之旨，附會改制、變法與經世之說⁸。1919年王國維(1877-1927)在沈曾植(1850-1922)70歲壽序中，勾勒清朝二百多年的學術發展脈絡，以「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概括清朝學術變化。王國維強調道咸以降之政治風俗已漸變於昔，士人憂心國勢不振，轉而求助先秦西漢的思想資源，一改乾嘉治學之法，冀期變革圖新，振衰起敝⁹。鄧實與王國維之文鞭辟入裡，提供吾人追尋清代學術發展的重要線索。

學者對清代學術文化史的相關研究泰半聚焦於明末清初、乾嘉年間或咸同以降(1851-1874)等時代。惟道光年間(1821-1850)的學術樣貌，似未受學者重視，如非略而不論，即僅以「經世」一語帶過。然清代學術風潮如何從乾嘉考據學轉變為咸同以降的西學東漸？清朝士人在接納西學前，有何回應？凡此種種，似非「經世」一語即可概括。學術思潮與社會變遷息息相關，儘管思想轉變有其內在理路，仍不應忽視外在社會環境的影響。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嘗借用佛家語「因陀羅網」，解釋世間所有現象皆如寶石鑲嵌於同一張網上，彼此相互關連。因此，透過17世紀的畫作可還原出17世紀的時代風貌¹⁰。而所有細微的變動皆可視為線索，協助吾人重回歷史場景，深入探尋其文化風貌。

乾隆年間(1736-1795)為清朝鼎盛時期，亦是由盛轉衰的關鍵時代。儘管川

⁸ 鄧實，〈國學今論〉，收入：國粹學報社(編)、黃節(主編)，《(景印)國粹學報舊刊全集》，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397-410；鄧實，〈國學今論(續)〉，《(景印)國粹學報舊刊全集》，2/495-504。

⁹ 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收入：王國維(著)、彭林(整理)，《觀堂集林》，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720-721。有關「道咸新學」的進一步討論，可參閱：羅志田，〈道咸“新學”與清代學術史研究——《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導讀〉，《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46(成都，2006)：5-15。

¹⁰ 卜正民教授解釋說：「因陀羅創造世界時，把世界造成網狀，網子的每個打結處繫上一顆寶珠。現存或一直存在未減的所有東西，想得出的所有想法，每個真實無誤的資料——套句佛家用語，『萬法』——都是因陀羅網上的一顆寶珠。不只每顆寶珠透過那張網而與其他所有寶珠相連，而且每顆寶珠的表面都映出網上其他所有寶珠。因陀羅網上的每樣東西，都暗暗表示了網上的其他所有東西」。見：卜正民(著)、黃中憲(譯)，《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17世紀全球貿易》(臺北：遠流出版社，2009)，38-39。

楚教亂爆發於1796(嘉慶元)年，但不少學者將其導火線上溯至乾隆晚年。無論如何，川楚教亂結束了康雍乾繁榮盛世，開啓日後動蕩時代的序幕¹¹。後人對嘉慶朝的研究僅以川楚教亂為主，餘皆未及細論。接續其後的道光朝同樣受到學者忽視，鴉片戰爭與儉樸的清宣宗(1782-1850)，成爲道光朝的唯一焦點。無庸置疑，嘉慶朝係清朝盛衰的轉捩點，國家內憂漸次浮現。道光朝則遭遇前所未有的外患，涉外事務成爲無法迴避的議題。進入咸豐朝，內憂外患交相侵擾，致使清廷左支右絀。同治朝略有中興氣象，芮瑪麗(Mary Clalough Wright, 1917-1970)將之歸功於理學思想的復興¹²。咸同以降已有部分士人提倡並接納西學，但國家漸趨安定的關鍵因素，並非全然依恃西學與洋務。嘉道咸三朝皇帝究竟如何面對世變與挑戰？其內心感受爲何？士人又如何運用傳統思想資源，回應時局的內憂外患？

歷史上不乏朝代中興的先例，值此清朝由盛轉衰之際，嘉道兩朝扮演極爲關鍵的腳色。但長期以來，對嘉道兩朝的相關研究，似略嫌不足。如無法準確掌握嘉道年間(1796-1850)國家社會的諸多變遷，如何進一步探尋學術文化的傳承與裂變？王汎森教授觀察出：道光年間以降，「中國思想界便進入不安定期，每一種學問都因內外的挑戰，而產生了分子結構的變化。它們催化了後來一些範疇性的轉變」，與此同時，「傳統學術極力掙扎著改變自己，以求扣聯政治、社會」¹³。本文嘗試在考察學術文化轉變之際，兼顧國家社會的變遷，將兩者一併置於「因陀羅網」上，通觀全局，冀期捕捉較爲貼近時代的風貌。

岸本美緒教授於〈清朝とユーラシア〉文中，將清朝置於歐亞地區的歷

¹¹ 鈴木中正，《中国史における革命と宗教》(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4)，153。

¹² Mary Clalough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中譯本：房德鄰(等譯)，《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¹³ 王汎森，〈自序〉，收入：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i-vi；所引在i, iv。

史脈絡，試圖探尋對清朝人而言，「清朝」是什麼¹⁴。本文之作殆亦有此意，冀期瞭解對清仁宗(1760-1820)、清宣宗與清文宗(1831-1861)而言，清朝是什麼？對此時的士人而言，清朝又是什麼？嘉道咸之際(1796-1861)諸多制度敗壞，災荒與戰爭，宛如一次次的地震，不僅撼動老舊房舍，亦讓人民感到惶恐，雖已有士人察覺時移世變的徵兆，但仍侷限於少數敏感士人與震央所在地附近。直至中法戰爭和甲午戰爭後，大地震始擴及全國，成為人們的共同記憶，並產生休戚與共的強烈感受。本文試圖踏尋嘉道咸時期看似微弱的地震，探索少數敏感士人觀察世變徵兆的論述，從中梳理士人的時代關懷，進而掌握整體的時代脈動。

二、研究回顧

本文聚焦於19世紀上半葉清朝嘉道咸時期，士人對國家社會遭遇的內政、涉外事務、人心風俗和學術文化等，多重面向的觀察與評述。昔往類似的討論多以通史性著作為主，橫跨範圍達百年以上。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針對19世紀以降的重大課題進行討論，包括清朝開拓西北、西南邊疆地區，嘉慶年間的內政與地方叛亂，鴉片戰爭，條約制度，太平天國之亂，同治中興與自強運動等。書中闢有專章論析清朝衰落的原因，如人口增長對經濟造成的壓力，漕運危機，貨幣與稅收制度的混亂，以及各地大小叛亂，並將世變與學術趨向加以連結，惟僅以魏源(1794-1856)的今文經學為例說明¹⁵。2010年日本岩波書店發行一套「シリ

¹⁴ 岸本美緒，〈清朝とユーラシア〉，收入：歴史学研究会(編)，《近代世界への道——変容と摩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5)，11-42。

¹⁵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0-11, Late Ch'ing 1800-1911*.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一ズ中国近現代史」，計6冊，1-5冊講述19世紀至21世紀中國歷史的發展，第6冊為重要議題答問。執筆者均為相關領域的重要學者，但文字內容並非嚴肅之學術體例，而近於一般科普讀本，曉暢易懂。其中第1冊由吉澤誠一郎教授負責，書名題為《清朝と近代世界19世紀》。第1章以「包藏於繁榮中的危機」為題，自乾隆晚年談起。書中所論聚焦於19世紀下半葉的諸多議題，嘗試將19世紀的清朝置於世界發展大勢中，觀察此時清朝發生的社會、經濟、地方叛亂與國際外交事務等問題¹⁶。同年，岩波書店另出版一套《岩波講座・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其中第1冊《東アジア世界の近代19世紀》，同樣以19世紀作為近代之起點。川島真教授在導言中重新檢討19世紀以降東亞地區與西方國家的互動關係，兼或涉及19世紀前半的發展情形，但大部分仍以19世紀後半西方諸國強勢介入後，引發的衝擊和轉變為主¹⁷。

部分學者則著重於18世紀的研究，如韓書瑞(Susan Naquin)與羅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教授合著《十八世紀中國社會》，特別標舉清朝在18世紀奠定的各項基礎，舉凡政治結構、社會文化、學術思想與地區發展等，皆對日後產生深遠影響。作者強調若仔細梳理18世紀的社會風貌，將可發現隱藏的線索，以解答19世紀劇變的原因¹⁸。岸本美緒教授在〈一八世紀の中国と世界〉，審視18世紀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高度評價清世宗(1678-1735)諸多施政舉措，對清朝整體發展方向具有關鍵性影響¹⁹。

其他對本論文具啟發性之相關研究，下文擬以清代學術文化史與嘉道咸時期為主軸，進行回顧。

¹⁶ 吉澤誠一郎，《清朝と近代世界19世紀》(東京：岩波書店，2010)。

¹⁷ 川島真，〈東アジア世界の近代一九世紀〉，收入：和田春樹(等編集)，《岩波講座・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東アジア世界の近代19世紀》(東京：岩波書店，2010)，1-47。

¹⁸ Susan Naquin, Evelyn S. Rawski,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中譯本：陳仲丹(譯)，《十八世紀中國社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¹⁹ 岸本美緒，〈一八世紀の中国と世界〉，收入：岸本美緒，《風俗と時代観——明清史論集1》(東京：研文出版，2012)，111-143。

(一) 清代學術文化史研究

清末民初以來，已有部分學者從中長時段的角度出發，論析清朝學術文化的發展。梁啟超(1873-1929)自1902(光緒28)年起於《新民叢報》連載有關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的文章，文中將近世學術分為四期，順康間、雍乾嘉間(1723-1820)、道咸同間(1821-1874)與光緒間(1875-1908)，註記曰：「其實各期銜接攙雜，有相互之關係，非能劃若鴻溝。讀者勿刻舟求之」。其中，雍乾嘉間的核心為漢宋問題，而道咸同間為今古文問題。並點出「當嘉、道間，舉國醉夢於承平，而定庵憂之，儼然若不可終日，其察微之識，舉世無能及也」，故新思想日漸萌蘖²⁰。其後，梁啟超於1920年撰述《清代學術概論》，並將1923-1925年於清華、南開大學等校講學之講義，彙集成書，題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兩書皆詳細闡明清代整體學術發展之履痕，且因梁啟超亦參與其中，故能提供第一手的觀察視野²¹。然錢穆(1895-1990)因不滿梁啟超論述清代學術的觀點，將其任教於北京大學之講義集結成冊，於1937年出版，同樣命名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諷刺近代學者多不知宋學，故評論漢宋問題多失之公允。錢書以學案體方式論述，與梁啟超之主題式論述略有不同²²。

1949年齊思和(1907-1980)發表〈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縷述乾嘉以降之史學，除簡要說明考據學方法外，著重討論道光年間的學術新風氣，包括：談富強、講經世、今文經學運動、研究邊疆地理與外國史地，以及纂修當代史等，敘述因受新史學影響展開的改編國史運動。翌年齊思和撰著〈魏源與

²⁰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²¹ 梁啟超(著)、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²²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有關梁啟超與錢穆二人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比較研究，可參閱：周國棟，〈兩種不同的學術史範式——梁啟超、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比較〉，《史學月刊》，4(開封，2000): 110-117；胡文生，〈梁啟超、錢穆同名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比較〉，《中州學刊》，145(鄭州，2005.01): 158-162。

晚清學風〉，從魏源生存的時代環境切入，論析其學術研究與貢獻，諸如經世思想、漕運、鹽法、河工與兵餉問題、掌故之學、邊疆與域外史地，以及今文學等。凡此種種，皆為晚清重大政治與學術風潮，魏源或啓風氣之先，或為重要推手，乃以魏源為中心，探問晚清學術思想脈動與時局變遷²³。陸寶千教授的《清代思想史》，討論清代各階段的思想變遷，勾勒其轉變之軌跡，包括明末清初以降之經世思想，康熙朝的朱子學，清代經學，乾隆朝的士林佛學，清代公羊學演變，嘉道史學與晚清理學等面向²⁴。

除觀察清代中長時段學術發展的脈動外，針對特定學術思潮的研究亦所在多有。王汎森教授選取明末清初之際士人的儒學宗教化、道德嚴格主義、修身日譜與悔罪心態等議題，闡釋思想轉變的趨向²⁵。清初以降，禮學一度成為思想主流，降至18世紀仍係考據學的重要主題之一。王汎森教授以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流變，及其在社會上實際運作的情形進行析論²⁶。張壽安教授則藉由凌廷堪(1755-1809)與18世紀的禮學考證熱潮為例，說明禮學思想在18世紀前後，伴隨社會秩序變遷，如何與時俱進²⁷。乾嘉考據乃備受學者重視之一環，考據學的成因，盛況與流弊，論著甚夥。杜維運(1928-2012)在《清代史學與史家》深入解析乾嘉考據學派的形成，浙東史學派的興起，王夫之(1619-1692)、戴名世(1653-1713)和全祖望(1705-1755)等人之史學思想²⁸。其後之西學

²³ 齊思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燕京社會科學》，2(北京，1949.10): 1- 35；齊思和，〈魏源與晚清學風〉，收入：齊思和，《中國史探研》(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599- 651。

²⁴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1983三版)。

²⁵ 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²⁶ 王汎森，〈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收入：陳弱水(主編)，《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12)，353- 392。

²⁷ 張壽安，《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²⁸ 其他相關研究討論已汗牛充棟，無法在此盡舉，僅列出部分論著以供參考。見：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收入：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87- 156；余

東漸思潮，學者亦多所關注，並從多面向闡述學術思潮的變容與風貌²⁹。

儘管積累豐碩研究成果，但有關清朝學術文化史的研究，仍有若干缺憾，蓋相關研究大多集中於清初、乾嘉與咸同年間。長久以來，乾嘉時代彷彿凝聚成相同的時代氛圍，甚至在學術思想層面上，亦以「乾嘉考據學」涵蓋。但歷史事實果真如此嗎？或許吾人應以更為細緻的角度重新檢視。

(二) 嘉道咸時期的相關研究

受到傳統王朝興衰觀念的影響，傳統史學研究者多以王朝或皇帝為分界，進行討論³⁰。故清朝皇帝向來是研究清朝歷史的焦點之一，尤以清聖祖(1654-1722)、清世宗與清高宗(1711-1799)為然³¹。惟涉及清仁宗、清宣宗或清文宗的研究，卻寥若晨星。如 *A Manchu Monarch: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a Ch'ing* 一書，雖以清仁宗為主角，但近於生平傳記的敘述，未見深入論析³²。傳教

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杜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再版)；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中譯本：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濱口富士雄，《清代考據學の思想史的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94)；木下鉄矢，《清朝考證學とその時代：清代の思想》(東京：創文社，1996)；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²⁹ 如：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以1815至1900年西方歷史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鄒小站，《西學東漸：迎拒與選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³⁰ 有關王朝興衰觀的討論，可參閱：楊聯陞，〈國史諸朝興衰芻論〉，收入：楊聯陞，《國史探微》(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21-42。另，對於過度重視帝王歷史的批評，見：梁啟超，〈新史學〉，收入：梁啟超，《飲冰室合集》，1(北京：中華書局，1989)，9/1-31。

³¹ 如：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臺北：時報文化，2005)；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曹寅與康熙》(臺北：時報文化，2012)；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吳家恆(譯)，《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臺北：時報文化，2002)；Mark C. Elliott,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New York: Longman, 2009).

³² A. E. Grantham, *A Manchu Monarch: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a Ch'ing*. (Arlington, Va.:

士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以其長期生活於中國的經歷，綜合文獻與傳聞內容，撰成清宣宗傳記。然論者認為書中所述，略有傳教士的想像強加於清宣宗身上之謬誤³³。茅海建教授則以「苦命天子」為題，撰述清文宗生平及其面臨的困境。作者深入剖析清文宗遭遇內憂外患的挑戰時，內心之糾結與掙扎³⁴。

宮崎市定(1901-1995)在〈清朝文化とその背景〉，將清朝分為興隆期、全盛期、頹廢期與衰亡期等，其中頹廢期即嘉道年間。然作者僅略述此時社會面臨不景氣的情形，以及因戰亂之故，國家經濟遭受嚴重打擊³⁵。鈴木中正(1913-1983)《清朝中期史研究》將清朝「中期」的起迄時間訂於1683(康熙22)年至1795(乾隆60)年。作者認為自清廷平定臺灣後，國家社會的矛盾開始逐漸累積，直到川楚教亂爆發，故清朝中期乃是「社會崩壞的過程」。作者特別強調社會問題對清朝造成的影響，尤以人口增長、奢侈風潮、地主和商人勢力，與官吏貪污問題等，逐漸侵蝕清廷的統治力³⁶。張瑞龍教授認為，應將嘉道年間視為一個學術思想整體進行考察。作者整理清末民初以來，皮錫瑞(1850-1908)、梁啟超、孟森(1869-1937)與錢穆等人，已注意到嘉慶朝的學術思潮與道光朝較為相近，而遠於乾隆朝。其後以經世思想為主軸的論著，則緊扣嘉道年間的士人思想與論著，咸豐朝亦可一併列入討論³⁷。故以嘉道咸年間的士人為主體，或許不失為重新審視清朝學術文化史的途徑。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6).

³³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The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with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Including A Sketch of the Principal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During the Last Fifty Years*.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65, Cornhill, 1852). 相關討論，可參閱：關紅柳，〈傳教士眼中的清代君主——以郭實臘《道光皇帝傳》為中心〉，《歷史檔案》，2(北京，2009): 48-53。

³⁴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豐皇帝奕訢》(北京：三聯書店，2006)。

³⁵ 宮崎市定，〈清朝文化とその背景〉，收入：宮崎市定，《宮崎市定全集》，14(東京：岩波書店，1991)，265-281。

³⁶ 鈴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東京：燎原株式会社，1971)。

³⁷ 張瑞龍，〈清中葉嘉道年間學術思想研究綜述〉，《漢學研究通訊》，27.4(臺北，2008.11): 1-11。

過去學者在相關議題的研究上，多從鴉片戰爭切入，強調西方勢力與商業貿易對清朝造成的衝擊，如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將鴉片戰爭定位為「兩種文明之間的衝突」，而「導致文化衝突的主要力量是英國的商業擴張」³⁸。 *The Opium War, 1840-1842: Barbarians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War by Which They Forced Her Gates Ajar* 延續相同論調，進而凸顯商人與傳教士的腳色及其複雜網絡³⁹。茅海建教授《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從武器裝備、防禦工事、兵員訓練、文化層面的戰爭觀，與軍事角度的戰術觀等面向，重新詮釋鴉片戰爭⁴⁰。日本學者特別著重分析鴉片戰爭對德川幕府的警醒與思想界衝擊，以及鴉片戰爭前後清朝士人著錄或譯介西方書籍，對日本政府和學界造成的影響。岩下哲典教授論析鴉片戰爭的消息如何傳至日本，及其對日本朝野產生的危機感⁴¹。森睦彥、源了圓與大谷敏夫教授介紹《海國圖志》如何傳入日本，其刊刻流布，以及日本有志之士的接受歷程⁴²。其後，源了圓教授以《海國圖志》為線索，探尋幕末日本朝野士人如何透過清朝瞭解與學習西方事物⁴³。

³⁸ Chang Hsin-pao,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15. 中譯本：張馨保(著)、徐梅芬(等譯)，《林欽差與鴉片戰爭》(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16。

³⁹ Peter Ward Fay, *The Opium War, 1840-1842: Barbarians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War by Which They Forced Her Gates Aj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5).

⁴⁰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5二版)。另請參閱：羅志田，〈“天朝”怎樣開始“崩潰”——鴉片戰爭的現代詮釋〉，《近代史研究》，3(北京，1999): 9-24。

⁴¹ 岩下哲典，《江戸の海外情報ネットワーク》(東京：吉川弘文館，2006)，82-117；岩下哲典，《幕末日本の情報活動——「開国」の情報史》(東京：雄山閣，2008增補版)，17-47。

⁴² 森睦彥，〈『海国図志』の舶載から翻刻まで〉，《蘭學資料研究會研究報告》，206(東京，1968.03): 55-64；源了圓，〈幕末・維新时期における『海国図志』の受容—佐久間象山を中心として—〉，《日本研究》，9(京都，1993.09): 13-25；大谷敏夫，〈『海国図志』の幕末日本に与えた影響〉，收入：大谷敏夫，《清代政治思想と阿片戦争》(京都：同朋舎出版，1995)，657-671。

⁴³ 源了圓，〈幕末日本における中国を通しての「西洋学習」——『海国図志』の受容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源了圓、嚴紹璽(編)，《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第3卷·思想》(東

1940年,《中和月刊》刊載〈道光學術〉,解析道光年間世變與學風的轉移,各項學風的流衍及其倡議者,如本乎今文經學之經世思想的魏源;由宋學以入詞章,由詞章而入治術的潘德輿;以政事為學術之包世臣(1775-1855)等⁴⁴。王汎森教授則標舉禁書的復出,視之為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進而探究禁書復出的學術風潮,及其與時代之間具有的互動和意義,並將此一風潮延伸至辛亥革命時期⁴⁵。1983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召開「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道咸時期的經世思想廣受研究者矚目,所發表之論文涉及:中國近世經世思想背景,經史輿地之學與經世思想,憂患意識與經今文學,尋求效驗與經世之學,科技經世與體用思想,清末經世思想之新趨向等諸多層面,試圖全面解析清中葉以降的經世思潮⁴⁶。王聿均(1919-2007)在〈清代中葉士大夫之憂患意識〉指出,「憂患意識」乃經世、維新,海防與塞防等思想的起源,並以龔自珍(1792-1841)、魏源及其今文經學思想為討論對象⁴⁷。李國祁教授〈道咸同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以龔自珍、魏源、曾國藩(1811-1872)與左宗棠(1812-1885)為道咸時期經世思想的代表人物⁴⁸。

劉廣京(1921-2006)、周啓榮與黃克武教授等人,均針對賀長齡(1785-1848)、魏源編輯《皇朝經世文編》中,〈學術〉與〈治體〉的內容進行介紹,歸納其思想內容,源流與特點,論析經世之學的時代意義⁴⁹。黃克武教授進一步上

京:大修館書店,1995),322-361。

⁴⁴ 楚金(瞿宣穎),〈道光學術〉,收入:太平山人(等撰),《道光朝銀荒問題:中和近代史論文集》(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4),6-19。

⁴⁵ 王汎森,〈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415-449。

⁴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⁴⁷ 王聿均,〈清代中葉士大夫之憂患意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1(臺北,1982.07):1-11。

⁴⁸ 李國祁,〈道咸同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下(臺北,1986.12):17-65。

⁴⁹ 劉廣京、周啓榮,〈《皇朝經世文編》關於經世之學的理論〉,收入:劉廣京,《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77-186;黃克武,〈《皇朝經世文編》

溯至乾隆年間陸燿(1723-1785)編纂之《切問齋文鈔》，指陳明清兩朝經世思想的演變並未斷層，並梳理《切問齋文鈔》的思想淵源、學術立場，及其對賀長齡、魏源以降，經世思潮的影響⁵⁰。龔來國博士〈清“經世文編”研究——以編纂學為中心〉綜論賀長齡以降形成的經世文編熱潮，解析賀長齡、葛士濬(1848-1895)、盛康(?-1902)與麥仲華(1876-1956)等人纂輯之經世文編，其編纂形式、關注內容與社會效應等⁵¹。1986年黃克武教授介紹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的研究概況與展望；2008年解揚回顧近30年以來有關中國近世經世思想的定義、研究情形與未來研究課題和展望等；2011年韓承樺撰文評介近十年來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透過黃、解、韓三文介紹，略可掌握經世文編與經世思想的研究趨勢⁵²。

除經世思潮外，理學與今文經學亦是學者關心的課題。如以唐鑑(1778-1861)、倭仁(1804-1871)、吳廷棟(1793-1873)、曾國藩、李棠階(1798-1865)、何桂珍(1817-1855)等人為核心，致力推動的復興理學運動，即受到嘉道年間思潮的影響，於咸同年間開花結果。芮瑪麗將同治中興、保守主義與理學思想相互結合，成為穩定晚清時局的重要力量⁵³。李細珠教授的倭仁研究，清楚揭示倭仁與理學發展的密切關連⁵⁴。而今文經學尤被視為道咸年間，士人比擬、

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⁵⁰ 黃克武，〈理學與經世——清初《切問齋文鈔》學術立場之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6(臺北，1987.06): 37-65。

⁵¹ 龔來國，〈清“經世文編”研究——以編纂學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4)。

⁵² 黃克武，〈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臺北，1986.09): 83-96；解揚，〈近三十年來有關中國近世「經世思想」研究評述〉，《新史學》，19.4(臺北，2008.12): 121-151；韓承樺〈評介兩岸學界近十年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史原》，23(臺北，2011.09): 205-238。

⁵³ 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著)、房德鄰(等譯)，《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54-85。

⁵⁴ 李細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李細珠，〈倭仁與道咸同時期的理學〉，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思想家與近代中國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58-90。

附會之工具，藉以闡發經學之微言大義，遂行經世志業。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教授有關常州今文學派的研究，提供我們瞭解常州今文學派與政治之間複雜互動的重要參考⁵⁵。

多數研究以特定學者，如龔自珍、魏源、林則徐或陶澍(1778-1839)等人為對象進行討論。固可突顯其思想特性與影響力，卻有見樹不見林之憾⁵⁶。James Polachek教授為較早關注士人群體與政治關係的學者，其博士論文“*Literati Groups and Literati Politics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探討嘉道年間經世思潮的興起，具有經世理念的士人網絡、宣南詩社與道光年間的清議政治等⁵⁷。而在*The Inner Opium War*一書中，嘗試回答鴉片戰敗後，為何中國無法立即展開改革？並將目光置於19世紀前期崛起的漢人士大夫群體，考察其形成的網絡如何對清廷內政、外交決策產生影響。James Polachek教授認為，鴉片戰爭後，漢人士大夫集結力量，挑戰和批判穆彰阿(1782-1856)政權，雙方勢力相互傾軋，爭取國家未來發展方向的發言權⁵⁸。楊國強教授先後發表〈鴉片戰爭與儒學〉、〈世運盛衰中的學術變趨〉，均涉及鴉片戰爭前後士人群體

⁵⁵ Benjamin A. Elman,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中譯本：趙剛(譯)，《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⁵⁶ 相關研究可參閱：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4)；王家儉，《魏源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魏秀梅，《陶澍在江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林則徐與鴉片戰爭研究論文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楊國楨，《林則徐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張壽安，《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段超，《陶澍與嘉道經世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彭大成、韓秀珍，《魏源與西學東漸：中國走向近代化的艱難歷程》(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⁵⁷ James M. Polachek, “*Literati Groups and Literati Politics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h.D. dissertation, 1977).

⁵⁸ James M. 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1992); 井上裕正，〈James M. Polachek著*The Inner Opium War*〉，《東洋史研究》，52.3(京都，1993.12): 507- 567。

的思想轉變⁵⁹。王汎森教授藉由考辨顧炎武(1613-1682)重獲重視的複雜因素和多重形象，論析嘉道年間官方意識形態與士人思想文化的轉變⁶⁰。羅檢秋教授以嘉道年間京師士人的修禊雅集，包括宣南詩社、蘇齋詩會、江亭活動、顧祠修禊等活動，討論士人經世意識的覺醒⁶¹。魏泉教授的《士林交游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探討北京宣南地區的文人集會活動，藉由論析翁方綱(1733-1818)發起之「為東坡壽」、宣南詩社、梅曾亮(1786-1856)及其古文圈子，與「顧祠修禊」相關的學術活動和士人交遊等，探討道咸時期的學術風向⁶²。趙雅麗教授同樣圍繞於北京宣南地區活動的士人群體，針對士人在宣南地區的聚會宴遊，議論時局，以及日後演變為「清流黨」干預政局，進行析論⁶³。

關於「清流黨」的源起，新村容子教授在系列文章中，以黃爵滋(1793-1853)為核心，考察其自1826(道光6)年入京擔任翰林院編修起，至1839(道光19)年離京為止，在北京發起多達30餘次的集會，逐步形塑出「黃爵滋師友圈」，解析士人群體與時局變遷的關連。1834(道光14)年黃爵滋上奏〈為綜核名實仰祈聖鑒事〉，乃「黃爵滋師友圈」重要轉捩點。此奏疏贏得友人之讚揚與附議，開啓黃爵滋、郭儀霄(1775-1855)、張際亮(1799-1843)、姚瑩(1785-1853)、潘德輿(1785-1839)等人對時局的嚴詞抨擊。而「黃爵滋師友圈」亦逐漸轉型為「清流黨」，儘管潘曾瑩(1808-1878)、潘曾綬(1810-1883)兄弟對黃爵滋激烈批評時政的態度，略有不滿且刻意疏離，然其父潘世恩(1769-1854)仍大力支持「清流黨」⁶⁴。

⁵⁹ 楊國強，〈鴉片戰爭與儒學〉、〈世運盛衰中的學術變趨〉，收入：楊國強，《晚清的士人與世相》(北京：三聯書店，2008)，35-97。

⁶⁰ 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臺北，2008.03): 63-93。

⁶¹ 羅檢秋，〈嘉道年間京師士人修禊雅集與經世意識的覺醒〉，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92-317。

⁶² 魏泉，《士林交游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⁶³ 趙雅麗，《晚清京師南城政治文化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

⁶⁴ 「黃爵滋師友圈」係筆者譯自新村容子教授使用之「黃爵滋サークル」。新村容子教授

部分研究則關於清朝內政、社會與制度等面向，冀期梳理清朝致亂之源。如馮爾康教授撰述〈道光朝存在的社會問題〉、〈述道光朝社會問題〉，闡述道光時期諸多弊病，包括：陋規與吏治敗壞，民眾運動的勃興，泛濫的鴉片煙，賭博和宴舞等，並簡述清宣宗執行修補政策的挫敗⁶⁵。楊杭軍教授《走向近代化：清嘉道咸時期中國社會走向》，綜論嘉道咸時期的政治、制度、基層社會，戰爭與中外關係等面向，剖析中國遭受內部與外來的挑戰，視嘉道咸時期為中國走向近代化國家的轉型期⁶⁶。林滿紅教授從白銀問題出發，將清朝置於全球大歷史的脈絡，論析嘉道咸時期因國外白銀產量減少，引發經濟、社會、文化、思想、制度等不同層面的變革，最終導致清朝走向衰亡⁶⁷。張豔麗教授藉由嘉道時期的重大水旱災，討論災荒對既有制度與社會造成的衝擊，以及後續救災引發的一連串問題，凸顯嘉道時期政府的諸多弊病⁶⁸。李文治(1909-2000)與江太新教授的《清代漕運》，解析漕運本身及其周圍連帶的

以「黃爵滋サークル」，取代James M. Polachek教授使用的“Spring Purification Circle”，魏泉教授將“Spring Purification Circle”譯為「春禊園子」。另，魏泉教授在書中，則使用「江亭雅集園子」。參閱：新村容子，〈1820-30年代北京の士大夫交流(I)——「黃爵滋サークル」の集會を中心として——〉，《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52(岡山，2009.12): 31-65；James M. 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 63-99；魏泉，〈士林交游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110/註1。新村容子教授其他系列文章，尚有：新村容子，〈1820-30年代北京の士大夫交流(II)——「黃爵滋サークル」から「清流党」へ——〉，《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53(岡山，2010.07): 47-79；新村容子，〈1820-30年代北京の士大夫交流(III)——道光十五年(1835)、黃爵滋「敬陳六事疏」を中心として——〉，《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54(岡山，2010.12): 69-85；新村容子，〈1820-30年代北京の士大夫交流(IV)——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四日「江亭展禊」を中心として——〉，《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55(岡山，2011.07): 45-65。

⁶⁵ 馮爾康，〈道光朝存在的社會問題〉，《南開學報》，4(天津，1991): 25-33；馮爾康，〈述道光朝社會問題〉，《南開史學》，1(天津，1991): 1-32。

⁶⁶ 楊杭軍，《走向近代化：清嘉道咸時期中國社會走向》(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⁶⁷ Lin Man-Houng(林滿紅), *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中譯本：林滿紅、詹慶華(等合譯)，《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

⁶⁸ 張豔麗，《嘉道時期的災荒與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諸多問題，探討漕運與清中葉國勢衰落的複雜原因⁶⁹。李典蓉教授從法制史的觀點切入，論析嘉道年間逐步正常化的京控制度，說明清朝在各方面已出現制度腐壞的情形⁷⁰。

綜上所述，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或可跳脫個別人物或單一議題的研究方式，進行較為全面性鳥瞰式的考察，重新審視嘉道咸年間的歷史脈動，應有助於吾人進一步深入理解時代風貌。

三、基本史料與研究途徑

菊池秀明教授指出，嘉道年間的研究未受重視，其故在於嘉道年間夾在近現代史與明清史之間，易受忽略；加上此前資料較少，相關研究較為不足⁷¹。本文探討清朝皇帝的自我省察，士人的時代關懷，分析皇帝與士人之內心世界，相關詩文集資料宜為最佳切入點。隨著御製詩文集與相關士人詩文總集的陸續出版，提供研究者充足史料，使得嘉道咸年間的研究不再窒礙難行。2000年嘉道咸三朝皇帝即位前後的詩文集重新彙集刊行，方便研究者使用。其中尤以近乎完整收錄清仁宗在位25年的詩作最為重要，可從中發掘清仁宗面對時局世變，內心的真實態度與轉折⁷²。《續修四庫全書》堪稱第一部收錄最多嘉道咸時代士人詩文集的總錄，提供研究者初步資料。2010年多達800冊的《清代詩文集彙編》正式出版，是編收錄明末清初至民國初年，逾3,400名作者，詩文集超過4,000餘種。儘管《清代詩文集彙編》與《續修四庫全書》

⁶⁹ 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運(修訂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⁷⁰ 李典蓉，《清朝京控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⁷¹ 菊池秀明，《清代中国南部の社会変容と太平天国》(東京：汲古書院，2008)，3-8。

⁷² 包括：故宮博物院(編)，《清仁宗御製詩》，1-7(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故宮博物院(編)，《味餘書室全集定本》，1-2(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故宮博物院(編)，《清仁宗御製文·養正書屋全集定本》，1-2(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故宮博物院(編)，《清宣宗御製詩》(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故宮博物院(編)，《清宣宗御製文·清文宗御製詩文·清穆宗御製詩文·清德宗御製詩文》(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有不少重複收錄的情形，但《清代詩文集彙編》仍收錄諸多此前不易查閱的士人詩文作品，如裕謙(1793-1841)奏稿，法式善(1753-1813)詩文集續編和二集，湯金釗(1772-1856)的詩文集正續編，林則徐《雲左山房文鈔》等，均為研究嘉道咸年間相關課題，提供豐富史料⁷³。

除大型詩文集彙編外，尚有許多士人詩文集、日記、年譜的刊行出版。2008年出版的《莫友芝年譜長編》，運用翔實且多樣的史料，呈現莫友芝(1811-1871)的生平事蹟⁷⁴。2008年集結出版《陳澧集》，首度整理輯錄陳澧(1810-1882)的部分讀書筆記遺稿，提供研究者深入瞭解陳澧的學術思想⁷⁵。2011年出版的《祁寯藻集》，完整收錄祁寯藻(1793-1866)詩文、專著、隨筆、雜記、日記、書札、奏議題本等史料⁷⁶。2011年初刊的《翁心存日記》，提供研究者扣問嘉道咸年間時代風貌的切入點⁷⁷。其他相關專著、總集和史料集等所在多有，無法在此一一詳述。然上述史料的出版，略可說明當前正是重新審視嘉道咸年間歷史的絕佳時刻。

為梳理嘉道咸年間士人的時代關懷，本文倚士人自身論述為證，冀期忠實呈顯時代氛圍。研究者泰半循著歷史履痕溯源而上，試圖尋求致變之源，解釋歷史發展的方向和結果。雖能發現時人未曾注意的關鍵核心，辨析時局演變的分水嶺，或有助於理解歷史變遷的趨勢，卻不免摻雜過多後見之明的論斷，有如「倒放電影」，倒果為因，略失公允。本文擬回歸「順著放電影」

⁷³ 裕謙，《勉益齋偶存稿·勉益齋續存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7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法式善，《存素堂續集·存素堂詩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43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湯金釗，《寸心知室存稿·隨筆·文端公自訂年譜·寸心知室存稿續編》，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0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林則徐，《雲左山房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4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⁷⁴ 張劍，《莫友芝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8)。

⁷⁵ 陳澧(著)、黃國聲(主編)，《陳澧集》，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⁷⁶ 祁寯藻(著)、《祁寯藻集》編委會(編)，《祁寯藻集》，1-3(太原：三晉出版社，2011)。

⁷⁷ 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1-5(北京：中華書局，2011)。

與「去熟悉化(defamiliarized)」，重新回到時代脈絡，與清朝士人處於同一時空，審視嘉道咸年間發生的諸多問題⁷⁸。

與清朝士人處於同一時空的重要途徑，乃透過詩文深入瞭解士人對時代的觀察與評論。但嘉道咸年間士人詩文集多如繁星，綜合王重民(1903-1975)、張舜徽(1911-1992)、來新夏、李靈年、柯愈春等人過眼的清人文集，已逾數千種以上⁷⁹。欲窮盡清中葉前後所有士人文集，實屬難人。故本文擬以議題為導向，集中討論內政、涉外事務、學術文化等範疇，運用相關言論，釐清嘉道咸年間士人的時代關懷重點。

本文透過士人群體的描繪以勾勒時代風貌，而非僅選取鉅型士人的論述⁸⁰。誠如朱琦(1803-1861)為符葆森(1814-1863)編纂之《國朝正雅集》題序時，強調詩謠係士人傳達性情的重要媒介，雖有專集或零星作品流傳，但唯有裒輯眾人詩作，方可看出時代風尚⁸¹。本文秉持此一精神，廣泛蒐羅全國知名的鉅型士人和地方型士人言論，綜合兩者論述，呈顯嘉道咸時期的時代風貌。在論述過程中，採取介於宏觀大歷史與微觀考證的研究取向，描繪士人時代關懷的完整面貌，而不拘泥於過度細碎的個案考證，或單一問題之論辨。

⁷⁸ 羅志田，〈民國史研究的“倒放電影”傾向〉，《社會科學研究》，4(成都，1999): 104-106；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學》，14.4(臺北，2003.12): 182-184。

⁷⁹ 見：王重民(主編)，《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9再版)；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來新夏，《清人筆記隨錄》(北京：中華書局，2005)；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上、中、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1-3(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⁸⁰ 「鉅型士人」，係指具有全國知名度，曾任中央要職或地方督撫大員，或具有高度學術聲名者，如：魏源、林則徐、姚瑩與祁寯藻等人。而地方型士人則多半活動於省縣之內，或不具全國知名度、未取得進士頭銜者，如朱鳳鳴、沈垚等人。相關研究討論，可參閱：潘光哲，〈張自牧論著考釋劄記——附論深化晚清思想史研究的一點思考〉，《新史學》，11.4(臺北，2000.12): 105-121；潘光哲，〈《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與晚清中國士人「認識世界」的「知識基礎」〉(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論文，2001.11)；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2002)，16-17/註44。

⁸¹ 朱琦，〈序〉，收入：符葆森(編)，《國朝正雅集》(清咸豐六年京師半畝園刊本，藏於臺灣大學)，13a-14b。

四、章節架構

綜上所述，由於涉及範圍與議題極為龐雜，甚難一一細述，如不以鳥瞰方式呈現，將無法呈顯嘉道咸以降的時代脈動與思潮變化。故本文擬先從嘉道咸三朝皇帝之詩文集和詔諭切入，探索其中顯現的重要時代議題。再以士人為主體，藉由實際例證析論士人關懷時代重要議題的諸多面向。

本文除第一章〈緒論〉與第六章〈結論〉外，第二章〈詔諭所見帝國之殤〉從官方視野出發，綜合析論嘉道咸三朝共同遭遇的重大議題與社會問題，並梳理三位皇帝如何看待其統治的王朝。自清聖祖以降，「大清盛世」成爲繼位者緬懷的榮光，亦爲無比承重的壓力，然承平日久，因循苟且，諸多弊病漸次浮現。身爲滿族的清朝統治者，自然對民族議題格外敏感，如何令八旗兵丁、旗人保有傳統風俗，不受漢人影響，維持其獨特性且繼續爲國效力，均係諸帝念茲在茲的重要議題。內政與涉外事務乃治理國政無法迴避的核心主軸，諸帝皆甚爲關注。風俗人心與學術文化則被視爲解決內政弊病和涉外事務的不二法門，在上位者無不大力提倡。故本章著重討論清中葉以降的旗人問題、內政弊病、涉外事務、風俗人心、學術文化等議題，藉此掌握詔諭中呈顯的時代脈動。其後，以內政弊病、涉外事務，風俗人心與學術文化等議題爲核心，探尋士人對此議題的觀察和對應之策。透過官民士庶的不同視角，描繪出嘉道咸年間的時代風貌。

第三章〈士人多旋律線的自改革〉關注嘉道咸年間的內政議題，闡述士人對人滿爲患的態度，以及因人口問題衍生的諸多弊病，對既有制度造成的衝擊，社會對立和破壞自然環境等問題。快速成長的人口考驗官員管理能力，吏治問題成爲重要關鍵，亦爲本章重點之一。自嘉慶朝伊始，士人屢犯顏直諫，指摘吏治敗壞，但未獲重視。洪亮吉(1746-1809)的尖銳言詞，非僅觸怒清仁宗，亦震撼士人網絡，引發騷動。然清中葉以降的吏治究竟有何問題？其影響層面至爲廣泛，舉凡漕運、河工、鹽政，銀與紙幣，均與吏治脫離不

了關係，故本章費詞辨析鹽漕河銀錢等經濟議題。

嘉道咸年間，另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為鴉片戰爭。第四章〈涉外事物的清議與人物品藻〉圍繞在鴉片戰爭前後，探討士人社群對鴉片戰爭和戰議題，主戰、主和之人物品評，以及天朝秩序等面向的言論。第一節從士人的英國觀切入，瞭解時下士人認識英國的途徑與評價；依循士人文字敘述，探悉鴉片戰爭的過程，關注士人筆下飽經戰火肆虐的戰區；面對鴉片戰爭的挫敗，士人試圖尋求戰敗原因；並藉由頌揚英勇殉國的將士，激發忠義之氣，喚醒時人攘夷精神。第二節以主戰人士林則徐與姚瑩受人崇敬的情形，對比主和人士穆彰阿與琦善(1790-1854)的下場，說明士人對戰和人物的神化與妖魔化。而林則徐、姚瑩獲罪遣戍事件，再度震撼士人網絡，其強度尤甚於洪亮吉遣戍伊犁事件。第三節透過士人網絡和輿論，梳理士人對天朝意象的解讀。

面對內外交迫的國情，士人究係如何回應？站在皇帝的角度，不難發現在上位者屢屢標舉人心風俗的重要性。然士人對人心風俗的態度為何？又有何實際作為？第五章〈化民成俗與詩文救國〉擬由士人對人心風俗的論述出發，探尋士人關懷時代的途徑。第一節以士人頒布勸諭告示為例，說明官員如何以實際行動化民成俗，並藉由士人文字，勾勒時下人心風俗之風貌。第二、三節，進一步闡述士人透過哀輯詩文集的方式，扭轉昔日之詩文風氣，將文學與政治局勢、社會氛圍、文化思潮、時代脈動緊密結合。第二節從纂輯《皇朝經世文編》、再現與復活經世文章著手，解析士人如何透過文集振起人心，激發社會忠義之氣。並以曾國藩為例，說明士人在師友網絡的交互影響下，一步步捲入時代學術思潮。第三節由詩賦切入，論析詩賦之作與編選詩集之影響，賦詩吟詠為士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環節，抒發情感的主要方式之一，藉由編選詩集，尤能凸顯編者意欲傳達的宗旨。本節選取鐵保(1752-1824)、符葆森、張應昌(1790-1869)三人編纂的詩集，辨析士人對嘉道咸時代的評述，並討論士人網絡的連結與日常活動，探尋士人藉由哀輯詩集，喚醒士庶危機意識的用心。



第二章 詔諭所見帝國之殤

1741(乾隆6)年，清高宗頒旨強調為政之源乃風俗人心，「人心正則風俗淳」，方能長治久安。清高宗於諭旨中評述政局，自豪清朝無諂謁女寵、干政宦官、擅權之貴戚大臣，與擁兵的強藩巨鎮，連萌孽之勢均未曾有。惟官吏、士人、氓隸、兵丁，仍未臻完善，雖在父祖與自己的努力下，尚可維持綱紀不墮。清高宗憂心如繼任者為平庸之君，將無法負荷繁重軍國大政，國事必然衰敗。故冀望內外諸臣實心任事，方能移風易俗，始為長遠之計¹。1780(乾隆45)年，清高宗年在古稀，特撰〈古稀說〉，將自己置於歷史長河中，與同享古稀高壽的漢武帝(156BC-87BC)、梁武帝(464-549)、唐玄宗(685-762)、宋高宗(1107-1187)、元世祖(1215-1294)與明太祖(1328-1398)等人相比擬，自覺有過之而無不及。且諸多亡國之兆，強藩、外患、權臣、外戚、女謁、宦寺、奸臣與佞幸等，清朝均未之見。無論年壽或國政，誠古稀矣²。清高宗多次以「綱紀肅清」描繪治下國家景況³，1793(乾隆58)年，在回覆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

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二)》，10(北京：中華書局，1986)，146/1105-1107。

² 清高宗，〈古稀說〉，收入：清高宗，《御製文二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清高宗御製文》，1(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6/319-320。

³ 如1761年清高宗自陳：「今當綱紀肅清之日，一切案牘，朕無不折衷裁處」；1767年談及吏治，云：「第就現今各省吏治而論，雖未能盡臻大法小廉，但當綱紀肅清之時，而朕之愛養生民，不容墨吏稍肆魚肉，即微員亦所深悉」；1778年諭曰：「我朝綱紀肅清，皇祖皇考至朕躬百餘年來，皆親攬庶務，大權在握，威福之柄，皆不下移，實無大臣敢於操竊」；1784年指出：「方今綱紀肅清，諸皇子皆敬慎小心，奉公守法諸臣亦斷無有畏憚迎合者」；1795年再次明言：「方今綱紀肅清，外無攬權怙勢之臣，內無婦寺偏寵

使節團通商要求時，一如其對東亞朝貢諸國的口吻，強調清朝係天朝大國，無所不有，不必與外夷進行商業貿易。但為表示懷柔遠人，仍准許來華朝貢，進行交易買賣，唯一體制須以天朝定例為準，各朝貢國一視同仁，不可獨厚英國⁴。

上述清高宗回覆馬戛爾尼的詔書內容，為中華王朝皇帝對商業貿易與華夷關係的典型論述⁵。然清高宗敘述的景象是否略有偏頗？清高宗早年對繼任者的憂心，是否已應驗在兒孫上？

1790(乾隆55)年，朝鮮燕行使者的觀察報告指出，「大抵為官長者，廉耻都喪，貨利是趨」，「侈風漸熾」，而「任事之臣，率多壅闕」，飢民「號訴無階，怨聲載路」⁶。馬戛爾尼離華時的評論，與清高宗早年的憂慮不謀而合。馬戛爾尼直言：清朝就像一艘「陳舊而又古怪的一流戰艦」，過去150年以來，因有能幹且警覺的官員使其飄浮著，並憑藉龐大外觀使四鄰畏懼。若由無能者掌舵，將失去紀律與安全，可能不會立即沉沒，在海上飄流數日後，粉身碎

之事，朕親裁庶政，鉅細無遺，宮中府中皆為一體」。見：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九)》，17/644/201；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一〇)》，18/778/553；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一四)》，22/1051/44；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一六)》，24/1220/365；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一九)》，27/1486/875。

⁴ 有關清高宗回覆馬戛爾尼的內容，見：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一九)》，27/1435/183-188。馬戛爾尼來華的相關討論，可參閱：James Louis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中譯本：鄧常春(譯)，《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⁵ 有關中華王朝皇帝對商業貿易、華夷關係的態度及相關論述，可參閱：John King Fairbank(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中譯本：杜繼東(譯)，《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王健文，〈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帝制中國初期的華夏意識〉，《新史學》，16.4(臺北，2005.12): 195-220；林孝庭，〈朝貢制度與歷史想像：兩百年來的中國與坎巨堤(1761-196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4(臺北，2011.12): 41-82。

⁶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11(北京：中華書局，1980)，4806-4810。

骨，但無法在此破舊基礎上重建⁷。

岸本美緒教授以「近世化」為主軸，論析清朝在時代脈絡中扮演的腳色，歸納歐亞大陸東側地區諸多新興政權共同面臨的問題，包括：民族、宗教與國家統合；市場經濟與財政；以及身分、社會團體與政治秩序等三大問題⁸。杉山清彥教授同樣將「大清帝國」置於歐亞大陸的歷史脈絡中，考察諸新興帝國的形質、支配組織與統治手段等面向⁹。透過兩位學者的析論，略可瞭解清朝肇建伊始面臨的時代局勢為何。因清初諸帝妥善回應時代變局，始有清高宗以降，諸帝懷想的重熙累洽。然時移世異，清王朝遭遇的問題，是否已流年暗中偷換？

本章將綜合三位皇帝的相關論述，梳理出共同關注的議題，藉以歸納清廷對此相關議題的態度，說明此時官方如何理解時代變局，勾勒詔諭中呈顯之時代脈動。身為滿族的清朝統治者，自然對民族議題格外敏感，如何令八旗兵丁、旗人保有傳統風俗，不受漢人影響，以維持其獨特性且繼續為國效力，均係諸帝念茲在茲的重要議題。內政與涉外事務是治理國政無法迴避的核心主題，諸帝皆甚為關注。風俗人心與學術文化則被視為解決內政弊病和涉外事務的不二法門，在上位者無不大力提倡。下文將以此為主軸，進行討論。

⁷ 轉引自：徐中約(著)、計秋楓、朱慶葆(譯)，《中國近代史》，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159。

⁸ 岸本美緒，〈「近世化」論と清朝〉，收入：岡田英弘(編)，《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232-239。

⁹ 杉山清彥，〈近世ユーラシアのなか大清帝国〉，《清朝とは何か》，290-301。

一、京都八旗俗習改，漸廢舊業就疲怠¹⁰

有效管理境內多民族及其衍生的相關問題，為16世紀以降亞洲地區新興政權必須面對的共同課題¹¹。清朝同樣無法迴避民族議題，在傳統中華思想脈絡下，夷夏之防尤為敏感。康雍乾各朝多起重大文字獄案，均涉及夷夏議題，牽連獲罪者甚夥¹²。1728(雍正6)年曾靜(1679-1735)案名噪一時，清世宗親自與曾靜辯論，並將相關文字彙集成《大義覺迷錄》，頒布全國廣為宣傳¹³。

清朝皇帝意欲藉由不同身分，將各民族妥善安置，保持固有傳統，不至於相互傾軋。儘管設立諸多制度加以規範，仍舊無法完全阻絕民族交流。何況過度強調民族界線與歧異，亦不利國家統治。如何維持滿族特色、避免漢化？如何保留各民族傳統，並糅合境內各民族，不因文化與宗教差異產生衝突，在在考驗執政者的智慧¹⁴。不少學者均指出清朝多民族、多元化的統治

¹⁰ 1815年，清仁宗賦詩〈射生手〉云：「射生手皆東省人，盤馬彎弧勇絕倫，平時獵獸勤練習，從軍致果心誠真。京都八旗俗習改，漸廢舊業就疲怠，恐辜列聖養育恩，教誨不懈計日待」。「射生手」意指精於騎射的武士。見：清仁宗，〈射生手〉，收入：清仁宗，《御製詩三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清仁宗御製詩》，6(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32/154；諸橋轍次(編)，《大漢和辭典》，4(東京：大修館書店，1955)，16。

¹¹ 岸本美緒，〈「近世化」論と清朝〉，《清朝とは何か》，237；杉山清彦，〈近世ユーラシアのなか大清帝国〉，《清朝とは何か》，295-296。

¹² 相關檔案史料已彙集成冊，參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輯)，《清代文字獄史料彙編》，1-14(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上海書店出版社(編)，《清代文字獄檔(增訂本)》(上海：上海書店，2011)。

¹³ 清世宗，《大義覺迷錄》(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吳家恆(譯)，《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臺北：時報文化，2002)。

¹⁴ 相關研究討論，可參閱：華立，〈清代甘肅·陝西回民的新疆進出——乾隆期的事例を中心に〉，收入：塚田誠之(編)，《民族の移動と文化の動態——中国周縁地域の歴史と現在》(東京：風響社，2003)，21-67；武内房司，〈《民族図説》の成立とその時代——一九世紀初伯麟《雲南人種図説》に見るシブソンパンナーの辺疆風景〉，收入：長谷川清、塚田誠之(編)，《中国の民族表象——南部諸地域の人類学・歴史学的研究》(東京：風響社，2005)，29-55；菊池秀明，〈清代中国南部の社会変容と太平天国〉(東京：汲古書院，2008)，137-220。

特色，如杉山清彥教授剖析大清帝國的支配構造，係結合率領八旗滿人的汗王，傳統漢人王朝的儒家天子，草原蒙古君長的大汗，西藏佛教的大檀越與文殊菩薩化身¹⁵，以及伊斯蘭世界的保護者等多重身分，糅合而成的統治構造。透過不同身分的轉換，大清皇帝有效治理漢、滿、蒙、回、藏等族群¹⁶。石橋崇雄教授以「三重構造」描繪大清帝國的統治樣貌，其代表場合分別為：北京(漢)、瀋陽(滿)與承德(藩)。大清皇帝在此三處政治核心行使權力，呈現出三種不同性格和身分，即「中華王朝體制」、「旗體制」與「汗體制」¹⁷。

清初諸帝均認識到，滿族作為統治者不可同化於其他民族，必須維持獨特存在。故清朝諸帝透過推行各式政策，維繫滿洲傳統風俗，保持語言與文字的獨特性。皇太極(1592-1643)多次以金朝舊事為例，強調騎射不可廢弛，服制不可更易，要求滿族子弟時時不忘騎射，服制更應遵循毋棄，甚至頒布相關法令保留滿族特色¹⁸。清王朝入關後，清世祖(1638-1661)與清聖祖均已察覺滿族風俗，正快速留失，且漸趨漢化。為強化滿族固有風俗習慣，清廷積極提倡國語騎射，考試繙譯¹⁹。從清聖祖開始，對滿人逐漸喪失武勇，感染漢人文弱、奢靡之風，甚為憂心。1687(康熙26)年，清聖祖談及皇子教育，強調須文武並行，滿漢兼習，若廢棄騎射，將與漢人無異。一旦棄滿入漢，背離祖訓，實非國家長遠之計²⁰。1724(雍正2)年，清世宗嚴厲斥責趙殿最(1668-1744)奏請在吉林船廠一帶建造文廟，設立學校，以為滿漢子弟讀書考試。清世宗認為：滿洲人「純一篤實」，事君至忠，事親至孝，倚仗實行與武略混一字內，

¹⁵ 「檀越」係梵語音譯，意指施主。見：諸橋轍次(編)，《大漢和辭典》，6/572。

¹⁶ 杉山清彥，〈大清帝国の支配構造〉，《清朝とは何か》，132-149。

¹⁷ 石橋崇雄，《大清帝国への道》(東京：講談社，2011)。

¹⁸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2/32/404; 2/34/446。

¹⁹ 葉高樹教授即以清初的文化政策解析，自清聖祖起，即注意滿族傳統正逐漸消逝，因此包括清聖祖、清世宗與清高宗等人，均試圖透過政策、制度的方式提振滿人重視傳統習俗、能力。參閱：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板橋：稻鄉出版社，2002)。有關清初的「國語問題」，可參閱：宮崎市定，〈清朝における国語問題の一面〉，收入：宮崎市定，《宮崎市定全集》，14(東京：岩波書店，1991)，282-337。

²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1(北京：中華書局，1984)，127。

遠勝漢人文藝，蒙人經典。如棄滿人武略之長，強就漢人文藝之風，未必能勝過漢人，宛如邯鄲學步。故滿洲尚武舊習，儉樸之俗毋得廢棄。居京滿人雖不得不兼習文藝，惟仍應以滿洲武略騎射為先，不可因崇尚文藝致使文武兩者俱無成就²¹。清高宗登基後，亦頒旨訓令八旗子弟：「勿事浮華，勿耽遊惰，交相戒勉，惟儉惟勤」，不可因承平日久而崇尚侈靡，干犯法紀，應維持儉樸風俗，以為國家根本²²。

清仁宗即位之初面臨川楚教亂，昔時倚為中堅的八旗軍隊卻不堪一擊。故清仁宗對旗人的衰弱，喪失應有的傳統、風俗，有著切身感受。1799(嘉慶4)年，清仁宗斥責竟有武職大員不習騎射乘轎出入，要求嚴加查緝，從重治罪²³。當富森布(1745-1799)以京師官兵拮据，致使操演技藝漸趨廢弛為由，奏請清仁宗施恩鼓勵。清仁宗命交軍機大臣議罪，強調國家經費有常，未可隨意恩賞。如恣意賞賚，將使旗人「妄生希冀恩賚之心」，有害風俗人心²⁴。除嚴禁八旗子弟生活靡爛，恣意揮霍外，對八旗子弟漸趨漢化，不習騎射，不諳清語，生計無著等情事，多有微詞。且維繫滿族特性乃祖宗家法，故清仁宗屢屢訓斥，規範宗室與八旗子弟，強調滿洲純樸習俗，騎射與清語的重要性。

1808(嘉慶13)年，清仁宗目睹宗室族人行為「不自檢束」，干罪獲譴者所在多有，特撰〈宗室訓〉宣示相關規範。清仁宗在訓詞中剴切陳言：八旗子弟係國家棟梁，以「孝弟忠信禮義禮恥」為立身之要，「國語騎射，讀書守分」乃應為之事²⁵。1811(嘉慶16)年清仁宗頒布〈訓諭八旗簡明語〉，列舉八旗子弟

²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一)》，7/22/360-361。

²²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一)》，9/17/442-443。

²³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47/579-580。

²⁴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46/566。

²⁵ 清仁宗，〈宗室訓〉，收入：清仁宗，《御製文二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清仁宗御製文》，1(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2/119-121。此外，清仁宗亦賦詩表達對於宗室綱紀漸趨渙散的憂心，詩云：「宗室實繁多，頗覺紀綱紊，深憫罹憲章，特製清漢訓，原期眾共和，賢愚盡思奮，前席宗族延，所答非所問，茫然皆未聞，負予垂示願，親近尚若斯，聞散又奚論，罰既不知懲，教復未能勸，吁嗟如之何，返躬惟自怨」。清仁宗，〈諭宗人府諸王貝勒〉，《御製詩二集》，《清仁宗御製詩》，4/39/60。

耽溺逸樂後產生的五大弊端，嚴重者將身敗名裂。故清仁宗訓斥八旗子弟不可不慎，以為國家棟梁²⁶。1813(嘉慶18)年，清仁宗針對移居盛京諸宗室，寄望返回故土後，能「返樸還淳，去奢從儉」，勤習武備，熟練家語²⁷。1816(嘉慶21)年，爆發宗室慶豐自首加入白蓮教一案，清仁宗勃然大怒，責成綿課(?-1826)嚴行審訊，不可迴護。翌年，清仁宗頒發〈御製訓管理宗人府王公及諸族長文〉，告戒宗人府王公與諸族長，不可有「酗酒鬥毆，淫邪放蕩」之情事，應多加策勵以杜因循、流患貽害²⁸，並以滿漢合璧的方式刊刻，頒發諸宗室，務令家喻戶曉²⁹。從清仁宗接連頒旨訓斥宗室與八旗子弟，不難看出他身為滿族大家長的苦心。

1800(嘉慶5)年，清仁宗坦言旗人生齒日繁，雖屢加恩賞，仍難「共臻饒裕」。因此，冀期八旗兵丁「力敦儉樸」，無涉「宿娼賭博」，競尚奢靡。且再度強調：八旗兵丁應「勤練弓馬，諳習清語，無失向來淳樸之風」，俾可日漸寬裕³⁰。1802(嘉慶7)年，清仁宗慨歎乾隆年間鑑於滿洲習俗純樸，曾將漢文經史典籍譯為滿文，然不肖之徒竟繙譯《水滸傳》、《西廂記》等小說，誘人為惡。清高宗為維持風俗人心，嚴令禁止。降至嘉慶年間(1796-1820)，滿人通曉滿文者甚少，滿語生疏，不識清字者比比皆是，遑論繙譯。兼且無法誦習深奧漢文，只能閱讀通俗小說，是以人心漸趨低陋。故再三頒旨嚴禁刊刻小說，以維風俗³¹。1820(嘉慶25)年，清仁宗因閱《高宗純皇帝實錄》，再次重申自清聖祖以降，在在強調肄武習勞，避免八旗子弟耽於安樂，且「騎射」乃祖宗家法，國家根本，不可偏廢。嘉慶年間，歲舉秋獮、詣陪都、謁祖陵，皆為緬

²⁶ 清仁宗，〈訓諭八旗簡明語〉，《御製文二集》，《清仁宗御製文》，1/2/121-122。

²⁷ 清仁宗，〈訓移居盛京諸宗室〉，《御製文二集》，《清仁宗御製文》，1/2/122-125。

²⁸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五)》，32/333/400。

²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五)》，32/333/400-401。

³⁰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64/861。

³¹ 有關乾隆年間，清高宗頒布的諭旨，見：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六)》，14/443/773-774。清仁宗的諭旨，見：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二)》，29/104/399-400。

懷創業艱難，不忘武備，以維繫滿族舊俗³²。

1799年，清仁宗為解決各省駐防八旗子弟的生計與仕途問題，准許各省駐防八旗子弟就近參加科考³³。翌年，清仁宗特頒詔書重新說明，不同於清世宗和清高宗憂心八旗子弟因就近參與科考而荒廢騎射，嘉慶年間，八旗子弟生齒日繁，政府已難悉數照料，任其遊手好閒亦非良法。如依循父祖成例，令其一體來京赴試，資斧亦是問題。為今之計，只能允許八旗子弟就近參加科考，為通曉文義，知所上進者，廣開宦途。惟騎射仍是八旗根本，不可廢弛，縱使參加科考，亦不能荒廢³⁴。

1843(道光23)年，清宣宗針對相同議題，再次頒旨諭示駐防各省八旗兵丁，因生齒日繁，允許通曉文義者，聽其應試，以解決生計問題，且有廣開進取之階，造就人才之意。然八旗根本應以騎射為先，清語尤為本業。清宣宗重申清仁宗成例，八旗子弟如廢弛清語騎射，將取消就近科考之恩典，並訓令相關官員詳加督促，俾使清語騎射日漸嫻熟。各省駐防八旗子弟除參加鄉試外，另有繙譯考試，鼓勵八旗子弟學習滿文，增加登進之途³⁵。

上述例證略可說明，自嘉道年間以降，「生齒日繁」已漸趨嚴重，清仁宗與清宣宗不得不違背父祖成例，略加變通，然清語騎射仍需維持。

道光年間，滿洲舊俗持續喪失，清宣宗遵循祖宗家法，對宗室和八旗相關規範屢加申斥，再三重申「國語騎射」乃八旗根本。對宗室人員沾染陋習，蕩檢踰閑與藉端訛詐等情事，要求有關大臣從嚴處置，以儆效尤³⁶。而八旗士兵因生齒日繁，競繁文薄騎射，水陸武備均疏於防務。清宣宗嚴旨要求須

³²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五)》，32/373/930-932。

³³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49/608。

³⁴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62/831-832。有關清世宗與清高宗的態度，見：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二)》，8/121/592-593；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二)》，10/72/156-157。

³⁵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六)》，38/395/1085。

³⁶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三)》，35/149/287。

勤加操練，毋廢騎射³⁷。清宣宗表示盛京、奉天等地風俗人心淳樸，不可受到他省影響，故各類戲曲娛樂，外省流民，鴉片煙毒等均嚴禁流入，並要求相關官員嚴加查緝。1826年吉林將軍富俊籲請暫緩驅逐無籍可歸之流民，清宣宗強調吉林乃清朝根本之地，如聽任流民入住，將危及旗人生計。因旗人「咸圖安逸，不知力作」，近來更染上漢俗，漸失「騎射本藝」，諭令另行安排流民³⁸。在各式場合中，凡涉及旗人事務，清宣宗無不強調「清語騎射」為滿洲根本，要求相關官員以身作則，並督促所屬精熟清語騎射，避免沾染漢人陋習，廢弛滿洲舊俗。

1828(道光8)年，清宣宗明言設立「繙譯科目」之用意，在廣開八旗子弟入仕之門，孰知旗人竟視為迂途，且錄取者答案文理欠通，錯誤太甚即占半數，可見應試者程度，期望八旗子弟勤加策勵³⁹。1833(道光13)年，清宣宗對吉林一帶士紳捐資建立考棚一事不甚同意，理由在於：如若八旗子弟醉心讀書科考，恐將「輕視弓馬，怠荒武備」。故特旨強調滿洲根本以騎射為先，毋得廢弛本業，必令各子弟嫻熟騎射。清朝發祥之地吉林，更應謹守滿洲本分，且國家教養八旗子弟以弓馬武備為先，並非專習舉業，崇尚文風⁴⁰。

1825(道光5)年，吉林衙門與旗民間的訴訟案件多以漢文書寫，清宣宗要求應恢復舊俗，並允許吉林將軍富俊(1748-1834)奏請頒發官刻滿文書籍，讓衙門官吏得以學習清語⁴¹。1827(道光7)年，清宣宗收到廣州將軍慶保(1759-1833)奏摺，以漢文寫成，諭示：「清語騎射」係滿洲根本，各省駐防八旗須一體學習清語，嚴令各省將軍，副都統均應循例以清摺具奏，且訓練所屬滿洲官兵精熟清語騎射，毋得沾染漢人習氣，廢弛滿洲舊業⁴²。1850(道光30)年，清宣宗召見安徽蕪采營遊擊薩齡阿時，因未以清語入奏，現場考核清語亦茫然不知，云

³⁷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五)》，37/271/177-178。

³⁸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二)》，34/102/676-677。

³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三)》，35/143/199。

⁴⁰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四)》，36/247/717-718。

⁴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二)》，34/79/276-277。

⁴²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二)》，34/127/1121-1122。

「自幼並未學習」。清宣宗怒斥薩齡阿為「旗人中之敗類」，諭令專心學習清語騎射，並交由載銓(1794-1854)留心察看，以觀後效⁴³。

清朝重視騎射，皇室尤然，清初諸帝泰半皆能親自率兵征討四方，但清高宗以後漸成虛文，清文宗尤為重大轉捩點。儘管崇彝云：清宣宗騎術甚精，在天理教亂中持鎗禦敵。而清文宗為皇子時騎術嫻熟，於南苑逐獸之際，不慎墜馬傷股，經診治後雖無大礙，卻終身行路不便⁴⁴。清文宗雖曾與奕訢(1833-1898)共創「棣華協力槍法二十八式」與「寶鏢宣威刀法十八式」⁴⁵，但似乎離騎射征伐已愈來愈遠。連身為旗人首領的清文宗亦呈現文弱書生模樣，又如何要求享樂已久的八旗子弟嫻熟騎射？

清文宗延續諸帝政策，於維繫滿族特色不遺餘力，並訓斥不可因循塞責，須實心辦理⁴⁶。1851(咸豐元年)年，御史王茂蔭(1798-1865)奏請振興人才，清文宗覽奏後，針對宗室八旗人才一節頗有感觸。重申八旗人才之勝遠邁前代，習尚淳樸，以清語騎射為本務。然近來多沾染時習，不務本業，崇尚浮華。故諭令宗室與八旗應奮勉砥厲，以為國家腹心干城⁴⁷。1854年，清文宗接到蘇勒布的謝恩摺，以滿文繕寫的名字、文句多所錯漏。蘇勒布為新任國子監滿洲司業，諸多案牘均須以滿文書寫，且負有考課滿文之責，竟不識滿文實「可惡之至」，因而予以降職。清文宗強調：「不曉清語，不識清字」，猶是旗人乎？嗣後八旗子弟不論出身，均須通曉清文，無論文字繕寫或口語奏對，一旦發現怠惰偷安，將嚴懲不貸⁴⁸。

滿人風俗自清初的純樸尚武，至清中葉變為奢靡文弱，其間轉變甚劇。

⁴³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一)》，40/23/341。

⁴⁴ 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2。

⁴⁵ 見：清文宗，〈棣華協力序〉、〈寶鏢宣威序〉、〈棣華寶鏢合編識語〉，收入：清文宗，《御製文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清文宗御製詩文》(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下/244-245。

⁴⁶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一)》，40/49/662。

⁴⁷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一)》，40/44/608-609。

⁴⁸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三)》，42/127/252。

由於旗人乃由國家供養，加上承平日久，早已脫離四處征戰之歲月，故旗人在北京的生活逐漸發展出一系列玩樂活動，包括：鬥蟋蟀、溜鳥，其中戲園更是蓬勃發展⁴⁹，看戲、唱戲成爲旗人時髦的標誌。清仁宗與清宣宗對八旗子弟沾染戲劇，不論沈迷其間，或參與演出，均甚爲在意，嚴禁北京、盛京等地出現戲園。

1799年，清仁宗因京城九門內戲園日漸增多，致使八旗子弟沉迷其間，漸趨浮蕩，生計拮据，下旨永遠禁止於城內設置戲園，以維風俗⁵⁰。1806(嘉慶11)年清仁宗聽聞旗人登臺唱戲之事，痛斥爲不務正業，偷閒遊蕩，甘爲下賤，諭令步軍統領衙門嚴加查辦⁵¹。1824年，清宣宗頒旨嚴禁於京城內開設戲莊，以維風俗人心⁵²。1830年，清宣宗密查得知盛京將軍奕顯(?-1843)生活奢華，不時在府內演戲宴會，大爲震怒，下令交宗人府嚴加議處，強調盛京係陪都，不許戲班聚集，豪奢放逸。且強行驅逐境內戲班雜劇，進而訓令官員嚴加查緝，使其不得潛行入境⁵³。其後，清宣宗於1833、1836(道光16)年再三重申，驅逐盛京所有戲班雜劇，以維持淳樸風俗，防止奸徒結黨⁵⁴。從相關諭旨中，不難看出清仁宗與清宣宗的態度，爲維持京城、陪都等處風俗，嚴令禁絕一切戲劇演出。雖不免矯枉過正，但可見其憂心程度。

清文宗曾因達崇阿身任武職二品大員，竟「性好演戲，並縱容子弟演唱，實屬有玷戎行」，予以革職，發往新疆充當苦差⁵⁵。1852(咸豐2)年，清文宗要求步軍統領衙門、五城御史，嚴加查禁戲園，「以振靡俗而除積習」⁵⁶。1859(咸

⁴⁹ 參閱：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劉小萌，《清代八旗子弟》(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112-145。

⁵⁰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42/505。

⁵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三)》，30/169/199-200; 30/172/239。

⁵²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二)》，34/67/59-60。

⁵³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三)》，35/166/576。

⁵⁴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四)》，36/244/665-666；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五)》，37/286/419; 37/289/462。

⁵⁵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一)》，40/2/85。

⁵⁶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一)》，40/51/687。

豐9)年，清文宗以順應輿情為由，允許商民演劇酬神，雖重申「不准尋常演戲，以敦樸素而杜奢華」，惟例一開，再難禁制⁵⁷。在旗人數量大幅增長，且漸趨奢靡的情況下，諸帝雖試圖力挽狂瀾，卻已難以遏止。

二、內政疲弊積習重

「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乃清朝諸帝面對宗室、八旗子弟問題時，必然指出的重要主因。時至19世紀，無論滿漢或其他民族，均有人口過剩的問題。從清高宗頒布的諭旨，不難看出清高宗已觀察出問題核心，近乎每年均在諭旨中提及「生齒日繁」，堪稱乾隆年間的重要關鍵字⁵⁸。據統計，1790年，人口總數一度突破3億；1819年增至3億5千萬；1834年4億；1850年逼近4億3千萬⁵⁹。過度膨脹的人口為清朝政府帶來極大壓力，影響擴及各層面，包括：地方官吏的管理事務，治安維護，經濟財政與糧食生產等內政議題，無一不受「生齒日繁」的影響。

清朝諸帝始終高度關注內政，祖訓亦再三強調勤政與愛民的重要性⁶⁰。自清世宗起，透過密摺制度，地方官員得以上達民情，事無巨細均在皇帝掌握之下。19世紀後，內政問題如雨後春筍一一浮現，且猶似脫韁之馬，越愈加難制。

⁵⁷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五)》，44/285/180。

⁵⁸ 由於內容繁多，無法悉數列舉，僅列出部分內容以為參考，如：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一)》，9/17/442-443; 9/50/860;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二)》，10/67/91-92; 10/86/341-342;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三)》，11/164/60; 11/181/352;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四)》，12/262/400。

⁵⁹ 有關清朝人口統計數字，參閱：張岩，〈對清代前中期人口發展的再認識〉，《江漢論壇》，1(武漢，1999): 65-69; 何炳棣(著)、葛劍雄(譯)，《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北京：三聯書店，2000)，328-330。

⁶⁰ 清仁宗，〈勤政殿記〉，《御製文初集》，《清仁宗御製文》，1/4/38-39; 清仁宗，〈勤政愛民論〉，《御製文二集》，《清仁宗御製文》，1/9/194-196。

(一) 災荒

自古以來，天災常被視為上天示警。為避免災害擴大引發民變，統治者無不竭盡心力彌補災變造成的損失，將傷害降至最低。清初亦曾爆發不少大規模災荒，如1660(順治17)年發生嚴重旱災，清世祖為此反思已過⁶¹。1681(康熙20)年渾河決隄，東北30餘里、西南20餘里均遭水淹⁶²。1689(康熙28)年北京發生亢旱，災情之重，讓清聖祖「不堪寓目」⁶³。1730(雍正8)年山東被水嚴重，京師亦有震災⁶⁴。諸帝皆立即回應，妥善賑濟，將災情減至最低。

時序進入19世紀，災荒愈見頻繁，且受災地區和時間漸趨擴大。張豔麗教授舉出：1801年永定河決口，1813年冀魯豫三省旱災，1823(道光3)年京畿直隸與蘇浙皖等省大水災，1841-1843年黃河大決口，1846-1847(道光27)年秦豫大旱，1848(道光28)-1850年東南各省大水災，為嘉道年間六大災荒。六大災荒的災民均達萬人以上，受災範圍更跨省越縣，相關損失難以數計⁶⁵。此外，中小型災害不勝枚舉，以安徽一地為例，1840(道光20)-1861年，大旱、暴雪、瘟疫、水患、蝗災、飢荒與地震等，無歲不有⁶⁶。

面對如此災情，諸帝皆表現出與民同悲的態度，並遵循祖訓盡力救災。如清仁宗坦言1801年的水患乃「從來未有之大災患」，90餘州縣受災，數千萬黎民流離失所，「實予不德之所致」。為彌補已過，唯實力救民，多方賑卹⁶⁷。冬季來臨前，清仁宗特意發放棉衣助災民過冬⁶⁸。1832(道光12)年，「亢旱異常，經夏不雨」，清宣宗仿效清高宗行大雩之禮，虔誠祝禱。祝文情詞懇切，歷

⁶¹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2(北京：中華書局，1977)，5/ 159。

⁶²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一)》，4/ 97/ 1126- 1127。

⁶³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5/ 141/ 555- 556; 5/ 142/ 559- 560。

⁶⁴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3/ 9/ 329。

⁶⁵ 張豔麗，《嘉道時期的災荒與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3- 54。

⁶⁶ 王鶴鳴、施立業(整理)，〈近代安徽災荒繫年錄〉，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7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189- 196。

⁶⁷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二)》，29/ 98/ 319。

⁶⁸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二)》，29/ 88/ 166- 167; 29/ 89/ 176。

數勞民傷財，任官不當，用兵殺戮與剿撫不當等過失，冀可仰邀赦宥⁶⁹。1845(道光25)年，臺灣彰化發生大地震，清宣宗立即撥銀五千兩以爲賑濟，並要求臺灣道府親往勘災，妥爲撫卹⁷⁰。1850年，清文宗甫登極，旋即接獲浙江水患災情，諭令吳文鎔(1792-1854)馳赴災區盡心辦理⁷¹。1852年，清文宗面對湖北嚴重水災，要求地方官員不論被水輕重，均應盡速撫恤，後續疏消，緩徵錢糧等事宜，亦需確查具奏⁷²。

當諸帝對災荒感同身受，委任各地官員賑濟災民之餘，卻也驚見遲報災情，侵吞賑濟款項或浮報開銷等，致使賑災效果大大折扣，嚴重者甚至衍生變亂。如1802、1803(嘉慶8)和1804(嘉慶9)年，均發生官員隱匿蝗災情事，清仁宗大爲震怒，強調自己並非好諛惡直之君，爲何群臣以妄誕之詞敷衍塞責？如再不據實呈報，將難逃重懲⁷³。1817(嘉慶22)年，直隸省順天府一帶降雨甚少，清仁宗除「躬自引咎」外，諭令諸臣「各思己過」。並要求地方官員實心任事，方可「救荒安民」，倘若依然故我，「因循疲玩」，則是泯滅良心⁷⁴。1822(道光2)年，清宣宗風聞直隸地區竟有胥吏假借勘災，勒索災民，特命顏檢(1757-1832)與陸言(?-1832)詳細查明，據實奏報，毋得姑息⁷⁵。諸帝深知，如未妥善賑濟災民，後續引發的問題將更難處理。1847年與1849(道光29)年，清宣宗面對災荒時，特旨要求官員嚴加緝捕土匪，以防災民受其脅迫落草爲寇。清宣宗知悉「地方官先事既不能設法安撫，臨時又不能嚴拏懲辦，其始土匪冒爲災民，其後災民勢必流爲土匪」，故派遣官員馳往災區，確實訪查⁷⁶。縱在豐稔之歲，亦有官吏謊稱受災，冀期從中圖利。1855(咸豐5)年，清文宗要求官員釐清江蘇

⁶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四)》，36/214/176-177。

⁷⁰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七)》，39/418/244。

⁷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一)》，40/17/241。

⁷²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一)》，40/65/857。

⁷³ 參閱：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二)》，29/102/375; 29/116/537; 29/130/770-771; 清仁宗，〈見蝗歎〉，《御製詩二集》，《清仁宗御製詩》，3/5/22-23。

⁷⁴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五)》，32/330/358-359。

⁷⁵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一)》，33/46/816-817。

⁷⁶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七)》，39/447/602-603; 39/470/919。

省秋收數量，究竟是豐稔或歉收，嚴禁官吏捏報災荒，中飽私囊，並簡派怡良(1791-1867)、吉爾杭阿(?-1856)前往調查，據實參奏⁷⁷。

19世紀以降，災荒頻傳的背後，說明了天候異常帶來的劇變⁷⁸，更透露出官吏敗壞造成的內政問題。

(二)吏治蠹壞

清仁宗、清宣宗和清文宗對吏治敗壞的情形，了然於心，直指吏治敗壞與官員因循，乃當前諸病之源。

1799年，清仁宗坦承奏摺所言外省四項積弊「切中時弊，朕所素知」。這四項積弊所論，無不針對督撫官員在外的鋪張排場，與勒索州縣等情事⁷⁹。奏摺中所論官員諸多行徑，在在顯示吏治的嚴重腐敗情形。清高宗病逝後，各省督撫藩臬紛紛具摺表達慰問之情，然清仁宗對此類奏摺深表不滿，強調督撫藩臬應針對「吏治官方，民生休戚」等，「留心查察」並據實奏陳⁸⁰。略可說明清仁宗對時下官員怠惰，吏治敗壞等情形憂心不已。清仁宗深知吏治係一切為政之本，若無官吏協助，不僅民情無法上達，政策亦難貫徹。故清仁宗強調識人不易，賢才難得，知人善任始有良好吏治，唯有去除官吏怠疲習氣，風俗方能淳厚⁸¹。清宣宗略謂：有治人無治法，只要得人，各級官員均實心任事，自然化民成俗，何需費心立法？⁸²清文宗屢言得人甚難，再三

⁷⁷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三)》，42/185/1071-1072。

⁷⁸ 有關19世紀以降，氣候劇變的相關討論，可參閱：張研，〈清代自然環境研究〉，《史苑》，8(北京，2005)：<http://www.historychina.net/magazinefree/html/13/73/content/148.shtml> (中華文史網)

⁷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40/474。

⁸⁰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40/480。

⁸¹ 清仁宗，〈靜怡軒〉，《御製詩三集》，《清仁宗御製詩》，5/19/336；清仁宗，〈鑑古齋〉，《御製詩三集》，《清仁宗御製詩》，6/38/245。

⁸² 參閱：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三)》，35/191/1024-1025；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五)》，37/271/170-172。

頒旨宣示整頓吏治的決心⁸³。

儘管清仁宗、清宣宗與清文宗均瞭解吏治的重要性，且對當前官場弊病略有所聞。如清仁宗自云對各州縣官府虧空、養廉銀和倉儲備荒等弊端知之甚詳，屢加訓斥，勒令各級官吏儘速改善，以「清吏治而肅官方」⁸⁴。1832年，御史裘元俊奏陳〈請飭各督撫整飭吏治民風〉，清宣宗重申政治得失、官員良莠與否，皆繫於督撫大吏有無隨時查辦。並臚列直隸習教傳徒案，廣東包攬鴉片獲取暴利案，江西會匪肆虐案，福建漳泉械鬥案，山東搶案，以及雲貴川等省「罌粟遍地，賊匪結黨擾害」等情事，凡此種種，皆肇因各省官吏未能實心查察，致使危害日甚一日。故要求督撫「激發天良」，毋得隱隱⁸⁵。咸豐年間(1851-1861)，官場陋規依舊盛行，甚或愈加嚴重。1851年，清文宗在諭覆慧成(1803-1864)奏陳禁侈言祥瑞及整頓吏治時，重申遵循清仁宗與清宣宗故事，直言近來所奏多為粉飾太平之語，兩廣一帶正值用兵之際，不可大意，要求督撫大員須實心實力杜絕奔競積習，革除因循弊病⁸⁶。1854年，何紹基(1799-1873)彈劾四川總督裕瑞(?-1868)收受陋規事，清文宗命載齡(1812-1883)、崇實(1820-1876)前往調查。經訪查後得知，自總督以下，各級官員均收受賄賂，致使公務廢弛，屬吏刁頑。但清文宗卻僅將總督裕瑞革職查辦，其餘各員皆從寬處置。雖然諭旨最後重申，禁革一切陋規，如「屢訓不悛」將予以重懲。但連懲一儆眾皆未之見，如何遏止陋規橫行？兼且裕瑞革職後不久後仍獲起用，歷任喀喇沙爾、喀什噶爾辦事大臣、葉爾羌參贊大臣、鑲紅旗滿洲都統、兵部左、右侍郎，正黃旗護軍統領等職位，實難警效尤⁸⁷。

⁸³ 參閱：清文宗，〈開誠痛戒因循詩以代諭〉，《御製詩集》，《清文宗御製詩文》，4/ 184；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二)》，41/ 92/ 264- 265；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三)》，42/ 131/ 338；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四)》，43/ 206/ 253- 254；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五)》，44/ 345/ 1104。

⁸⁴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 41/ 502- 503；28/ 44/ 530；28/ 57/ 749。

⁸⁵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四)》，36/ 213/ 141。

⁸⁶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一)》，40/ 26/ 375- 376。

⁸⁷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三)》，42/ 151/ 637- 638。有關裕瑞生平介紹，見：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13(北京：中華書局，1987)，3964- 3967。

故清仁宗、清宣宗與清文宗雖屢頒詔書嚴厲斥責，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

除了官員問題外，地方胥吏尤為一大弊端。宮崎市定論析胥吏乃近世獨裁君主政治下，伴隨官僚制度漸趨完備的特殊制度。儘管清世宗以降諸帝均對胥吏多所約束，但胥吏勾結官員的幕友，並依賴陋規生存。因此，清宣宗即位後試圖禁絕一切陋規，改革胥吏造成的官場弊病，卻遭到強烈反對，致使禁革陋規一事無疾而終⁸⁸。山本英史教授指出，自17世紀起，胥吏已有「衙蠹」之稱，即寄生於衙門內，蛀蝕政府的害蟲。雖然巡按御史屢屢糾舉州縣官「縱蠹」情形，以進行「剔蠹」，但胥吏與官員間的關聯極為緊密，「衙蠹」問題始終未能解決⁸⁹。

1806年，清仁宗賦〈懲蠹詩〉痛陳胥吏之弊，強調御極以來「勤求治道，惟以整飭官方，剔除吏弊為亟」，然官員竟如木偶，任憑胥吏擺布，甚或狼狽為奸。清仁宗除懲處直隸藩庫虛解虛收的涉案官員，亦自慙德化未淳⁹⁰。1819年，清仁宗頒旨強調督撫延聘幕友佐理繁雜事務的必要性，但不可任其胡作非為。故特旨孫玉庭(1752-1834)，要求密查署中幕友有無「倚藉聲勢，包攬招搖情事」，據實參辦，以免「累及己身，並貽誤公事」，甚至直接諭令孫玉庭將此幕友驅逐⁹¹。

1820年，清宣宗諭示：實施將屆滿百年的養廉銀制度，及其相應而生的諸多陋規，皆肇因於各級官吏未能循名責實，盡心奉行。並直指官吏剝削乃民生困敝主因，要求清查所有陋規以決存廢，體現恤吏愛民之心，達成吏治清民生厚的理想⁹²。然諭令一出立刻引發官員激烈論辯，湯金釗、陳官俊(?-1849)、汪廷珍(1757-1827)與孫玉庭等先後上奏表達反對之意；於是清宣宗詢問

⁸⁸ 宮崎市定，〈清代の胥吏と幕友—特に雍正朝を中心として—〉，《宮崎市定全集》，14/173-205。

⁸⁹ 山本英史，〈「衙蠹」のいみするもの——清初の地方統治と胥役〉，收入：細谷良夫(編)，《清朝史研究の新たなる地平》(東京：山川出版社，2008)，140-162。

⁹⁰ 清仁宗，〈懲蠹詩〉，《御製詩二集》，《清仁宗御製詩》，3/23/251-253。

⁹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五)》，32/354/675; 32/355/691。

⁹²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一)》，33/4/124-125; 33/5/130-131。

方受疇(?-1822)、蔣攸銛(1766-1830)等人，皆期期以爲不可。反對者率皆強調：此舉殊非治本之道，官吏苛索之風或將愈加熾烈，並申辯「吏治貴在得人，得其人，雖取於民而民愛戴之，不害其爲清」⁹³。清宣宗幾經思考後，取消禁革陋規事，倡議者英和(1771-1840)則遭逐出軍機處⁹⁴。道光年間，胥吏之弊仍層出不窮，1832年清宣宗諭覆御史陳焯奏請整飭吏治時，表示：州縣緝拏匪徒不得不用胥吏，然「會匪梟徒、土豪巨盜」竟賄通胥吏，逼使良民來京具控。嚴旨要求官員實心訪查，毋讓胥吏有機可趁，顛倒是非⁹⁵。

1851年御史吳若準(?-1854)奏請嚴禁差役積弊，因胥役已由辦公差遣之用，變爲假公濟私、蠹害民眾。清文宗飭令地方官員隨時糾舉胥役之弊，嚴加懲辦，不得故縱⁹⁶。同年，貴州古州鎮總兵雙福(?-1852)奏謝其子蒙恩授爲廕生，清文宗語重心長地諭示：「清」字係爲官第一要務，切不可拘泥積習，因循不振⁹⁷。清文宗一語道破官場弊病之源，貪墨之風橫行，官員泰半因循怠惰，衍生種種惡習。如此風氣瀰漫整個社會，更擴及各層面，諸多弊病追根究柢均關乎吏治敗壞。

(三) 鹽漕河三大政

鹽務、漕運與河工係清朝三大政⁹⁸，歷朝皇帝均謹慎以對，力圖除弊以

⁹³ 如湯金釗疏言：「陋規皆出於民，地方官未敢公然苛索者，畏上知之治其罪也。今若明定章程，即為例所應得，勢必明目張膽，求多於例外，雖有嚴旨，不能禁矣。況名目碎雜，所在不同，檢察難得真確，轉滋紛擾。無論不當明定章程，亦不能妄立章程也。吏治貴在得人，得其人，雖取於民而民愛戴之，不害其爲清；非其人，雖不取於民而民嫉讎之，何論其爲清？有治人無治法，惟在督撫舉措公明，而非立法所能限制」。趙爾巽(等撰)，《清史稿》，38/364/11427。孫玉庭的奏疏內容，見：孫玉庭，〈請停止查辦陋規疏〉，收入：孫玉庭，《延釐堂集·奏疏》(1872年孫毓漢校刊本，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卷中/40a-47a。

⁹⁴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一)》，33/10/209-210。

⁹⁵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四)》，36/211/107-109。

⁹⁶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一)》，40/41/566。

⁹⁷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一)》，40/37/513。

⁹⁸ 陳康祺與金安清均曾並舉鹽漕河係三大政。見：陳康祺(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郎

維持正常運作。如清仁宗親政後，屢頒諭旨飭令所屬官員肅清漕務積弊，毋得徇私⁹⁹。惟清仁宗亦察知各省名爲肅清漕務，浮收之弊依舊存在，督撫縱容下屬收賄，卻無「實力糾察嚴參」，要求督撫須以用人爲先，正本清源，1800年責成費淳(1739-1811)、鐵保、岳起(1750-1803)與阮元(1764-1849)等人規劃漕運事宜，不得有誤¹⁰⁰。儘管清仁宗屢頒諭旨，希冀各省督撫實心辦理。但直至1819年猶見清仁宗頒旨曰：「漕務正當剔除積弊，大加整頓之時」，顯見漕務積弊終嘉慶朝均未見革除¹⁰¹。

清仁宗於1806年勅勉河道總督戴均元(1746-1840)，強調漕運對北京的重要性，須認真辦理¹⁰²。1810年，清仁宗更多次言明，河工與漕運互爲表裏，相互影響，飭令所屬官員認真辦理。爲求漕糧暢通，清仁宗甚至要求松筠(1752-1835)、章煦(1745-1824)與蔣攸銛等員，試辦漕糧海運的可行性¹⁰³。但兩個月後，章煦覆奏云：海運諸多不便，礙難辦理，其事遂寢。清仁宗只得要求督撫奏陳海運以外之法，以解決漕糧運輸問題¹⁰⁴。

自1824年起，因江南高家堰漫口，衝毀運道，海運之議遂起。1825年，清宣宗頒旨要求官員籌議漕糧海運相關細節，表示海運係一時權宜之計，無預設立場，端視群臣奏覆意見而定¹⁰⁵。1826年，在琦善、陶澍等人執行下，順利完成漕糧海運。雖成效頗佳，但並未持續執行。直到1847年，始再試辦海運。

潛紀聞四筆》(北京：中華書局，1990)，122；歐陽兆熊、金安清(撰)、謝興堯(點校)，《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87。

⁹⁹ 如：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49/604-605；28/52/671-672；28/59/773。

¹⁰⁰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59/768；28/76/1026-1027。

¹⁰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三)》，30/211/826-828；30/215/882；30/219/947；957；30/220/974-975；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五)》，32/361/766。

¹⁰²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三)》，30/164/140。

¹⁰³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四)》，31/224/8-9；31/226/40。

¹⁰⁴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四)》，31/228/58-59。

¹⁰⁵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二)》，34/79/271；34/81/303；34/83/338-339；34/84/360-361；34/85/363-364；34/92/491-492。

清中葉以降，漕運面臨的問題，除災變頻傳外，更大的問題在於官吏貪腐蠹害漕運正常運作。1820年，清宣宗登基後，諭示：「漕務積弊，首在浮收」，欲革浮收之弊，須輔以恤丁之法，始能徹底革除相關陋規¹⁰⁶。其後，清宣宗屢頒諭旨，冀期大小臣工實心革除漕務浮收之弊。若因循不改，將嚴懲不貸¹⁰⁷，惟成效不佳。咸豐年間，相關漕運弊病殊無趨緩情勢，反愈加嚴重。清文宗即位後，御史李維翰(?-1879)奏陳：海防、河工與漕務係攸關國計民生之三大端，須以實心實政，方能剔奸釐弊。清文宗諭覆要求各省督撫實心整頓¹⁰⁸。嗣後清文宗依舊不時頒旨飭令督撫整頓漕務積弊，顯見清文宗對漕務疲弊之憂心。雖多次改定相關章程，嚴懲官員，但仍未見遏止¹⁰⁹。

長久以來，鹽一直是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故鹽政乃國家重要大事。然鹽務相關運作，自清中葉以降即弊端叢生，諸帝無不疊頒諭旨要求各級官吏實心革除鹽務弊病¹¹⁰。儘管言者諄諄，但成效卻遠不如預期，僅道光年間陶澍、陸建瀛(?-1853)先後在兩淮地區進行鹽務整頓，推行票鹽之法，稍有成果。但積弊已久，實非少數督撫地區性的改革，能夠徹底改善。清宣宗的鹽務、漕務改革，仍未能撼動既有制度，打破積弊，在在凸顯改革的難度。

¹⁰⁶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一)》，33/5/140。有關歷朝浮收之數額，可參閱：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運(修訂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254。

¹⁰⁷ 如：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一)》，33/12/235-236; 33/15/283; 33/17/310; 33/20/368-369;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三)》，35/146/246。

¹⁰⁸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一)》，40/7/135。

¹⁰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一)》，40/31/439; 40/51/690-691;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三)》，42/141/478;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四)》，43/197/137-138; 43/238/693; 43/259/1026;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五)》，44/302/416-417。

¹¹⁰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58/765;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一)》，33/15/287-288;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二)》，34/83/340; 34/95/531-532;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四)》，43/261/1045;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五)》，44/350/1164-1165。

(四) 銀貴錢賤

清朝銀礦藏量並非豐富，卻以銀作為主要貨幣之一，殊堪玩味。19世紀以降，益加確立銀銅作為主要交易貨幣的地位，白銀更是繳納稅收的最終媒介，透過交易取得的白銀數量多寡，將影響銀銅的兌價波動。

雖然嘉慶朝已隱約浮現「銀貴錢賤」的現象，清仁宗即位之初，「各省銀少錢多，銀貴錢賤」，要求各省督撫嚴加處理¹¹¹。惟後續鮮少見到清仁宗論及「銀貴錢賤」議題。進入道光朝，銀價問題漸次浮上檯面。1824年清宣宗收到奏摺云「銀貴於錢」，銀錢兌換時，形同支絀。清宣宗於是下旨停鑄銅錢，軍餉發放一律改以白銀支應，並要求督撫須視市場價格隨時調整銅錢數量¹¹²。其後，清宣宗根據許乃濟(1777-1839)、鄧廷楨(1776-1846)等人奏疏，以為鴉片進口是造成銀貴錢賤的主因，要求廣東貿易只准以貨易貨，紋銀易貨，不得以洋銀易貨，防止銀價持續飆漲¹¹³。1844(道光24)年，清宣宗提及「銀貴錢賤為各省通病」，考慮是否改以「銀錢兼收，就近撥解」等方式解決¹¹⁴。1844年策試，清宣宗要求考生論析：以銀為幣始於何時，何地，樣式為何，便利何在，何代錢式最善，何人論錢法最詳，以及鈔法利弊得失等問題¹¹⁵。略可顯見清宣宗急欲廣徵士人意見，冀期解決當前遭遇的貨幣難題。

1853(咸豐3)年清文宗諭令戶部「製造錢鈔，與官票銀錢並行」。因清文宗見「銀價日昂，民生愈困」，小民均受其害，欲發行「官票寶鈔」以「濟銀錢之不足，務使天下通行，以期便民裕國」¹¹⁶。但這項政策並未得到支持，僧格林沁(1811-1865)、翁心存(1791-1862)等人均上奏表達窒礙難行之處，清文宗仍

¹¹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4/103-104。

¹¹²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二)》，34/65/33。

¹¹³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四)》，36/238/566-567；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五)》，37/284/392-393；37/309/819。

¹¹⁴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七)》，39/405/77。

¹¹⁵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七)》，39/404/64-65。

¹¹⁶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二)》，41/113/764-765。

執意實行，重申完稅須以鈔票和銀錢並行¹¹⁷。而上奏直言鈔法窒礙難行的王茂蔭，更遭到清文宗「嚴行申飭」¹¹⁸，顯見清文宗之堅持己見。

據林滿紅教授研究指出：吾人應修正長久以來，認為鴉片進口是造成清朝白銀外流主因的論點。從全球經貿變化的角度觀察，將可發現自18世紀晚期開始，中國轉而單純依靠拉丁美洲進口白銀，與過去從琉球、朝鮮、緬甸、日本與安南等多處進口白銀極為不同。輔以19世紀初期，中國茶與絲的出口量銳減，拉美地區貴重金屬減產，致使白銀進口數量不足¹¹⁹。然而清中葉諸帝，殊難跳脫既有框架，立足全球視野，辨析「銀貴錢賤」的難題。

(五)礦務

清初諸帝對開礦一事，泰半表達禁絕態度。早在1652(順治9)年，即有開礦之議，然工部卻以明朝萬曆年間(1573-1620)故事為由，強調「差官開礦，徒虧工本，無裨國計」。清世祖同意工部所云，諭令嚴行禁止¹²⁰。康熙年間，仍有官員奏請開礦，清聖祖皆以擾害百姓、無甚大益等為由禁止¹²¹。清世宗詔示：養民之道當勸農務本，而非舍本逐末，競逐末利殊非正道。且礦源難保生生不息，更恐因開礦而嘯聚匪徒，引發禍端，故嚴禁招商開礦，以免因小失大¹²²。

¹¹⁷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二)》，41/115/804-806。

¹¹⁸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三)》，42/123/137-138。

¹¹⁹ 林滿紅(著)、林滿紅、詹慶華(等合譯)，《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56-93。

¹²⁰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3/70/556。

¹²¹ 如1682年，「九卿議准土司田舜年請開礦採銅。上曰：開礦採銅恐該管地方官員借此苦累土司，擾害百姓。應嚴行禁飭，以杜弊端」；1712年，「上諭大學士等曰：前原任四川巡撫能泰曾具摺奏請開礦，後又奏稱江中有銀，派官監視撈取，以為兵餉。朕以此二事俱不可行，隨硃筆批發。朕乃人君，豈有令江中撈取銀兩之理。觀此二事即知能泰必貪，爾等可傳能泰問之。尋大學士等奏傳問能泰，據云奏請二次皇上皆硃筆批不准行。算開礦所用工費，價值亦無大益。上曰：以此觀之，一面奏請，一面即行矣。督撫提鎮奏摺一二次，朕即可知其行事也」。見：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5/104/53；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6/252/494。

¹²² 參閱：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一)》，7/24/380；7/55/830；中華書

清高宗秉承父祖遺訓，仍以務本、防範聚眾滋事為出發點，禁絕開礦¹²³。

嘉慶年間，清仁宗猶引述清世宗諭旨，強調開礦係「言利擾民」，自己並非好利之君，且國用充足，豈可「窮搜山澤，計及錙銖」。而開礦將聚集游手之民於深山老林，官員難以管理，故嚴禁開礦¹²⁴。其後商人呈請官員轉奏，冀期准許開採金、銀、銅等礦藏，清仁宗皆訓戒臣工不得言利，且將聚集遊民、匪徒，恐有聚眾滋擾之憂，一律嚴旨駁回¹²⁵。一旦奏報出現偷挖之事，立即要求督撫限期遣散，封禁礦坑¹²⁶。

清宣宗即位後，同意各地督撫奏請開採礦藏，包括廣西多處縣分和四川地區¹²⁷。清宣宗認為，因官吏為奸，致使官民受開礦之累。若能經理得宜，將可富國裕民，雲南、貴州、四川與廣西等處礦場可為明證。清宣宗進而密諭桂良(1785-1862)、賀長齡與周之琦(1782-1862)等督撫，酌予開放民間開採，惟須嚴防吏胥介入，冀期有益國計民生¹²⁸。1848年，清宣宗重申開礦之舉係藏富於民，如督撫均能確實管理，何患人民聚眾滋事¹²⁹。

1826年，為鼓勵鑄造制錢以供軍用，清宣宗諭令招募商民，於新疆別開新礦以增鑄造¹³⁰。惟當商民奏請於京師近郊開採銀礦時，清宣宗卻以地近京師，有礙風水為由禁絕。連呈奏的英和亦遭降三降留任，其餘戶部堂官一律降二降留任¹³¹。然伴隨開礦而來的諸多問題，漸次浮現，包括搶奪礦場，礦匪聚眾滋事，私開礦藏等情事¹³²。

局影印，《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二)》，8/117/556。

¹²³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三)》，11/219/820-821。

¹²⁴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43/519-520。

¹²⁵ 如：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二)》，29/80/37; 29/87/155-156；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三)》，30/173/266。

¹²⁶ 見：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四)》，31/297/1074。

¹²⁷ 見：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一)》，33/19/346; 33/24/439。

¹²⁸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七)》，39/404/57-58。

¹²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七)》，39/461/821-823。

¹³⁰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二)》，34/105/737-738。

¹³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二)》，34/111/858-859。

¹³²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五)》，37/290/473；中華書局影印，《清實

清文宗對開礦的態度，大體延續清宣宗的基調。1853年，有鑑於「軍餉浩繁，左藏右絀」，清文宗諭令地方督撫派員勘察，試辦開採，且不得以風水，聚眾滋事為由，聽任官吏把持，「名為封禁，暗取陋規」¹³³。此後清文宗對各地開礦之事，大多抱持肯定態度，並要求地方督撫善盡管理之責，嚴禁民間私挖，慎防匪徒聚眾滋事¹³⁴。但為爭奪開礦之利，致使匪徒聚眾滋擾，甚或出現礦匪與民人之間的爭鬥¹³⁵。咸豐晚年，礦務問題更加入西方列強勢力的競逐因素，使得開礦與否，成為重要角力戰場¹³⁶。

三、涉外關係的對應之策與態度

自16世紀起，西洋傳教士與商人陸續來華，開啓東西雙方另一波交流高潮。隨著清朝定鼎北京，重新規範國家秩序，大幅限制與西方的交流¹³⁷。1793年，英國派遣馬戛爾尼使團來華，希望與清朝商討貿易活動的擴大化，並改善現行「廣東體制」諸多弊病¹³⁸。但雙方因朝覲禮儀問題，不歡而散，完全

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六)》，38/359/478-479; 38/360/507-508; 38/388/965。

¹³³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二)》，41/89/201。

¹³⁴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二)》，41/101/479; 41/103/533；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三)》，42/131/341。

¹³⁵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四)》，43/229/562；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五)》，44/356/1253-1254。

¹³⁶ 如：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五)》，44/344/1094。

¹³⁷ 相關研究討論，可參閱：張國剛(等著)，《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張國剛，《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爭：明清傳教士與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¹³⁸ 有關馬戛爾尼提出的內容，參閱：秦仲顛(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230-231。針對「廣東體制」的相關討論，已有多位學者論及，見：濱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97)；濱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岸本美緒、宮嶋博史，《明清と李朝の時代》(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8)，456-458；岩井茂樹，〈帝國と互市——16-18世紀東アジアの通交〉，收入：籠谷直人、脇村孝平(編)，《帝国とアジア・ネットワーク：長期の19世紀》(京都：世界思想社，2009)，30-59。

沒機會進行商業貿易談判。儘管英國對「廣東體制」及其衍生的諸多弊病深表不滿，但1793年後，歐洲局勢的發展，讓英國無暇顧及與清廷間的貿易改善問題。直至1816年歐洲局勢回復穩定狀態後，英國再次派遣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 1st Earl Amherst, 1773-1857)率團來華，以開啓與清朝交流的大門¹³⁹。阿美士德試圖改善中英雙方商業貿易活動，但同樣因朝覲跪拜問題，無法展開談判，甚至未能晉見清仁宗¹⁴⁰。

清仁宗對訪華英使阿美士德及其提出有關通商貿易的議題，一如清高宗在1793年對馬戛爾尼的回覆。清仁宗重申清高宗的態度，再次表達天朝係格外開恩，派遣官吏賜宴，陪同遊玩，不意使節竟稱病不願朝覲。惟收下貢品並賞賜禮物，以示懷柔，且表示其後不必遣使來貢，但仍准許在廣東循例進行貿易¹⁴¹。雖然英國兩度遣使來華，但清廷似乎有意彌封這段記憶。相較於歐美各國爭相出版中英交流故事，甚至出現不少扭曲、醜化中國的內容。中國朝野對此事件顯得冷淡許多，鮮少刊印馬戛爾尼與阿美士德使華，或相關覲見禮儀爭議等相關內容，縱有敘及亦僅三言兩語，諱莫如深，甚至避而不談¹⁴²。

清仁宗以天朝角度，斷然拒絕英方提出有關商業貿易的意見¹⁴³。在《嘉慶會典》中，清仁宗延續康雍乾年間(1662-1795)纂修《大清會典》的思想資源，

¹³⁹ 有關1793-1816年，歐洲政局的變化，可參閱：Philip L. Ralph, Edward McNall Burns(著)、文從蘇(等譯)，《世界文明史·後篇》(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9)，13-45。

¹⁴⁰ 有關英使覲見禮儀爭論的深入討論，可參閱：黃一農，〈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兩國的覲禮之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78.1(臺北，2007.03): 35-106。

¹⁴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五)》，32/320/239-240、264-265。清仁宗嘗賦詩云：「本無招致心，突來英咭喇，既來復不馴，巧言多詐偽，未能成禮還，庸臣實債事，瞻額哀慚惶，艱哉在上位，訓誨竟敢違，要名又任意，用人誠最難，題壁述予志」。清仁宗，〈遠瀛觀述志〉，《御製文三集》，《清仁宗御製文》，6/40/260。

¹⁴² 黃一農，〈龍與獅對望的世界——以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後的出版物為例〉，《故宮學術季刊》，21.2(臺北，2003冬): 265-297。另，有關18世紀歐洲「中國熱」風潮的討論，參閱：許明龍，《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

¹⁴³ 清仁宗一開始便視阿美士德來訪係「輸誠入貢」，見：清仁宗，〈延清堂作〉，《御製文三集》，《清仁宗御製文》，6/38/239。

以朝貢、互市等方式安排諸國位置，藉以呈顯中外一家的世界觀¹⁴⁴。雖然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謁見清高宗時，清仁宗亦在現場，且對訪華使團帶來的珍玩表達興趣¹⁴⁵。但清仁宗並未因此對西洋事務有所好感，面對圓明園內著名西式水法建築群「遠瀛觀」，表達：中國當以道德教化外夷，而非追求奇珍異物。興建仿洋式建築僅為一時玩樂，一切仍應以「務實政」、「敦俗安囂浮」為本¹⁴⁶。1820年，清仁宗賦詩言明，儘管阿美士德來華的結局是不歡而散，仍可顯現天朝恩澤廣被四方¹⁴⁷。

道咸年間遭遇的夷務問題可視為一個整體事件，自鴉片戰爭起，連帶著後續的換約行為。由於清朝不熟悉西方外交的「換約」及相關規定，加上西方急欲在鴉片戰爭取得的成果上，進一步擴展商機，引發雙方另一波衝突。相關的談判與衝突，橫跨整個咸豐年間，直至清廷與英、美、法、俄等國先後簽署〈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始稍稍平息爭議。

清宣宗即位初期，面臨西北邊疆的反叛，不惜耗費鉅資，動員軍隊平亂事。歷經4年，花費上千萬兩白銀¹⁴⁸，終於平定亂事，擒獲逆首張格爾(1790-1827)。得知肅清匪賊，擊獲張格爾消息後，清宣宗旋即賦詩誌慶¹⁴⁹。隨著平定亂事，清宣宗沉醉於勝利的氛圍中，更讓他堅信治國之道為遵循祖宗家法，勤修內政則遠人自服。加上張格爾之亂已使清廷糜耗大量軍費，因此清宣宗乃將心力置於內政上，對沿海外夷商貿事務未加措意。即或發生齟

¹⁴⁴ 岡本隆司，〈朝貢と互市と會典〉，《京都府立大学學術報告・人文》，62(京都，2010.12): 17-47。

¹⁴⁵ 秦仲顛(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202-203。

¹⁴⁶ 清仁宗，〈遠瀛觀〉，《御製文三集》，《清仁宗御製文》，6/34/198。

¹⁴⁷ 清仁宗，〈遠瀛觀〉，《御製詩餘集》，《清仁宗御製詩》，7/4/323。

¹⁴⁸ 魏源，〈道光重定回疆記〉，收入：魏源，《聖武記》，收入：《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校)，《魏源全集》，3(長沙：岳麓書社，2004)，184。

¹⁴⁹ 清宣宗，〈正月二十二日酉刻揚威將軍長齡參贊大臣楊芳由八百里加緊馳奏紅旗報捷於卡外喀爾鐵蓋山督率大兵生擒逆首張格爾邊徼肅清大功告成用成七言六韻以誌欣慶〉，收入：清宣宗，《御製詩初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清宣宗御製詩》(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22/261-262。

齟，亦僅命地方督撫循例辦理，甚至以天朝之姿拒其來朝，以為恐嚇¹⁵⁰。清宣宗尤視夷人為「化外蠢愚」，唯利是圖，描寫夷人「犬羊成性」，「貪黷無厭」，「強悍狡黠」，「桀驁不馴」與「心懷叵測」等¹⁵¹。故需以恩威並施之法，羈縻夷人，展現天朝恩惠。

隨著西方商業貿易需求與日俱增，對「廣東體制」的不滿亦逐漸升高，此時英國政府收回英國東印度公司(Governor an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into the East Indies, 1600-1708/Unite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England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 1708-1873)的特許經商權，改由政府直接負責，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為官方在華代理機構¹⁵²。然中英貿易問題始終無法妥善解決，導致發生炮擊、禁止貿易等事件。其後林則徐受命為欽差大臣抵達廣東，雷厲風行禁烟政策，因而引爆雙方激烈對抗，最終釀成鴉片戰爭。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英國以武力強行逼迫清朝開放更多通商口岸，由於清廷無力抵禦，致使清宣宗以降諸帝不得不面對外夷連番挑釁。鴉片戰爭期間，清宣宗對於外夷毫無所悉，曾要求官員可不循成例，直接奏陳夷務，俾使其能在最短時間內瞭解情況¹⁵³。但在〈江寧條約〉及相關附加條約簽訂後，仍未見清宣宗深入瞭解外夷虛實的企圖。清朝官方對國際情勢毫不感興趣的態度，與日本形成強烈對比。早在1839年，日本幕府即得知清廷與英國均針對鴉片貿易展開行動，翌年獲悉英國已派兵出征，雙方衝突一觸即發。戰爭期間，日本更透過「風說書」掌握戰情。戰後日本即出現以紀事本末和紀傳體裁纂輯鴉片戰爭史事之書，譯介清人介紹英國著作，或以小說形式撰

¹⁵⁰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四)》，36/255/896-898。

¹⁵¹ 見：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三)》，35/185/936-937；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四)》，36/255/896-898；36/256/900；905-907；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五)》，37/270/158。

¹⁵² 有關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研究討論，可參閱：汪熙，《約翰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¹⁵³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六)》，38/336/111。

述鴉片戰爭¹⁵⁴。1847年，塩谷世弘(1809-1867)編纂鴉片戰爭始末成《阿芙蓉彙聞》。序文中，塩谷世弘坦言纂輯動機乃將清朝之敗引以為鑑。其後，積極刊刻《海國圖志》，針對相關事務屢發議論，冀期警醒朝野¹⁵⁵。故有論者認為：鴉片戰爭推動了日本維新運動¹⁵⁶。

鴉片戰爭漸趨平息後，清宣宗將簽訂條約視為英夷就撫，且係「軫念黎民塗炭」，「曲意勉從」耆英(1790-1858)等人所請，准許英夷通商¹⁵⁷。戰後清宣宗用心留意內政治理，強調夷務甫定，揀調得人方可辦理善後事宜，要求相關地區之官員，應「招集流散，安撫居民，彈壓土匪」，俾使民眾早日恢復生計¹⁵⁸。並頒旨明言，可不拘泥舊制，實心造船製礮。各省駐防兵丁，水師武備等，均應認真訓練方可禦侮¹⁵⁹。

儘管清文宗不願與外夷多所接觸，但現實逼迫他不得不與之交涉。清文宗即位之初，面對英法等國要求依據〈江寧條約〉與相關續約所訂定的內容，

¹⁵⁴ 有關鴉片戰爭情報在日本傳播的情形，見：岩下哲典，《江戸の海外情報ネットワーク》（東京：吉川弘文館，2006），82-117；岩下哲典，《幕末日本の情報活動——「開国」の情報史》（東京：雄山閣，2008增補版），17-47。日本德川幕府末年吸收西學的相關研究討論，可參閱：徐興慶，〈德川幕末知識人吸收西洋文明的思想變遷〉，《臺大歷史學報》，40(臺北，2007.12): 149-199。而日本地區纂輯的鴉片戰爭史事，請參閱：烏有生、嶺田楓江、橋本貞秀，《海外新話》（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849，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種菜翁，《海外新話拾遺》（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849，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早野惠，《清英近世談》（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850，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醉夢痴人，《海外餘話》（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854，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

¹⁵⁵ 塩谷世弘，〈阿芙蓉彙聞序〉、〈翻築海國圖志序〉、〈書英吉利圖志後〉、〈書俄羅斯圖志後〉、〈書清蘭鴉片單報後〉、〈題英吉利圖志〉、〈書夷情備采前〉、〈阿芙蓉彙聞跋〉，收入：塩谷世弘，《宕陰存稿》（東京：山城屋政吉、岡田屋嘉七等，明治三庚午年仲夏刻成，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卷4/4b-6b; 11a-13b; 卷11/12a-17a; 21b-24b; 卷12/7b-8a。

¹⁵⁶ 日本人(撰)、湯歡(譯)，〈英人強賣鴉片記〉，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鴉片戰爭》，6(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97。

¹⁵⁷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六)》，38/380/862-863。

¹⁵⁸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六)》，38/380/860; 38/381/868。

¹⁵⁹ 如：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六)》，38/381/870-871; 873-876。

進行換約。然清文宗對相關內容的瞭解似乎略嫌不足，一再表示乃係外夷貪得無厭，不顧信義，欲以此為藉口，多生事端。再三訓令有關大員虛與委蛇，若能因此不必換約乃是上上之策¹⁶⁰。

由於清廷不諳西方發展多年的外交規則，故常於關鍵時刻遭洋人蓄意欺瞞。由清朝角度觀之，或許也因皇帝與清廷官員始終以天朝觀點出發，不願平等對待西方諸國，遲遲未學習國際法與外交規範。至少截至1861年為止，未有跡象顯示清朝官方態度的轉變。

根深柢固的夷夏觀念，使清朝將一切外國事務均視為夷務。然西方各國對清廷以夷務之名稱呼雙方交涉事宜，已有不滿。1858(咸豐8)年中英〈天津條約〉，特別約定：「嗣後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英官民不得提書夷字」¹⁶¹。儘管如此，將涉外事務視為夷務的態度，始終深刻烙印於皇帝與士大夫心中¹⁶²。雖有學者指出：19世紀前半至1860年為夷務時代，1860年代以降至1890年為洋務時代，1890年代以後則為外務時代。但直至1900(光緒26)年，外務部成立後，夷務的思想始漸趨告終。夷務、洋務與外務等名詞轉變的背後，除了因應機構設置外，更蘊含思想內涵的變化¹⁶³。故19世紀清廷對外關係的基調，仍以夷務為主，摻雜部分洋務。

¹⁶⁰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一)》，40/9/165-167；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三)》，42/143/512-513；42/145/555-556；42/175/953-954。

¹⁶¹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353·條約一》(臺北：新興書局，1963)，10970。

¹⁶² 1859、1860年，諭旨和奏摺中，仍不時出現以「夷務」稱呼涉外事務的情形。見：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五)》，44/281/120；44/285/172-173；44/323/787-788；44/328/880-881；何桂清，〈何桂清奏英法同思報復現在設法辦理摺〉，收入：中華書局(編)，《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5(北京：中華書局，1979)，1545-1547；崇恩，〈崇恩奏遵旨嚴防海口洋船摺〉，《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5/1614-1615；何桂清，〈何桂清奏美使求先開市情形摺〉，《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5/1642-1644。

¹⁶³ 岡本隆司，〈中国近代外交へのまなざし〉，收入：岡本隆司、川島真(編)，《中国近代外交の胎動》(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1-19；川島真，〈おわりに——新しい「胎動」〉，《中国近代外交の胎動》，203-211；岡本隆司，〈清末の対外体制と対外関係〉，收入：飯島涉、久保亨、村田雄二郎(編)，《中華世界と近代》(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15-35。

爲因應嗣後外國公使駐京與外國交涉等問題，部分官員籲請設立專責機構，總統交涉事務¹⁶⁴。其後，奕訢與文祥(1818-1876)奏請設立專責處理涉外事務機構。幾經商討後，擬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下簡稱「總理衙門」)，奏請清文宗裁示。最早清文宗訂名爲「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奕訢奏請刪去「通商」二字，以免與上海、天津等地辦理通商事務專員重疊，造成洋人疑惑¹⁶⁵。

成立「總理衙門」，代表清朝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轉折，特別增設一個機構，職司外夷交涉事務。此前，清朝係由禮部、理藩院與兩廣總督等負責處理與外夷的接洽事務。禮部設立之初，掌管業務即包括與藩屬交往，接待朝貢使節等。清朝入關後，承襲傳統中華王朝體制，仍以六部爲中央重要單位。1636(崇德元)年，皇太極置「蒙古衙門」，負責處理蒙古事務。1638(崇德3)年，改「蒙古衙門」爲「理藩院」，相關業務從蒙古一地漸次擴增，西藏、青海、新疆與西南等少數民族相關事務，盡歸理藩院負責。1661(順治18)年，理藩院脫離禮部，成爲獨立機構。1842(道光22)年，中英雙方簽訂〈江寧條約〉後，清朝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與上海等五處港口。爲管理五口通商事宜，清廷初以兩江總督兼管，1844年後改由兩廣總督署理，遂成定例。

1861年成立總理衙門，最初設有英國股、法國股、俄國股與美國股，專責對外交涉事務。主事長官由王大臣兼任，而負責處理文書工作的滿漢章京，亦多由他處借調或兼署。儘管奕訢以事涉機密，當由軍機處等官員兼署以利辦理，但也說明清朝未將總理衙門視爲常設性機構的規劃。奕訢甚至在奏請設置總理衙門相關章程中，直言：待日後「軍務肅清，外國事務較簡」

¹⁶⁴ 〈光祿寺少卿焦祐瀛等請設辦理通商處分司辦理各國事務片〉，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第二次鴉片戰爭》，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228-229。

¹⁶⁵ 參閱：〈奕訢桂良文祥奏統計全局酌擬章程六條呈覽請議遵行摺〉，《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8/2674-2680；〈綿愉等奏遵議奕訢奏章程請照原議辦理摺〉，《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8/2692；〈上諭〉、〈廷寄〉，《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8/2692-2693；〈奕訢等又奏請關防及行文不用通商二字片〉，《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8/2710。

時，總理衙門即行裁撤，相關事務仍歸軍機處辦理，以符舊制¹⁶⁶。

由官制演變可看出清朝官方與外國交涉事務的態度。相較皇太極為攏絡蒙古部族，1636年設置「蒙古衙門」，處理相關事務；1638年擴充為「理藩院」；1661年升格為獨立機構，略可顯現清朝在處理國內民族議題的謹慎態度。然面臨西夷時，清朝卻顯得猶移不定，最初以地方督撫兼管夷務，總理衙門成立後始由中央大員領銜處理相關事務。雖然多由其他官員兼署，但至少代表清朝官方開始正視相關議題。

1858年〈天津條約〉條文中提及，中國將選派學生學習英文，日後條約將以英文為正本，不再附註中文¹⁶⁷。總理衙門成立後，陸續設立相關機構以推行洋務。1862(同治元)年，奕訢、桂良與文祥共同奏請成立「同文館」，教授西語，培養外語人才。

清朝為多民族帝國，並未獨尊滿語或漢語，而是兼容並蓄，同時保留蒙文，藏文與維吾爾文等¹⁶⁸，故學習其他民族語言並非創舉。清朝沿襲明制，設有四譯館與會同館，1748(乾隆13)年，兩者合併為會同四譯館，專責翻譯與語言教學工作。此外，尚有：文館、俄羅斯館、高麗館、譯學館、蒙古官學、內閣蒙古房、漢本房、理藩院蒙古翻譯房、內翻書房等機構，負責語言翻譯工作，唯其組織架構，存續時間不如四譯館或會同館之完整¹⁶⁹。以清高宗為

¹⁶⁶ 〈奕訢桂良文祥奏統計全局酌擬章程六條呈覽請議遵行摺〉，《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8/2674-2680；所引在2676。其他相關規定，見：〈奕訢桂良文祥奏總理衙門未盡事宜擬章呈十條覽摺〉、〈奕訢等又奏覆奏章京司員兼行走摺〉、〈廷寄〉、〈奕訢桂良文祥奏議定章京額外行走章程摺〉、〈上諭〉，《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8/2714-2722；2733-2735；吳福環，《清季總理衙門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6-104。

¹⁶⁷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353·條約一》，10970。

¹⁶⁸ 有關清朝對於多民族語言政策的相關討論，請參閱：袁劍，〈“國語”興亡——清朝“滿語思路”的流變略論〉(北京：“社會、經濟、觀念史視野中的古代中國”國際青年學術會議暨第二屆清華青年史學論壇，2010.01.16-17)；王澤民，〈認知與建構：清代新疆語言政策的歷史考察〉，《黑龍江民族叢刊》，115(哈爾濱，2012)：115-118。

¹⁶⁹ 相關研究討論，見：李云泉，〈清代前期的外交機構與外事管理〉，《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0.5(濟南，2005)：80-83；李壓西、陳偉民，〈從「同文三館」起步〉(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10-32；鄒振環，〈清代前期外語教學與譯員培養上

例，其本人可同時運用滿、漢、蒙、藏與維吾爾等多種語言¹⁷⁰。但同文館並非單純學習其他民族語言而已，其中更牽涉華夷、天朝與朝貢等複雜因素。1866(同治5)、1867(同治6)年，奕訢先後奏請於同文館內增設天文算學館，並鼓勵翰林院官員與五品以下進士出身之京官入館學習。因而引發部分士人強烈反彈，在士人圈中掀起一股激憤情緒¹⁷¹。

有鑑於洋人已留心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與典籍律例，辯論時尤援引中國事例以詰難清朝官員。為求知己知彼，以利外交談判，清朝乃籌設同文館，訓練外國語文人才。其後在丁韞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與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等人力勸下，1863(同治2)年，奕訢奏請撥銀500兩，資助丁韞良翻譯《萬國公法》，刊印後呈送300部給總理衙門，再分送至通商口岸以供參酌¹⁷²。方濬師(1830-1889)云：《萬國公法》於「中外交涉事宜，頗多可採」，有心者可依此書與洋人「據理論辯，因勢利導」¹⁷³。

《萬國公法》刊行後雖曾被實際引用於外交事務¹⁷⁴，地方督撫亦要求增印以廣為運用¹⁷⁵，然相較於傳播至日本後產生的影響力，顯現其在中國的影

的制度性問題——與俄國、日本的比較》，《社會科學輯刊》，168(瀋陽，2007)：160-167；拉賓·帕維爾，〈清朝俄羅斯文館(18世紀初-19世紀中葉)〉，《歷史檔案》，1(北京，2011)：52-60；王智仁，〈清代內閣俄羅斯文館之研究〉(臺北：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¹⁷⁰ 張小李，〈乾隆學語言〉，《紫禁城》，3(北京，2011)：48-49。

¹⁷¹ 本文不擬在此深論同文館的爭論，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劉廣京，〈變法的挫折——同治六年同文館爭議〉，收入：劉廣京，《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403-418；趙雅麗，《晚清京師南城政治文化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255-296。

¹⁷² 〈奕訢等又奏美士丁韞良譯出萬國律例呈閱已助款刊行摺〉，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李書源(整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3(北京：中華書局，2008)，1184-1185。

¹⁷³ 方濬師(撰)、盛冬鈴(點校)，《蕉軒隨錄·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326。

¹⁷⁴ 見：〈奕訢等又奏布使李福斯來津擅扣丹國商船已與交涉放回將往來照會呈覽摺〉、〈布使李福斯照會〉、〈給布使李福斯照會〉，《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3/1144-1152。

¹⁷⁵ 1869年，兩廣總督瑞麟奏請總理衙門頒發10部《萬國公法》，以為各員辦理洋務時查看。見：〈同治8年10月11日收粵督咨請頒發《萬國公法》10部〉、〈同治8年11月5日發兩廣總督咨送《萬國公法》10部〉，《總理衙門檔案》；轉引自：林學忠，《從萬國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國際法的傳入、詮釋與應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52-53。

響微弱¹⁷⁶。縱使如此，《萬國公法》的譯介仍可代表一個重要轉捩點，總理衙門願意出資刊印尤為關鍵，表示官方不得不承認世界局勢已發生變化，必須瞭解世界的遊戲規則。其後，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也翻譯國際公法或外交相關法令¹⁷⁷，略可透露大清帝國內「天朝上國」的心態開始悄悄轉變。

自〈天津條約〉起，英國要求清廷需以洋務取代夷務，作為涉外事務之稱謂。加上總理衙門、同文館等機構漸次設立，《萬國公法》與相關西洋書籍的譯介，雖未產生立即且急劇的影響力，但隱隱透露出清廷正逐漸走出傳統思想資源的倉庫。不論是否心悅臣服，均須打破祖宗家法，設置專門處理外交事務的機構，援引國際法條以進行交涉。凡此種種，標誌著清廷在1860年前後進入另一個階段，開始容許新的思想資源走私進入「知識倉庫」¹⁷⁸。

四、風俗人心與學術文化

1741年清高宗頒旨強調：風俗人心係治國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之根源，故為政者需多加措意¹⁷⁹。清仁宗於1800年與1818(嘉慶23)年兩度頒發詔書詳加闡述。清仁宗開門見山自陳因恭閱《高宗純皇帝實錄》，見1741年清高宗頒布之諭旨，故心有所感。除重申清高宗諭旨內容外，直指川楚教亂係源於教

¹⁷⁶ 有關《萬國公法》在中日韓等國的傳播及其影響，可參閱：川島真，〈中国における万国公法の受容と適用—「朝貢と条約」をめぐる研究動向と問題提起—〉，《東アジア近代史》，2(東京，1999.03): 8-26；金容九(著)、月脚達彦(譯)，〈朝鮮における万国公法の受容と適用〉，《東アジア近代史》，2: 27-44；安岡昭男，〈日本における万国公法の受容と適用〉，《東アジア近代史》，2: 45-64；鄒振環，〈丁韞良譯述《萬國公法》在中日韓傳播的比較研究〉，《韓國研究論叢》，7(上海，2000): 258-278；陳秀武，〈《萬國公法》在明治初期的日本〉，《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38(長春，2009): 18-23。

¹⁷⁷ 參閱：上海圖書館(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圖志》(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1)。

¹⁷⁸ 有關「知識倉庫」概念的相關討論，參閱：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16.3(臺北，2005.09): 137-170。

¹⁷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二)》，10/146/1105-1107。

化不行，民惑於邪，然化民成俗須上行下效，故期望君臣同心協力，萬勿因循怠惰，以達圖治求寧之效¹⁸⁰。

縱使英人來犯，清廷亦不認為是王朝出了問題，仍強調只須人心正，風俗淳，回復至過去的景況，自然可以解決眼前面臨內外交逼的問題。因此，「漢奸」成為鴉片戰爭的失敗主因，政府屢頒諭旨要求地方官員努力緝捕漢奸，加強人心宣導，使其不為外夷所用，自能抵禦外敵¹⁸¹。

在傳統儒家思想的框架下，風俗人心往往與教化連結，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¹⁸²。欲求風俗人心漸趨淳厚，繫於推廣教化。1813年清仁宗強調：「治民之道，教化為先」¹⁸³；1818年清仁宗再次諭示：「自古國家長享太平，未有不加意於人心風俗者。而人心之所以正，風俗之所以醇，則繫乎政教之得失」¹⁸⁴。故學術文化與政治之間存在難以切割的連繫，更是觀察學術文化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楊念群教授指出：清朝士人倡導經世思潮，並非士人單方面的想望，係配合王權合演的一場戲。因此，不應忽略帝王政治對士大夫階層的影響，而需重新商榷雙方的互滲與互動¹⁸⁵。

下文將針對皇帝關於風俗人心的態度進行討論，再聚焦於具體的書籍纂修活動。冀期瞭解清廷在面臨內外交迫之際，如何以風俗人心與學術文化挽救國家危機。

¹⁸⁰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73/973-974；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五)》，32/350/619-620。

¹⁸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六)》，38/333/55-56；38/334/76-77；38/335/96-97；38/351/349。有關漢奸問題的討論，可參閱：田中正美，〈阿片戦争前における「漢奸」の問題〉，《東京教育大学文学部紀要》，46(東京，1964.03):1-37；張銓津，〈鴉片戦争時期的「漢奸」問題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¹⁸² 何晏(注)、邢昺(疏)、朱漢民(整理)，《論語注疏》，下(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1)，188。

¹⁸³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四)》，31/279/814-815。

¹⁸⁴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五)》，32/350/619-620。

¹⁸⁵ 楊念群，〈“經世”觀念的變異與清朝“大一統”歷史觀的構造〉，收入：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北京：三聯書店，2010)，307。

(一)官多玩愒難敷化，民半漓澆未返淳¹⁸⁶

自清聖祖始已措意於社會風俗的趨向，而崇儉去奢為政府一貫的重要態度。1726(雍正4)年，清世宗增設觀風整俗使，藉以瞭解和抑制江南一帶的奢靡風氣¹⁸⁷。儘管清高宗大體延續父祖的政策基調，但面對臣下奏請嚴禁浮費，「去奢崇儉，返樸還淳」，清高宗卻也坦承在實行上有其難度。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京師、江南與各省大城，「由儉入奢」勢所必然，且「習俗日趨於華靡，殆非條教號令所能飭禁，譬如江河之向東，誰能障之使西流耶」。如一昧要求儉樸，加以嚴刑峻法，僅徒增人民困擾，難收嚇阻之效。故內外大臣均應存此「崇儉尚樸」之心，冀期日漸「返古還淳」¹⁸⁸。清高宗甚至認為江南一帶無籍遊民，係藉商賈奢靡糊口，若嚴令禁止，將啓「需索訛詐之漸」，何益於政？故民風華靡已積重難返，嗣後為政當「因利乘便，酌衷至當」，不可「肆意累民」，甚至「違俗干譽」¹⁸⁹。

嘉慶年間，清仁宗已不可能像清高宗一樣，口云崇儉去奢，卻在南巡或日常用度上大肆鋪張，甚而默許富商競富¹⁹⁰。經過和坤案的查抄，或許已讓清仁宗驚覺風俗敗壞的嚴重性，故在位期間屢屢針對風俗人心發表言論，或慨歎，或指斥，甚至頒旨詳加規範。如1800年、1815(嘉慶20)年、1817年，清仁宗均對民間進香活動，造成男女雜遯於道，甚為在意。憂心將成為匪徒嘯聚藉口，不僅有害風俗人心，更恐危及國家安全¹⁹¹。為遏止奔競之風，清仁宗於1802年特旨「停止中外臣工貢獻，凡金玉珠寶等物，概不准呈進」。甚

¹⁸⁶ 清仁宗，〈淳化軒〉，《御製詩二集》，《清仁宗御製詩》，4/ 53/ 265。

¹⁸⁷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一)》，7/ 49/ 737。

¹⁸⁸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一五)》，23/ 1143/ 324- 325。

¹⁸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一九)》，27/ 1423/ 37- 38。

¹⁹⁰ 有關清高宗南巡的討論，特別是有關其鋪張行徑，可參閱：高翔，《乾隆下江南》(中和：雲龍出版社，1991)，23- 48。

¹⁹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 66/ 885；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五)》，32/ 312/ 147- 148; 32/ 334/ 408- 409。

至要求將運送至半路的玉石，棄置於途¹⁹²。1813年，清仁宗歷經天理教匪攻入禁城的變亂後，下令要求壽誕慶祝活動一律從簡，毋事奢華¹⁹³。1814(嘉慶19)年尤大嘆化俗難，嚴詞抨擊官吏尸位素餐，百姓以下犯上，道出「成何世界心目酸」，仰求上天寬宥施澤¹⁹⁴。

除屢頒詔書外，清仁宗的擔憂更在詩詞文字上顯露無遺。綜觀清仁宗的詩詞作品，不難發現清仁宗直承風俗確有諸多弊病，與康雍乾年間相去甚遠，故壓力極大¹⁹⁵。但同時強調，僅須守成，遵循祖宗家法，即可恢復昔日榮光¹⁹⁶。在御製詩集中，「淳化軒」與「繼德堂」是清仁宗最常使用的題目。此外，「知過堂」、「長春仙館」、「萬方安和」與「知不足齋」等，也是清仁宗經常使用的詩題。

淳化軒為長春園建築之一，1769(乾隆34)年清高宗將北宋淳化年間(990-994)收藏之歷代書法拓本《淳化閣帖》¹⁹⁷，輯刻於石碑上，鑲嵌廊壁兩側，淳化軒遂由此得名。清高宗嘗頒旨諭示：重刻《淳化閣帖》係為嘉惠海內士人，以為後學追摹¹⁹⁸。然作為度藏書法珍品的淳化軒，何以成為清仁宗最常使用的賦詩主題？

1798(嘉慶3)年，清仁宗介紹淳化軒因貯有石刻《淳化閣帖》，故名之曰「淳化軒」，並強調宋太宗(939-997)多有慚德，有愧「淳化」年號，惟清高宗始與「淳化」名實相符，可謂「俗美絃歌循聖教，民安耕鑿樂豐年」¹⁹⁹。1804年，

¹⁹²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二)》，29/105/407-408。

¹⁹³ 清仁宗，〈酌減令節禮儀諭〉，《御製文二集》，《清仁宗御製文》，1/3/126-127。

¹⁹⁴ 清仁宗賦詩〈化俗難吟〉云：「治理庶姓資庶官，官不實心化俗難，疲庸玩愒度歲月，大半尸位成素餐，馭兵未能明紀律，守土不知民饑寒，邪教多半聚鄉邑，養癰貽患恣作奸，民不畏官下犯上，成何世界心目酸，官庸民玩總予咎，仰天赦宥數澤寬」。見：清仁宗，〈化俗難吟〉，《御製詩三集》，《清仁宗御製詩》，5/18/325-326。

¹⁹⁵ 參閱：清仁宗，〈敬題紀恩堂〉，《御製詩初集》，《清仁宗御製詩》，2/33/100。

¹⁹⁶ 清仁宗，〈延春閣〉，《御製詩三集》，《清仁宗御製詩》，5/19/335-336。

¹⁹⁷ 有關《淳化閣帖》的評述，可參閱：徐珂(編撰)，《清稗類鈔》，9(北京：中華書局，1984)，4437; 4451。

¹⁹⁸ 清高宗，〈重刻淳化閣帖諭〉，《御製文二集》，《清高宗御製文》，1/7/322。

¹⁹⁹ 清仁宗，〈淳化軒〉，《御製詩初集》，《清仁宗御製詩》，1/17/311-312。有關清仁

清仁宗再次強調淳化軒之名係來自《淳化閣帖》，非宋太宗淳化年號，並以「去奢從儉」與「返樸還淳」自勉²⁰⁰。清仁宗在位期間屢以「淳化軒」為題，翻閱詩詞內容即可發現，清仁宗每每在淳化軒觀賞書法碑刻之餘，鮮少細論《淳化閣帖》的精妙書法，而係著重「淳化」二字，回想康雍乾以降的重熙累洽，進而愧嘆時下風俗未淳，與清高宗熱衷書法有明顯歧異²⁰¹。清仁宗的詩詞內容泰半圍繞於慨歎風俗未淳，兵興未平與不知用人諸端，並坦言為君難，自責失德以致於風俗漸趨浮蕩，官吏怠疲，斷案不公，遂使黎民刁頑。至盼風俗漸淳良，官吏戒疲玩，庶民守紀綱²⁰²。從《淳化閣帖》引申至淳化風俗，顯見清仁宗意欲透過教化以端正士習文風的用心。

繼德堂與知不足齋均為毓慶宮內殿室，毓慶宮初建於1679(康熙18)年，係清聖祖專為皇太子胤禛(1674-1725)準備之居所，後因胤禛被廢，毓慶宮遂降為一般皇子居所，清高宗、清仁宗幼年時均曾居住於此。清仁宗即位後，仍以

宗對宋太宗的評價，可參閱：清仁宗，〈讀通鑑紀事本末·宋太宗致治〉，《御製詩二集》，《清仁宗御製詩》，4/ 63/ 379- 380。

²⁰⁰ 清仁宗，〈淳化軒〉，《御製詩二集》，《清仁宗御製詩》，3/ 5/ 25- 26。

²⁰¹ 清高宗對書法的熱愛及相關討論，可參閱：曉棠，〈《劬農紀典》冊與乾隆御筆書法(上)〉，《藝術市場》，1(北京，2006): 88- 89；曉棠，〈《劬農紀典》冊與乾隆御筆書法(中)〉，《藝術市場》，2(北京，2006): 80- 81；曉棠，〈《劬農紀典》冊與乾隆御筆書法(下)〉，《藝術市場》，3(北京，2006): 78- 79；梁繼，〈張照與乾隆關係考述——以書法為視角〉，《學術交流》，173(哈爾濱，2008.08): 176- 179。

²⁰² 有關清仁宗以「淳化軒」為題之詩繁多，無法悉數列舉。僅列出部分內容，見：清仁宗，〈淳化軒有感〉，《御製詩初集》，《清仁宗御製詩》，2/ 33/ 102；清仁宗，〈淳化軒〉，《御製詩初集》，《清仁宗御製詩》，2/ 35/ 122；2/ 36/ 127；清仁宗，〈淳化軒有會〉，《御製詩初集》，《清仁宗御製詩》，2/ 36/ 131；清仁宗，〈新秋淳化軒〉，《御製詩初集》，《清仁宗御製詩》，2/ 36/ 134；清仁宗，〈淳化軒誌愧敬疊〉，《御製詩初集》，《清仁宗御製詩》，2/ 39/ 157- 158；清仁宗，〈淳化軒敬題〉，《御製詩初集》，《清仁宗御製詩》，2/ 42/ 212；清仁宗，〈淳化軒〉，《御製詩初集》，《清仁宗御製詩》，2/ 47/ 259；261；清仁宗，〈新春淳化軒〉，《御製詩二集》，《清仁宗御製詩》，2/ 2/ 383；清仁宗，〈淳化軒〉，《御製詩二集》，《清仁宗御製詩》，3/ 10/ 98；3/ 18/ 197- 198；3/ 19/ 211- 212；3/ 29/ 339；3/ 32/ 377- 378；4/ 53/ 265；清仁宗，〈淳化軒〉，《御製詩三集》，《清仁宗御製詩》，6/ 26/ 86；7/ 53/ 71；7/ 58/ 163；7/ 59/ 171。

毓慶宮為主要住所²⁰³。此外，避暑山莊內另有一處「繼德堂」，同為清高宗駐蹕之處。毓慶宮內之繼德堂得名自清高宗於1795年所賜，避暑山莊內之繼德堂則為1792(乾隆57)年清高宗所題²⁰⁴。而「知不足齋」為清仁宗取自浙江藏書家鮑士恭之藏書室名²⁰⁵。故以繼德堂與知不足齋為題之詩，多為追思清高宗訓政與教誨的內容。清仁宗鍾愛「繼德」與「知不足」之名，充分展現其一貫謙沖自牧，期望繼承祖德的態度。不論繼德堂或知不足齋之詩，清仁宗均表達已德有虧，風俗敗壞，官玩民頑與吏治懈疲等愧嘆，藉此陳述己志，說明為君繼德之難。且對風尚虛浮，官吏因循，民頑刁悍感到痛心，期許「修己日勤政，衷期風俗淳」²⁰⁶。

「知過堂」、「長春仙館」與「萬方安和」均為圓明園內建築。知過堂建於1782(乾隆47)年，清高宗為警惕增建殿閣而興徭役、加賦稅，故自署堂名知過，以為鑑戒。清仁宗解釋清高宗無過卻云知過，乃「聖不自聖」的表現。

²⁰³ 見：清仁宗，〈毓慶宮即事〉，《御製詩初集》，《清仁宗御製詩》，1/ 10/ 211；清仁宗，〈毓慶宮述事〉，《御製詩初集》，《清仁宗御製詩》，2/ 29/ 51- 52；劉暢、趙雯雯、蔣張，〈毓慶宮〉，《紫禁城》，7(北京，2009): 14- 19。

²⁰⁴ 清仁宗，〈繼德堂述志〉，《御製詩初集》，《清仁宗御製詩》，1/ 23/ 386；清仁宗，〈繼德堂〉，《御製詩二集》，《清仁宗御製詩》，3/ 28/ 328。

²⁰⁵ 清仁宗，〈題知不足齋〉，《御製詩初集》，《清仁宗御製詩》，1/ 23/ 386。

²⁰⁶ 有關清仁宗以「繼德堂」與「知不足齋」為題之詩繁多，無法悉數列舉。僅列出部分內容，見：清仁宗，〈夏日繼德堂敬述〉，《御製詩初集》，《清仁宗御製詩》，1/ 12/ 245；清仁宗，〈繼德堂述志〉，《御製詩初集》，《清仁宗御製詩》，1/ 15/ 285- 286；清仁宗，〈題知不足齋〉，《御製詩初集》，《清仁宗御製詩》，1/ 23/ 386；清仁宗，〈繼德堂靜坐自述〉，《御製詩初集》，《清仁宗御製詩》，2/ 33/ 103；清仁宗，〈繼德堂靜坐成詠〉，《御製詩初集》，《清仁宗御製詩》，2/ 39/ 156；清仁宗，〈繼德堂述志詩示在廷諸臣〉，《御製詩二集》，《清仁宗御製詩》，3/ 5/ 22；清仁宗，〈繼德堂述志〉，《御製詩二集》，《清仁宗御製詩》，3/ 12/ 119- 120；清仁宗，〈繼德堂〉，《御製詩二集》，《清仁宗御製詩》，3/ 19/ 208；3/ 23/ 255；3/ 28/ 328；清仁宗，〈知不足齋〉，《御製詩二集》，《清仁宗御製詩》，4/ 45/ 156；清仁宗，〈繼德堂〉，《御製詩三集》，《清仁宗御製詩》，6/ 34/ 200- 201；清仁宗，〈知不足齋〉，《御製詩三集》，《清仁宗御製詩》，6/ 40/ 264；清仁宗，〈繼德堂〉，《御製詩三集》，《清仁宗御製詩》，7/ 56/ 116。

並以知過之名，提醒自己過錯實多，「官疲兵玩皆予咎」²⁰⁷。多首以「知過堂」為題之詩均不離此基調，如1815年賦詩指陳：「官吏疲心嗜怠惰，庶民玩法忽刑章，總緣政闕予多咎，力挽頹風刻不遑」²⁰⁸。1818年之詩再次強調因己過甚多，故民俗未化，官箴未肅，因循之習極深，只能「克己省愆惟自責，形端表正勉君臨」，冀期君臣同心，相與維新²⁰⁹。

「長春仙館」為圓明園中清高宗居所，詩中所述多屬頌揚清高宗，懷念父親訓政之詞。如1803年〈長春仙館感賦〉即懷想清高宗訓政之恩，並表達愧對父親之志，未能「兵銷俗美兆民康」²¹⁰。1810年，清仁宗再次賦詩感懷承恩聆訓的時刻，猶不忘慨歎「民俗鮮淳和，吏習尚浮議」，故唯有遵循祖制，勉力守成²¹¹。至1820年，清仁宗仍念念不忘父親恩澤，強調須「修己治黎民」，勤習舊學，研磨日新，以期綱紀循良，風俗淳厚²¹²。「萬方安和」為圓明園中頗具特色的建築，外觀呈現卍字形，為清世宗在圓明園內主要居所。故「萬方安和」多屬追思清世宗之詞，並藉由讚揚清世宗的施政手腕與成果，自省己過或慨歎時下政局²¹³。無論追想父祖盛世，或慨歎自己才德不足，清仁宗在詩詞文字中皆對當前因循弊病、涼薄風俗深表不滿。

自清中葉起，鴉片問題開始成為皇帝們關注焦點。最初清仁宗與清宣宗對鴉片的關注，在於其對風俗人心有所影響。1813年清仁宗嚴斥鴉片流入內地，將危害風俗人心，且邇來不論市井無賴或侍衛官員，均有吸食者，故頒

²⁰⁷ 清仁宗，〈知過堂述志〉，《御製詩二集》，《清仁宗御製詩》，3/4/14。

²⁰⁸ 清仁宗，〈知過堂敬紀〉，《御製詩三集》，《清仁宗御製詩》，6/31/151。

²⁰⁹ 清仁宗，〈知過堂自責〉，《御製詩三集》，《清仁宗御製詩》，7/53/69。

²¹⁰ 清仁宗，〈長春仙館感賦〉，《御製詩初集》，《清仁宗御製詩》，2/45/242。

²¹¹ 清仁宗，〈長春仙館感賦〉，《御製詩二集》，《清仁宗御製詩》，4/50/219。

²¹² 清仁宗，〈長春仙館〉，《御製詩餘集》，《清仁宗御製詩》，7/3/296-297。

²¹³ 清仁宗，〈萬方安和四首〉，《御製詩初集》，《清仁宗御製詩》，1/9/208-209；清仁宗，〈萬方安和歌〉，《御製詩初集》，《清仁宗御製詩》，1/19/338-339；清仁宗，〈萬方安和〉，《御製詩二集》，《清仁宗御製詩》，3/7/53；3/16/165；4/50/219-220；清仁宗，〈萬方安和敬述〉，《御製詩三集》，《清仁宗御製詩》，6/23/42；6/47/356；清仁宗，〈萬方安和〉，《御製詩餘集》，《清仁宗御製詩》，7/2/280。

旨嚴禁，「以挽澆風」²¹⁴。1821(道光元)、1822和1835(道光15)年，清宣宗皆提及鴉片流入內地將蠹害原本淳樸的風俗人心，應嚴加防範，從重治罪²¹⁵。

清宣宗為皇子時已留心於儉德議題，即位後更身體力行，堪為勤儉表率，對風俗厚薄一節尤為在意。1823年清宣宗撰〈善教得民心〉一文，論析治民須教之，而教民當先正君心，君心正則不受擾亂。同時，須以教化為先，方能重綱常，厲風俗，使民眾「天良具在」²¹⁶。然何以正君心？清宣宗標舉崇儉黜奢，冀期革除此前競尚豪華的風氣。1828年清宣宗諭覆富俊奏請〈黜奢尚儉以維風化〉，斥責大小臣工均視訓誡崇儉之旨為具文，致使京師外省浮誇之風更甚以往，飭令官員嚴加查核，以副崇儉黜奢之旨²¹⁷。

清宣宗在詩文中雖不時論及風俗未淳，人心澆薄等情形，卻不及清仁宗營造出憂心如焚的氛圍。如清宣宗亦曾以「淳化軒」為題，愧歎風俗未淳，當行恭儉之道，以身作則。但詩集中僅出現2次²¹⁸。此外，清宣宗藉由「述志」、「示意」和「即事」等題，除自慙「化民成俗愧難移」外，更再三期望「敦崇樸實除虛偽，風化還淳互勉脩」²¹⁹。

清文宗一如其父祖，心心念念風俗人心之厚薄。1851年清文宗藉羅惇衍(1814-1874)上奏〈請崇儉禁奢以畜物力疏〉，重申官民競尚奢華，有害風俗人心，要求禮部重新頒布1828年的相關規定，俾使官民知曉，以達崇儉黜奢之意²²⁰。

²¹⁴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四)》，31/270/655。

²¹⁵ 見：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一)》，33/26/468; 33/29/529; 33/46/817;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五)》，37/264/54-55。

²¹⁶ 清宣宗，〈善教得民心〉，收入：清宣宗，《御製文初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清宣宗御製文》(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10-11。

²¹⁷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三)》，35/132/15-16。

²¹⁸ 清宣宗，〈淳化軒〉，《御製詩初集》，《清宣宗御製詩》，7/119; 11/160。

²¹⁹ 清宣宗，〈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即席示意〉，《御製詩初集》，《清宣宗御製詩》，17/215; 清宣宗，〈仲春經筵即事〉、〈勤政殿述志〉，《御製詩餘集》，《清宣宗御製詩》，1/309; 清宣宗，〈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述志〉，《御製詩餘集》，《清宣宗御製詩》，8/358。

²²⁰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一)》，40/48/654-655; 羅惇衍的奏摺內容，見：羅惇衍，《羅文恪公遺集》(刊刻者、年代不詳，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部)，13a-16a。

對盛京、蒙古、山西與安徽等地風俗人心漸染澆薄，亦深感憂心²²¹。然清文宗在御製詩文集中，卻鮮少論及風俗人心的議題，而集中於自省己過、地方變亂或災荒等情事。

(二)教化與書籍纂修

面對日趨敗壞的風俗，皇帝第一時間的反應均認為係因教化不行，導致風俗不淳。欲使風俗淳化，唯有端正人心。而淳化風俗，端正人心之法則繫於政教之得失。清朝入關後，即以「興文教，崇經術」為國策，「崇儒重道」為教化主軸²²²。故清仁宗秉持祖訓，屢言：「治民之道，教化為先」，「自古國家長享太平，未有不加意於人心風俗者。而人心之所以正，風俗之所以醇，則繫乎政教之得失」²²³。為倡揚教化，清廷除重視科舉，舉行博學鴻詞特科，崇尚程朱理學等，更積極纂輯、刊刻圖書²²⁴。從訪求書籍開始，及至編纂過程，官方權力的痕跡隨處可見，甚至如同毛細管作用般，滲透擴散²²⁵。因此，刊刻任何一本官書，尤其是大規模套書的纂輯工程，均為官方樹立思想典範的契機，且被賦予特定意涵。

入關前皇太極命人纂修相關史籍以為資鑑²²⁶，入關後更展開大規模圖書編纂工程，纂修書籍內容包含：文史地理、字典與百科全書式的大型套書，其中蘊含複雜的政治文化思想。如1673(康熙12)年起，清聖祖下令修纂《御製

²²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二)》，41/103/540；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三)》，42/170/894-895；42/185/1073；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五)》，44/275/34。

²²²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3/74/585；3/90/712。

²²³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四)》，31/279/814-815；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五)》，32/350/619-620。

²²⁴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2-6。

²²⁵ 此處係借用王汎森教授「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之論點。詳細討論，請參閱：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99年度第2次學術講論會，2010.01.25)。

²²⁶ 相關討論，請參閱：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53-65。

清文鑑》，直至1708(康熙47)年告竣。《御製清文鑑》最初係為滿語字典，嗣後漸次增補，1717(康熙56)年的《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1743(乾隆8)年的《御製滿蒙文鑑》，1771(乾隆36)年《御製增訂清文鑑》，1780年《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1791(乾隆56)年《御製五體清文鑑》，以至1794(乾隆59)年的《御製四體清文鑑》。略可顯示清初諸帝透過編纂滿文字典，強化各民族之間的聯繫²²⁷。

此外，1704(康熙43)年清聖祖命張玉書(1642-1711)、陳廷敬(1638-1712)等人開始纂修《御定佩文韻府》，1711(康熙50)年付梓。1705(康熙44)年清聖祖命人編校《全唐詩》，翌年刊刻印行²²⁸。1710(康熙49)年起，清聖祖下旨纂修《康熙字典》，費時6年，於1716(康熙55)年完成。1723(雍正元)年，清世宗在此前《圖書彙編》的基礎，命蔣廷錫(1669-1732)重新校刊完成《古今圖書集成》²²⁹。1760(乾隆25)年，清高宗透露已命儒臣針對《通鑑》一書「分條修輯彙冊」，供其精研訂正，加以評騭²³⁰。1768(乾隆33)年，《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成書，係清高宗對歷代史事的完整評論，試圖重新定義綱紀倫常之價值²³¹。1766(乾隆31)年清高宗見皇子們效法書生習氣，別取字號，於扇子上題詩落款，頗為不滿。此前，已令皇子們誦習通鑑輯覽中，有關北魏金元諸朝，擅變舊法之事。書成後，頒賜講習，使之不忘祖宗成憲，勤習國語騎射²³²。1773(乾隆38)年開始編纂《四庫全書》，尤為清朝文化事業的高峰。費時9年，多達3,600餘名學者共同參與，

²²⁷ 相關討論，可參閱：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林士鉉，《清代蒙古與滿洲政治文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9)，279-296。

²²⁸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教授將諭令纂輯《全唐詩》，視為清聖祖意欲「證明自己有鑑賞漢人的詩作傳統」。見：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曹寅與康熙》(臺北：時報文化，2012)，135-142。

²²⁹ 有關《古今圖書集成》的相關討論，可參閱：裴芹，《古今圖書集成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詹惠媛，《《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體制研究》(永和：花木蘭文化，2009)。

²³⁰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八)》，16/605/795-796。

²³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一〇)》，18/802/820。

²³²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一〇)》，18/760/366-367。

《四庫全書》背後的政治文化意涵，顯而易見²³³。康乾年間大規模進行各式圖書編纂工作，意欲確立清朝的歷史發言權。其中以《四庫全書》的編纂，尤為清朝政治思想與學術文化緊密結合的典範。

承繼康乾遺緒，嘉慶朝仍進行若干書籍編纂工作或增補，續修事業如1801年續修《大清會典》，1803年因《四庫全書》出現缺漏，遂命紀昀(1724-1805)續行繕辦²³⁴。略可說明此時學術風氣仍保有前朝遺韻，但除例行的實錄、御製詩文集與聖訓等編纂工作外，已鮮少進行大規模編修古籍圖書的活動。1804年清仁宗為鐵保纂輯之八旗詩章命名為《熙朝雅頌集》，諭旨中提及，詩文之作可發抒「忠義勇敢之氣」，且「存其詩實重其人」。一語道出刊刻《熙朝雅頌集》的意涵，標舉具有「忠義勇敢之氣」的旗人，以為典範²³⁵。時值川楚教亂初定，清仁宗藉由印行《熙朝雅頌集》，重振旗人「忠義勇敢之氣」。1808年刊刻頒行之《全唐文》為嘉慶朝最後一項大型文化工程，清仁宗在序文中云，刊刻《全唐文》乃追隨清聖祖頒行《全唐詩》之遺意，裨益詩教，故《全唐文》意在「崇文講學，嘉惠士林」²³⁶。

道光朝官方大型纂輯文化工程尤為缺乏，1827年清宣宗諭令奕繪(1799-1838)、王引之(1766-1834)校正《康熙字典》內訛誤之處，撰成《字典考證》，於1831(道光11)年刊刻。1842年完成的三修《大清一統志》乃嘉慶朝遺留的未竟之業。1811年清仁宗諭令重修《大清一統志》，但遲遲未成。1815年清仁

²³³ 有關《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及其相關意涵的討論，可參閱：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李常慶，《四庫全書出版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陳曉華，《《四庫全書》與十八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長沙：岳麓書社，2010)；林志宏，〈舊文物，新認同——《四庫全書》與民國時期的文化政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7(臺北，2012.09): 61-99。

²³⁴ 有關紀昀與《四庫全書》的相關討論，可參閱：張維屏，《紀昀與乾嘉學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8)。

²³⁵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二)》，29/129/747。

²³⁶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三)》，30/202/688-689。

宗斥責各省督撫未實心配合，原訂半年內完成之書，竟拖延達5年²³⁷。《大清一統志》直至1842年始纂校完成，清宣宗在序文中，除縷述清初諸帝開拓之功，教化之洽，更不忘強調守成之難，至盼此後黎民均能得到休生養息²³⁸。揆諸1842年的時空背景，或許是清宣宗在鴉片戰爭後的肺腑之言。

咸豐朝最重要的官方編書事業，應以纂修《籌辦夷務始末》為首。1851年清文宗接受杜受田(1788-1852)奏請，下旨纂修《籌辦夷務始末》，蒐集自1836年迄1849年涉外事務之相關上諭、奏折與照會等檔案資料，未收入實錄者，均編年紀月翔實刊載。1857(咸豐7)年完成後，由總裁官文慶(1796-1856)進呈²³⁹。然何以書成後，諭令藏於深宮，不准刊印，且纂修人員不得洩露？論者以為一旦將《籌辦夷務始末》公諸於世，將會暴露統治者的昏庸及其對世界局勢之愚昧無知，而清宣宗的羈縻態度亦將使之喪失權威。且輯錄內容涉及機密文件，為防夷人刺探，亦不宜公開²⁴⁰。但士大夫是否有足夠的知識與勇氣，鑑別統治者的處置方式為昏庸無能？尙待進一步討論士大夫們對夷務的態度，方能確知。

雖然編纂《籌辦夷務始末》僅將相關奏摺、上諭與照會等檔案資料，集結成冊，未有評論、解題等論述。然諭令編纂《籌辦夷務始末》，已值得吾人措意。除了視《籌辦夷務始末》為史料外，其本身所代表的時代意義，學術意涵，均值得深入爬梳²⁴¹。編纂《籌辦夷務始末》的主要用意，乃冀期能作為日後與西方各國交涉之參考。但編纂完成後不准刊印，如何作為大臣參酌之源？就連清朝皇帝亦鮮少閱讀此書，直到1860年清文宗巡幸木蘭時，曾

²³⁷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五)》，32/312/148。

²³⁸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六)》，38/387/958-959。

²³⁹ 何雙生、劉德麟，〈清代官修的外交檔案資料彙編——《籌辦夷務始末》〉，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學林漫錄》，5(北京：中華書局，1982)，207-216。

²⁴⁰ 朱梅光，《近代中國外交史學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12)，45-48。

²⁴¹ 有關發現與印行《籌辦夷務始末》的過程，見：蔣廷黻(著)、謝鐘璉(譯)，〈蔣廷黻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104；蔣廷黻，〈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清華周刊》，37.9-10(北京，1932)：5-14。相關研究討論，請參閱：朱梅光，《近代中國外交史學研究》，22-53。

要求軍機大臣穆蔭(?-1864)等人補鈔《宣宗成皇帝實錄》與《籌辦夷務始末》進呈。或許在遭遇英法聯軍攻陷北京的變亂後，清文宗希望參酌道光朝故事，尋求禦敵之法。但清文宗未及閱覽其書，隔年即已崩殂，鈔錄工作遲至1864(同治3)年始完成²⁴²。

值得注意的是，清中葉以降，清廷刊刻大型書籍的活動有漸趨減少之勢，但以民間力量進行的方式，卻逐漸興起。如1808年嚴可均(1762-1843)編纂《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1827年由賀長齡主持，魏源編輯的《皇朝經世文編》正式刊刻，尤為清中葉學術思潮的重要代表。1829(道光9)年阮元編輯的《皇清經解》，代表另一股學術潮流。鴉片戰爭後，介紹西方史地的書籍，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呈現出時代脈動與學術思潮的緊密結合。而張應昌於1856年開始纂輯，1869(同治8)年完成的《國朝詩鐸》，乃清中葉重要私修詩集集成。從官修到私纂的變化，蘊含著什麼意義？在私纂書籍的過程，士大夫個人以及整體學術網絡又是如何運作？相關問題，將在第五章進行析論。

五、小結

本章藉由清中葉的詔諭解析時代脈動，然所有事情牽涉繁複，限於篇幅，難以一一詳盡討論。故本章僅擷取其中某些切片，冀期描繪清中葉詔諭所顯現的時代脈動。歷史上發生的事件均有其內在連繫，嘉道咸年間的諸多現象，清楚呈顯事件之間環環相扣的情形，以中長時段的角度審視，將可發掘隱含在事件背後的關連性。高翔教授論析清高宗南巡開啓奔競奢靡之風，對清朝造成極大傷害，尤埋下嘉道中衰的導火線。道咸年間的夷務問題，環繞於鴉片戰爭後一連串的換約行爲，而鴉片戰爭的導火線早在乾嘉年間即已埋下。因此，意欲解析清中葉以降涉外事務的內容，應將視野擴及19世紀上半葉，始能對相關事務有完整認識。

²⁴² 中華書局編輯部、李書源(整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3/1319-1320。

本章嘗試綜合清仁宗、清宣宗與清文宗三位皇帝的詔諭與御製詩文集，歸納清中葉以降諸帝共同面臨的問題，依序聚焦於八旗問題、內政弊病、涉外事務、風俗人心與學術文化等四大議題。

自1644(順治元)年入關後，旗人迅速喪失滿族傳統風俗。清初諸帝透過各種方式，加強滿族的向心力與認同感，包括再三強調清語騎射與質樸風俗為滿族根本和美德，嚴禁滿人沾染漢人文弱、奢靡習氣。然邁入19世紀，「人口」成為清朝官方急待克服的重要課題。自乾隆年間起，「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已成為重要關鍵字，清高宗幾乎年年困擾於「生齒日繁」的問題。因此，如何安頓旗人的生計問題，常令皇帝感到棘手。

除了清王朝統治者自身的旗人問題外，在治理廣大漢人居住地區時，同樣面臨許多難題，內政上諸多問題均令清朝統治者疲於奔命。和坤案讓清仁宗不得不正視吏治敗壞的議題；道光年間，清宣宗不時強調諸多事務，包括：裁汰庸冗之員，官員升遷，審訊案情之法與整飭胥吏幕友等，均關乎吏治，故要求大小臣工實心整頓，方可「端風化而肅吏治」，庶使吏治民風蒸蒸日上。咸豐年間，清文宗多在詔書中，直斥「吏治廢弛」，「吏治尚可問乎」或「吏治之壞已極」等，透露出清文宗對當前吏治敗壞的憂心。而吏治敗壞使得防災、救災出現漏洞，鹽漕河的運作也因貪官污吏出現嚴重弊病。銀貴錢賤以及能否開採礦藏，亦為清中葉以降的重要經濟議題。凡此種種，均是清仁宗、清宣宗與清文宗三位皇帝在處理內政上，必須面對的難題。

當清廷費心整治內政問題之際，來自西方列強的壓力讓清朝政府益加難以負荷。儘管清高宗與清仁宗，均曾接觸英使來華，抵擋英國急欲扣關的壓力。但清宣宗以降卻難將夷人拒之門外。原本即已紊亂的內政之弊，加上夷人來犯，確實讓清廷遭逢「千百年未有之變局」。由於清仁宗並未遭遇夷人犯境的挑戰，故晚年尚可道出天朝恩澤廣被四方的盛世景象。清宣宗與清文宗則苦嚙西力入侵的事實，不得不正視夷務問題。但綜觀清宣宗與清文宗處理夷務的態度，多以逃避為主，並未積極回應外夷挑戰。

面對內外交迫的情勢，清朝皇帝極力試圖尋求解決之道。皇帝們依循「家

法祖制」，回到風俗人心的淳化，希冀能以「崇正學」的方法，達成化民成俗的終極目標。清初諸帝本即特別留意「人心」，清高宗於1741年頒布的詔書，明確表達重視人心的態度。而清仁宗在詩文中，不時以淳化與繼德為題，表達淳化風俗的想望，尤常藉由父祖居所懷念父祖施政與盛世，慨歎時代變異，自責本身才能有限，惕勵群臣佐君中興，堪稱清仁宗為政的關鍵字。清朝肇建以來，常藉由纂修書籍以傳達官方意識型態，宣揚符合官方統治的文化思想。從《康熙字典》、《全唐詩》、《古今圖集成》與《四庫全書》等大規模套書漸次刊刻後，除例行的地方志、政書、聖訓與實錄修纂外，清中葉以後鮮少大型文化事業。代之而起的，是督撫或文人利用私人力量進行編纂書籍。而這些私修書籍的內容，往往更契合於時代脈動。

藉由本章析論，略可瞭解嘉道咸年間，詔諭關注的問題為何，皇帝認知的「大清帝國」²⁴³已變成何種模樣。下文擬將視角從皇帝轉向士人階層，透過士人討論內政弊病、涉外事務、風俗人心與學術文化等議題，剖析士人如何描繪其身處的時代，提出何種對策解決所面臨的困境。藉由論析士人在一次次重大事件中的表述，求索士人如何運用傳統思想資源²⁴⁴，面對日漸迫切的國家危機。

²⁴³ 岡田英弘、宮脇淳子與杉山清彥等教授均指出：「清朝」，係中國傳統朝代觀下的稱呼，然滿洲人在部分觀念上係繼承蒙古人而來，故正式的國號稱呼應為「大清」。參閱：岡田英弘，〈インタビュー—清朝とは何か〉，《清朝とは何か》，9；宮脇淳子，〈大清帝国にいたる中国概説〉，《清朝とは何か》，42-58；杉山清彥，〈大清帝国史研究の現在—日本における概況と展望—〉，《東洋文化研究》，10(東京，2008.03): 347-372。

²⁴⁴ 有關「思想資源」的論述，可參閱：王汎森，〈「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收入：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181-194；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16.3: 137-170。



第三章 士人多旋律線的自改革¹

1833年，魯一同(1805-1863)回顧自1820年起，13年中竟有半數以上的年歲出現災荒，且水患、旱災、匪亂、饑饉與瘟疫伴隨相生，致使生靈塗炭。其中1831年的東南大水、京師旱象，更造成嚴重災情²。郭嵩燾(1818-1891)在1891(光緒17)年賦詩慶賀元旦，追憶1831年爆發的水患，以及此後30餘年的時局世變，憂心不已³。魯一同與郭嵩燾不約而同聚焦於1831年的災患，隱然將之視為清朝盛衰的轉捩點。

1835年8月28日深夜，一道彗星從天空劃過，張際亮夜觀天象，慨然賦詩云：連年以來，各地水患、旱象與蝗災頻傳，晉、川等省更不時發生「夷匪滋事」，戕官謀逆之事。閩省官吏近乎人人賞戴花翎，但又有誰真正為國擔憂？同年10月，鄉試結束後，張際亮自福州返家，歸途中震懾於百姓流離失所，幾欲相食和官場弊病的景象，致書黃爵滋，痛陳內心悲憤之情。信中

¹ 「自改革」一詞係借用龔自珍在〈乙丙之際箸議第七〉中所云：「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見：龔自珍，〈乙丙之際箸議第七〉，收入：龔自珍(著)、王佩誥(校)，《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6。進一步的論述可參閱：朱維錚，〈導讀：晚清的“自改革”與維新夢〉，收入：朱維錚、龍應臺(編著)，《維新舊夢錄：戊戌前百年中國的“自改革”運動》(北京：三聯書店，2000)，21-72。而有關音樂「多旋律線」與史學研究的結合，請參閱：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2002)，1-26。

² 魯一同，〈安東歲災記叙〉，收入：魯一同(著)、郝潤華(編校)，《魯通甫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55-57。

³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4(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984；汪榮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386-387。

直指社會現況係「海內虛耗，官吏玩愒」，進而抨擊官吏殆皆浚民脂膏，舞文弄法，欺瞞朝廷。胥吏剝削小民的行徑，已到了天地不容的地步，被逼投池自縊者，比比皆是。而這些官吏均由科考出身，張際亮不禁對科舉制度產生信心危機⁴。莫友芝甚至痛斥「科舉壞人心術」，不如棄文從武，建功立業，萬里封侯⁵。沈垚(1798-1840)尤屢屢在致友人書札中，批評時下科舉弊病，諷刺京師重利之俗，考生只需攜帶高貲赴京趕考，中舉易如反掌，單憑真才實學，絕無希望⁶。朱鳳鳴(1790-1857)則建議改革科舉制度，仿效漢朝薦舉賢良方正或清初博學鴻詞之法，輔以皇帝親試，確保拔擢的人才符合國家所需，且因舉主負有連帶責任，可避免濫舉之弊⁷。

此時期之士人，常以寫實筆法，感懷社會景況。如1798年張問陶(1764-1814)在離鄉赴京途中，親見遭白蓮教徒肆虐故鄉，賦詩記述清朝官兵腐敗無能，黎民百姓流離失所，飢寒貧困的情形⁸。1833年魯一同賦詩〈荒年謠五首〉，強調係筆錄所見所聞，雖僅能述及十之二三，然所言盡皆徵實，乃社會實象。詩中包括：宰殺耕牛以活人，並藉此帶出人吃人的駭人聽聞；遍地骨骸任由「犬饕鳥啄」，行人早已習以為常；母親為求活命，不得不棄兒自保；大雪紛飛，窮苦人家僅能拆屋為薪；流民四處逃散，官吏卻驅人如蠅⁹。唐鑑和裕謙擔任地方要員期間，皆頒發告示嚴禁宰殺耕牛，強調以農為本，祭神以誠，

⁴ 張際亮，〈八月廿八日夜作是夜於寓廬天開圖畫樓觀彗星，長丈餘。慨然賦此。〉，收入：張際亮(著)、王飈(校點)，《思伯子堂詩文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877；張際亮，〈答黃樹齋鴻臚書〉，《思伯子堂詩文集》，下/1359-1362。

⁵ 莫友芝，〈郭店題壁〉，收入：莫友芝(著)、張劍、陶文鵬、梁光華(編輯校點)，《莫友芝詩文集》，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452。

⁶ 沈垚，〈與張淵甫〉，收入：沈垚，《落帆樓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461。

⁷ 朱鳳鳴，〈恩科論〉，收入：朱鳳鳴，《食字齋文集》(光緒癸未年癸未新鐫，藏於日本東洋文庫)，卷1/15a-16b。

⁸ 張問陶，〈戊午二月九日出棧宿寶雞縣題壁十八首〉，收入：張問陶(著)、成鏡深(主編)，《船山詩草全注》，3(成都：巴蜀書社，2010)，1116-1123。

⁹ 魯一同，〈荒年謠五首〉，《魯通甫集》，182-184。

毋須妄加殺生¹⁰。略可說明耕牛的重要性，並突顯百姓被迫宰殺耕牛時，面臨的窘困生活。1846年，祁寯藻在詩中指陳銀貴錢賤，江南漕弊，以及官吏擾民等現象¹¹。1850年題詩〈哀流民〉，記敘荆楚地區連年水旱、兵戎，逼民為盜或四處流徙。〈牽夫謠〉則描繪牽夫為求溫飽，辛勤工作的景象¹²。1857年，祁寯藻生動敘述一位19歲母親，帶著年僅六個月大卻即將餓死的嬰兒，前往長椿寺領取賑粥，由於官方規定施粥以口計算，故母親祈求嬰兒暫且勿死，方能多領一碗粥¹³。

胡林翼(1812-1861)在《孫芝房侍講芻論》一書敘言中，指陳：當今天下之患在於「人滿」與「吏惰」，人滿致使貧困，吏惰造成怠玩，遂令水火災疫頻傳¹⁴。汪士鐸(1802-1889)在日記中，毫不諱言：「世亂之由人多」，故倡議推廣溺女之法，家有兩女者倍其稅賦和嚴禁再嫁等政策，以解決人多之患¹⁵。並強調衡量君德應以「英明吏治，綜核名實，兼資文武，知人善任」為標準，而非抽象的「崇儒重道，偃武修文」，且君心重在「英武」，而非「寬仁慈惠」。君主應以豐年無災為瑞，而非祥麟瑞鳳；應以充斥「巧佞便給」之人，「流

¹⁰ 見：唐鑑，〈禁宰耕牛示〉，收入：唐鑑(撰)、李健美(校點)，《唐鑑集》(長沙：岳麓書社，2010)，129；裕謙，〈禁宰耕牛示〉，收入：裕謙，〈勉益齋偶存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7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14-215；裕謙，〈禁私宰耕牛示〉、〈再禁私宰耕牛各條示〉、〈禁宰耕牛檄〉，收入：裕謙，〈勉益齋續存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7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23-424；572-573；670-671。

¹¹ 祁寯藻，〈感河南、直隸二案，時久不雨〉，收入：祁寯藻(著)、《祁寯藻集》編委會(編)，《祁寯藻集》，2(太原：三晉出版社，2011)，251。

¹² 祁寯藻，〈哀流民〉、〈牽夫謠〉，《祁寯藻集》，2/279。

¹³ 祁寯藻，〈打粥婦貧民領粥，俗謂之“打粥”。有少婦懷垂死兒打粥者，聞而悲之，故為此詩也〉，《祁寯藻集》，2/404。

¹⁴ 胡林翼，〈敘〉，收入：孫鼎臣，《孫芝房侍講芻論》(咸豐十年五月刊于武昌節署，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5a-7a。盛康編纂之《皇朝經世文續編》則註記為汪士鐸代筆。見：汪士鐸，〈孫芝房侍講芻論序〉，收入：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967-969。

¹⁵ 汪士鐸(著)、鄧之誠(輯錄)，《汪悔翁(士鐸)乙丙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152-154。

蕩棍匪」為戒，而非彗孛飛光¹⁶。

上述文字，生動呈顯嘉道年間，天災和人禍交相襲擊，致使百姓生活面臨嚴峻考驗，且反映官方治理上的諸多弊病。藉由魯一同、郭嵩燾、張際亮、祁寯藻與汪士鐸等人的記述，略可發現其所描繪的時代情景並非特例，不少士人均有類近之觀察。林昌彝(1803-?)與魯一同不約而同以生病比喻當前國家情勢，且舉國均諱言生病，致使病情愈加嚴重。林昌彝並臚列外夷之患，水旱饑饉，械鬥，盜匪劫掠與河鹽漕等，皆為當前國家疾病¹⁷。這些事件並非單獨發生，而是同時爆發。如災荒過後必定產生饑饉與賊匪劫掠，尤有官吏利用各式藉口，加入剝削民眾的行列。觀察出時代警訊與急呼革新的士人，隱隱然形成一個網絡，彼此相互聯繫，一起對時政發表議論，相偕參與宴遊修禊活動。魯一同因從學潘德輿，故與孔繼鑠(?-1858)、湯鵬(1801-1844)、何紹基、葉名澧(1811-1859)、黃爵滋、張際亮、朱琦、陳慶鏞(1795-1858)、徐寶善(1790-1838)、梅曾亮與汪喜荀(1786-1847)等人往來密切¹⁸。魯一同甚至賦詩懷念曾國藩、朱琦、臧紆青(1795-1855)、戴鈞衡(1814-1855)與楊彝珍(1807-?)，視為性命之交，讚譽人人「皆秉天地之正氣，意存乎拯斯民於水火」¹⁹。1845年乙巳恩科上榜名單有：魏源、徐鼎(1810-1862)、孫鼎臣(1819-1859)與何秋濤(1824-1862)等人。1848年，以何紹基為首發起祭祀顧炎武活動，徐鼎、孫鼎臣、曾國藩、王茂蔭、陳慶鏞、蘇廷魁(1800-1878)、潘曾瑋(1818-1886)與葉名澧等人，均受邀參與²⁰。儘管士人網絡難以明確畫定，但隱約有其脈絡可尋，吾人或可據以上下求索。

士人對社會的關懷並非侷限於單一面向，細察士人詩文作品即可探驪得

¹⁶ 汪士鐸(著)、鄧之誠(輯錄)，《汪梅翁(士鐸)乙丙日記》，117。

¹⁷ 林昌彝，〈醫喻〉，收入：林昌彝(著)、王鎮遠、林虞生(標點)，《林昌彝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64-266；魯一同，〈覆潘四農書〉，《魯通甫集》，20-24。

¹⁸ 劉承幹，〈心嚮往齋集序〉，收入：孔繼鑠(著)、劉承幹(校)，《心嚮往齋詩文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160(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據南林劉氏求恕齋叢書排印)，4；馮煦，〈孔宥函先生傳〉，《心嚮往齋集》，《叢書集成續編》，160/8。

¹⁹ 魯一同，〈途中懷人五詩〉，《魯通甫集》，288-291。

²⁰ 徐鼎(撰)、劉榮喜(校注)，《未灰齋詩文集》(成都：巴蜀書社，2009)，262-264。

珠。如祁寯藻曾在一首詩中，同時觸及銀錢議題，漕運弊病與吏治問題等²¹。吳嘉賓(1803-1864)對夷務、錢法、人材晉用、治理黃河，漕務與改善鹽務等，均有專文討論²²。孫鼎臣針對治體、鹽務、漕運、幣制、兵法等，均深研細論²³。魏源論著之內容尤包羅萬象，學術、治術、考證、史論、宗教、鹽務、農政、戰史、漕運，水利與海運等，均有所述及²⁴。徐嘉亦針對開礦、銀錢、戰略、兵器與風俗民情等議題，進行論析²⁵。凡此種種，略可說明士人係以多旋律線的角度出發，關懷時局，並從各個層面尋求解決方案，以畢其功於一役。

人口極速成長，係清中葉的重要核心議題，因人口多寡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政府如何提供龐大人口所需的一切資源？一旦人民生活無法獲得滿足，極易鋌而走險與官方對抗，以求生存。而政府如何迅速救平亂事，防止其擴大，在在考驗著中央與地方官員的智慧。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均可能嚴重影響政府威信與帝國統治。因此，吏治乃極關鍵之環節，除了可能造成內亂外，舉凡漕運、河工、鹽政與銀錢等諸多議題，均與官吏素質脫不了關係。本章將聚焦於清中葉以降的時代主動脈，從人口問題出發，擴及吏治問題，最後再回到與官民息息相關的銀錢、鹽漕河等經濟議題，冀期呈顯士人多旋律線的時代關懷心態，並試圖勾勒士人網絡之相關連結。

一、天下之患在人滿²⁶

自1711年，清聖祖下詔「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中國人口出現顯

²¹ 祁寯藻，〈感河南、直隸二案，時久不雨〉，《祁寯藻集》，2/251。

²² 吳嘉賓，《求自得之室文鈔》(同治丙寅刊於廣州，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室)。

²³ 孫鼎臣，〈芻論目錄〉，《孫芝房侍講芻論》，1a-2b。

²⁴ 魏源(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魏源集》，上、下(北京：中華書局，2009三版)。

²⁵ 徐嘉(撰)、劉榮喜(校注)，〈目錄〉，《未灰齋詩文集》，1-8。

²⁶ 語出：胡林翼，〈敘〉，《孫芝房侍講芻論》，5b。

著成長。據推算，清朝人口數在康熙年間約達1億左右，至1741年，已逾1億4千萬人，1762年，突破2億；1790年，一度衝過3億²⁷；略可說明中國人口增長的速度。由於人口稅是傳統中國重要稅收來源之一，在人口稅無法持續增加的情況下，大幅減少清朝官方合法稅收的來源，致使繼任者不得不在正稅外，別立名目收取稅收，以維持國家財政²⁸。1821年，湯金釗在討論漕務的奏疏中，即隱諱指出：康熙年間詔令永不加賦，雖係「培養國脈」之策，但亦非無弊，故需適時補救，以增加賦稅²⁹。

人口激增出現的另一項隱憂是，過度集中於已開發地區，造成土地負擔沈重，難以供給龐大人口所需。為解決人口過度集中已開發地區的問題，清廷官方嘗試引進新作物，以增加土地單位面積產量。1745年，陝西巡撫陳宏謀(1696-1771)上奏〈巡歷鄉村興除事宜檄〉，臚列陝西省應興應除之事，倡議廣行蠶桑，興修田功，廣植材木與勸種甘薯等，以增加民食，獲利於地³⁰。1785(乾隆50)年，清高宗諭令刊刻陸燿(1723-1785)撰述之《甘薯錄》，使民周知，廣為栽種，以濟民食³¹。官方並提供諸多優厚條件，鼓勵人民移往邊區或飽經戰亂的人口稀少省分。早在順治年間，清廷以減免稅賦之手段，吸引湖廣地區人民移往四川一帶，充實住民，促進開發³²。降至乾隆年間，「生齒日繁」已成

²⁷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13(北京：中華書局，1977)，121/3546。有關清朝人口統計數字，參閱：張岩，〈對清代前中期人口發展的再認識〉，《江漢論壇》，1(武漢，1999)：65-69；何炳棣(著)、葛劍雄(譯)，《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北京：三聯書店，2000)，328-330。

²⁸ 相關討論，可參閱：曾小萍(Madeleine Zelin)(著)、董建中(譯)，《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²⁹ 湯金釗，〈漕務非定以八折所能有濟疏〉，收入：湯金釗，《寸心知室存稿續編》，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0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84-485。

³⁰ 陳宏謀，〈巡歷鄉村興除事宜檄〉，收入：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1022-1025。

³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一六)》，24(北京：中華書局，1986)，1236/611。

³² 相關研究討論，參閱：劉源，〈“湖廣填四川”與四川流民問題〉，《清史研究》，1(北京，1994)：39-44；孫曉芬(編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鄭維寬，〈清前中期“湖廣填四川”的生動例證——衡陽鄧氏家族的移民史〉，《尋根》，

為清高宗急待克服的難題，近乎無歲不在諭旨中論及。1791、1793年，清高宗均坦言，自康熙年間以迄今日，因承平日久，人口已十倍於前。且因數十年來物價飛騰，難以讓百姓均富，物產之數有限，生民日用無限，故爾人民生活益加困苦。雖移民於邊，拓墾邊區，終非長久之計。對此情況，清高宗深感憂心，諭令各級官員曉諭百姓，當以儉樸為尚，毋得競相奢靡，習於怠惰³³。

面對人口快速增長，士人早已察覺，並再三發出警訊，試圖提出應對之策。1819年，龔自珍剖析因承繼乾隆朝60年太平盛世，致使生齒日繁，人心奢靡，風俗澆薄。為求改善之道，應將京師游食之人，直隸，山東，河南，陝西與甘肅之民，移往新疆，以解決當前生齒日繁之患³⁴。1826年，魏源在回答友人詢問西北邊域問題時，提及：「中國土滿人滿」，新疆地廣人稀，牛羊麥蔬均可生長，具「氈裘貿易之利」，且蘊藏金礦，建議移民新疆地區³⁵。然論及人口問題，當以洪亮吉最引人注意³⁶。

1793年，洪亮吉著《意言》20篇，闡述當前社會遭遇的諸多問題，痛斥因循積弊。其中〈治平論〉直指乾隆晚年以降，因承平日久，致使人口快速增長，為能養活龐大人口，唯有廣闢草萊，移墾荒地，禁靡減稅，抑止兼併³⁷。

5(鄭州，2010): 132- 138；龔義龍，〈清代“湖廣填四川”移民浪潮時間考證〉，《長江師範學院學報》，27.6(重慶，2011.11): 7- 14; 158；森永恭代，〈清代四川における移民開墾政策——清朝政府から見た「湖広填四川」〉，《史窓》，68(京都，2011.02): 187- 209。

³³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一八)》，26/ 1370/ 381- 383；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一九)》，27/ 1441/ 249- 250。

³⁴ 龔自珍，〈西域置行省議〉，《龔自珍全集》，105- 112。

³⁵ 魏源，〈答人問西北邊域書〉，《皇朝經世文編》，2847- 2849。

³⁶ 片岡一忠教授嘗指出：洪亮吉的身分有三個面貌，其一為詩人、散文家、其二為政治評論家、其三為社會思想家。隨著時代變遷，洪亮吉受重視的身分亦有所轉移，其中，作為社會思想家、被譽為「中國的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洪亮吉，係1920年代以降，始受人看重。見：片岡一忠，〈洪亮吉傳(初稿)(一)〉，《歷史人類》，20(茨城，1992.03): 46。

³⁷ 洪亮吉，〈治平篇〉，收入：洪亮吉(撰)、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1(北京：中華書局，2001)，14- 15。

稍後且直言「戶口至今日可謂極盛矣」，「東南之患在土狹而人眾」，強調不論財富或物產均有定數，不可能無限制增加，故治理之法「唯去其糜費而已」。洪亮吉提出的方法，一是從飲食衣服著手，二是神廟佛寺。洪亮吉認為飲食衣服係風俗之本，士人若能以身作則，撙節飲食衣服，不尚奢靡，將可端正風俗。但江南地區為害最甚者，莫過於神廟佛寺與不事生產的僧徒道士。洪亮吉嚴詞抨擊僧徒道士多由小民「典衣損食之錢」供養，造成俗貧民困。宜限制神廟數量，田產，僧徒道士人數等，冀期杜絕糜費³⁸。唯包世臣於1820年，撰文駁斥「生齒日繁，地之所產不敷口食」之論，謂此乃「小儒不達理勢之言」。包世臣認為：人口愈多應愈加富庶，豈有貧困之理。只要認真研究農事，在全國各地創造適合耕種的環境，即可養活龐大人口³⁹。

傳統中國係以土地和戶籍徵稅，不擅於掌控流動人口與商業活動之稅收，故官方鮮少鼓勵移民。最明顯的例證為1683年，清聖祖收復臺灣後，雖解除海禁政策，但仍接受施琅(1621-1696)建議，頒布「渡臺禁令」，嚴格限制內地人民移住臺灣。1732(雍正10)年，廣東巡撫鄂彌達(1685-1761)奏請開放來臺之民，攜帶家眷同行，冀期緩解分類械鬥與反清抗爭等壓力。但1739(乾隆4)年，閩浙總督郝玉麟(?-1745)以渡臺之民多偽造眷屬，賄頂渡臺，弊病叢生，奏請禁止，清廷復又嚴禁搬取家眷⁴⁰。1788(乾隆53)年，陝甘總督福康安(1753-1796)赴臺平定林爽文事件，深感渡臺禁令形同具文，致使偷渡問題日益嚴重，貪官污吏有機可乘，奏請廢止攜眷禁令，放寬合法渡臺民眾的申請。惟直至1875(光緒元年)年，福建巡撫沈葆楨(1820-1879)以拓墾後山荒地和開山撫番為由，奏請廢除渡臺禁令，改採廣招民眾；赴臺墾荒政策，至此始完全解禁⁴¹。

³⁸ 洪亮吉，〈服食論〉、〈寺廟論〉，《洪亮吉集》，1/240-243。

³⁹ 包世臣，〈庚辰禠著二〉，收入：包世臣，《安吳四種》(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1761-1773。

⁴⁰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二)》，10/100/515。

⁴¹ 沈葆楨，〈臺地後山請開舊禁摺〉，收入：沈葆楨，《福建臺灣奏稿》，收入：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48(臺中：文叢閣圖書公司，2007)，191-19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1(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9。有關清朝渡臺禁令的相關討論，可參閱：黃秀政，〈清代治臺政策的再檢討：以渡臺禁令為

人口激增自然逼使部分人口遠離家鄉，另謀生路。除遠赴東南亞外，亦有人選擇移往各省交界或人跡罕至的深山區域，尤以江西、浙江和福建三省近山地區的居民為多。因進入深山老林後搭棚而居，故稱之為棚民。棚民在山中多以「藝麻種筍、開鑪煽鐵、造紙製菇」為生。明朝末年，曾爆發棚民聚眾起事，1638(崇禎11)年，湖南地區因此成為戰區。1642(崇禎15)年，在丘仰寰號召下，數千名江西省袁州府萬載縣棚民加入張獻忠(1605-1647)部隊，與官軍作戰。清朝入關後，各省棚民仍不受官府控制，躲藏於深山中，不時與清朝為敵。棚民並與多起反清叛亂活動相互呼應，如1648(順治5)年，前明降將江西總兵金聲桓(?-1649)舉兵復叛，朱益吾(?-1674)嘯聚江西棚民與之呼應；1659(順治16)年，張煌言(1620-1664)與鄭成功(1624-1662)發動渡海作戰，贛西棚民亦舉兵呼應；1673年，三藩之亂爆發，江西省西北部的棚民起兵支持吳三桂，攻克萬載、新昌縣城；1723年，朱一貴(?-1721)事件結束後，朱一貴的部屬溫上貴潛回江西萬載縣，聯絡當地棚民起事，但未及起事，即遭萬載縣知縣施昭庭破獲。清世宗覽奏後，諭令所屬官員嚴加查緝，不得縱容姑息⁴²。

對清政府而言，究竟該如何將棚民納入管理，實屬不易。1723年溫上貴事件後，清世宗積極處理棚民問題，將棚民編入地方保甲，使其受土著勢力管束，防止為害鄉里。其後清世宗改弦易轍，另立棚籍，輔以保甲制度，由棚民自主管理。並且給予科舉名額，鼓勵棚民子弟應試。其顯例為江西省西北地區的「懷遠人」，懷遠人乃廣東、福建和江西南部移住江西寧州(案：今江西省修水縣)地區之民，於1724年透過地方官員協助，增設懷遠都，編入戶籍，

例》，《文史學報》，20(臺中，1990.03): 49- 66；施志汶，〈臺灣史研究的史料運用問題，以清代渡臺禁令為例〉，《臺灣史蹟》，36(南投，2000.06): 148- 189。

⁴² 鄭銳達，《移民、戶籍與宗族：清代至民國期間江西袁州府地區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9)，23- 32；謝宏維，〈化干戈為玉帛：清代及民國時期江西萬載縣的移民、土著與國家〉，《歷史人類學學刊》，3.1(香港，2005.04): 79- 82；謝宏維，〈棚民、土著與國家——以清中期江西省萬載縣土棚學額紛爭案為例〉，收入：方志遠(等著)，《國家制度與古代社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147- 151；裴率度，〈江西巡撫裴率度奏銅鼓民人謀叛現獲究審摺〉，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2(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1991)，107- 108。

使移住民回到國家法律體系之內。然此舉隨即遭到土著強烈反彈，認為移住民將損害土著權益，以罷考表達對政府安輯棚民政策的不滿⁴³。懷遠人事件略可說明棚民問題牽涉廣泛，處理不善，後果將不堪設想。隨著人口持續快速成長，迫使生計無著的人民離開原鄉，尋求生存機會，致使棚民隊伍持續擴大。

新增戶籍納入管理或許不難，但涉及科舉錄取名額則茲事體大。由於各級科舉名額採地域分配制，大量棚民加入其中，勢必壓縮本地土人中舉機會。自1763(乾隆28)年起，江西省萬載縣爆發學額紛爭案，曠日彌久，歷時近半世紀。江西省萬載縣學額紛爭案肇因於官方重新調整各地棚民學額，其肇始為江西學政周煌(1714-1785)因江西棚民日較減少，奏請裁減江西棚民學額。經江西巡撫湯聘(1706-1769)查明後，江西省大多縣分棚童確實皆在50人以下，雖然萬載縣棚童仍多達240名，但為求江西省境內政策一致，故取消萬載縣棚童另額錄取之規定，與土籍同爭原定之12名學額⁴⁴。此一政策轉變旋即招致土籍士人強烈不滿，屢屢出現以棚童侵占學額為由，上控官府，阻撓棚童考試。1767(乾隆32)年，當地士人辛廷芝要求恢復土棚分考，知縣亦代為陳奏，仍舊遭到拒絕。1796年，多名土籍生員再次控告棚籍生員冒充土籍應試，且阻撓其考試。儘管地方官員承諾將嚴行察核，並要求土棚考生需依法具結擔保，然相關衝突依舊屢見不鮮，且紛爭漸趨激烈。1799年，土籍舉人辛炳晟、貢生鄧錚與廩生郭光笏，再度呈請分額考試，仍未成功。

1803年，土籍副貢辛梅臣前往北京，進行京控，以「棚民去來無定，言語不通，若不分考，勢必黨同伐異，釀成大案」為詞，驚動清仁宗，皇帝諭令兩江總督陳大文(?-1815)、江西學政李鈞簡(?-1823)悉心察核。經過長達一年的調查，1804年，李鈞簡上疏表達支持土棚合考政策，強調土棚合考自1763

⁴³ 梁洪生，〈從「異民」到「懷遠」——以「懷遠文獻」為重心考察雍正二年寧州移民要求入籍和土著罷考事件〉，《歷史人類學學刊》，1.1(香港，2003.04): 29-66。

⁴⁴ 崑岡(等修)、劉啟端(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80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780。

年起已實施多年，倘若復行分額考試，恐將造成混亂。且土棚合考略有消除土棚畛域之意，故不應強分土棚，加深對立。萬載縣之土棚爭議，可以嚴加查核與增加學額等方式處理。其後陳大文亦上奏陳述己見，奏摺中縷述土棚由來與分籍、分考之原因。自1763年土棚合考後，雙方爭議不斷，攻訐不休。陳大文站在土籍立場，直言：「在棚民止願合考，不願分額，以便多占學額；在土民以棚籍人數無常，混亂占額，情實不甘」。為杜絕土棚紛爭，陳大文建議恢復1731(雍正9)年定例，採行土棚分考、分額之法。儘管李鈞簡警告復行土棚分考、分額，恐將引發臨近縣分土棚士人效法，不可不慎。清仁宗仍不敢妄行裁斷，諭令新任江西學政曹振鏞(1755-1835)、江西巡撫秦承恩(?-1809)加緊查辦，具奏說明。曹振鏞與秦承恩在聯合奏疏中，以李鈞簡所論為本，同樣陳請應以同額合考處理，清仁宗接受曹振鏞之建議，諭令土棚應續行同額合考。然萬載縣棚童以罷考表達不滿，在曹振鏞與秦承恩威嚇下，曾復行同額合考，但土棚積怨已深，難以罷休。1807(嘉慶12)年，再度爆發罷考事件，江西巡撫金光悌(1747-1812)與江西學政汪廷珍上奏詳述事件始末，字裡行間多為土籍抱不平。清仁宗於是加派鐵保與金光悌、汪廷珍等人會同查辦，要求具摺說明，以供裁定。1808年，清仁宗在審酌各方意見後，諭令萬載縣復行分額錄取模式，且其他縣分不得援引仿效⁴⁵。至此，萬載縣土棚爭議始暫告落幕。

江西省萬載縣延宕近半世紀之久的學額紛爭案，在在突顯出棚民背後牽涉的複雜問題，以及政府管理的難度，稍有不慎，極易橫生枝節，引發衝突。棚民除了造成政府管轄上的困難外，隨著大批棚民長期開墾山區，更破壞當地環境，改變地形、地貌，一旦氣候異常，極易產生災害。1823年，梅曾亮撰文直言對棚民發展的兩難抉擇。儘管梅曾亮肯定安徽巡撫董教增(1750-1822)於1807-1810年任內，鼓勵棚民深入崇山峻嶺，人跡罕至之處，拓墾種植以盡

⁴⁵ 相關奏摺，參閱：呂小鮮(選編)，〈嘉慶朝江西萬載縣土棚學額紛爭案〉，《歷史檔案》，1(北京，1994.01): 12- 26; 42；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三)》，30/ 193/ 550- 551。

地利。然在親訪安徽宣城居民後，梅曾亮對附近山區因遭棚民濫墾濫伐，致使每逢大雨即發生土石流，造成嚴重災害，深表遺憾。究竟該鼓勵或嚴禁棚民入山開墾，仍無定論⁴⁶。1834年，山西道監察御史蔡賡颺(1796-?)上疏陳請浙江杭州、湖州等地，已因棚民入山濫墾，致使水土流失，大雨來襲隨即將上游沙石冲刷至下游，淤塞河道，籲請強令棚民回籍或改種林木厚植地力⁴⁷。1836年，御史陶士霖奏請嚴禁棚民入山開墾，即著眼於危害治安與對環境造成的嚴重破壞。由於棚民開山種植，漸趨頻繁，致使土鬆石碎，每逢大雨，衝刷至下游，造成傷亡，阻塞河道，弊害甚多。清宣宗乃責成管轄官員皆應嚴加察核棚民開墾事宜，毋得四處流竄或非法濫墾⁴⁸。1850年，江西道監察御史汪元方(?-1867)上奏指稱：江浙地區水患頻仍，多肇因於棚民濫墾山林，造成水道淤阻，每遇大雨即淹沒附近良田，損失慘重。奏請嚴禁棚民拓墾未開之山，以保全生民財產。清文宗諭示所屬官員實心查察，妥善保全未開之山，並嚴緝非法躲藏於山林中的棚民，製成戶冊管理，嚴防蠹胥藉此需索⁴⁹。

自乾隆中葉以降，大批棚民過度墾伐山林，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相關研究尤指出過度開發的土地，其產量極速下降，難以供給龐大人口所需。山林地區廣植玉米，嚴重危害水土保持，致使災害愈加頻繁⁵⁰。為解決相關問題，清中葉以降，不少士人倡議廣植樹木，禁止栽種玉米，改良農耕方法等。如黃德濂(1786-1849)撰文推廣植木的重要性，視為養民之道⁵¹。陳景潮認為種植玉

⁴⁶ 梅曾亮，〈記棚民事〉，收入：梅曾亮(著)、彭國忠、胡曉明(校點)，《柏枧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26-227。

⁴⁷ 蔡賡颺，〈奏請飭禁杭湖兩府棚民墾種山場湖田〉，《軍機處檔摺件》，066866號。

⁴⁸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五)》，37/288/443-444。

⁴⁹ 汪元方，〈請禁棚民開山阻水以杜後患疏〉，收入：王雲五(主編)，《道咸同光四朝奏議》，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903-905；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一)》，40/20/289-290。

⁵⁰ 有關玉米的傳播、種植等相關討論，可參閱：郭松義，〈玉米、番薯在中國傳播中的一些問題〉，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論叢》，7(北京：中華書局，1986)，80-114。

⁵¹ 黃德濂，〈勸種樹株檄〉，《皇朝經世文續編》，4545-4548。

米「利在一時，害貽百世」，除造成水土流失，危害下游百姓外，且斷喪山川靈氣和文風士習。因不論土客民皆違法私種，故籲請官府明令禁止，並分配植樹定額，以期恢復山林⁵²。儘管包世臣積極鼓勵開山墾殖，以舒緩沈重的人口壓力，惟亦規劃一套漸層開山法，在拓墾山林之際，仍可保持地力，避免水土流失⁵³。1807年，安徽巡撫彭初齡、安徽寧池太廣兵備道楊懋恬(?-1826)；1815年，浙江巡撫顏檢(?-1833)；1837(道光17)年，御史陶士霖；1850年，江西監察道御史汪元方；1851年，浙江巡撫常大淳(1793-1852)等，皆上奏陳請皇帝諭令嚴禁棚民入山開墾。奏疏內容多聚焦於嚴禁棚民入山非法開墾，禁止棚民種植有礙水土保持之作物等，冀期驅離棚民，恢復山林地力⁵⁴。

由上述棚民問題，以及1796年爆發的川楚教亂，略可說明棚民背後隱含的複雜問題，包括制度，軍事，宗教，經濟，治安與災荒等諸多層面。除特殊棚民族群衍生的諸多問題外，為求生存而移居他地所出現的土客問題，同樣不容小覷。清中葉以降，因移民而衍生出的諸多問題愈形嚴峻，甚或爆發武力衝突。1819年，江西商民與湖南湘潭居民在省城附近，爆發大規模仇殺事件；1832年，臺灣嘉義地區的張丙事件；自1850年起，長達十年、蔓延十數省的太平天國事件，細察其成因均與土客紛爭不無關係。

1819年，江西戲班於湖南湘潭演出時，當地民眾為報復此前湖南戲班遭江西人嘲笑之仇，故於江西戲班表演時喝倒采。湖南湘潭地區的江西人群起反擊，商民以集資招募或要脅的方式，鼓動當地江西人響應。當地湖南人聞訊後，亦聚眾攻擊江西人。一時之間，湘潭地區「閉城罷市，械鬪兼旬，人心洶惶，幾激大變」⁵⁵。官方介入調停後，雖然民間械鬥衝突暫歇，但湖南籍與江西籍官員在官場上的角力，方始揭幕。雙方官員為迴護本籍利益，紛

⁵² 陳景潮，〈開種苞蘆利害論〉，收入：陳常鐸(修)、臧承宣(等纂)，《光緒分水縣志》，1(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臺一版，據清光緒32年刊本影印)，176-177。

⁵³ 包世臣，〈農政·任土〉，《安吳四種》，1667-1679。

⁵⁴ 參閱：王淑芬，〈清代治山防洪環保策略之探討：以長江流域為中心〉，《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報》，19.1(臺北，2006.03)：68-69。

⁵⁵ 魏源，〈戶部左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周公神道碑銘〉，《魏源集》，上/336。

紛上奏清仁宗爭取支持。但清仁宗極為在意官員涉入地方事務，故對雙方官員均有懲處。湖南江西土客仇殺事件背後，涉及移住民和土著爭搶市場利益。雙方積怨已久，略有不慎即擦槍走火，引發大規模械鬥仇殺事件⁵⁶。

1832年，中國內地米價貴騰，連帶使得臺灣米價上漲，臺灣嘉義縣店仔口因而爆發搶米事件。遭搶商人向官府控訴，張丙(?-1833)係搶米事件的主謀。1831年，當地閩粵移民已因細故產生對立。1832年，雙方為進行報復，尋釁爆發衝突械鬥。事發後，臺灣鎮總兵劉廷斌(1768-1833)旋即率領200名兵丁前往嘉義平亂。然張丙卻對嘉義縣知縣邵用之(?-1832)縱放粵人，追捕閩人，以及劉廷斌殺害閩莊良民，氣憤難平，決意舉兵對抗官府。彰化、鳳山等縣亦在黃城、張紅頭、許成等人組織下，起兵響應張丙。儘管聲勢貌似驚人，張丙更一度攻陷嘉義縣城，但最終仍不敵清軍，張丙、黃城與許成等人紛紛戰歿或遭俘。張丙事件表面上肇因於搶米問題，分類械鬥，因而舉兵反抗政府。實際上卻涉及部分移民罷占利益，形成分配不均，引發不滿，故張丙以掃除貪官污吏，殺官攻城，不犯人民為號召，獲得廣大共鳴，糾眾達數萬人以上。張丙事件充分突顯清朝在臺管理，包括官吏和兵丁的素質，治理政策，經濟財政或治安盜匪等，均面臨嚴峻考驗⁵⁷。

然張丙事件並非特例或臺灣獨有，相關問題在各地屢見不鮮，廣西於太平天國爆發前夕，湧入眾多移民，發生多起因租稅、土地使用等問題，赴京控訴的案件或在當地引發官民抗爭，呈顯因新舊移民造成的緊張對立氛圍，且涉及漢人與當地少數民族的紛爭。四川涼山地區，漢人與彝族之間亦爆發緊張對立關係。嘉道年間，接連傳出多起漢彝衝突事件。事件起因於漢人侵入彝族地區開採礦藏，或與彝人爭奪耕地。初時清仁宗採取分離政策，隔絕

⁵⁶ 相關討論，參閱：Peter C. Perdue, "Insiders and Outsiders: The Xiangtan Riot of 1819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Hunan," *Modern China*, 12.2 (Apr., 1986), 166-201; 邵鴻，〈利益與秩序——嘉慶二十四年湖南省湘潭縣的土客仇殺事件〉，《歷史人類學學刊》，1.1(香港，2003.04): 83-98。

⁵⁷ 有關張丙事件的相關討論，見：菊池秀明，《清代中国南部の社会変容と太平天国》(東京：汲古書院，2008)，89-134。

漢彝交往，但效果欠佳。雙方仇怨累積至道光年間，頻傳舉兵抗官事件。除顯示清廷統治與軍事力量的衰退外，亦突顯漢人不斷湧入彝族地區，大幅增加雙方衝突機會。湖南與兩廣境內，也先後在1832、1836與1847年，發生瑤族叛亂事件。1832年的趙金隴之亂，1836年藍正樽(1789-1850)的青蓮教之亂，1847年雷再浩的棒棒會之亂，皆與漢人攘奪瑤族耕地有關，且因部分官員偏袒漢人，欺壓瑤族，使其心生不滿，致使瑤族屢屢舉兵反抗⁵⁸。嘉道年間，由於雲南西部土地豐饒且具地利之便，吸引大量漢人移住，粗估18世紀初，該地區人口增加達200萬人以上，1850年，更增加近1,000萬人，19世紀中葉即達到人口飽和狀態。而大量移住漢人因爭奪礦產與搶占耕地，不時與回民發生嚴重對立，械鬥事件，甚或起兵抗官。如1800年悉宜銀廠爭礦事件，1821年白羊銅廠爭礦事件，1839年順寧府緬寧廳漢回械鬥，以及1845年保山雲州地區漢回抗爭等。諸多抗爭事件，雖均暫時平息，但漢回雙方皆不滿官府裁判，回民更認為有偏袒漢人之嫌，故多次赴京控訴，惟未獲善意回應，致使漢回心結愈加深化。1856年，杜文秀(1823-1872)起兵攻占大理，別立政權，遙奉太平天國號召，與清朝對抗。細察漢回對立緣由，殆與雲南地區龐大的漢人移住民密切相關，且嘉道年間雙方衝突所埋下的仇恨，未能全然消弭，成為咸豐朝大規模回民起義的遠因⁵⁹。

儘管上述事例散於各省，情形非盡相同，但不論土客問題或民族對立，皆突顯出移民衍生的複雜問題，或可說明人滿之患帶來的廣泛影響。在諸多變亂中，吏治往往成為事後眾多官員檢討的主因之一。

⁵⁸ 參閱：菊池秀明，《清代中国南部の社会変容と太平天国》，37-87; 137-220。

⁵⁹ 安藤潤一郎，〈清代嘉慶・道光年間の雲南省西部における漢回対立——「雲南回民起義」の背景に関する一考察——〉，《史學雜誌》，111.8(東京，2002.08): 46-71。

二、官箴吏治與政府革新

定義一個時代的盛衰殊甚不易，遑論為衰世尋找起點。吾人僅能在士人的隻字片語中求索，藉以描繪時代樣貌。洪亮吉在奏疏中指陳：1790年以降為重大轉捩點，此後下情無法上達，官吏貪贓枉法，人材消磨殆盡，士人不知廉恥，賞罰不明與言路未通等，致使變亂紛乘，不復乾隆盛世⁶⁰。龔自珍論析乾隆末年諸多亂象，生齒日繁，氣象狹隘，黃河為患，人心風俗不復淳化，已呈王朝衰世之象⁶¹。

1790年，尹壯圖(1743-1808)上疏直指督撫貪玩之情，「吏治廢弛」已極，各地商民泰半「蹙額興歎」。當清高宗進一步要求尹壯圖提出具體事證時，尹壯圖旋即改稱「措詞過當」，奏請治罪。刑部議處斬立決，獲清高宗加恩免死，改授內閣侍讀、禮部主事等職⁶²。無獨有偶，1793年，洪亮吉揭露官員、胥吏諸多弊病，強調官員之賢能與否影響深遠。迄乾隆晚期，官員之外，胥吏之害更甚以往，非僅把持官府，凌脅士人，且魚肉里閭，宜戒慎其事⁶³。洪亮吉為川楚教亂中殉職的王翼孫(1757-1796)撰寫行狀時，刻意強調王翼孫雖為巡檢，卻能撫民禦敵，迥異於封疆大吏聞賊而逃，推諉塞責之行徑⁶⁴。洪亮吉將整肅吏治列為平定川楚教亂的首要之務，直言斯時吏治敗壞已百倍於十年、二十年前，「上敢隳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資」，竊占捐賑撫卹，蝕糧冒餉，避罪就功，推諉塞責。當務之急宜明賞罰，肅吏治，以通上下之情⁶⁵。

⁶⁰ 見：洪亮吉，〈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洪亮吉集》，1/223-230。

⁶¹ 龔自珍，〈西域置行省議〉，《龔自珍全集》，105-112。

⁶²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36/322/10799-10801。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7(北京：中華書局，1987)，2029-2032；葛劍雄，〈清乾隆年間尹壯圖上疏事件始末〉，《探索與爭鳴》，7(上海，1996.07)：43-46。

⁶³ 洪亮吉，〈守令篇〉、〈胥吏篇〉，《洪亮吉集》，1/24-26。

⁶⁴ 洪亮吉，〈敕授登仕郎晉贈武德騎尉卹授雲騎尉世職湖北呂堰驛巡檢王君神道表〉，《洪亮吉集》，1/198-200。

⁶⁵ 洪亮吉，〈征邪教疏〉，《洪亮吉集》，1/206-208。

清高宗病逝，清仁宗以懲治和坤展現親政實力，且迭頒詔書廣求諫言，冀期振衰起敝。清仁宗並且為尹壯圖平反，諭曰：尹壯圖於1790年所奏之事雖查無實據，但必事出有因，皇帝深知彼時各省督撫「冀圖朦蔽，多係設法那移，彌縫掩飾」，故「似此敢言之臣，急宜錄用」，諭令來京候旨擢用。尹壯圖抵京後，以母老乞恩歸養，清仁宗賞予給事中銜。尹壯圖則奏請清查各省陋規，指稱：1765年前後，吏治風氣已出現重大轉變，此前雖有陋規，係為公私應酬之用。其後風氣漸趨奢靡，人心狡詐，上下官吏皆喜夤緣攀附，致使苛斂日甚，遠逾陋規之數。尹壯圖將吏治視為腹心之患，強調澄清吏治，即可消滅賊匪。雖然清仁宗平反了尹壯圖1790年的奏疏案，但卻認為尹壯圖奏請清查各省陋規事，窒礙難行。清仁宗強調各省陋規相沿已久，難以斷然革除。如依尹壯圖的建議，將陋規項目「明示科條」，「定為成式」，則流弊無窮⁶⁶。

當此之際，不少士人紛紛上書陳述己見，指摘國家弊病，其中乾隆末年以降，因和坤崩壞的吏治，尤為士人抨擊核心。如國子監祭酒法式善擬訂8項條陳上奏，即強調應整頓吏治，行維新之政。山東道監察御史何道生(1766-1806)則奏請清仁宗當整飭吏治，禁革奢靡，訪察民隱。面對臣下諫言，清仁宗始終難以虛心接受，如法式善上奏內容遭清仁宗一一駁斥，並將其解職，諭交大學士與軍機大臣會同審訊⁶⁷。與法式善、何道生時相唱和的洪亮吉，亦在此時陳奏〈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啓〉，將上疏諫言的風潮推向高峰。

在進呈奏疏前，洪亮吉與友朋間的詩詞唱和，即已透露些許端倪。例如在參加法式善邀請的極樂寺遊憩時，賦詩述及與同人縱論時事，擔憂川楚教

⁶⁶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7/2032-2033；尹壯圖，《尹楚珍先生年譜》，收入：《叢書集成續編》，31(上海：上海書店，1994)，737。尹壯圖奏疏內容，轉引自：周健，〈陋規與清嘉道之際的地方財政——以嘉慶二十五年清查陋規事件為線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5(臺北，2012.03): 147。

⁶⁷ 趙雅麗，《晚清京師南城政治文化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110；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56/721-723。

亂已令前線將士兵疲馬困，官吏因循苟且，暴斂橫徵，尤為倒懸之急。自謙無權勸諫，惟賴同志直言救國。其後，洪亮吉作詩20首，嚴詞抨擊官場奢靡、賄賂，胥吏為害，綱紀廢弛等陋習，並慨歎無才可用。洪亮吉自言將以桔槔、反舌鳥為惕，不願俯仰由人，默然無聲⁶⁸。故爾在〈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啓〉中，直言當前風俗日趨卑下，賞罰未明，言路似通未通，吏治欲肅未肅，且將矛頭指向清仁宗，謂其臨朝聽政不復勤勉，君側出現熒惑聖聽的小人，要求清仁宗當法清世宗之嚴明，以整肅吏治，安民樂生，且效清聖祖之寬仁，以轉移風俗⁶⁹。洪亮吉上書成親王後，知即將獲罪，故「棄官待罪」，與知交好友作別於宣南坊蓮花寺，同人知悉後，無不驚懼恐慌，以為將遭不測。儘管清仁宗要求臣下勇於進諫，然洪亮吉的尖銳言詞，仍觸怒清仁宗。清仁宗罪其不以成例上奏，並「以無稽之言，向各處投札，是誠何心？」疏入之日，將洪亮吉革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擬依大不敬罪，判處斬立決。翌日，清仁宗念其為讀書人，傳旨加恩從寬免死，改發往伊犁，交將軍保寧(1734-1808)嚴行管束，隔日即行，不得延誤⁷⁰。

事件爆發後，一時間洪亮吉聲名大噪，包括知交好友與庶民百姓均表達崇敬之意。關押之時，不少官員特地前來慰問，包括：張惠言(1761-1802)、陶登瀛、王引之、吳鼐(1755-1821)、戴敦元(1767-1834)、法式善、管同(1780-1831)與阮元等人。好友張問陶則賦詩慰問，勉其毋須在意一時毀譽⁷¹。然因事出突然，且諭令立時出發，故一切皆由姻家崔景儼及其友人王蘇、莊曾儀(1769-1807)等協助操持。與洪亮吉互不相識的戶部主事成格(1769-1838)，以房屋抵押，換得300兩相贈，其餘故交素識亦慷慨解囊，助其成行。待洪亮吉行至彰儀門時，滿漢官員、百姓，「慰問者不絕於道」，其中不乏素昧平生之人。崔景儼、莊

⁶⁸ 洪亮吉，〈四月二日法祭酒式善邀同人至極樂寺小憩分韻得月字〉、〈偶成二十首〉、〈自勵〉，《洪亮吉集》，2/939-943; 945。

⁶⁹ 洪亮吉，〈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啓〉，《洪亮吉集》，1/223-230。

⁷⁰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50/640-642。

⁷¹ 張問陶，〈懷稚存〉，《船山詩草全注》，3/1202。

曾儀、張惠言與陶登瀛等人更送行至蘆溝橋，並與洪亮吉秉燭夜談，洪亮吉乃賦詩感念張惠言及諸多友人送行之情⁷²。洪亮吉離開京師往西安行，經蘭州、肅州、過嘉裕關抵伊犁，沿途賦詩記述見聞，38位友朋門人與之唱和，輯為《萬里荷戈集》⁷³。各地居民「圍觀而拜於馬前。將宿，或薦酒饌，已寢，則置牖上，以首叩戶闖而去」，地方州縣官無不熱情接待，如李景梅、蔣榮昌、陳曰壽、朱勳(?-1829)、莊斡(1735-1818)、費濬、錢坫(1741-1806)、楊芳燦(1753-1815)、楊揆(1760-1804)、姜開陽、唐以增與周能珂等人，均饋以衣食，談論時局。其中錢坫、楊芳燦與楊揆等人，與洪亮吉皆曾共事於畢沅(1730-1797)幕府，誼屬故交⁷⁴。

洪亮吉抵達伊犁後，自云擬效法陸贄(754-805)謫貶四川時，深居簡出，鑽研醫理，除拜謁將軍外，大多閉戶不出，讀書度日⁷⁵。後因京師亢旱，清仁宗親自登壇祈禱，下詔清理庶獄，加恩釋回謫戍之人，澄清洪亮吉獲罪非因拒諫，而係違例呈奏，但深感其愛君之心，故將洪亮吉的奏疏置於左右，以為警省，萬望諸臣仍師其行，直言不諱，以副求治之心，並傳諭將洪亮吉釋回原籍。趙懷玉(1747-1823)為洪亮吉撰述墓志銘時特別指出：洪亮吉謫戍伊犁僅百日，係開闢新疆以來，遣戍新疆之漢員，賜還最速者⁷⁶。楊芳燦在收到洪亮吉之信札，得知將獲賜還時，亦賦詩誌喜，詩中追憶兩人在蘭山話別，互道珍重的情景，並讚賞其慷慨諫言的勇氣⁷⁷。曾燠(1760-1831)則將洪亮吉與蘇軾(1037-1101)、賈誼(220BC-168BC)相比擬，然皇恩浩蕩，不僅未加殺害，亦未禁

⁷² 洪亮吉，〈蘆溝橋口占贈張吉士惠言并寄同館諸君子〉，《洪亮吉集》，3/ 1199- 1200。

⁷³ 洪亮吉，〈萬里荷戈集〉，《洪亮吉集》，3/ 1199- 1227。

⁷⁴ 倪惠穎，〈論乾隆朝不同文章流派的衝突與互動——以畢沅幕府為中心〉，《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9.3(南昌，2008.05): 114- 118。

⁷⁵ 洪亮吉，〈伊犁紀事詩四十二首〉，《洪亮吉集》，3/ 1211- 1215。

⁷⁶ 趙懷玉，〈皇清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洪君墓志銘〉，《洪亮吉集》，5/ 2362- 2363。

⁷⁷ 楊芳燦，〈喜得洪雅存入關之信書此代簡〉，收入：楊芳燦，《芙蓉山館全集》，收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7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87。

其文章⁷⁸。

洪亮吉獲悉加恩遣戍伊犁時，有詩云「從此餘年號更生」，得知特旨釋回原籍時，尤感激涕零，不意竟有生還之日⁷⁹。此後洪亮吉不時在詩文中表達對清仁宗的感念之情，謳歌清仁宗乃前所未有的聖德之君，僅使其遣戍萬里，卻未加誅戮，本罪當萬死之人，竟獲此高天厚地深恩⁸⁰。返鄉幽居的洪亮吉，專注於詩文著述與纂修地方志。詩集內容多屬與友朋間的宴遊酬酢，與獲罪遣戍前勇於針砭時政的態度大相逕庭。前此除著名的〈征邪教疏〉與〈乞假將歸留別親王極言時政啓〉外，洪亮吉不時在詩詞中指摘社會積弊，如眼見川楚教匪難平，借送友人歸里之際，賦詩諷曰：「二千石吏倘奉法，五斗米賊何難平」⁸¹。且不時慨歎承平日久，風俗奢靡，苞苴興盛⁸²。釋回後的洪亮吉，僅偶述小民生活困頓情景，與連年天災造成生靈塗炭，少有尖銳抨擊⁸³。

然嘉道年間以降，吏治問題積重難返，士人爭相抨擊。惟鑑於洪亮吉的遭遇，即使清仁宗屢頒詔書，廣求諫言，士人率皆謹慎回應，鮮少出現如洪亮吉的嚴厲諫言。1813年，天理教亂後，清仁宗再次頒旨求言，姚文田(1758-1827)上奏指斥胥吏欺瞞官員，苛斂百姓情事，致使民力殫竭。奏摺之言詞明顯和緩許多，且不忘頌揚1799年以降，清仁宗「澄敘官方，勸懲並至」的用心⁸⁴。除應詔陳言外，士人刻意藉由表揚位卑權小的官吏，反諷官場上之違法亂

⁷⁸ 曾燠，〈讀洪禔存萬里荷戈百日賜環二集題其後〉、〈禔存蒙特赦歸寄示塞外詩冊奉答一首〉，收入：曾燠，《賞雨茅屋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8; 49。

⁷⁹ 洪亮吉，〈八月二十七日請室中始聞遣戍伊犁之命出獄紀恩二首〉、〈庚申又四月廿七日特奉恩命釋回感事紀恩四首〉、〈將發伊犁留別諸同人〉，《洪亮吉集》，3/ 1199; 1228-1229。

⁸⁰ 洪亮吉，〈兜觥還趙歌為趙大令貴覽賦〉，《洪亮吉集》，3/ 1250- 1251。

⁸¹ 洪亮吉，〈送吳文學文桂旋里〉，《洪亮吉集》，2/ 869。

⁸² 洪亮吉，〈偶成二十首〉，《洪亮吉集》，2/ 940- 943。

⁸³ 如：洪亮吉，〈賣兒行〉、〈土豪行〉、〈憫災〉、〈冬日寓興〉，《洪亮吉集》，4/ 1495- 1496; 1756; 1758。

⁸⁴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9/ 2663- 2665。

紀。除此前洪亮吉爲川楚教亂中殉職的巡檢王翼孫撰寫行狀，標舉位卑權小的巡檢王翼孫，尙能撫民禦敵，封疆大吏卻聞賊而逃，推諉塞責⁸⁵。嚴如煜(1795-1826)賦詩追悼白河令黃袞英勇剿殺白蓮教徒，堪爲文官表率⁸⁶。梅曾亮爲西藏糧員蔣作梅(?-1810)立傳時，特意標舉其不爲同僚接受之清廉，故爲長官、下屬所忌。梅曾亮尤藉記述日本國民身在海外，依舊畏服長官威信，謹守律令之事，強調因「階級少則事權一，胥吏去則上下通」。略有暗諷清朝官場階級繁複，胥吏從中作梗之意⁸⁷。魯一同針對胥吏問題撰文討論，提出：管束胥吏之法，唯有嚴刑使之威服，裁減胥吏人數，二項而已。魯一同認爲，天下之患在於「治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故應減少知府以上官員，增加州縣以下實際治理事務之官，則胥吏將無法攘奪官員之權，即可去除胥吏之患。魯一同更針對地方權責重新規劃，提高知府之權以統理州縣，將道和按察使之職併入布政使，使其得詳察事務，直接奏報皇帝。至於鹽務、漕運與軍政等大事，另置總督專職負責，涉及地方相關事務則不得干擾布政使。布政使亦不得干涉地方州縣事務。不但胥吏之弊可去，地方事務皆由官員親自管理，下情上達，皇帝能即時掌握地方輿情，文景、貞觀之治不難再現⁸⁸。

胥吏問題確實是清朝一大隱憂，陸隴其(1630-1692)將例、吏與利，視爲清朝大弊。郭嵩燾則謂「歷朝風氣，皆名利遞嬗」，如唐、宋、元、明之風氣，即利與名相更迭，故清朝風氣好利。郭嵩燾直言歷朝皇權均有所分寄，如西漢君王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爲太監、名士，唐朝爲后妃、藩鎮，北宋是奸臣，南宋是外國，元朝是奸臣與番僧，明朝是宰相與太監，而清朝則是

⁸⁵ 洪亮吉，〈敕授登仕郎晉贈武德騎尉卹授雲騎尉世職湖北呂堰驛巡檢王君神道表〉，《洪亮吉集》，1/198-200。

⁸⁶ 嚴如煜，〈輓白河令黃補堂袞殉節三首〉，收入：嚴如煜(輯)，《三省邊防備覽·藝文續下》(出版地不明：來鹿堂，道光庚寅仲夏月重鐫，藏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卷18/46b-47a。

⁸⁷ 梅曾亮，〈蔣念亭家傳〉、〈記日本國事〉，《柏枧山房詩文集》，208-209; 220-221。

⁸⁸ 魯一同，〈胥吏論一〉、〈胥吏論二〉、〈胥吏論三〉、〈胥吏論四〉、〈胥吏論五〉，《魯通甫集》，9-17。

與胥吏共天下⁸⁹，生動道出清朝胥吏的權勢及其影響力。金安清更毫不諱言嘉慶朝以降，各處衙門拘泥律例，致使胥吏得以操控弄權⁹⁰。

時序進入道光朝，吏治問題更形嚴峻，士人嚴詞抨擊者不絕如縷。1821年，清宣宗諭令疆吏親勘搜除蝗害，王引之上奏：需以利誘民捕蝗，而非委任胥役督辦。因胥役必強行攤派，藉端勒索，蹂躪田地，本擬為民除害，轉為貽害於民⁹¹。裕謙在1831、1835、1838(道光18)與1839年，擔任武昌府知府，江蘇按察使，布政使期間，疊頒告諭，要求幕友，佐雜，佐貳與書吏等，均需嚴守分際，不得擅受請託，積壓公文，薦舉人事等⁹²。裕謙三令五申的告諭內容，充分突顯幕友胥吏蠹害綱紀的嚴重程度。1834年，黃爵滋上奏陳請力行官員課令之法，以造就人才，杜絕「奸胥猾吏」，改善「闕冗廢事」，挽救社會因承平日久，因循廢弛之弊⁹³。1838年，莫友芝賦詩指斥遵義地區的胥吏橫行，甚至喻為噬人之豺，官長莫之能制⁹⁴。1839年，張集馨(1800-1878)委署雁平道(案：今山西省代縣)事時，發現歷任道臺從不問案，案牘積累甚多，前任道臺章沅(1785-?)甚至一任幕友、胥吏主持。連京控案件亦令胥吏勸和兩造，從未親自提審。且章沅「口鈍言澀」，無法折獄斷事，皆由幕胥偽作點單、供詞，以求結案⁹⁵。京控本身即代表皇帝默認地方司法已出現問題，故允許人民以京控方式，跨越正常司法審理管道陳述冤屈。京控制度的定型與公式化約在嘉道年間，略可佐證司法制度在此時已出現弊病⁹⁶。而章沅對京

⁸⁹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11(北京：中華書局，1984)，5250。

⁹⁰ 歐陽兆熊、金安清(撰)、謝興堯(點校)，《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86。

⁹¹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9/2673。

⁹² 裕謙，〈飭書吏毋許稽壓稿案諭〉，《勉益齋偶存稿》，《清代詩文集彙編》，579/121-122；裕謙，〈飭禁佐貳佐雜等官擅受民詞檄〉、〈飭禁勒薦幕友等項檄〉、〈再飭不薦幕友等項檄〉、〈再飭書吏不得積壓稿件諭〉、〈再飭佐雜不准擅受檄〉，《勉益齋續存稿》，《清代詩文集彙編》，579/447-448；455-456；534-535；637。

⁹³ 黃爵滋，〈綜核名實疏〉，收入：黃大受(主編)，《黃爵滋奏疏(附許乃濟奏疏)》(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63)，32-39。

⁹⁴ 莫友芝，〈有豺并序〉，《莫友芝詩文集》，上/455-456。

⁹⁵ 張集馨(撰)、杜春和、張秀清(點校)，《道咸宦海見聞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45。

⁹⁶ 相關研究討論，參閱：李典蓉，《清朝京控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控案件的處理方式，顯現地方官員虛應故事的態度，呈顯吏治與司法制度的敗壞程度。1839年，朱琦受友人託付作官誠詩，詩中特別強調：親民，教養，理獄訟，懲奸宄，稅賦與備荒等事。其中吏治尤為首要之務，須嚴防奸胥、蠹役，玩法害民⁹⁷。1841-1842年間，劉蓉(1816-1873)在致某官書札中，闡述其對天下大勢的看法。書札中將天下之事分為不足憂者與大可憂者。凡有形、可測之事，皆不足憂慮，如英夷犯境，真正大可憂者係「有禍亂之實，而莫著其形；有潰裂之憂，而莫測其所從起」。故劉蓉列舉吏治，風俗，財政與盜賊等問題，視為「未形之患」，恐其有滋蔓難圖之勢。今天下之吏率皆暴斂橫徵，濫刑殘罰，未見安民恤眾者。官吏未能以身作則，廣興教化，風俗如何淳美？官吏奢靡無度，逐末嗜利，財政如何不匱？官吏為淵驅魚，縱賊為利，諱盜為功，盜賊如何救平？故不論風俗、財政或盜賊，追根究柢均與吏治密切相關，若乏能員廉吏執行政策，何能弭患無形⁹⁸。

部分士人甚或直指道光朝為重要分水嶺，如金安清(1816-1878)指陳清初諸帝皆愛民，故斂民最薄，乾隆年間各省鮮少遭遇大水旱，故百姓充實，鮮少積欠丁糧。朝廷亦慎選疆吏，以民事為重。降至嘉道年間，風氣日漸轉變，國家與百姓盡皆貧困，「奸偽日滋，禍亂相繼，士習益漓，民心益競」。其中關鍵在於清初因有老吏、老幕與老胥，故吏治蒸蒸日上；道光年間以後，此三老一變為老貪、老滑與老奸，國家之紀綱法度遂不再。金安清更諷刺自乾隆中葉以降至道光年間，督撫與州縣官員，皆有優厚陋規，且循例收取者始為「操守廉潔」。其中兩江總督居冠，一年可獲30萬；廣東、廣西巡撫皆逾10萬，浙江巡撫6萬、江蘇巡撫4萬；江、浙布政使亦有5-6萬，陝西糧道、福建、臺灣道臺皆可達30萬；四川夔州府有20萬，廣東廣州、潮州與廣西潯州、

71-143。

⁹⁷ 朱琦，〈官誠十六首有序〉，收入：朱琦，《怡志堂詩初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51-153。

⁹⁸ 劉蓉，〈致某官書〉，收入：劉蓉，《養晦堂文·詩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153-184。

梧州等府皆在10萬左右。陋規數額之驚人，在在突顯吏治敗壞的嚴重程度⁹⁹。1873(同治12)年，郭嵩燾在日記中明言：清朝朝局至道光朝爲之大變，清宣宗雖係「恭儉仁慈之聖人」，卻仍招致變亂紛乘，究其原因有三。其一，列聖致治需治官以嚴，治民以寬，然清宣宗治官寬厚，遂使「吏治日偷、紀綱大壞，相與因循粉飾」。其二，清世宗鼓勵群臣直言過錯，知過能改，善莫大焉。道光朝卻但求不知有過，文過飾非，致使吏治廢弛。其三，清初以降，諸帝皆乾綱獨攬，六部群臣僅聽命奔走而已。然自道光朝起，清宣宗拱手垂裳，大權操於六部臣工之手，卻未慎選官員，由「一二闖茸無能之俗吏」掌管國家大政，導致「國政日隳，人才日靡，終至敗壞而不可支」¹⁰⁰。綜觀郭嵩燾所云三大原因，無不涉及吏治，且皆肇因於清宣宗未能嚴厲管束群臣。

清宣宗或許已察覺吏治相關問題的嚴重性，即位伊始，召見甫入值軍機處的吏部尚書英和，詢問相關政事，英和奏以：各州縣之養廉銀已不敷辦公，故多收取陋規以爲支出，且日益增加。因此，英和建議諭令各地督撫先行查核陋規項目，視情節定其存廢與收取數額¹⁰¹。清宣宗隨即頒旨：爲求循名責實，要求督撫詳實查核陋規，在官府公務支出範圍內，收取陋規爲合法行爲，但嚴禁增收陋規¹⁰²。論者以爲，此乃清宣宗意欲效法清世宗推行火耗歸公之遺意，改善窘迫的地方財政¹⁰³。諭旨頒布後，遭多位大臣反對，引發朝野士人諸多討論。

清宣宗於召對時，首先詢問直隸總督方受疇的意見，方受疇明確表達清查陋規有諸多窒礙難行之處。翌日，四川總督蔣攸銛在清宣宗詢問清查各省陋規事時，表示：「宜密查以防貪吏之苛索，而陋規之額請免具奏以全良吏

⁹⁹ 歐陽兆熊、金安清(撰)、謝興堯(點校)，《水窗春嘯》，33: 59-62。

¹⁰⁰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2/ 801-802。

¹⁰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一)》，33/ 10/ 209-210。

¹⁰²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25(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413; 421-422。

¹⁰³ 周健，〈陋規與清嘉道之際的地方財政——以嘉慶二十五年清查陋規事件為線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5: 115-158。

之廉隅」。清宣宗維點頭不語。蔣攸銛擬另行具摺陳述時，孫玉庭與湯金釗等人的奏疏，已先後進呈¹⁰⁴。

兩江總督孫玉庭在奏疏中剖析清查陋規事，期期以爲不可，強調如打破禁止收取陋規之成例，使其合法化，將造成各級官員聚斂之心益加肆無忌憚。孫玉庭更藉1799年清仁宗諭令尹壯圖當次第整頓陋規事務，未可明示科條或獨斷施行爲準則，提醒清宣宗改革之道。孫玉庭建議諭令督撫要員嚴厲稽查，「毋許于舊有常數之外，苛取厲民」。而已在任三年之官員，若官民相安無事，即可量才拔擢，此將有俾於恢復吏治¹⁰⁵。吏部左侍郎湯金釗的反對理由與孫玉庭相近，指陳陋規皆出於民，地方官吏未敢公然苛索，一旦明定章程，官吏恐將明目張膽，強行聚斂，遠逾此前陋規之數。兼且陋規名目繁多，難以逐一清查，或將引來不必要之紛擾。故治本之法乃澄清吏治，任用得人。「有治人無治法」，故不可依恃立法，而求吏治清明¹⁰⁶。值得注意的是，孫玉庭與湯金釗兩人在奏疏中，均以「有治人無治法」爲由，強調整頓陋規之事，不可奢望以立法杜絕陋規橫行，當從提升官吏素質，淳化風俗著手。群臣上奏表達反對意見的論述，多爰引清仁宗於1799年駁斥尹壯圖的說法，包括禮部尚書汪廷珍，山西巡撫成格，山西學政陳官俊與江南道監察御史鄭家麟等人，皆上奏表達反對立場。清宣宗於覽奏、召對後，頒旨表示：因大喪期間心緒暫亂，且親政之初對吏治民生未能悉知，誤信英和之詞，幸有群臣直言，不致於釀成變亂。惟英和係出於赤忱忠心，對外省情形未能周知，以致冒昧建言。如交付議處，恐有寒蟬效應，故免其入值軍機處，以示薄懲¹⁰⁷。

但陋規問題並未因而解決，仍爲士人關懷重點。在1820年英和奏請清查陋規事稍平息後，1821年，兩江總督孫玉庭再次針對漕運之幫費、陋規與浮

¹⁰⁴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一)》，33/10/209-210；蔣攸銛，《繩樞齋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123。

¹⁰⁵ 孫玉庭，〈請停止查辦陋規疏〉，收入：孫玉庭，《延釐堂集·奏疏》(1872年孫毓漢校刊本，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卷中/40a-47a。

¹⁰⁶ 湯金釗的奏疏內容，見：湯金釗，《寸心知室存稿續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07/483。

¹⁰⁷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一)》，33/10/209-210。

收等問題，難以悉數革除，擬以「八折收漕，減半給費」，冀期漸除積弊，減少胥吏累民。孫玉庭的立論，與英和籲請清查陋規，在合理範圍內將之合法化的提議若合符節。清宣宗閱覽奏疏後，立即同意孫玉庭所請，頒旨允行。惟上諭頒布後，同樣遭到其他官員強烈反對。

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家相(1762-1838)上奏反對孫玉庭所論，斥責孫玉庭僅為屬吏著想，未替百姓設想，並臚列十大不可，其中多強調民困已極，不宜增加百姓負擔。王家相認為，一旦明定浮收之額，恐將助長不肖官吏朘削民眾，且予官吏口實，聚斂愈甚。故王家相奏請申明收糧、計贓與考覈之法，嚴禁官吏循私舞弊¹⁰⁸。無獨有偶，江蘇學政姚文田在奏疏中，亦表達出與尹壯圖相近的觀察，直指1765年為重大轉捩點。1765年之前並無所謂浮收問題，其後因生齒日繁，物價騰貴，漸生弊端，然不過「斛面浮收」而已。未幾始有「折扣之法」，且日漸增多。民眾終歲勤動，卻難以糊口，不得不與官吏相抗，官吏則以抗糧、包完與掙交醜米為由，百般刁難。倘若官吏得人，百姓豈願與官府對抗，故不論抗糧、包完或掙交醜米，均有其不得已之苦衷。然州縣官員亦有難以啓齒的隱情，諸物昂貴，開銷繁重，僅恃薪俸已難以支應。整修倉廩，聘請幕友書役，遞解人犯與運送稅款等，公務私事皆須龐大開銷，與其貪污舞弊招致重懲，不如浮收以補不足，此乃公開之秘密。故明定收漕不得超過八折，勢必影響州縣收入，且不肖官吏恣意朘削依舊，愈易引發百姓抗爭，弊多於利¹⁰⁹。湯金釗上奏認為孫玉庭八折收漕的提議，不僅無法革除積弊，更將增加小民負擔，引發不必要之紛爭。湯金釗以孫玉庭1820年奏疏中所云：有治人無治法為例，指控孫玉庭的政策，如無良好官吏配合，立法限制將形同虛設。湯金釗更以清宣宗守成思想，「謹守常制，毋得輕議更張」為由，陳請取消孫玉庭八折收漕之議¹¹⁰。浙江巡撫帥承瀛(1766-1841)亦上

¹⁰⁸ 王家相，〈敬陳八折收漕不可者十事疏〉，《道咸同光四朝奏議》，1/15-22。

¹⁰⁹ 姚文田，〈敬陳東南漕務情形疏〉，《道咸同光四朝奏議》，1/11-14。

¹¹⁰ 湯金釗，〈漕務非定以八折所能有濟疏〉，《寸心知室存稿續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07/484-485。

疏表達反對，奏摺中強調州縣浮收將轉嫁於小民身上。且因弊立法，弊亦將因法而生。唯有嚴禁官役需索陋規，方可杜絕浮收之弊，體現愛民恤丁之美意¹¹¹。幾經討論後，清宣宗再度頒旨承認「八折收漕」不可遽行，取消孫玉庭所建議之方案。

道光初年為陋規合法化所引發的兩次論爭，在政壇上掀起不小波瀾。陳康祺(1840-1890)敘述：好事者視英和與孫玉庭兩人水火不容，1820年，孫玉庭刻意反對英和，使其獲罪罷出軍機處。1825年，英和掌管戶部，藉故駁斥孫玉庭所請公帑，使孫玉庭遭罷革回籍。兩人不和傳言，一時甚囂塵上。然陳康祺卻以為兩人互相傾軋之說，皆係無稽之談。兩人均秉持大公，就事論事，未有私心¹¹²。在這場風波中，士人網絡究竟有無相互串連？從相關士人詩文集中，似未能發現蛛絲馬跡。反而在蔣攸銛的詩文中，見到不少與英和唱和的詩作，如1814、1819年左右，蔣攸銛均賦詩祝賀英和長子奎耀與次子奎照(?-1843)雙雙入選翰林院和擢升之事。直至1828年，蔣攸銛仍題詩紀念兩人於會勘河工相遇的喜悅之情¹¹³，略可說明英和與蔣攸銛兩人之交誼。

熟諳地方事務的劉衡(1776-1847)¹¹⁴表示：陋規分可收與必不可收，凡出之民或牽涉訴訟者，皆為必不可收者，此類陋規均應革除罄盡，始可保富安民。然其他無礙陋規遽行裁革，恐將影響正常用度。且裁革陋規茲事體大，未可驟然實行，尤需慎防不肖人士藉此詐騙百姓，故廢除陋規應秘而不宣，始有成效¹¹⁵。但究竟該如何處理陋規問題？是否應予以合法化？在嘉道咸年間成

¹¹¹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38/381/11622。

¹¹² 陳康祺(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郎潛紀聞四筆》(北京：中華書局，1990)，128-129。

¹¹³ 蔣攸銛，〈英煦齋冢宰以長君新入詞垣次君方授館職賦詩紀盛且以志勗次韻奉賀〉、〈賀煦齋冢宰哲嗣昆仲同擢學士少詹即次其韻〉，收入：蔣攸銛，《繩樞齋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48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43; 646。

¹¹⁴ 有關劉衡的生平簡述，參閱：吳嘉賓，〈循吏劉廉舫觀察傳〉，《求自得之室文鈔》，卷10/12b-14b；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19/6256-6258。

¹¹⁵ 劉衡，《蜀僚問答》，收入：陳生璽(輯)，《政書集成》，10(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838-841。

爲士人公開討論的重大議題。清仁宗面對尹壯圖奏請清查陋規，立即斥回，殆深知茲事體大，驟然革除恐將引發紛擾。清宣宗御極之初，或係聽信英和之言，或因有心圖治，下旨商議清查陋規事。雖數日內寢其事，最終亦不了了之，惟已在士人間掀起一股風潮。時序進入咸豐朝後，儘管清文宗在諭覆諸大臣奏陳時，強烈要求「所有陋規浮費，全應禁革」，「飭查向來一切浮費陋規，徹底清釐，實力裁革」，「一切陋規，著永行禁革，如有陽奉陰違，仍蹈積習，或另改名目，暗復舊規者，著該部從嚴定擬處分具奏，以儆官邪」¹¹⁶。

但陋規問題除涉及官箴吏治外，更與整體國家經濟，地方政府開銷息息相關，故士人此時較少糾結於陋規廢除與否，轉而關切更爲實際的經濟層面，包括：如何增加稅收支應政府開銷，如何調整銀錢比價問題等，冀期改善政府財政困境，解決燃眉之急。

三、鹽漕河銀錢與經濟發展

1836年，姚瑩在贈汪喜荀序中，縷述近年來清廷因平定張格爾之亂、西南地區盜匪，以及廣達7省的災荒救濟，已使國庫左右支絀¹¹⁷。1851年，禮部右侍郎曾國藩和陝西道監察御史王茂蔭先後上疏直諫，針對國家當前弊病多所指摘。曾國藩在〈議汰兵疏〉與〈備陳民間疾苦疏〉中，直指經濟議題乃國家大患，強調：因夷務、災荒之故，國庫已然空竭，且銀價太高，造成民眾繳納錢糧之沉重負擔。針對銀貴錢賤問題，曾國藩奏陳〈平銀價疏〉，綜合此前吳文鎔(1792-1854)、劉良駒(1801-?)與朱嶠上疏內容，歸納出6點解決之法，希望藉此平抑日漸上揚的銀價¹¹⁸。而王茂蔭同樣認爲：治平之道在用人

¹¹⁶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一)》，40/ 7/ 138; 40/ 12/ 191；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三)》，42/ 151/ 637- 638。

¹¹⁷ 姚瑩，〈贈汪孟慈序〉，收入：姚瑩，《東溟文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64- 565。

¹¹⁸ 曾國藩，〈議汰兵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收入：李翰章(編纂)、李

與理財二端而已，故依序奏陳〈條議鈔法摺〉和〈振興人才以濟實用摺〉，以實行鈔法和科舉改革作為振衰起弊之策¹¹⁹。1854年，祁寯藻亦賦詩述及因連年爭戰，國庫日漸空虛¹²⁰。劉衡在《蜀僚問答》中，明確點出：天下之患在民貧，故圖治之道在「恤民貧」而已。而恤民貧之法則在「保富」，鄉有富民即可助官濟貧¹²¹。王茂蔭論及歙縣利弊事宜時，亦首舉「保富民」，謂「富戶為地方元氣」，可助貧戶謀生、災荒時可勸捐賑濟¹²²。

故不論士人私下議論或公開上奏，皆對國家當前面臨的經濟危機多所關注。在此危機中，以銀貴問題最為關鍵。林滿紅教授從宏觀的世界史角度，揭示清中葉銀貴錢賤現象係肇因於：自18世紀後期起，清朝幾乎完全依賴拉丁美洲的白銀，而19世紀初開始，中國茶葉和絲織品在全球市場銷售不佳，面臨出口衰退，加上拉丁美洲貴重金屬減產等多重影響，致使仰賴國外進口白銀作為貨幣的清廷，出現銀價騰貴的情形¹²³。然身處時代洪流的士人，無法取得出口統計資料或掌握拉丁美洲消息，僅能從傳統思想資源出發，努力探求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法。因清朝官方採取銀銅雙本位制，作為主要貨幣的銀與銅影響經濟發展甚巨，士人於是針對銀銅問題展開討論，甚或論及銀銅貨幣存廢與發行紙鈔等。

銀貴問題自乾隆晚年起漸次浮現，如1788年長蘆鹽政穆騰額在奏疏中述及，最初銀1兩需錢800-900文，1786(乾隆51)年需錢1,000文，1787(乾隆52)年漲

鴻章(校勘)、寧波(等校注)，《足本曾文正公全集》，2(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370-372; 376-381。

¹¹⁹ 王茂蔭，〈條議鈔法摺〉、〈振興人才以濟實用摺〉，收入：王茂蔭，《王侍郎奏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50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419-427。

¹²⁰ 祁寯藻，〈甲寅仲冬蒙恩以大學士致仕，恭紀四首〉，《祁寯藻集》，2/290。

¹²¹ 劉衡，《蜀僚問答》，《政書集成》，10/813。

¹²² 王茂蔭，〈歙邑利弊各事宜〉，收入：曹天生(整理)，〈王茂蔭未刊稿三種〉，收入：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文獻》，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33-336。

¹²³ 林滿紅(著)、林滿紅、詹慶華(等合譯)，《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135。

至1,100餘文，致使長蘆行鹽處所年年虧損達70-80餘萬¹²⁴。1796年清仁宗諭覆江蘇巡撫費淳奏請減價平糶時，指稱：「各省銀少錢多，銀貴錢賤，正當設法調劑」¹²⁵。1822年，清宣宗以銀貴錢賤為由，允許各省停鑄銅錢，以減少白銀支出，冀期解決銀貴危機¹²⁶。士人於是紛紛提出各種見解，回應銀貴錢賤現象。

1822年，貴州道監察御史黃中模上奏直言：近來各省銀昂錢賤，係肇因於廣東洋面銀兩偷漏嚴重之故，奏請廣東華洋交易應復行以物易物之法，禁止私用銀兩，以防偷漏¹²⁷。1843年，浙江道監察御史張修育上奏強調「夫銀之為用，止有此數」，勢必難以滿足全國使用，並駁斥停鑄銅錢可平抑銀價之說，奏請恢復舊制，籲請朝廷鼓勵各省廣鑄錢文，且以制錢為主要貨幣，避免使用白銀，即可減少對其依賴。輔以導正奢靡風俗，銀價日昂問題將可獲得改善¹²⁸。以制錢為主或銀錢並用之法，平抑漸趨高漲的銀價，為許多士人的共同論點。1845年，江南道監察御史劉良駒奏請政府應銀錢兼用，毋得偏重。劉良駒於奏疏中駁斥銀貴錢賤係因銀少之故，而是「用銀太重，用錢太輕」，由於官民皆以白銀為主，棄錢不用。故欲緩解當前銀貴錢賤危機，當由官方制訂章程，不論稅收、薪餉或日用，收放盡皆兼用銀錢。輔以鼓勵各省加鑄制錢，如此一來，對鹽務、河工亦有裨益¹²⁹。吳嘉賓則撰〈錢法議〉一文，附議劉良駒的意見。吳嘉賓於文中痛陳當前國家財政已然空竭，且官民皆用銀、藏銀，致使白銀不敷使用，而白銀「民不能生之，君不能制之」，利權遂操於商賈之手。設若財政稅收和民間日用皆以制錢為主，即可解決當前銀貴錢賤的困境，重新掌控利權¹³⁰。王慶雲(1798-1862)闡述銀錢問題時，強

¹²⁴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一七)》，25/ 1311/ 687- 688。

¹²⁵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 4/ 103- 104。

¹²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27/ 495- 496。

¹²⁷ 黃中模，〈請嚴查海洋偷漏銀兩疏〉，《道咸同光四朝奏議》，1/ 46- 47。

¹²⁸ 張修育，〈請變通錢法疏〉，《道咸同光四朝奏議》，2/ 660- 664。

¹²⁹ 劉良駒，〈請飭定銀錢畫一章程疏〉，《皇朝經世文續編》，6703- 6709。

¹³⁰ 吳嘉賓，〈錢法議〉，《求自得之室文鈔》，卷4/ 9a- 17a。

調銀貴錢賤皆因市場趨勢所成，平抑銀價之法當從銀錢兌換著手，籲請官方介入調控銀錢比價，並改鑄大錢，降低白銀使用率，增加制錢價值，官民皆用大錢，即可免於銀價日昂之苦¹³¹。1851年，曾國藩為挽回銀貴錢賤之勢，參酌吳文鎔、劉良駒和朱嶠等人奏疏，擬訂六項銀錢並用章程，包括：部定時價，每年一換；京外兵餉，皆宜放錢；部庫入項，亦可收錢；地丁正項，分縣收錢；外省用項，分別放錢；量減銅運，以昂錢價。細察曾國藩章程所論，不外強調政府應強勢介入銀錢使用範圍，掌控銀錢比價，杜絕不法官吏舞弊營私。且籲請不論稅收或薪餉發放，皆採銀錢兼用，即可減少依賴白銀，降低銀價日昂造成的衝擊¹³²。

除倡議銀錢並用外，更有士人提出賤銀或棄銀之論，作為解決當前銀貴問題的方法。1841年徐鼎獲悉某御史奏請開礦助餉，以退英夷，奏請停止其事。徐鼎認為國之根本乃農桑，恃銀為用，國必貧困。且銀非「耕之能生，織之能成」，礦藏更非無窮。自古以來，凡有折銀之法的朝代，國皆大困，故銀愈多，弊愈繁，國愈困。且開銀礦尚有六大弊端：妨軍務，耗國帑，廣盜賊之藪，擾閭閻之業，肥貪猾之橐與洩山川之靈等。因此，救治當前弊病，當重農桑，貴穀帛，禁淫侈等，方為治本之法¹³³。1849年，因連歲饑饉，國用不足，開礦、折漕或捐輸之議復起，徐鼎聞知後，特撰《務本論》駁之。徐鼎在《務本論》中，採一問一答方式，圍繞於國用之法進行闡述。該書強調：銀非耕之能出，織之能成，故恃銀為用弊病繁多，唯有重農桑，貴穀帛，禁淫侈，始可救治。徐鼎提出：廣開墾，開西北水利，講樹藝，廣教習，設爵賞與節煙酒等六項重農桑之法；酌徵收，定支銷，立市法，易關稅與核奸偽等五項貴穀帛之法；辨尊卑與抑奇巧等二項禁淫侈之法。徐鼎認為依此步

¹³¹ 王慶雲，〈鑄大錢說帖〉、〈紀銀錢價直〉，收入：王慶雲，《石渠餘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420-436。

¹³² 曾國藩，〈平銀價疏〉，《足本曾文正公全集》，2/379-381。

¹³³ 徐鼎，〈擬上開礦封事〉，《未灰齋詩文集》，45-51。

驟一一實行，即可還淳返樸，不患銀價高昂¹³⁴。

徐鼎的賤銀重農論並非特例，尤有士人提出激進手段，呼籲全面廢除使用白銀，以遏止社會奢靡風俗，徹底根除銀貴問題，孫鼎臣即為其中之代表人物。1858年，孫鼎臣於寄呈曾國藩的著述中明確指出：應重本捨末，即重農捨銀。因農桑皆取之於地，人之必需，用之不窮，然銀非地之所出，非人之必需，且久用即窮。銀雖為天下大利，亦為天下大奸所在，故為天下大害。孫鼎臣以史為鑑，加強其廢銀正當性，指出：秦漢以至唐宋之際，皆以粟帛為主，佐以銅錢，未嘗用銀，國家因而富強，故聖人為治乃協助人民從事農桑粟帛之事，使人民得以溫飽，而非競逐銀錢之利。明太祖因禁銀之用，被孫鼎臣譽為英主。及至明嘉靖年間(1522-1566)實行一條鞭法後，稅收改以銀為主，此乃「好貨之君」與「籠利之臣」所為，且棄粟帛用銀係千古之罪，人心日下難以復返。郭嵩燾在文末評語亦深表認同，強調矯正末俗之弊，必自禁銀始¹³⁵。

銀貴錢賤在清中葉成為士人關注焦點之一，除激烈廢銀手段外，部分士人則倡議使用鈔法，冀期緩解銀貴壓力。1814年，侍講學士蔡之定(1745-1830)奏請發行紙幣，遭清仁宗嚴厲申斥，稱其所奏係「泥古迂謬」，且前明殷鑑不遠，鈔法不僅弊病百端，易於作偽，造成訟獄繁興，故不宜遽行鈔法，驟改舊章，且將蔡之定以「妄言亂政」治罪¹³⁶。進入道咸年間，鈔法成為士人重要議題，不少士人對鈔法進行熱烈討論。其中王塗(1786-1843)刊行《錢幣芻言》，更為相關議題掀起一波熱潮。

1828年，王塗撰成《鈔幣芻言》一卷，顧莼(1765-1832)閱後大為讚賞，鼓勵其付梓。王塗進一步就教於萬貢珍(1796-?)、張履(1792-1851)、李孚忠、葉敬及其父親等人，其父認為該書體例未精，毀其原著。王塗重新蒐集資料，踵

¹³⁴ 徐鼎，《務本論》，《未灰齋詩文集》，75-92。

¹³⁵ 孫鼎臣，〈論治六〉、〈論幣一〉、〈論幣二〉、〈通論唐以來銀幣〉，《孫芝房侍講芻論》，卷1/23a-27a；卷2/1a-7a；36a-39a。

¹³⁶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四)》，31/286/910。

事增華，改名為《錢幣芻言》，經其父審閱，獲得首肯後，始於1837年重新刊印。王塗在《錢幣芻言》中，建議政府發行紙幣，取代當前流通的銀幣，庶可解決銀貴錢賤衍生的問題，並由政府重新主導發行貨幣的權力。而白銀僅能作為器具而非貨幣使用，官方則需嚴密管控銅的使用，由官方銅店負責販售銅製品，禁止民間銅店。而發行紙幣所獲取的利益，將回饋鹽務，漕運與河道等事務，庶幾可停止賣官鬻爵，減輕稅收¹³⁷。

《錢幣芻言》刊行後，王塗滿懷信心，呈送諸多官員、學者覽閱，包括：顧藜、林則徐、包世臣、李兆洛(1769-1841)、陳用光(1768-1835)與湯金釗等人。惜多數回應貶多於褒，張履指出：何凌漢(1772-1840)對其主張有所保留，不願起用。林則徐欲採用之，因派往廣東而作罷。顧藜、李兆洛和包世臣雖認為可行，但外省大吏卻以為不可¹³⁸。王塗之論未獲採用，部分士人在獲悉其意見後，撰文與之論辯，如陳鱣(1753-1817)反對王塗發行大面額紙幣的想法¹³⁹；張履雖云包世臣認為王塗的意見可行，但在實行細節上仍略有出入，包括：紙幣運用範圍、銀錢貨幣的存廢和銀銅使用情形等¹⁴⁰。魏源在討論軍備財政用度時，述及當前銀貴錢賤與王塗議行鈔法等話題。而魏源對王塗倡行的「廢銀行鈔」，鈔幣樣式和材質等均不甚苟同，反駁當前銀貴成因係與白銀「透漏外洋」相關，故解決之道應「開礦以浚銀之源，更幣以佐銀之窮」¹⁴¹。而許棷(1787-1862)和許楣(1797-1870)兄弟於1846年自行刊印自著之《鈔幣論》，針對王塗的觀點一一反駁，包括：應開放民間競爭而非由政府主導貨幣發行權；

¹³⁷ 王塗，《鈔幣芻言》、《鈔幣芻言續刻》，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8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599-651。

¹³⁸ 張履，〈王君亮生傳〉，收入：張履，《積石文彙》，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7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67-568。

¹³⁹ 王塗，〈駁陳扶雅孝廉論鈔幣書〉，《鈔幣芻言續刻》，《續修四庫全書》，838/638-639。

¹⁴⁰ 包世臣，〈與張淵甫書〉、〈答王亮生書〉、〈再答王亮生書〉，《安吳四種》，1774-1788。相關研究討論，可參閱：林滿紅(著)、林滿紅、詹慶華(等合譯)，《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172-173。

¹⁴¹ 魏源，〈軍儲篇三〉，收入：魏源，《聖武記》，收入：《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校)，《魏源全集》，3(長沙：岳麓書社，2004)，574-577。

貴重金屬仍較紙幣適合作為貨幣使用；紙幣可能造成的偽造、通膨、經濟損失和政治滋擾等¹⁴²。儘管王塗的鈔幣觀點在士人網絡中引發不少爭議，惟亦有支持者，如梁章鉅(1775-1849)對王塗的論點大加讚賞，譽之為「至詳且確」，「可坐而言，起而行者」；對許楣《鈔幣論》的評價，則鄙為「不過鬪妍騁巧於文字間」而已¹⁴³。但王塗本人並無顯赫功名，且未獲得外省大吏的認同和採行，故僅止於士人間之討論。

1851年，陝西道監察御史王茂蔭上奏〈條議鈔法摺〉，再次籲請發行紙幣，王茂蔭於奏疏中針對紙鈔的防弊，防偽，發行面額，總量，以及相關推行、使用和流通等配套措施，提出十大章程¹⁴⁴。儘管王茂蔭的鈔法政策較王塗溫和且上達天聽，但仍在大學士會同戶部討論後遭駁回，未能付諸實行。1852年，江南道監察御史黎吉雲(1795-1854)、左副都御史文瑞(?-1862)、左都御史花沙納(1806-1859)和江蘇巡撫楊文定(?-1857)等多人，先後奏請酌行鈔法。其中尤以花沙納所論較為完備，略謂酌行鈔法係當前萬全之策，其奏詳述鈔法歷史，並提出12條造鈔之法、14條行鈔之法和6條換鈔之法等。江蘇巡撫楊文定則在陳請改行鈔法之際，表態願意在江蘇省率先試行¹⁴⁵。

面對群臣奏請酌行鈔法，清文宗於是諭令戶部研擬發行銀票的可能性。其後由惠親王綿愉(1814-1864)領銜，奏請發行銀票、錢鈔，以利流通，獲得清文宗肯定，諭令大學士、軍機大臣與戶部會同籌辦¹⁴⁶。自1853年起，清廷開始發行「戶部官票」與「大清寶鈔」兩種紙鈔，冀期舒緩沈重的銀貴問題¹⁴⁷。紙鈔發行前，部分士人對此政策充滿疑慮，如翁心存記述在發行戶部官票消

¹⁴² 有關許榘、許楣兄弟對王塗論點的反駁，請參閱：許楣，《鈔幣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8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653-674。

¹⁴³ 梁章鉅(撰)、陳鐵民(點校)，《浪跡叢談·續談·三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70-71。

¹⁴⁴ 王茂蔭，〈條議鈔法摺〉，《王侍郎奏議》，《續修四庫全書》，500/419-422。

¹⁴⁵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13/3851；花沙納，〈奏為請急停捐納舉人生員成議酌行鈔法以培國本〉，《軍機處檔摺件》，086128號；楊文定，〈奏請行鈔法以裕庫藏平銀價而厚民生〉，《軍機處檔摺件》，087471號。

¹⁴⁶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二)》，41/85/100-102；41/106/614-615。

¹⁴⁷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二)》，41/113/764-765。

息披露後，引發北京官民人心惶惶，甚至出現擠兌風潮，已有多家錢鋪關閉，卻未見相關單位有所因應¹⁴⁸。紙鈔發行近半年後，順天府隨營糧臺和工部尚書翁心存等人，上疏奏云：軍營搭放官票、鈔票等窒礙難行，陳請酌發現銀或大錢¹⁴⁹。通政使崇實尤直言：搭放之鈔票皆無法流通、買物，部分兵丁甚至拒收鈔票¹⁵⁰。清文宗特派僧格林沁察核，務使鈔票流通無礙，且疊頒諭旨，飭令相關官員應認真執行，如不遵循既定章程，將嚴懲不貸¹⁵¹。儘管如此，官票與寶鈔依舊未能發揮預期功效，甚至增加社會大眾的恐慌，對舒緩銀貴錢賤問題無甚裨益。

由於銀錢與民生日用、財政稅收息息相關，故銀貴錢賤產生的影響極為廣泛。劉良駒和吳嘉賓在議論銀貴問題時，均提及銀價對鹽務、河工的影響¹⁵²。然非僅銀價問題，曹振鏞指出：漕運之弊在於州縣、旗丁與胥吏之間相互挾制、勒索，層層剝削，因而加速漕運崩壞¹⁵³。包世臣尤明確表示：河漕鹽實為一事而已，且皆與利相涉，故長久以來，主其事者見利忘義，弊病因此而生¹⁵⁴。前述略可說明，清中葉以降諸多議題盡皆環環相扣，政治、制度與經濟等層面相依相生，士人將之視為整體面向，而非一一割裂。

安徽省阜陽地區的舉人朱鳳鳴(1790-1857)，因久居地方，對相關事務有切身感受。針對鹽務問題，朱鳳鳴強調一切問題係肇因於鹽梟，由於官吏已受鹽梟賄賂，未能盡心查緝，愈加助長鹽梟氣焰。陶澍於淮北試行票鹽法，改革鹽務，朱鳳鳴雖予以肯定，卻對票鹽法未在全國推廣略有微詞，僅在淮北試行，恐將引發更多利益糾紛。朱鳳鳴質疑何以未見實心任事之大臣，剖析

¹⁴⁸ 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3(北京：中華書局，2011)，953。

¹⁴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二)》，41/115/804-806。

¹⁵⁰ 轉引自：張成權，《王茂蔭與咸豐幣制改革》(合肥：黃山書社，2005)，121。

¹⁵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三)》，42/137/421-422; 42/148/598。

¹⁵² 劉良駒，〈請飭定銀錢畫一章程疏〉，《皇朝經世文續編》，6703-6709；吳嘉賓，〈錢法議〉，《求自得之室文鈔》，卷4/12b-13a。

¹⁵³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折》，道光元年六月十九日軍機大臣曹振鏞折。轉引自：倪玉平，《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33。

¹⁵⁴ 包世臣，〈卷首總目敘〉，《安吳四種》，35-40。

利害，上奏皇帝？是否別有所圖？朱鳳鳴在談論鹽法時，在在強調鹽務與吏治兩者之間的關連性¹⁵⁵。長年負責管理鹽務的俞德淵(1778-1835)因有豐富實務經驗，對此尤有深刻體驗。

俞德淵認為，相關鹽法已行之百餘年，弊病繁多，積重難返，需有擁權者進行大刀闊斧之改革。而鹽務改革第一步以去私鹽為先，然去私鹽前，宜檢討鹽政運司與相關吏員的責任。俞德淵深刻瞭解胥吏在地方衙門上下其手，蠹害鹽務的嚴重程度，故鹽務敗壞，胥吏難辭其咎。除胥吏外，與鹽務相關的所有人員皆涉及貪瀆，且再三剝削鹽商，包括各省岸費數十萬，各衙門陋規數千至數萬不等，其餘尚有關隘刁難，書役需索和地匪訛詐等，皆取之於鹽商，官員卻置之不理。鹽商除支付正常稅額外，須負擔官吏貪得無厭的需索，只好將成本轉嫁於價格上。俞德淵反覆闡述鹽價日昂，鹽務敗壞，不能徒怪鹽商。藉由俞德淵的記述，充分說明鹽政與各項環節千絲萬縷的關連，殊非一旨政策即可立即改善。而從俞德淵與師友的相關往來文字中，略可窺知俞德淵、賀長齡與林則徐等人，曾就淮北鹽務議題私下交換意見，互通訊息¹⁵⁶。

至於漕運問題，誠如曹振鏞之言，其弊在於州縣、旗丁與胥吏之間，相互挾制、勒索，層層剝削，加速漕運崩壞¹⁵⁷。為杜絕官吏與兵丁藉由漕運橫徵苛斂，中飽私囊，部分士人倡議以海運取代漕運。自康熙年間起，相關意見屢屢出現，如1682(康熙21)年，戶部尚書伊桑阿(1638-1703)奏覆，因海運須造船、清理淤積，且漕運非獨運糧而已，賴此維生之商賈甚夥，仍應以漕運優先¹⁵⁸。其後曾因故改為海運，但基本上仍以漕運為主。嘉慶年間雖議及海運措施，但未實施。如1803年因河南省黃河河道決口，漕船無法運行，給事中蕭芝奏

¹⁵⁵ 朱鳳鳴，〈鹽法論〉、〈鹽法後論〉，《食字齋文集》，卷1/19a-22b。

¹⁵⁶ 俞德淵，〈復陸心蘭方伯〉、〈呈賀耦耕師〉，收入：俞德淵，《默齋公牘》(道光庚子冬鐫，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卷上/18a-20a; 23a-26b; 31a-34a。

¹⁵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折》，道光元年六月十九日軍機大臣曹振鏞折。轉引自：倪玉平，《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33。

¹⁵⁸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5/106/74。

請南米海運，然兩江總督陳大文、浙江巡撫阮元均反對其事。翌年黃河河口再次阻塞，海運之議再起，因不久後河道暢通，海運一事遂寢。1810和1811年皆因河漕受氣候影響，清仁宗深恐無法運漕，諭令群臣商議海運之法。兩江總督勒保(1740-1819)上奏力陳12項不可行海運之原因，不論河海並行或改行海運，皆需耗費巨資，不如仍以河運為主。清仁宗覽奏後，頒旨：海運之事毋庸再議，如今之計唯有謹守前人成法，盡心整治河道，使之暢通無礙。若遇漕運阻塞，則另行處理，不可輕改舊章¹⁵⁹。

進入道光朝後，1824年因清江浦高家堰大決堤，安徽巡撫陶澍奏請試行海運，清宣宗覽奏後，諭令兩江總督魏元煜(?-1825)，漕運總督顏檢，江蘇巡撫張師誠(1762-1830)與署理浙江巡撫黃鳴傑(?-1841)等人奏覆意見¹⁶⁰。兩江總督魏元煜，江蘇巡撫張師誠等皆奏覆，經派員調查後，海運風險難測，旗丁不識海性、經費龐大，力主河運¹⁶¹。惟在英和、琦善與陶澍等人請命下，清宣宗終於下令實行海運，並由琦善、穆彰阿與陶澍等人負責擬訂海運章程，交由琦善與陶澍會同籌辦，於1826年正式試行漕糧海運。陶澍為此率領多位官員前往吳淞口祭拜海神，祈求平安順利，並賦詩感念同僚友朋的襄贊和努力，包括最先倡議的英和，曹振鏞，玉麟(?-1833)等，參與規劃執行的琦善，穆彰阿，賀長齡，陳中孚(1766-1826)與俞德淵等多人。而賀長齡在唱和詩中，回思爭取漕糧海運的過程，以及多位官員分工合作，使得漕糧海運得以成功試行¹⁶²。

儘管1826年成功試行漕糧海運，但卻未成定例，仍有不少反對聲浪。早

¹⁵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四)》，31/240/238-240。

¹⁶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30/32-33。

¹⁶¹ 轉引自：倪玉平，《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50-51。

¹⁶² 陶澍，〈丙戌二月一日海運初發偕同事諸君赴吳淞口致告海神登礮臺作〉，收入：陶澍，《陶文毅公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0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34-135；賀長齡，〈和陶雲汀中丞海運初發致告海神原韻〉，收入：賀長齡，《耐菴詩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70-471。

在1804年，包世臣即撰著〈海運南漕議〉，力駁洋氛方警，適資盜糧；重洋深阻，漂沒不時；糧艘需別造，舵水須另招，事非旦夕，費更不貲等三大理由，斥之曰「書生迂譚」¹⁶³，卻未能消除反對者的疑慮。路德(1785-1851)在俞德淵〈酌擬海運未盡事宜〉後之評述，極為貼切。路德云：因風濤為患、變生意外和竇糧於盜等，故海運勢有難行。俞德淵「慮事縝密詳審，坐而言，起而可行」，且「曲體人情」，不同於其他士人一味強調「裁汰陋規，力省浮費」，讓海運得以順利實行¹⁶⁴。此處所謂「人情」，或即為依靠漕運中飽私囊的龐大官吏集團。魏源在〈籌漕篇〉、〈道光丙戌海運記〉、〈復魏制府詢海運書〉、〈復蔣中堂論南漕書〉和〈上江蘇巡撫陸公論海漕書〉等文中，反覆敘及：海運利國、利民、利官、利商，因不利於海關稅餉、天津倉胥和屯弁運丁，遂以風濤，盜賊，霉濕，商船僱價，倉胥勒索和漕丁安置等理由，與之詰難。魏源一一駁斥詰難者言，力陳唯有海運方能救治當前漕運之弊¹⁶⁵。甚至有士人發出停漕之論，認為：漕運周遭聚集無數冗官胥吏，搜刮民脂民膏中飽私囊¹⁶⁶，故推行漕糧海運之阻力未曾稍減。降至咸豐朝，漕糧海運更加頻繁，係肇因於許多漕運重鎮已被太平天國占領，為正常供應北京所需，故不得不改以海運輸送¹⁶⁷。

自乾隆晚年伊始，銀貴問題漸次浮現，19世紀以降更形加劇。林滿紅教授從世界史的角度切入，以銀的進口、外流，析論清中葉的歷史發展，強調「銀貴錢賤」危機勝過一切，且為核心關鍵因素，指出：「19世紀前期是純粹用傳統觀念處理貨幣危機的最後一個時代」¹⁶⁸。而銀貴危機亦對鹽漕河等政

¹⁶³ 包世臣，〈海運南漕議〉，《安吳四種》，41-47。

¹⁶⁴ 俞德淵，〈酌擬海運未盡事宜〉，《默齋公牘》，卷下/1a-10a。

¹⁶⁵ 魏源，〈籌漕篇上〉、〈籌漕篇下〉、〈道光丙戌海運記〉、〈復魏制府詢海運書〉、〈復蔣中堂論南漕書〉、〈上江蘇巡撫陸公論海漕書〉，《魏源集》，上/398-410; 414-429。

¹⁶⁶ 黃維夢，〈停漕論〉，收入：李作棟(輯)，《新輯時務匯通》。轉引自：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運(修訂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342-343。

¹⁶⁷ 有關咸豐年間漕糧海運的相關討論，參閱：倪玉平，《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101-177。

¹⁶⁸ 林滿紅(著)、林滿紅、詹慶華(等合譯)，《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319。

務造成影響，加上原先的吏治、法令等問題，讓諸事環環相扣，形成惡性循環，牽一髮而動全身。

四、小結

有別於第二章，站在清仁宗、清宣宗與清文宗三位皇帝的立場，審視清中葉以降發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共同關注的八旗問題，內政弊病，涉外事務和風俗人心與學術文化等四大議題，藉以瞭解三位皇帝的為政態度，並捕捉官方視野的時代脈動。本章改由士人角度出發，梳理士人時代關懷的多重面向，呈現嘉道咸年間士人自改革的複雜樣貌，聚焦於清中葉以降的內政核心，依序論析人口問題、政府吏治與鹽漕河銀錢等議題。

清中葉以降，士人從不同觀點出發，描繪當時社會樣貌。如洪亮吉、龔自珍與尹壯圖等人，從生齒日繁，吏治廢弛，人心奢靡和風俗澆薄等角度切入，指陳自1790年起，清朝已出現衰世景象。而魯一同和郭嵩燾則從頻仍的災荒，觀察出1831年為清朝由盛轉衰的重大轉捩點。不論從哪個角度切入，士人率皆強調：因承平日久，官民喪失因時制宜，革故鼎新的勇氣，舉國上下瀰漫著因循態度，致使諸多弊病積重難返，養癰成患。

本章從官民雙方反覆述及的「生齒日繁」切入，不僅諸帝疊頒詔書述及社會因生齒日繁造成的嚴重影響，胡林翼和汪士鐸直言：「天下之患在人滿」，「世亂之由人多」，深刻道出清中葉以降問題的核心。儘管洪亮吉和包世臣皆提出對人滿之患的觀察，但未受到官方重視。為求生存的百姓，不得不離開原鄉尋求生機。其中大批人口聚居於江西、浙江和福建三省近山地區，形成特殊的棚族群。自乾隆晚年起，棚民已成為政府的燙手山芋。進入嘉慶朝，活動於四川、陝西、河南和湖北交界地區的棚民，更爆發大規模反叛事件。歷時8年，耗費逾1億兩，川楚教亂始告平定，但棚民問題並未因川楚教亂的結束而解決，仍為士人關注焦點，清廷必須正視之嚴峻問題。藏

匿於深山老林的棚民，進行大規模燒山墾荒以種植經濟作物，短視近利的結果造成嚴重破壞水土環境，危害下游百姓，遺害無窮。

聚居山區的棚民和移住平地的客民，相對於當地長期居住的土著而言，皆係新移民。雙方為爭奪生存空間、科舉名額和經濟利益，針鋒相對，嚴重者甚至發生分類械鬥。江西省萬載縣土棚民的學額紛爭，湖南湘潭的湘贛仇殺事件，臺灣嘉義地區的張丙事件，皆具體呈顯人滿為患所引發的複雜問題。而漢人和少數民族的糾紛，亦為土客衝突的形式之一。嘉道以降，漢人和少數民族即不時發生大小衝突，包括：四川涼山地區的漢彝衝突、湖南與兩廣境內的瑤族叛亂，以及雲南地區的漢回糾紛，最後甚至演變為杜文秀起兵別立政權，反抗清廷。細察事件始末，雙方衝突多肇因於土地拓墾和經濟利益的爭奪，進而種下心結，加上官方裁判有失公允客觀，致使少數民族憤恨難平，即便赴京控訴，仍未獲平反。最終演變為大規模軍事叛亂事件。追根究柢，確實與人口問題密切相關。

然生齒日繁、人滿為患衍生出的問題非僅止於此，且突顯出另一個更為嚴峻的官箴吏治問題。與人口問題相似，吏治問題不時出現在詔令和士人議論中。清仁宗親政後，下詔求言，士人紛紛應詔陳言，而將這股上疏諫言風潮推向高峰的是洪亮吉。洪亮吉堪稱清中葉的時代觀察家，側身於乾嘉時代，與邵晉涵(1743-1796)、孫星衍(1753-1818)、盧文弨(1717-1796)等著名考證、經學大家時有往來，並與黃景仁(1749-1783)、張問陶等人同聲慨嘆時移世異的變化。身處乾嘉考證的學術氛圍，洪亮吉除展現考證學家的學識，撰述考據文章外，且能觀察出時代脈動，並以多旋律線的方式，針對諸多層面提出警訊與個人見解，開啓清中葉士人議論時政的先聲。然洪亮吉因〈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啓〉的尖銳文字觸怒清仁宗，獲罪遣戍伊犁，卻讓他聲名大噪。洪亮吉離京時，知交好友為其送行，甚至連素昧平生的官民亦列隊歡送。沿途官員熱情接待，與其縱論時局，地方百姓更奉為英雄人物，紛紛獻上酒食。部分士人藉由洪亮吉遣戍伊犁事件，或隱或顯，表達其對當前政局的態度。類似情況，也在林則徐、姚瑩身上出現，本文第四章將有進一步討論。

儘管洪亮吉因敢言直諫獲罪遭遣，一度引發寒蟬效應，但在士人詩文集
中，仍隨處可見士人對政局，尤其是吏治相關議題的評論，其中胥吏問題乃
士人關注的核心之一。如魯一同從胥吏問題延伸至官制改革，強調若能增加
治事之官，裁汰治官之官，即可減少官員依賴胥吏，胥吏之弊即可去除。而
吏治問題中另一個核心為陋規問題，在清宣宗即位伊始，即已浮出檯面，成
為朝野共同關注的焦點。1820年吏部尚書英和擬將陋規合法化，彌補養廉銀
不足之數，以供官府公務使用。但包括蔣攸銛，孫玉庭，湯金釗和汪廷珍等
多人，皆持反對意見，此議遂寢。翌年，孫玉庭因漕運幫費、陋規與浮收等
問題，難以悉數革除，擬以「八折收漕，減半給費」，冀期漸除積弊、減少
胥吏累民。與英和陋規合法化立意相近，仍遭致湯金釗、王家相和姚文田等
人的反對，同樣無法實行。

然陋規合法化與否的問題，除涉及官箴吏治外，和經濟財政亦密切相
關。造成嘉道咸年間經濟財政面臨極大困境的關鍵之一，即銀貴錢賤現象。
對此問題，士人提出銀錢兼用，廢銀或發行紙鈔等方案，冀期舒緩日漸高昂
的銀價，但效果均極為有限。其中，王塗撰著《錢幣芻言》，研究發行紙鈔
的利弊得失，大力鼓吹發行紙鈔。其說雖獲得不少士人回應，卻貶多於褒，
許楣尤刊印《鈔幣論》與之辯駁。其後王茂蔭，黎吉雲，花沙納和楊文定等
人次第上疏，陳請酌行鈔法，終於在1853年先後發行戶部官票與大清寶鈔。
惟紙鈔發行前後，仍有不少士人力持反對意見，且相關配套措施亦未盡完
善，故爾銀貴問題依舊持續困擾政府。

鹽漕河三大政深受銀貴錢賤和吏治敗壞影響，1827年賀長齡在離開江南
時，賦詩慨嘆江南鹽漕之弊，敗壞已極¹⁶⁹。清中葉以降，部分士人試圖提出
相關應變之策，以振衰起弊，如票鹽法和漕糧海運等革新。透過俞德淵對鹽
務的觀察及其自身經歷，說明鹽務與各項事務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不論

¹⁶⁹ 賀長齡，〈丁亥三月廿三日自江南入覲舟次寶應感懷有引〉，《耐菴詩存》，《續修四庫全書》，1511/471。

鹽務改革或海運議題，均充分顯示：所有問題糾結難分，僅關注單一面向，卻期望獲得顯著成效，無益緣木求魚。正當士人積極尋求銀貴錢賤問題的解決之道時，猶有士人不忘鼓吹人心風俗之淳化。正如魯一同在論析銀貴議題時，將問題核心歸咎於人心風俗，強調一切皆肇因於俗尚奢靡，若能整風厲俗，內外問題將可迎刃而解¹⁷⁰。

本章聚焦於清中葉以降，士人對內政事務的討論。由於內政事務涉及層面繁多，本章僅選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環節，人口、吏治與經濟議題，進行討論。透過本章討論，略可說明清中葉以降內政事務緊密結合的現象，牽一髮而動全身。然清中葉以降，除內政問題外，西方列強的侵擾接踵而來。面對西力衝擊，士人該如何因應？本文第四章將對此展開討論。

¹⁷⁰ 魯一同，〈與左君第四書〉，《魯通甫集》，371-372。

第四章 涉外事物的清議與人物品藻

1838年某日深夜，翰林院庶吉士吳嘉賓、舉人臧紆青與江開(1804-1860)秉燭夜談鴉片與白銀議題，草成一稿，交由鴻臚寺卿黃爵滋上奏清宣宗，即〈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黃爵滋於奏疏中強烈呼籲政府採取嚴禁措施，根絕吸食鴉片問題，「嚴塞漏卮，以培國本」¹。其後，林則徐附議黃爵滋所請，強調「流毒至於已甚，斷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頹波，非嚴戔濟」²。清宣宗受此激勵，諭令各地督撫，嚴格查禁吸食、販賣鴉片者³，並派遣林則徐前往廣州執行嚴禁政策，造成與英國的爭執愈加白熱化，最終爆發鴉片戰爭。

1840年姚瑩與鄧廷楨魚雁往返中，提及：當今天下急務係「鴉片」與「夷務」，冀望朝廷採取雷厲風行的態度，去除沉疴，振聵發聵⁴。1843年年初，姚瑩因臺灣殺俘冒功事件獲罪下獄，出獄後，至交契友為慶賀其平安歸來，競相設宴款待或出遊共飲。席間談論內容多圍繞於國家當前危難，尤對姚瑩

¹ 歐陽兆熊、金安清(撰)、謝興堯(點校)，《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80。奏疏內容見：黃爵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收入：黃大受(輯)，《黃少司寇(爵滋)奏疏》(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63-66。

² 林則徐，〈籌議嚴禁鴉片章程摺(附戒煙方)〉，收入：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奏稿》，中(北京：中華書局，1965)，567-575。

³ 參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43(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290。1839年清宣宗再次諭令：「著各直省將軍、督撫、府尹等，嚴密訪查，如有造賣吸食者與鴉片烟一律嚴拏究治，儻再敢更換名目公然售賣，一經訪聞，立即拏辦，不准稍有疎漏」。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44/33。

⁴ 姚瑩，〈復鄧制府言夷務書〉，收入：姚瑩，《東溟文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84-486。

在臺灣擊退英夷之事甚感興趣。在一次馮桂芬(1809-1874)發起的聚會中，馮桂芬邀集陳慶鏞，張穆(1805-1849)，趙振祚(?-1860)，羅惇衍，莊受祺(1810-?)，潘曾瑋等人，聚會共飲，席間眾人熱切詢問姚瑩臺灣抗敵之事，姚瑩詳加解說戰守策略與退敵經過⁵。其後，由湯鵬作東，召集朱琦，陳慶鏞，蘇廷魁，梅曾亮，馬沅，王拯(1815-1876)與何紹基等人，於萬柳堂宴請姚瑩與張際亮。酒過三巡，眾人爭相詢問姚瑩在臺抵禦英夷情事，英夷船艦形貌如何等。姚瑩謂大敗夷船，四戰皆捷，大快人心。朱琦憶與姚瑩獲罪入獄時，士人盡皆憤恨不平，亟盼能為其申辯，幸而最終平安獲釋⁶。梅曾亮、馬沅、湯鵬、王拯、何紹基、陳慶鏞、蘇廷魁、朱琦和張際亮等人，邀宴於蒹葭閣，與姚瑩把酒言歡，暢論時事⁷。

藉由上述事例，略可透露來自東南沿海的夷人步步進逼時，夷務開始成為士人的關注議題。從鴉片戰爭爆發前數年起，士人即常聚會談論涉外事務。戰爭期間與結束後，士人聚會則痛斥朝廷舉措失當，和戰未明，錯失制敵機先。聚會士人隱隱然有其網絡存在，在此網絡中，士人相互聲援，與洪亮吉獲罪遣戍事件若合符節，且議論時事的分貝數漸次提高，試圖影響中央決策方向。

本章擬以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為主軸，擴及前後數年間，士人對鴉片戰爭與相關和戰議題，主戰、主和人物品評，以及天朝秩序等面向，進行討論。並藉時人言論，還原時代氛圍，勾勒士人網絡，深入瞭解清中葉以降，士人對涉外事物的清議與人物品藻。

⁵ 馮桂芬，〈姚石甫觀察小象題辭〉，收入：馮桂芬，《顯志堂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3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1。

⁶ 見：朱琦，〈癸卯九月朔日集萬柳堂宴姚石甫丈席間話臺灣事慨然有作在坐者為陳頌南蘇慶堂兩侍御梅柏言馬湘帆王少鶴三農部何子貞編修主人海秋夫子暨予凡九人〉，收入：朱琦，《怡志堂詩初編》，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1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21。

⁷ 姚瑩，〈梅伯言馬湘帆湯海秋王少鶴四農部何子貞編修陳頌南蘇慶堂朱伯韓三侍御疊次召余同亨甫為觴讌之樂九月二十六日復集蒹葭閣蓋丙申年入都伯言湘帆置酒處也諸君各以詩文見贈余行有日輒成七律數章酬別〉，《後湘續集》，《清代詩文集彙編》，549/ 678。

一、士人眼中的鴉片戰爭

面對夷人犯境的威脅，士人賦詩撰文表達內心的思緒與見聞。而士人的交遊、酬酢尤為凝聚共識，形成輿論的重要途徑。因此，透過士人文字，或可進一步瞭解士人眼中的鴉片戰爭景象，及其對相關議題的態度。下文將分別討論士人對英國的介紹與評述，鴉片戰爭過程的記述，戰敗原因的分析，戰火下百姓的遭遇，以及對忠烈之士的歌頌。

(一) 士人的英國觀

1751(乾隆16)年，清高宗命大學士傅恒(1720-1770)主持編纂《皇清職貢圖》，作為瞭解朝貢諸國風俗民情的大型參考書籍⁸。其中雖已述及英國，但相關記載卻僅得數語，極為簡略，且將英國誤認為荷蘭屬國⁹，對認識英國並無太多正面助益。此時清廷對英國的認識，乃將之置於朝貢體系中，雖符合官方意象，卻與實際情況略有不符，無法真實傳達英國形象。

進入19世紀，雙方關係因鴉片貿易而逐漸升溫，漸趨緊張，略有劍拔弩張之勢，部分士人開始撰文介紹英國國情，民族性格與風俗習慣等。1832年，蕭令裕撰述〈英吉利記〉與〈粵東市舶論〉，介紹英國史地、風俗民情與雙方貿易情況。在〈英吉利記〉中，蕭令裕略述英國歷史沿革及其地理位置之後，話鋒一轉，謂英商久慕華風，久習漢文，讀漢書，進而強調英國船艦性能及其武力，故「英吉利恃其船礮漸橫海上，識者每以為憂」。惟蕭令裕將英國占領殖民地的行為，解讀為「素貪無遠略」，派官治理僅欲收取稅收獲利，未有長遠綱紀制度的規劃。故爾馭夷之道，當以誠信教化。其後，蕭令

⁸ 相關討論可參閱：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5(臺北，2012.03): 1-76。

⁹ 傅恒(編纂)，《皇清職貢圖》(出版地不明：出版者不明，1761，藏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卷1/46a-47a。

裕縷述雙方交往歷史，著重乾嘉年間英國兩度來華朝貢事。文中一再述及英人貪婪無厭個性，坦言胥吏橫徵暴斂，致使英商氣憤難平，試圖轉往他處貿易。蕭令裕仍一秉天朝態度，說明清廷與外夷貿易乃皇恩浩蕩。〈粵東市舶論〉則偏重敘述自康熙年間以降的貿易發展，分析英、美、法諸國間的利益衝突，提出「以夷伐夷」，使之為我所用的策略，並強調以商業利益為誘餌，作為防邊之策¹⁰。1834年，葉鍾進在〈英吉利國夷情紀略〉中，同樣以英國史地為開場，介紹英國國內諸多設施、制度，且詳述雙方貿易發展情況¹¹。

1840年代以後，士人利用各種方式蒐集資料，撰述與英國相關之文字。如魏源透過審訊鴉片戰爭期間俘虜犯人撰成〈英吉利小記〉，文中主要介紹英國風俗民情和政治制度。惟內容簡略，未能深入細論¹²。鴉片戰爭爆發後，士人對英國的觀感漸趨一致，均著重闡明英國人民的卑劣性格，對英國國內情勢多略而不談，或僅偶一涉及。如1841年汪文臺(1796-1844)撰《紅毛番英吉利考略》，介紹英國國情，文中就英國風俗、疆域與器械等，一一解說，以為國人參酌。惟對英國人民的描述不脫「犬夷之性」之舊說，謂其「涎貪時思乘隙以圖，喜則人而怒則獸」，並略提及馬戛爾尼與阿美士德來華事蹟。汪文臺同樣將英國視為荷蘭屬國，與實情不符¹³。陳逢衡(1778-1855)的《英咭喇紀略》，簡述英國地理位置、國情風俗與英人擅長的天文算數技藝等。陳逢衡提及英國曾遣使來貢，但僅云「仁宗皇帝初年，曾遣使朝貢」，未再深入細論。其後，轉而敘述鴉片流入中國與黃爵滋奏請禁烟，林則徐銷烟與初期戰事等。陳逢衡雖頌揚「彼國人最精巧，故所造船炮無不適用，則其雄視宇內久矣」，但文末不忘強調：唯利是趨的英國人，竟不自量力與天朝為難。

¹⁰ 蕭令裕，〈英吉利記〉，收入：王錫祺(編輯)，《補編再補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7(臺北：廣文書局，1964)，無頁碼；蕭令裕，〈粵東市舶論〉，收入：王錫祺(編輯)，《補編再補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6(臺北：廣文書局，1964)，無頁碼。

¹¹ 葉鍾進，〈英吉利國夷情記略〉，《補編再補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7/ 無頁碼。

¹² 魏源，〈英吉利小記〉，《補編再補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7/ 無頁碼。

¹³ 汪文臺，《紅毛番英吉利考略》，收入：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下(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756。

而中國無所不有，雅不願與之斤斤計較¹⁴。

士人詩文中，對英國有甚多相近描述。如許棫(1799-1881)述及英國僻居海西，「地貧性驚嫉」，將洋人來華貿易形容為慕化華風，中國賜以大黃、絲織布帛等，不意「鬼親無人性」，竟以鴉片銷往中國。詩末不忘強調，儘管英國技藝頗有可觀之處，但奇技淫巧豈能戰勝人心正理，故英夷罪不容誅¹⁵。朱葵之(1781-1845)則提及英國人「有巧思，精火器，樓船高大，能逆風行」，同樣記述英人來華朝貢，中國恩賜大黃、茶葉¹⁶。孫義鈞將英人比擬為狼貪之性，輸入鴉片令中國苦嚙鴉毒之害¹⁷。綜觀士人對英國的敘述，雖云英國技藝機械的優越，但仍強調人心的重要性，以及清王朝乃天朝大國，英國無法戰勝。

儘管如此，1840年前後，僅少數士人願意投入譯介外國史地和瞭解世界，士人有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看世界。1841年陳逢衡的《英咭喇紀略》，1853年在日本刊行，受到日本學界重視，然《清史列傳·儒林傳》載及陳逢衡卻隻字未提，仍以其考證作品為主，呈顯陳逢衡考證學家的面貌¹⁸，略可說明清朝士人對譯介外國史地的態度¹⁹。

¹⁴ 陳逢衡(記)、荒木謩(訓點)，《英咭喇紀略》(江戶：書林和泉善兵衛，1853，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

¹⁵ 許棫，〈述夷九十七韻〉，收入：許棫，《東夫山堂詩選》，收入：文清閣(編)，《稀見清人別集百種》，17(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360-365。

¹⁶ 朱葵之，〈夷警四首英咭喇紅毛種一名英圭黎大西洋夷也去中國約八萬里其國與各因黃旗荷蘭相犄角有巧思精火器樓船高大能逆風行屢屢入貢以不習聽拜儀却之通市於粵歲以大黃茶葉賜焉近以內地禁售鴉片失利糾其與國四駛入內洋巨艇凡二十八襲距定海旋犯鎮海其統兵頭目為爵子百參布爾哩義律懿律等六月二十四日遊奕至乍鹽邑聞警焉〉，收入：朱葵之，《妙吉祥室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95。

¹⁷ 孫義鈞，〈前定海行〉，收入：孫義鈞，《好深湛思室詩存》，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5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37。

¹⁸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18(北京：中華書局，1987)，5604；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鎖國時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識：世界地理·西洋史に關する文献解題》(東京：乾元社，1953)，155; 403。

¹⁹ 有關鴉片戰爭前後，譯介外國史地的討論，請參閱：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

(二)鴉片戰爭過程

士人對鴉片戰爭的描述有其共通點，即在詩文中蘊含其對戰爭的感慨。如祁寯藻位居中樞要津，在黃爵滋上奏嚴禁鴉片時，賦詩三首以求整飭士習民風之效。詩中縷述鴉片及其傳入中國的相關史實，其後述及黃爵滋上奏嚴禁鴉片事。祁寯藻將淳化民風與化民成俗視為士人責任，故禁絕鴉片，抑制金、銀、米、鹽等價格高漲等事，皆應由士人承擔，以救治社會風俗²⁰。1839年，林則徐調授兩廣總督，銜命與英夷交涉，祁寯藻聽聞水師出洋禦敵，仍自信滿滿地認為「軍威震粵洋」²¹。1841年祁寯藻賦詩紀恩入值軍機處，詩中不再頌揚清朝軍威，轉而直指銀漏、貪官蠹吏與百姓生活困頓等弊病，並隱隱表明，面對夷務當寬猛相濟，果決執行²²。

除朝中大臣對鴉片戰爭的記述外，士人筆下的鴉片戰爭亦有相近之處。1840年，姚瑩在致鄧廷楨信函中論及，英夷以貿易維生，且狡悍難制，故禁絕貿易，以武力迫其服從勢所難免²³。朱葵之賦詩12首以記粵事，詩題中逕言粵事日壞，肇因於琦善主和，奕山(1790-1878)、隆文(?-1841)與楊芳(1770-1846)諸將怯戰，「一誤再誤，可歎可恨」。詩中傳達出對鴉片戰事接連失利的痛心，以及奸佞誤國，將兵怯懦，群情激憤的無力感。雖然皇上暫示羈縻，但深恐英夷「戎狄豺狼」之性，貪得無厭²⁴。朱葵之為國家焚香祝禱，祈求海靖國安。並縷述英國自乾隆年間來華朝貢事，及其銷售鴉片來華，造成亂象叢生。英夷「火器巧且利，樓船高能堅」，我國承平日久，不習兵武，且諸多能臣，

麥田出版，2002），189-280；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以1815至1900年西方歷史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²⁰ 祁寯藻，〈新樂府三章有序〉，收入：祁寯藻（著）、《祁寯藻集》編委會（編），《祁寯藻集》，2（太原：三晉出版社，2011），207-208。

²¹ 祁寯藻，〈聞道四首〉，《祁寯藻集》，2/219。

²² 祁寯藻，〈辛丑九月奉命入直軍機處，紀恩述志〉，《祁寯藻集》，2/231。

²³ 姚瑩，〈復鄧制府言夷務書〉，《東溟文後集》，《清代詩文集彙編》，549/484-486。

²⁴ 朱葵之，〈粵事十二首粵事之壞始由琦督主和繼則靖逆奕山參贊文隆楊芳怯戰也一誤再誤可嘆可恨因志之〉，《妙吉祥室詩鈔》，《清代詩文集彙編》，537/204-205。

林則徐、關天培(1780-1841)、王錫朋(1786-1841)、葛雲飛(1789-1841)、鄭國鴻(1777-1841)、裕謙、余步雲(1774-1842)與陳化成(1776-1842)，均遭奸人陷害，致使夷人予取予求，只能效法故事暫示羈縻，以恤民苦²⁵。

身處安徽阜陽的地方型士人朱鳳鳴，對鴉片戰爭的敘述，同樣強調漢奸誤國，林則徐應受重用，英夷唯恃船炮，不擅陸戰等，與其他士人的論述若合符節。朱鳳鳴除評論外，且提出諸多諫言，獲清宣宗「溫諭獎慰」，欲傳旨召對，然為人所忌其事遂寢。但朱鳳鳴卻因此名動京師，受到士人群體激賞。朱鳳鳴奏陳平夷策略，力主對英做戰，強調應任用英夷懼怕的林則徐；嚴禁販賣英夷最需要之茶葉、大黃；嚴加緝捕漢奸，不為英夷所用；訓練水勇禦敵；選任將材率軍抗敵等²⁶。

另一首佚名作者的五言詩，更清楚表達對鴉片戰爭的憂憤之情，作者在詩中極言鴉片戰爭係有不肖紳衿勾結英夷，糾集貪官佞臣致有此亂。忠心耿耿的林則徐慘遭漢奸構陷，充軍遣戍，靖逆將軍奕山與揚威將軍奕經(1791-1853)禦敵無方，徒有虛名。作者毫不諱言，「中原無一能，忠良俱不用，盡是賣國臣」，詩中多次指陳皇上聖明，均因臣下蒙蔽，明君待臣以禮反遭臣下欺心，過錯全在滿朝權奸，賢能之臣又無能為力，王鼎(1768-1842)忿恨而死，潘世恩(1769-1854)不加聞問，致使生靈塗炭²⁷。

多年以後，顧雲(1846-1906)路經報恩寺，心有所感賦詩感懷鴉片戰爭事。顧雲從清宣宗登基談起，漸次敘及黃爵滋上奏禁烟，林則徐銜命馳赴廣東禁烟，裕謙、葛雲飛、王錫朋與鄭國鴻等人為國殉節。最終仍無力抵禦英夷，與其訂立條約，此乃光天化日下，鬼蜮橫行於世。顧雲將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捻亂相對照，強調平定亂事憑恃人心與主戰非和的態度。詩末慨嘆若疆

²⁵ 朱葵之，〈自題焚香祝國圖一百韻并序〉，《妙吉祥室詩鈔》，《清代詩文集彙編》，537/214-215。

²⁶ 有關朱鳳鳴的生平事蹟，參閱：王則僑，〈追贈知府銜揀選知縣阜陽朱曉山先生行狀〉，朱鳳鳴，《食字齋文集》（光緒玖年癸未新鐫，藏於日本東洋文庫），5a-18a。朱鳳鳴奏陳之平夷策略，見：朱鳳鳴，〈上平夷策疏〉，《食字齋文集》，卷1/3a-8a。

²⁷ 無名氏，〈五言詩〉，《鴉片戰爭文學集》，上/213。

臣皆如林則徐、鄧廷楨，何懼之有？²⁸

在戰火肆虐下，受害最深者當屬黎民百姓，不僅遭受夷人侵襲，更被軍紀敗壞的官兵二度蹂躪。鴉片戰爭前夕，已有士人以杜甫(712-770)〈石壕吏〉入詩，諷刺廣東地區胥吏對人民的剝削²⁹。徐時棟(1814-1873)賦詩哀悼浙江鄞縣遭夷人攻陷，縣衙人員紛紛走避，獨留縣官一人殉城，百姓僅能四處逃竄³⁰。另一首詩，〈聞警紀實〉，更揭露官兵暴行，京江都統縱容旗兵劫掠民財，姦淫民女。鄉勇將良民視為漢奸，藉端勒索，餓死、投井、墜樓與吊死者，不計其數³¹。孫鼎臣甚至賦詩形容廣州城內，因「官兵殺人食人肉」，家家戶戶緊閉門窗，人人自危。官兵尙未討伐外夷，卻先屠戮百姓，無人阻止³²。1843年鍾琦(1818-1904)形容江浙地區人民流離失所，死亡無數，官憲卻未予撫恤。家園汪洋一片，均成鳥雁巢穴，無法種稻，賣妻鬻子者比比皆是³³。

1842年浙江乍浦遭英夷攻擊，士人賦詩記錄眼前宛如人間煉獄。丁殿華與柯萬源均在詩中提及：百姓慘遭殺戮，白骨遍布，過去繁華的街市已難恢復³⁴。另一位浙江平湖士人黃金臺(1789-1861)，以多首樂府詩描敘乍浦家園殘破，百姓逃難橫遭殺戮的景況，痛陳官軍不敢發砲，不敢拔刀，致使守軍400餘名將士裹屍馬革。乍浦城陷後，街道血跡斑斑，屍橫遍野，居民逃竄無蹤。逃命的父母，狠心將嬰孩丟入城濠中，慘不忍睹。家園在無情戰火中，付之一炬。百姓除受外夷侵擾，尤遭土匪劫掠，破壞程度遠甚夷人。詩中描繪的

²⁸ 顧雲，〈經報恩寺感成四十韻〉，收入：顧雲，《益山詩錄》，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75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763。

²⁹ 無名氏，〈戊戌感事十八詠〉，《鴉片戰爭文學集》，上/201-205。

³⁰ 徐時棟，〈八月湖水平有敘〉，收入：徐時棟，《烟嶼樓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5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7-58。

³¹ 無名氏，〈聞警紀實七絕十四首〉，《鴉片戰爭文學集》，上/211-212。

³² 孫鼎臣，〈官兵行〉，《鴉片戰爭文學集》，上/182。

³³ 鍾琦，〈癸卯孟春英夷撤師分守香港追憶諸大帥辦理海疆軍務再誌其大略〉，收入：鍾琦，《亦囂堂詩鈔》，《鴉片戰爭文學集》，下/875。

³⁴ 柯萬源，〈壬寅仲秋偕浪仙由觀山至苦竹山觀戰場有作〉，收入：沈筠(編錄)，《乍浦集詠》(道光丙午四月，藏於日本東洋文庫)，卷10/5a-5b；丁殿華，〈海上〉，《乍浦集詠》，卷14/18a。

景象，令人讀來觸目驚心³⁵。孫瀛帆賦詩譏諷清軍看似壯盛，一旦英夷砲火來襲，士兵紛紛棄械鼠竄。賊兵聚官兵散，賊兵散官兵聚，朝廷養兵千日，竟使昔日重鎮變為曠土³⁶。

(三) 戰敗咎責的討論

面對鴉片戰爭的挫敗，士人未將罪責歸咎於清宣宗，視其「羈縻議和」乃為民著想的政策。如祁寯藻追憶議和決策過程時，即云清宣宗批准議和，實有不得已之苦衷³⁷。而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或兵不習戰等理由，被士人認為是鴉片戰爭戰敗主因之一。翁心存日記中，接連出現「承平日久」字句，擔憂因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難以抵禦夷敵攻擊，生靈恐遭塗炭³⁸。其後，翁心存撰文紀念殉職的定海縣知縣姚懷祥(1783-1840)時亦云「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故英夷來犯，「闔城驚竄」³⁹。1840年，陸嵩(1791-1860)賦詩歎道：「可憐久承平，民不睹兵革。一朝起倉皇，骨肉痛狼藉」，隱約透露當前諸多弊政當早日革除，方可驅夷復仇⁴⁰。陳鼎雯在詩題下，即自注「惡軍士不用命也」，詩中諷刺清兵孱弱、愛錢、惜命，百戰而無一勝，以「鴉片烟，殺盡天下蒼生天不憐」作結，說明鴉片對中國的影響⁴¹。袁綬(1795-?)同樣指陳夷人犯境之際，「戰守無長策，攻心乏將才」，且諸位官員「愛財兼惜死」，加

³⁵ 黃金臺，〈唐灣戰〉、〈乍城陷〉、〈棄嬰孩〉、〈焚海塘〉、〈土匪亂〉、〈山下鬼〉，《乍浦集詠》，卷10/2b-4b。

³⁶ 陸以湉(撰)、崔凡芝(點校)，《冷廬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4)，102。

³⁷ 祁寯藻，〈書生六首〉，《祁寯藻集》，2/512。

³⁸ 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1(北京：中華書局，2011)，378-380。

³⁹ 翁心存，〈題姚履堂大令遺墨并敘〉，收入：翁心存，《知止齋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76-177。

⁴⁰ 陸嵩，〈禁烟歎〉，收入：陸嵩，《意苕山館詩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7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13。

⁴¹ 陳鼎雯，〈鴉片烟新樂府惡軍士不用命也〉，收入：陳鼎雯，《梨花佩葉山房詩稿》，《鴉片戰爭文學集》，下/966。

之「太平時已久，列閩不知兵」，故難以廓清夷匪，上報天恩⁴²。褚維壇、許棫與謝蘭生等人，均在詩文中強調因承平日久，百姓不習兵革之事，將兵守備懈弛，突遭外夷來襲，猝不及防，致使烽火遍地。加上官員臨事畏懼，猶疑不決，讓黎民百姓深陷水火⁴³。而對和戰策略的搖擺不定，部分士人歸咎於滿洲官員的讒言佞語，致使漢人將士未能出奇制勝，落得捐軀疆場⁴⁴。

漢奸問題亦為士人爭相指摘的戰敗原因之一，並讓士人懷抱非戰之罪的錯覺，認為清廷並非不敵而敗，乃因漢奸從中作梗，致使清廷戰敗⁴⁵。貝青喬(1810-1863)認為漢奸之弊，肇因於此前執行嚴禁政策，使過去與大小各衙幕友、家丁相結納的中國販煙者，無利可圖，乃為夷所用，刺探中國軍情。故建議：欲除漢奸，當先釐清各衙門之幕友、家丁，而辨析幕友、家丁是否為漢奸，則須嚴行查辦天主教⁴⁶。劉長華同樣認為禁烟政策逼使販賣和吸食者生計無著，且對官方嚴刑心生畏懼，故逃入夷船，煽動夷人，假夷之勢，劫掠財貨，並為夷人打探消息，甘為奸細⁴⁷。尤有甚者，凡不符合天朝對外應有的行為模式，即被視為漢奸。1841年爆發三元里事件後，曾往三元里勸導罷戰的廣州知府余保純，視察鄉試時，引發現場童生譁然，怒曰：「我輩讀聖賢書，皆知節義廉恥，不考余漢奸試」，斥責余保純在三元里事件中，行賂求和，禁止鄉勇圍殺夷人，連南海、番禺知縣亦遭羞辱。眼見眾怒難息，

⁴² 袁綬，〈聞道〉，收入：袁綬，《閩南雜詠》，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16。

⁴³ 褚維壇，〈感事〉，收入：褚維壇，《入境結廬詩稿》，收入：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下/880；許棫，〈述夷九十七韻〉，《東夫山堂詩選》，《稀見清人別集百種》，17/360-365；謝蘭生，〈海疆紀事〉，《鴉片戰爭文學集》，上/194。

⁴⁴ 劉長華，《鴉片戰爭史料》，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鴉片戰爭》，3(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54。

⁴⁵ 有關漢奸問題的討論，可參閱：田中正美，〈阿片戦争前における「漢奸」の問題〉，《東京教育大学文学部紀要》，46(東京，1964.03): 1-37；張銓津，〈鴉片戰爭時期的「漢奸」問題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⁴⁶ 貝青喬，《咄咄吟》，《鴉片戰爭》，3/203-204。

⁴⁷ 劉長華，《鴉片戰爭史料》，《鴉片戰爭》，3/154。

余保純乘轎離去，童生則以瓦塊丟擲，擊破轎子⁴⁸。

儘管追捕漢奸乃眾人共識，但李善蘭(1810-1884)描繪所謂義勇之士為緝捕漢奸，竟割取無辜民眾首級冒充之，許多無頭屍體慘遭棄置街頭，令人怒氣難遏⁴⁹。金和(1818-1885)在詩中述及因懷疑夷人同夥在城內縱火，官吏四處搜捕嫌犯，無故被捕者即誣指仇人以求脫罪，致使冤獄頻傳，閭閻之間風聲鶴唳⁵⁰。孫瀛帆描述乍浦地區失守後，居民紛紛避寇轉徙，官兵遇敵怯懦遇民奮勇，且為捕殺漢奸濫殺無辜，狡黠奸民趁勢作亂，良家子弟慘遭屠戮，屍橫遍野，烏鳶啄食。冤死人數之多，連閻羅王亦來不及點名⁵¹。李善蘭、金和與孫瀛帆的描述，或可說明追捕漢奸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四) 頌揚英靈激發忠義之氣

鴉片戰爭爆發後，英軍率先進犯浙江定海，期間因琦善與義律(Sir Charles Elliot, 1801-1875)議訂〈穿鼻草約〉，曾短暫停戰。然雙方政府均不願接受草約內容，再次引爆戰事，英軍立刻攻陷浙江定海、鎮海與乍浦等地。儘管清軍難以阻擋英軍攻勢，不時傳來官兵望風而逃的軍情，但仍有將領身先士卒，英勇抗敵，甚至裹屍馬革。士人接連面對戰敗消息，在憤恨失望之餘，刻意藉由歌頌死難將士，表達忠義之氣，以激起國人對外抗敵之心。士人透過墓誌銘、詩詞、年譜、行狀或序跋等各式文類，傳頌死難將士的英勇事蹟，包括

⁴⁸ 不著撰人，《英夷入粵紀略》，《鴉片戰爭》，3/ 15- 16。有關三元里事件，可參閱：〈三元里平英團史實調查會記錄〉，收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近代史資料》，1(北京：科學出版社，1954)，1- 5；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編)，《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78)。

⁴⁹ 李善蘭賦詩云：「千家萬家門亂關，街頭義勇殺漢奸，漢奸出沒不可蹤，割民首級以報功，東家有兒暮不歸，屍橫門前血滿衣，西家有弟朝纔出，覓之身存頭已失，通衢蕩蕩人畏行，白日城市走山精，旁觀不忍怒氣勃，大呼突出甘肅卒，腥血模糊義勇頭，為爾良民一鬢雪」。李善蘭，〈書乍浦壬寅四月事〉，《乍浦集詠》，卷14/ 3b。

⁵⁰ 金和，〈圍城紀事六詠·驚奸〉，收入：金和，《來雲閣詩》，《鴉片戰爭文學集》，上/ 43。

⁵¹ 陸以湉(撰)、崔凡芝(點校)，《冷廬雜識》，102。

關天培、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裕謙與陳化成等殉難官員，均為關注焦點。

不論位居要津之官員或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型士人，均可見其藉詩文表達對殉難官員的崇敬之心。社會上彷彿掀起一股風潮，士人藉由書寫抗夷死事之人，彰顯其抗敵精神，忠義愛國之心，略有反諷時下一味求和的士人與朝廷怯戰心態之意味。

1841年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在廣東虎門炮臺抵禦英軍攻擊，未獲琦善增援，力戰而死。清宣宗優加撫卹，授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諡忠節，並入祀昭忠祠，准建專祠祭拜⁵²。另一場戰役中，三江口協副將陳連陞(1775-1841)不敵英軍攻勢，戰死沙場，其子陳長鵬聞訊後投水而死。英軍因陳連陞頑強抵抗，死傷甚多，斃割陳連陞遺體洩恨。清宣宗頒旨嘉其父子忠孝兩全，准許入祀昭忠祠，建專祠，以總兵例賜卹，且頒授騎都尉世職，賜其子舉人銜⁵³。士人紛紛頌揚關天培與陳連陞父子的英勇事蹟，魯一同撰〈關忠節公家傳〉，敘述關天培生平與抗敵事蹟。出殯之日，數百人縞衣迎送，觀者無不痛哭失聲⁵⁴。朱琦為關天培賦輓歌，讚譽其料敵機先，英勇殺敵，士兵雖眾卻無鬥志，僅恃關天培一人奮戰，終因缺乏後援，以死殉國⁵⁵。何仁山(1811-1874)為陳連陞父子撰輓詩，謳歌陳氏父子浴血抗敵，奮勇捐軀的事蹟，並指責軍民畏敵如畏虎的膽怯心態，以及軍心士氣低落，難以守城禦敵的困境。詩末則復期許十萬王師，一舉掃蕩夷人，不復為害⁵⁶。

⁵²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1(北京：中華書局，1984)，466。趙爾巽(等撰)，《清史稿》，38(北京：中華書局，1977)，372/11526-11528。

⁵³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38/372/11528。

⁵⁴ 魯一同，〈關忠節公家傳〉，收入：魯一同(著)、郝潤華(編校)，《魯通甫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76-79。

⁵⁵ 朱琦，〈關忠節公輓歌諱天培廣東提督道光辛丑殉節虎門〉，收入：張應昌(輯)，《國朝詩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62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4-125。

⁵⁶ 何仁山，〈陳都督父子輓詩并敘〉，收入：何仁山，《艸艸堂詩艸》，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841年英軍持續猛烈進攻定海，定海總兵葛雲飛、處州鎮總兵鄭國鴻與壽春鎮總兵王錫朋，以4千名兵力抵抗英軍2萬餘人，經過六晝夜血戰，始終未獲兵援。最後在英軍全力進攻下，奮戰而亡。義勇徐保趁著黑夜，擬將葛雲飛遺體攜出安葬，驚見葛雲飛雙手握刀，巍然屹立於崖石上而不倒。徐保拜曰：將返家見其母親，始可負之而行⁵⁷。清宣宗聞訊後，「揮淚下詔」，特撥經費治喪，頒授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諡壯節，分賜兩子文、武舉人。王錫朋戰死於守城之役，其遺體許久始尋獲，朝廷加等優卹，頒授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諡剛節，賜其兩子舉人銜。鄭國鴻在戰場上單騎衝鋒，力戰傷重而亡。以總兵賜卹，頒授騎都尉世職，追諡忠節，賜其兩孫舉人銜。定海一役戰況激烈，死傷最為慘重，故朝廷恩准三人入祀昭忠祠，且在定海建專祠合祀三人，三人原籍亦准許建祠奉祀⁵⁸。士人則對定海戰役的死難將士，多所頌揚。葛雲飛歸葬故里後，宗稷辰(1792-1867)為其撰行狀，邵懿辰(1810-1861)書墓表；王拯寫墓誌銘，其子葛以簡、葛以敦為父刊刻年譜，以存史事⁵⁹。張金鏞(1805-1860)、黃金臺等人在拜讀年譜後，賦詩撰文表達內心崇敬之意⁶⁰。程鴻詔(1820-1874)哀悼葛雲飛慘烈死事，並慨嘆承平已久，軍不習兵⁶¹。此外，悼念王錫朋，或合述葛雲飛、王錫朋與鄭國鴻等三人死難事蹟之專文，所在

272- 273。

⁵⁷ 陸以湑(撰)、崔凡芝(點校)，《冷廬雜識》，225- 226。

⁵⁸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38/ 372/ 11531- 11534。

⁵⁹ 葛以簡、葛以敦(編)，《凌臺府君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143(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87- 207。

⁶⁰ 張金鏞，〈書葛壯節公年譜〉，收入：張金鏞，《躬厚堂詩錄》，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9；黃金臺，〈書葛壯節公年譜後〉，收入：黃金臺，《木雞書屋文四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6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02- 203。

⁶¹ 程鴻詔，〈讀葛壯節墓誌甲辰葛山陰人定海總兵道光辛丑八月守定海在竹山門戰歿贈提督廕騎都尉〉，收入：程鴻詔，《有恆心齋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7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03。

多有。如朱琦縷述定海三鎮失陷過程，哀悼王錫朋死狀尤為慘烈⁶²。王拯追記王錫朋死難事績，以表彰其忠勇愛國之心⁶³。許棫和陸嵩賦詩並陳三人血戰故事，與痛失將才的悲嘆⁶⁴。

1841年，英軍進犯浙江地區，兩江總督裕謙駐守鎮海，令葛雲飛、王錫朋與鄭國鴻戍守定海。接戰後兵敗如山倒，鎮海守兵更望風而潰。裕謙見狀，原擬力戰捐軀，卻投池自殺，雖經副將救起，仍宣告不治。儘管裕謙並非裹屍馬革，仍獲朝廷追贈太子太保，頒授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附祀京師昭忠祠，於鎮海建立專祠奉祀，諡靖節⁶⁵。魯一同撰述裕謙死節事，略述裕謙禦敵經過，並為裕謙辯駁，謂其自殺係「從容就義」⁶⁶。陸嵩驚嘆於裕謙殉難事，稱其忠孝家風值得褒獎⁶⁷。十年後，宣昌緒特詣鎮海憑弔裕謙死難處，並訪查當地遺老，以記述裕謙死事本末。詩中對裕謙投池自殺多所迴護，指稱係因夷敵多如蟻集⁶⁸。

奮勇捐軀的陳化成，尤為士人賦詩頌揚對象。1840年起，英夷進犯粵東，為防範英夷侵擾江浙地區，江南提督陳化成馳赴吳淞口駐防。1842年，英軍連陷鎮江、定海與寧波等地，吳淞為之震撼，隨後在雙方炮戰中，清軍多名部將中彈而亡，陳化成遭落彈擊中，失血過多而死。陳化成死難後，由其副將劉國標攜出遺體，鄉民為其殮葬，清宣宗特詔撫卹，賜銀一千兩治喪，賞

⁶² 朱琦，〈王剛節公家傳書後〉，收入：朱琦，《怡志堂詩初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61。

⁶³ 王拯，〈王剛節公家傳跋尾〉，收入：王拯，《龍壁山房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5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41-542。

⁶⁴ 許棫，〈塵舟山并敘〉，《東夫山堂詩選》，《稀見清人別集百種》，17/346-348；陸嵩，〈定海陷賊鎮將葛雲飛壽春鎮王錫朋處州鎮鄭國鴻俱力戰死王公尸未得歸其死尤慘〉，《意苕山館詩稿》，《清代詩文集彙編》，570/619。

⁶⁵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38/372/11523-11525。

⁶⁶ 魯一同，〈書裕靖節公死節事略〉，《魯通甫集》，79-82。

⁶⁷ 陸嵩，〈驚聞四明失守督帥裕公殉難〉，《意苕山館詩稿》，《清代詩文集彙編》，570/618。

⁶⁸ 宣昌緒，〈鎮海弔裕靖節公〉，收入：宣昌緒，《留讀齋詩集》，收入：文清閣(編)，《稀見清人別集百種》，34(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290-291。

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謚忠愍，特准在殉難處及原籍建立專祠祭拜⁶⁹。陳化成死難消息傳出後，吳淞地區的人民皆大驚曰：「長城壞矣！」且謂夷酋登城後，笑談：此戰險矣，倘有兩位陳化成，豈可破城？吳淞人民作詩成帙以哭公哀，題曰《表忠崇義集》，王樹滋撰〈殉節始末記〉誌之，文中誦贊陳化成捨身取義，雖遭同僚掣肘，仍盡忠報國，死而後已⁷⁰。士人悲痛於陳化成的死難，紛紛賦詩寫詞記述功蹟，繪像存人。如張金鏞撰寫輓辭哀悼⁷¹；金和、王燾與陸嵩等人均在詩中標舉陳化成不願棄城而逃，堅守到底的壯烈行爲⁷²。一些士人在拜訪吳淞後，引發幽情，如侯楨(1816-1861)前往吳淞憑弔陳化成，賦詩讚揚其爲國捐軀的英勇行爲，並褒獎陳化成的坐騎⁷³。姜皋、許械與嚴鈞(1829-1873)等人親臨吳淞後，爲陳化成的抗敵功蹟，壯烈犧牲慨嘆不已。姜皋形容吳淞在陳化成戍守下，堅若長城。嚴鈞指陳英夷懼怕陳化成如同畏虎，若人人皆像陳化成般奮勇，何患英夷來犯，不但吳淞可守，中國亦

⁶⁹ 有關陳化成的生平，見：王蘧常，〈陳化成將軍年譜〉，《上海文博論叢》，3(上海，2005): 70-73；王蘧常，〈陳化成將軍年譜(連載二)〉，《上海文博論叢》，4(上海，2005): 78-81；王蘧常，〈陳化成將軍年譜(連載三)〉，《上海文博論叢》，1(上海，2006): 78-83；王蘧常，〈陳化成將軍年譜(連載四)〉，《上海文博論叢》，3(上海，2006): 64-67；王蘧常，〈陳化成將軍年譜(連載五)〉，《上海文博論叢》，4(上海，2006): 68-71；王蘧常，〈陳化成將軍年譜(連載六)〉，《上海文博論叢》，1(上海，2007): 82-84；王蘧常，〈陳化成將軍年譜(連載七)〉，《上海文博論叢》，3(上海，2007): 67-70；趙爾巽(等撰)，《清史稿》，38/372/11529-11531；李國環，〈陳化成與吳淞戰役考實〉，《史林》，4(上海，1996): 35-41。有關士人的記述，可參閱：陳康祺(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郎潛紀聞四筆》(北京：中華書局，1990)，41-44；袁翼，〈江南提督陳忠愍公殉節記略〉，收入：袁翼，《邃懷堂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6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62-165。

⁷⁰ 陸以湉(撰)、崔凡芝(點校)，《冷廬雜識》，351-352。

⁷¹ 張金鏞，〈江南提督陳公化成輓辭〉，《躬厚堂詩錄》，《清代詩文集彙編》，618/10。

⁷² 金和，〈陳忠愍公死事詩〉，收入：金和，《來雲閣詩》，《鴉片戰爭文學集》，上/41；王燾，〈弔陳元戎化成〉，收入：王燾，《對山樓詩稿》，《鴉片戰爭文學集》，上/92；陸嵩，〈悲吳淞為陳將軍化成作〉，《意苕山館詩稿》，《清代詩文集彙編》，570/621-622。

⁷³ 侯楨，〈吳淞行弔陳提軍〉，收入：侯楨，《古杼秋館遺藁》，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6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82。

可保全⁷⁴。許棫、周星譽(1826-1884)和趙起(1794-1860)等人則填詞歌頌陳化成事蹟，內容殆亦聚焦於英夷懼怕陳化成，乃國家禦敵棟梁，不幸卻馬革裹屍⁷⁵。

陳化成死難後，出現許多他的繪像，士人在畫像上題詩撰文，記其事蹟。嘉定縣令練廷璜在陳化成死難三週內，命人繪製圖像，並徵集詩作，以資紀念。其後，蘇廷玉(1783-1853)邀請張際亮為練廷璜收藏之圖像撰述〈陳忠愍公死事詩〉。張際亮在詩中頌揚陳化成的禦敵事蹟與帶兵方法，抨擊舉國畏戰、求和的消極態度，並以南宋故事為例，說明和談的悲慘後果⁷⁶。何紹基亦為陳化成遺像題詩，盛讚其英勇事蹟與愛國熱忱⁷⁷。陳慶鏞於〈陳忠愍公化成遺像〉中，頌揚其以一擋十，力抗不屈的態度⁷⁸；王拯在〈陳將軍畫像記〉詳述陳化成堅守吳淞，令夷敵不敢冒進，以及開戰後奮勇禦敵的身影。並說明畫像之由來，乃嘉定縣令練廷璜募得陳化成遺體，命人為其繪製遺像。文末慨嘆陳化成之勇猛，吳淞陷落後，江南危矣，朝廷採撫夷之策，令人不勝唏噓⁷⁹。褚維壇的〈書陳忠愍公畫像〉，描述陳化成奮勇抗敵事蹟，諷刺多數士

⁷⁴ 姜泉，〈吳淞哀為忠愍陳軍門作〉，收入：姜泉，《荒江老屋詩識》，收入：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下/936-937；許棫，〈吳淞江口弔陳忠愍公化成〉，《東夫山堂詩選》，《稀見清人別集百種》，17/365；嚴鈞，〈吳淞口弔陳忠愍公〉，收入：嚴鈞，《香雪齋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7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1。

⁷⁵ 許棫，〈永遇樂·登丹鳳樓望黃浦江陳忠愍公化成〉，《三檀老屋詞選》，《稀見清人別集百種》，17/484-485；周星譽，〈永遇樂·登丹鳳樓望黃浦懷陳忠愍公同夢西素生兄樓在滬城東北女牆上宋淳熙間立〉，收入：周星譽，《東鷗草堂詞》，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7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43；趙起，〈滿江紅·弔陳化成將軍〉，收入：楊柏嶺(著)，《近代上海詞學繫年初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6。

⁷⁶ 張際亮，〈陳忠愍公死事詩〉，收入：張際亮(著)、王颺(校點)，《思伯子堂詩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68-1269。

⁷⁷ 何紹基，〈題陳忠愍公化成遺像練栗人屬作〉，收入：何紹基(撰)、龍震球、何書置(校點)，《何紹基詩文集》，1(長沙：岳麓書社，2008)，153。

⁷⁸ 陳慶鏞，〈陳忠愍公化成遺像〉，收入：陳慶鏞，《籀經堂類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07。

⁷⁹ 王拯，〈陳將軍畫像記〉，《龍壁山房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659/520。

兵因承平日久視戰爭為兒戲，未及交戰即已潰散⁸⁰。楊榮(1787-1863)在〈陳忠愍公畫像歌〉，強調英夷畏懼陳化成，故捨強攻弱，轉攻他處⁸¹。

部分士人作品則一體歌頌陳化成與其他死難將士，如張維屏(1780-1859)撰〈三將軍歌並序〉，細述陳化成、陳聯升與葛雲飛等三人禦敵事功，盛讚其為當今將才，故賦詩以存史事⁸²。謝蘭生在詩中諷刺敵軍未至，鎮海、明州等地兵民早已相率逃亡，留下空城，唯葛雲飛、王錫朋與鄭國鴻等三人身先士卒，奮勇作戰達六晝夜⁸³。魯一同合撰裕謙、王鼎與劉韻珂(1792-1864)等三人事功，裕謙以身死之，而王鼎，劉韻珂均懷賢憂國，憂憤致死，故賦詩頌揚以記史事⁸⁴。

除對官員的諸多頌讚詩詞外，士人在發揚忠義之氣時，亦兼及小官吏或百姓身上。如謝蘭生編纂《思忠錄》與《景忠錄》，表揚死難諸人，輯錄內容包含各級官吏，凡死難者率皆載入史冊，以為宣揚⁸⁵。定海縣令姚懷祥即備受士人讚賞，朱琦在〈定海紀哀〉中，生動描繪縣令姚懷祥不畏夷敵勢眾，願與縣民同生死的感人故事⁸⁶。翁心存、孫義鈞與孫衣言等人，賦詩紀述姚懷祥與典史全福等人死難事⁸⁷。朱琦記述副將朱桂與吳淞老將等默默無聞的

⁸⁰ 褚維壇，〈書陳忠愍公畫像〉，收入：褚維壇，《人境結廬詩稿》，《鴉片戰爭文學集》，下/880。

⁸¹ 楊榮，〈陳忠愍公畫像歌名化成字蓮峰閩之同安人江南提督道光壬寅五月殉夷難〉，收入：楊榮，《蜨庵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5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58。

⁸² 張維屏，〈三將軍歌並序〉，收入：錢仲聯(編著)，《近代詩鈔》，1(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14-15。

⁸³ 謝蘭生，〈海疆紀事〉，《鴉片戰爭文學集》，上/194。

⁸⁴ 魯一同，〈三公篇三首〉，《魯通甫集》，224-226。

⁸⁵ 陸以湉(撰)、崔凡芝(點校)，《冷廬雜識》，389-390；謝蘭生(編校)，《景忠錄》，收入：《叢書人物傳記資料類編·仕宦卷》，4(北京：國家圖書館，2010)，89-177。

⁸⁶ 朱琦，〈定海紀哀〉，《怡志堂詩初編》，《續修四庫全書》，1530/161。

⁸⁷ 翁心存，〈題姚履堂大令遺墨并敘〉，《知止齋詩集》，《續修四庫全書》，1519/176-177；孫義鈞，〈定海姚大令懷祥殉英夷之變伊莘農節相哀之以詩次韻一首〉，《好深湛思室詩存》，《清代詩文集彙編》，554/637；孫延釗(撰)、徐和雍、周立人(整理)，《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7。

小人物，在抗英戰役中的事蹟⁸⁸。陸嵩則將聽聞而來的浙東、廈門等處死難將士事蹟，一一記錄下來⁸⁹。陳化成的坐騎，更被歌頌為義馬。在陳化成死後，其坐騎落入英人手中，英人騎乘時，馬竟自投於海，英人大驚。廣州人聞訊後出資贖回。士人紛紛賦詩讚揚馬猶識忠義，頗有諷刺意味⁹⁰。陳連陞的坐騎遭英軍擄獲後，不肯食英人飼料。英人騎乘時，更將乘者顛落，「悲鳴跳擲而死」⁹¹。葛雲飛之妾率眾闖入英軍陣營，奪回葛雲飛遺體，歸葬故里。士人撰〈葛將軍妾歌〉，頌揚其義行⁹²。

綜觀士人在歌頌死難將士時，均強調死難者的禦敵之策，並渲染戰功，殆皆云因有其鎮守，方能抵抗英夷入侵。或謂英夷因忌憚有其鎮守，遂轉往疏於防備之處。略可說明士人對理應贏得戰爭勝利的自信與期許，在頌揚死難將士之餘，刻意推崇主戰人士，對主和人士則百般斥責，視為千古罪人，戰和人物呈現神化與妖魔化的兩極評價。

二、戰和人物的神化與妖魔化

除了書寫死難將士，宣揚抗敵忠義之氣外，士人尤大力歌頌在世的主戰人物，寄予厚望，幾已達神化程度。

部分士人認為中國可戰、應戰，且穩操勝券，但最終應勝而未勝，錯失制敵良機，故無法接受英軍攻陷各地的事實，並慨歎清廷懦弱怯戰的態度。

⁸⁸ 朱琦，〈朱副將戰歿他鎮兵遂潰詩以哀之〉、〈吳淞老將歌〉，《怡志堂詩初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13/220。

⁸⁹ 陸嵩，〈聽繆心如嘉穀談浙東死寇王將軍國英事〉、〈聽閩客談廈門死事諸公本末紀之以詩甲辰〉，《意苔山館詩稿》，《清代詩文集彙編》，570/630; 637。

⁹⁰ 周騰虎，〈陳將軍義馬行〉，收入：周騰虎，《餐芍華館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6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24-325；王拯，〈陳將軍義馬贊〉，《龍壁山房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659/583-584。

⁹¹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6/2542-2543。

⁹² 汪美生，〈葛將軍妾歌〉，《鴉片戰爭文學集》，上/199-200。

如魏源認為可借美、法之兵抗英，可驅義民、漢奸以攻逆敵，周旋於列強間，運用談判獲取最大利益。不但能永禁鴉片，更可將賠償英夷之金錢，用於購買洋礮洋艦，易外國長技為中國長技，收富國強兵之效⁹³。在此氛圍下，士人藉由形塑英雄以為人心寄託，因此對採取鐵腕作風禁絕鴉片，積極備戰，但未曾正面迎戰的林則徐，寄予高度期望。林則徐彷彿成為勝利保證，只需任用林則徐與英夷作戰，即可殄滅夷氛⁹⁴。鴉片戰爭期間，士人獲悉福建臺灣鎮總兵達洪阿(?-1854)與福建臺灣兵備道姚瑩，兩度擊退英軍，莫不高聲讚揚⁹⁵。卻爆出所謂擊退英軍，乃殺俘冒功，一時間引發士人熱烈討論。林則徐與姚瑩先後遭譴獲罪，舉國譁然，士人網絡尤齊聲反彈。藉由林則徐與姚瑩的境遇，或可略窺士人對主戰人物的造神運動。在謳歌主戰英雄之際，士人對朝廷主和人士則嚴詞攻訐，視之為國家罪人，其中又以穆彰阿與琦善為最。清文宗對穆彰阿、耆英等人的斥革，頗有加深妖魔化的跡象，讓士人將罪責往他們身上推。

下文將討論林則徐遠戍與姚瑩殺俘冒功事件，解析士人輿論如何塑造主戰英雄人物，並透過士人對穆彰阿與琦善的苛責，呈顯士人對主和人物的評述。

(一) 主戰人物的造神運動

林則徐與姚瑩同出生於1785年，在淑世理念驅使下，面對日益嚴重的鴉片與漏銀問題，亟思振衰起弊。惟兩人雖有熱誠，卻獲罪遭譴，未能發揮滿腔抱負。但在士人網絡支持下，兩人聲名大噪。下文將略述林則徐與姚瑩獲

⁹³ 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下〉，收入：魏源(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魏源集》，上(北京：中華書局，2009三版)，206。

⁹⁴ 如朱鳳鳴即上疏陳請清宣宗重用林則徐，以抵禦英夷，即可退敵致勝。參閱：朱鳳鳴，〈上平夷策疏〉，《食字齋文集》，卷1/3a-8a。

⁹⁵ 如：張際亮，〈是夜月明不寐感寄石甫廉訪臺灣〉，《思伯子堂詩文集》，下/1247；方東樹，〈寄姚石甫觀察臺灣〉，收入：方東樹，《考槃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0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4-55。

罪始末，描繪兩人於赴京候審與發配伊犁途中，各地官員和友人的反應。

1.從未有之曠典到遠戍伊犁

林則徐1811年中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起，一路宦途順遂。1820年外放浙江杭嘉湖道，歷任多省按察使、布政使、巡撫和總督等職，任上積極興利除弊，頗受百姓愛戴，屢獲嘉獎⁹⁶。1838年10月林則徐奉命入京覲見，清宣宗於8日內連續召見8次，恩賞紫禁城騎馬，授欽差大臣督辦粵事，沿海水師一體歸其節制，論者以為此乃國初以來未有之隆恩曠典⁹⁷。林則徐抵粵後以強硬手段執行禁烟政策，封鎖商館，要求出具切結，查抄烟土達20,000箱以上，獲賞加二級。但義律對清廷的強硬態度極為不滿，加上其後發生林維喜事件，使雙方衝突白熱化⁹⁸。

當清廷面臨英國武力威脅，林則徐協同鄧廷楨、關天培，加強布置沿岸砲臺守禦工事。然英人希望引起皇帝的注意，直接與中央進行交涉，不願在廣州一隅耗費時日，改為取道北上，冀期震撼清廷。反被士人宣傳為：因林則徐、關天培設置諸多海防關隘與防禦工事，致使夷船傷損，不敢來犯。英夷畏服林則徐，知廣東無隙可乘，故轉往福建、浙江一帶。周沐潤(1810-?)賦詩云：威嚴的林則徐使得萬鬼不敢覬覦廣東，加上虎門險峻，逼使英夷轉襲浙江、定海等處⁹⁹。更有士人編輯小說《罌粟花》，警惕世人鴉片之害與林則徐功績。《罌粟花·弁言》盛讚林則徐「深識遠見，智勇足備」，洞悉鴉片禍

⁹⁶ 有關林則徐的生平略歷，可參閱：楊國楨，《林則徐傳(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來新夏(編著)，《林則徐年譜新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

⁹⁷ 雷瑄(輯)，《蓉城閒話》，《鴉片戰爭》，1/314。

⁹⁸ 有關林維喜事件的相關討論，參閱：林啟彥、林錦源，〈論中英兩國政府處理林維喜事件的手法與態度〉，《歷史研究》，2(北京，2000): 97-113。

⁹⁹ 劉長華，《鴉片戰爭史料》，《鴉片戰爭》，3/144；貝青喬，《咄咄吟》，《鴉片戰爭》，3/222；黃鈞宰，《金壺七墨》，《鴉片戰爭》，2/607；周沐潤，〈客從粵中來〉、〈後海上行并敘〉，收入：周沐潤，《柯亭子詩初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3；周沐潤，〈後海上行并敘〉，收入：周沐潤，《柯亭子詩二集》，《清代詩文集彙編》，638/108-109。

害之深¹⁰⁰。

其後在琦善斡旋下，英國艦隊暫時南返，清宣宗的態度轉趨軟化，寄望以和談方式儘速解決，1840年7月命琦善向英軍表示將重治林則徐，9月初更以「辦理不善」為罪名，命林則徐、鄧廷楨來京候審，交部議處。大學士湯金釗雖犯顏奏保林則徐，遭清宣宗怒叱¹⁰¹。9月下旬，林則徐交卸兩廣總督一職，廣州商民紛至衙署表達不捨之情¹⁰²。紳民發起贖鍰之舉，集巨萬白銀，朱履賦詩讚揚其事，但林則徐致函婉謝紳民¹⁰³。

由於朝廷剿撫不定，對林則徐的處置亦遲遲未決，原諭令來京候審，其後又改以「革職並折回廣東以備查問差委」¹⁰⁴。湖廣道監察御史石景芳、戶科給事中萬啓心(1800-?)和吏科給事中周春祺等，均上奏要求對英用兵，請求起用林則徐、鄧廷楨¹⁰⁵。1841年3月，命林則徐以四品卿銜赴浙，聽候諭旨¹⁰⁶；5月以「辦理殊未妥協，深負委任」與「廢弛營務」罪名，「革去四品卿銜，從重發往伊犁效力贖罪」¹⁰⁷。消息一出，士人群情激憤，馮昕華與王柏心(1799-1873)，在第一時間賦詩慨嘆林則徐謫戍伊犁事，抨擊朝廷求和之策¹⁰⁸。

1841年5月底，林則徐乘船從鎮海啓程，沿甬江，經寧波，再沿姚江，

¹⁰⁰ 觀我齋主人，《罌粟花》，《鴉片戰爭文學集》，上/279。

¹⁰¹ 轉引自：劉長華，《鴉片戰爭史料》，《鴉片戰爭》，3/147。

¹⁰² 見：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373-374。

¹⁰³ 朱履，〈題林少穆制府辭贖鍰書後〉，收入：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道光朝卷》，14(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9645。陳康祺(撰)、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下(北京：中華書局，1984)，377。

¹⁰⁴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373。

¹⁰⁵ 來新夏(編著)，《林則徐年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2版)，322; 323; 325。

¹⁰⁶ 來新夏(編著)，《林則徐年譜》，348。

¹⁰⁷ 來新夏(編著)，《林則徐年譜》，359。

¹⁰⁸ 馮昕華，〈聞林少穆制軍遣戍新疆書感〉，收入：《柳堂師友詩錄·巢雲山房詩鈔》，轉引自：來新夏(編著)，《林則徐年譜》，359；王柏心，〈聞侯官林公謫伊犁〉，收入：王柏心，《百柱堂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95。

經餘姚、上虞北上，轉赴伊犁¹⁰⁹。行抵杭州時，為張珍泉題咏〈伊江蘿月聽詩圖〉，抒發遭遣戍之心情¹¹⁰。當地友人相邀餞別，賦詠《贈行詩冊》相送¹¹¹。7月初途經蘇州，顧沅(1799-1851)為林則徐畫像留念¹¹²。其後在鎮江與魏源相會，魏源賦詩表達憂國憂民之情¹¹³。6月中因黃河潰堤衝毀安徽5府23州，清廷命大學士王鼎主持治河工作，在其舉薦下，林則徐奉諭旨折回東河效力贖罪。汴梁紳民聽聞林則徐將來，喜躍扑舞。河務竣工後，林則徐奉旨續往伊犁，紳民聞之泣如雨下¹¹⁴。王鼎涕泣相送，林則徐賦詩二首酬答，藉此抒發遣戍之情與對時局的關心¹¹⁵。林則徐座師沈維鏞(1779-1849)對其仍遭遣戍伊犁憤憤不平，且對政局敗壞多所批評¹¹⁶。

1842年2月間，林則徐行經蘇州，宣南詩社舊友潘曾沂(1792-1852)因有所顧忌，僅賦詩相贈，林則徐回贈數首詩，感謝其贈詩之情，將遣戍比擬為「壯遊」，云將細體惠贈之「退思養素，藏密歸真」八字真言¹¹⁷。3月路過洛中，

¹⁰⁹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404。

¹¹⁰ 林則徐賦詩云：「謫宦東歸已十秋，玉關懷舊感西州。從戎大漠追狐尾，惜別將軍揖馬頭。詩夢俄驚梁月墮，邊心遙逐塞雲愁。誰知卷里濡毫客，垂老憑君問戍樓！」林則徐，〈乙未在吳張同莊明府珍泉出蘿月聽詩圖冗中僅題額應之辛丑重晤武林則余亦有荷戈之役矣率成誌感〉，收入：林則徐，《雲左山房詩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28。

¹¹¹ 林則徐，〈同莊贈詩六章次余題蘿月圖韻復疊前韻答之并謝武林諸君贈行詩冊〉，《雲左山房詩鈔》，《續修四庫全書》，1512/328-329。

¹¹² 見：馮桂芬，〈林少穆督部師小像題辭〉，《顯志堂稿》，《續修四庫全書》，1536/30。

¹¹³ 魏源，〈江口晤林少穆制府〉，《魏源集》，下/781。

¹¹⁴ 李景文(點校)，《汴梁水災紀略》(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35; 85-86。

¹¹⁵ 詩云：「幸瞻鉅手挽銀河，休為羈臣悵荷戈。精衛原知填海悞，蚊蟲早愧負山多。西行有夢隨丹漆，東望何人問斧柯。塞馬未堪論得失，相公且莫涕滂沱」；「元老憂時鬢已霜，吾衰亦感髮蒼蒼。餘生豈惜投豺虎，群策當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渾不定，君恩每飯總難忘。公身幸保千鈞重，寶劍還期賜尚方」。林則徐，〈壬寅二月祥符河復仍由河干遣戍伊犁蒲城相國涕泣為別愧無以慰其意呈詩二首〉，《雲左山房詩鈔》，《續修四庫全書》，1512/330。

¹¹⁶ 沈維鏞，〈與林少穆書〉，收入：沈維鏞，《補讀書齋遺藁》，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85。

¹¹⁷ 林則徐，〈次韻潘功甫舍人見贈三首〉、〈又次韻五言一首〉，《雲左山房詩鈔》，《續修四庫全書》，1512/330。

當地官員葉小庚邀遊龍門香山寺，林則徐藉撰寫遊記表達黍離之思¹¹⁸。抵達洛陽時，林則徐賦詩3首酬答葉小庚¹¹⁹。4月赴西安途中，路過華陰縣，受縣令姜申璠邀請，與陳堯書、劉建韶等同遊華山，另有答友人詩數首¹²⁰。其後林則徐染上瘧疾，病情嚴重，暫留西安調養，6月底始漸痊癒，7月6日自西安出發啓行赴戍¹²¹。

沿途官員率皆出城相迎，盛宴款待。如7月29日抵達蘭州時，總督以下各級文職官員齊集藍山書院，武職官員則於十里外列隊迎接。期間與陝甘總督富呢揚阿(1789-1845)，以及其他重要官吏程德潤、王兆琛(1786-1853)、唐樹義(1793-1854)等酬酢往還，題詩書聯¹²²。8月12日行抵甘肅古浪縣，縣令陳世鏞(1792-1878)離城三十餘里迎候，陪同入縣。14日至涼州，甘涼道郭柏蔭(1807-1884)邀往署中，多位滿城官員，文祥(1770-?)、長松亭、保忠、瑞慶，與武威、鎮番、永昌三縣縣令均出城迎接。22日啓程時多位官員欲遠送，在林則徐力阻下乃於道署聚談而別¹²³。9月5日抵肅州，亦受到當地官員遠迎，勾留2日¹²⁴。23日至哈密，辦事大臣德全(?-1862)、協辦大臣恆毓、哈密協巴克新布、哈密

¹¹⁸ 林則徐，〈同遊龍門香山寺記〉，收入：林則徐，《雲左山房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4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776。

¹¹⁹ 林則徐，〈西行過洛葉小庚招入衙齋並贈兩詩次韻奉答〉、〈小庚邀集千祥庵疊僚字韻奉謝〉、〈連日對飲怡園讀天籟軒詞復次身字韻〉，《雲左山房詩鈔》，《續修四庫全書》，1512/330-331。

¹²⁰ 參閱：林則徐，〈華陰令姜海珊申璠招余與陳賡堂堯書劉聞石建韶同游華山歸途賦詩奉東〉、〈次韻答宗滌樓稷辰贈行〉、〈次韻答姚春木〉，《雲左山房詩鈔》，《續修四庫全書》，1512/331-332。

¹²¹ 來新夏(編著)，《林則徐年譜新編》，525。

¹²²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413-414；林則徐，〈題富海駟督部富呢揚阿韜光蠟屐圖〉、〈題海駟松陰補讀圖〉、〈留別海駟〉、〈程玉樵方伯德潤餞予於蘭州藩廡之若已有園次韻奉謝〉、〈題唐子方觀察樹義夢硯圖〉，《雲左山房詩鈔》，《續修四庫全書》，1512/333-334。

¹²³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417。

¹²⁴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421。

廳惠存等人出城拜會。10月往烏魯木齊，路上受到各縣官員熱烈招待¹²⁵。

11月4日抵四臺，正式進入伊犁界，伊犁將軍布彥泰(1791-1880)與參贊慶昌(?-1843)派遣侍從來迎，7日續行至頭臺，當地之筆帖式、將軍、參贊與總兵等先後派人遠迎。8日行抵綏定城，總兵福珠洪阿(?-1853)親自率將郊迎，並在會芳園備席款待。鄧廷楨先遣人駕車來迎，翌日入伊犁後，親自拜訪。10日，將軍饋贈林則徐諸多物品，並派掌糧餉處事¹²⁶。其後，連日與各方人士晤談¹²⁷。12月19日，林則徐與鄧廷楨、伊犁將軍、參贊等共計11人，在鄧廷楨的雙硯齋作東坡生日會。林則徐賦詩感懷，以蘇軾被逐的遭遇自況¹²⁸。

在伊犁效力期間，伊犁將軍布彥泰將林則徐、鄧廷楨兩位留於衙署，凡軍國要事均與其商酌計議，深獲器重¹²⁹。林則徐負責水利開墾事業，墾地達數十萬餘畝¹³⁰。1845年伊犁將軍布彥泰奏陳，林則徐在新疆地區開墾有功，諭令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補。林則徐賦詩紀恩述懷，表達自己經久遭戍，不意竟能獲得起用¹³¹。其後，諭令暫署陝甘總督。消息一出，士人紛紛賦詩慶賀。梅曾亮、魯一同、李星沅(1797-1851)、鄧廷楨、姚瑩、宗稷辰與錢寶琛(1785-1859)等知交好友，以及李杭(1821-1848)、張金鏞等慕名者，皆賦詩誌其事，企盼林則徐東山再起¹³²。林則徐親戚故舊得知消息後，在友人壽宴上轟傳。待正式

¹²⁵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429-432。

¹²⁶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438。

¹²⁷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438-439。

¹²⁸ 林則徐，〈壬寅臘月十九日嶰筠前輩招諸同人集雙硯齋作坡公生日詩以紀之〉，《雲左山房詩鈔》，《續修四庫全書》，1512/336-337。

¹²⁹ 劉長華，《鴉片戰爭史料》，《鴉片戰爭》，3/173。

¹³⁰ 陳康祺(撰)、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上/17-18。

¹³¹ 林則徐，〈乙巳子月六日伊吾旅次被命回京以四五品京堂用紀恩述懷〉，《雲左山房詩鈔》，《續修四庫全書》，1512/344-345。

¹³² 見：梅曾亮，〈林少穆先生奉恩旨入關署陝甘總督作此寄呈〉，收入：梅曾亮(著)、彭國忠、胡曉明(校點)，《柏硯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83；魯一同，〈使君來〉，《魯通甫集》，334；李星沅，〈和林少穆制軍東歸述懷原韻〉，收入：李星沅，《李文恭公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05；鄧廷楨，〈少穆被命還朝以詩二章迎之〉，收入：鄧廷楨，《雙硯齋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

人事命令傳回福建，民眾率皆額手稱慶。包括兩湖、兩廣地區人民，亦欣喜歡慶¹³³。其後，改授陝西巡撫，雲貴總督，因平亂有功加太子太保，賞賜花翎，1849年以病乞歸。清文宗嗣位後，授欽差大臣，署廣西巡撫，進剿太平天國，行抵潮洲病卒。林則徐病逝征途，帶給親朋好友極大打擊，好友在紀念詩文中，慨歎其出師未捷身先死。龍啟瑞(1814-1858)賦詩惋惜痛失將才，致使廣西鼠賊橫行¹³⁴。宗稷辰〈公祭林文忠公文〉縷述林則徐功蹟，及對斯人之無盡懷想¹³⁵。王柏心在挽詩中，情感真摯，悼念兩人情誼並嘆息其未盡志業¹³⁶。

綜觀林則徐獲罪遭譴後，雖係「發往伊犁效力贖罪」，然沿途受到的歡迎、款待程度，完全不像負罪之人。與各地友人詩文酬唱，遊覽景致，宛若英雄人物之壯遊。藉由各地官員的反應與友人之詩詞唱和，略可看出多數士人支持積極好戰的林則徐，將其描繪為必勝將軍，對抗英夷的唯一人選。士人冀望朝廷能任用林則徐之流的人才，對外採取強硬態度，恢復昔日天朝榮光。

2. 殺俘冒功？臺灣冤獄？

隨著鴉片戰爭漸趨落幕，英國開始要求歸還戰俘，臺灣地區監押的英國

文集彙編》，5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24；錢寶琛，〈聞林少穆節帥起官陝督有作〉，收入：錢寶琛，《存素堂詩彙》，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91；李杭，〈聞侯官林公入關志喜〉，收入：李杭，《小芋香館遺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8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784；張金鏞，〈聞林制府東還有余未識制府不以寄也〉，《躬厚堂詩錄》，《清代詩文集彙編》，618/24。

¹³³ 王景賢，〈上林少穆岳叔書〉，收入：王景賢，《伊園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9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58。

¹³⁴ 龍啟瑞，〈紀事〉，收入：呂斌(編著)，《龍啟瑞詩文集校箋》(長沙：岳麓書社，2008)，145-148。

¹³⁵ 宗稷辰，〈公祭林文忠公文〉，收入：宗稷辰，《躬恥齋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7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08。

¹³⁶ 王柏心，〈輓侯官林公〉，《百柱堂全集》，《續修四庫全書》1527/247-248。

俘虜成爲交涉重點。

1842年7月，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 1789-1856)首度指稱裕謙與各省將軍大臣，「酷心殘殺」因風大船破之英人，僞稱捷報¹³⁷。8月初璞鼎查致函要求釋放英俘¹³⁸，8月中姚瑩接到暫行拘禁未經正法英俘¹³⁹。9月底閩浙總督怡良上奏說明，部分夷俘業已正法，僅餘11名¹⁴⁰，10月初清廷飭令釋俘，並曉諭英人，正法乃議和以前之事，姚瑩在奏摺中，詳述相關事情¹⁴¹。10月中清廷再次諭令怡良，移交英俘時務必明白宣示彼時和議未成，戰時互有殺傷乃爲常事，不應據此要求賠償，並使英人「畏威懷德，不復有所借口」¹⁴²。10月底璞鼎查抵達廈門後，獲知臺灣英俘被殺，嚴斥達洪阿「不顧廉恥，貪婪功勞」，假冒戰功，要求應將達洪阿等妄殺之兇官，革職正法，所有財產悉數交由英人分予死者家屬¹⁴³。11月初兩江總督耆英先後接到怡良奏報姚瑩辦理之法，與璞鼎查的相關照會，奏陳：達洪阿與姚瑩兩人勤求治理，匪徒懾服，兵民愛戴，實屬有功無過，惟爲求顧全大局，無法保全¹⁴⁴。但清宣宗不改初衷，諭示：不論是非曲直，均應由清廷按例賞罰，豈可聽從他國指示辦理？¹⁴⁵

清宣宗於怡良赴臺查辦，雙方交涉後，爲免英人尋釁，一改初衷，於1843年正月命怡良傳旨拿問達洪阿、姚瑩，押解回京審訊。

¹³⁷ 〈璞鼎查告示〉，收入：《中英兩國來往照會公文簿》，《鴉片戰爭》，5/452-454。關於告示內容劉蜀永教授另有校對版本，參閱：劉蜀永(整理)，〈璞鼎查中文告示一則〉，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7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26-28。

¹³⁸ 張喜，《撫夷日記》，《鴉片戰爭》，5/392。

¹³⁹ 姚瑩，〈二次生擒逆夷奸民訊供進呈夷信圖書奏(夾片)〉，收入：姚瑩，《東溟奏稿》，收入：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45(臺中：文叢閣圖書公司，2007)，106-116。

¹⁴⁰ 施立業，《姚瑩年譜》(合肥：黃山書社，2004)，255。

¹⁴¹ 施立業，《姚瑩年譜》，256；姚瑩，〈夷船兩次來臺釋還遭風夷人奏(夾片)〉，《東溟奏稿》，《全臺文》，45/187-193。

¹⁴² 施立業，《姚瑩年譜》，259。

¹⁴³ 〈怡良單〉，收入：前清華大學歷史系(輯)，《原藏故宮大高殿軍機處檔案》，《鴉片戰爭》，4/184-185。

¹⁴⁴ 施立業，《姚瑩年譜》，265。

¹⁴⁵ 施立業，《姚瑩年譜》，265。

姚瑩和達洪阿拿問前，士人密切關注，輿論一致認為臺灣鎮道乃有功之人，應嚴防英夷構陷。遠在北京的曾國藩和邵懿辰連日討論，兩人「極為憂憤，幾於坐不安席」¹⁴⁶。監察御史福珠隆阿，工科掌印給事中薩林等，均上奏表達支持姚瑩與達洪阿¹⁴⁷。獲罪消息傳出後，群情譁然，引發士人強烈反彈。臺灣地區舉人士紳，各地郊商與耆老等，聯名盛讚姚瑩等官員，平日勤政愛民，戰時護臺禦夷。署名震無咎齋居士者在《臺人輿論·弁言》中形容：姚瑩、達洪阿逮問後，臺人「奔走惶駭」，如喪考妣，嗟歎墮淚。強調臺人奮勇禦夷，非恃地利之險，端賴姚瑩與達洪阿兩人智勇雙全，固民心，振士氣。英夷難逞奸計，故矯誣以陷害之¹⁴⁸。

士人聞訊後，紛紛撰文賦詩聲援¹⁴⁹，魯一同指陳此乃敵人構陷，如輕信夷人之言，將使親痛仇快，自毀士氣。文中讚揚姚瑩文武雙全，守邊禦敵，三挫英夷，有功而無罪。朝廷宜當獎勵，以為忠勇楷模¹⁵⁰。錢贊黃認為姚瑩、達洪阿係「能戰之臣」，雞籠、大安之役屢建奇功，兩人獲罪肇因於英夷與議和之臣之構陷¹⁵¹。

1843年3月初，姚瑩被押解至福建惠安¹⁵²，抵福州時，友人置酒餞行，賦詩相贈¹⁵³。3月下旬清宣宗接到怡良赴臺調查報告後，極為震怒，諭示：姚瑩、

¹⁴⁶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日記一》（長沙：岳麓書社，1987），149。

¹⁴⁷ 施立業，《姚瑩年譜》，277-278。

¹⁴⁸ 謝興堯（供稿），《臺人輿論》，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8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1-21。

¹⁴⁹ 姚瑩，〈出獄後聞今年正月臺諫諸公先後上言爭臺灣事一時中外作詩著論者甚眾閩閩中亦多感詠近傳臺人復有輿論之刻自非盛朝寬大何能有此感成一律〉，收入：姚瑩，《後湘詩集·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1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80。

¹⁵⁰ 魯一同，〈擬論姚瑩功罪狀〉，《魯通甫集》，105-106。

¹⁵¹ 錢贊黃，〈論臺灣之獄〉，收入：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編），《鴉片戰爭在閩、臺史料選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281-282。

¹⁵² 姚瑩，〈奉逮內渡抵惠安縣〉，《後湘詩集·續集》，《續修四庫全書》，1513/76。

¹⁵³ 姚瑩，〈至福州喜晤楊笙友水部林梅友謝碩甫劉芑川三孝廉及亨甫弟子余柏溪茂才小集寓舍諸君各有詩文見贈既登舟諸君復置酒洪山橋餞送作長句酬別是時亨甫方遊河洛〉，《後湘詩集·續集》，《續修四庫全書》，1513/77。

達洪阿辜負皇恩，欺君冒功，可惡至極。一切罪愆皆咎由自取，著革職嚴辦，解交刑部，由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審訊，定擬具奏。除義勇外，撤銷此前保奏獎勵之臺灣雞籠、大安出力人員¹⁵⁴。4月下旬姚瑩致書劉鴻翱(1778-1849)話別，辯駁冒功獲罪一事，自述並未謊報攬功，乃臺灣軍民人人爭先，奮勇守城殺敵，故能獲此戰功。書中姚瑩道出清廷屢戰屢敗，士人憂憤，忠良切齒拊心，期以臺灣捷報挫夷銳氣，告慰全國君民¹⁵⁵。其後，姚瑩於致方東樹(1772-1851)函中透露，冒功案係相關官員盡皆獲罪，獨臺灣屢邀恩賞，且督撫無功，鎮道受賞，難免招忌。且因英夷獨敗於臺灣，遂以膚愬之辭恫喝朝臣，其內心已有追隨林則徐、鄧廷楨遠戍伊犁的準備¹⁵⁶。汪喜孫得知姚瑩被逮赴刑部時，「大慟嘔血」¹⁵⁷。5月底姚瑩在與光聰諧書中，重申：英夷五度進犯臺灣，未得一利，二度擊退，一次潛遁而逃，二次破舟，擒敵斬之，冀期「上振國威，下雪眾恥」。然因英夷不得志，以詭辭讒言威嚇要員，欲入姚瑩、達洪阿於罪¹⁵⁸。

7月初姚瑩行抵蘇州，與其兄姚朔(1781-1848)久別重逢¹⁵⁹，顧沅為之畫像留念¹⁶⁰。過吳江時，年近古稀的鄉前輩左德慧，「猶出見，話言縷縷」¹⁶¹。7月7日應鹿澤長之邀，與張際亮、張竹虛、陳梁叔、陸次山等人宴集白公祠下¹⁶²。

¹⁵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48/154。

¹⁵⁵ 姚瑩，〈奉逮入都別劉中丞書〉，《東溟文後集》，《續修四庫全書》，1512/550-551。

¹⁵⁶ 姚瑩，〈再與方植之書〉，《東溟文後集》，《續修四庫全書》，1512/552。

¹⁵⁷ 姚瑩，〈管小異言癸卯五月在濟甯汪孟慈聞余被逮大慟嘔血而余未知孟慈嘗言以朋友為性命不其信哉君沒今三年矣小異異之子也孟慈是其婦翁言當不妄嗟呼交道之薄久矣如孟慈亨甫其猶古人之風哉〉，《後湘詩集·續集》，《續修四庫全書》，1513/109-110。

¹⁵⁸ 姚瑩，〈與光律原書〉，《東溟文後集》，《續修四庫全書》，1512/553。

¹⁵⁹ 姚瑩，〈喜晤家兄伯符時至吳門相候一月矣〉，《後湘詩集·續集》，《續修四庫全書》，1513/77。

¹⁶⁰ 馮桂芬，〈姚石甫觀察小象題辭〉，《顯志堂稿》，《續修四庫全書》，1536/31。

¹⁶¹ 姚瑩，〈左右僑墓誌銘〉，《東溟文後集》，《續修四庫全書》，1512/604。

¹⁶² 姚瑩，〈鹿春如召同張亨甫張竹虛陳梁叔陸次山家兄伯符集白公祠下時方七夕〉，《後湘詩集·續集》，《續修四庫全書》，1513/77-78。

8月上旬姚瑩抵北京，30餘名公卿大臣爭相出迎¹⁶³。8月13日入刑部獄，25日穆彰阿進呈審訊供詞。儘管穆彰阿並無處置建議，但供詞後附言：兩度擒夷正法，非獨達洪阿、姚瑩之功，係文武士民之力。且英夷五犯臺灣，未獲一利，故銜恨甚深。英夷就撫後譎辭上控，更非達洪阿、姚瑩所能逆料¹⁶⁴。清宣宗覽閱後，將達洪阿、姚瑩「加恩免其治罪」，釋放出獄¹⁶⁵。

姚瑩出獄後聲名大噪，不論相識與否，亟欲與其交，其中不乏政要顯貴，如潘世恩、祁雋藻、湯金釗、許乃普(1787-1866)、陳官俊、祝慶蕃(1777-1853)、魏元烺(1779-1854)與楊殿邦(1777-1859)等¹⁶⁶；各級官員：劉寬夫、何紹基、陳慶鏞、王拯、朱琦、邵懿辰、蘇廷魁、陳景亮(1810-1884)與馮志沂(1814-1867)等人¹⁶⁷。馮桂芬謂姚瑩出獄後，與陳慶鏞、張穆(1805-1849)、趙振祚、羅惇衍、莊受祺、潘曾瑋等人，聚會共飲，與會者相繼詢問臺灣事件始末，姚瑩未嘗居功自恃，僅如實陳述戰守形勢¹⁶⁸。

除輿論支持外，時人文字多視之為冤案。1843年朱琦賦詩云：姚瑩大挫夷勢，四戰皆捷，乃忠義之事。獲罪遭逮後，士人議論紛紛，且多佛鬱難平，朱琦誓言為姚瑩申辯曲直¹⁶⁹。方東樹在餞別姚瑩詩中云：姚瑩出任福建臺灣兵備道4年以來，召募義勇逾3萬人，屢挫英夷，故英夷忌憚不敢近。然浙粵、江南等地連年喪師，獨臺灣完好未失，英夷誣陷之，致使姚瑩獲罪遭逮。數千名臺灣民眾泣訴於官，要求開釋姚瑩¹⁷⁰。鄧顯鶴(1777-1851)與戴鈞衡(1814-1855)

¹⁶³ 施立業，《姚瑩年譜》，300-301；姚永樸，《舊聞隨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186。

¹⁶⁴ 施立業，《姚瑩年譜》，303。

¹⁶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48/443-444。

¹⁶⁶ 姚瑩，〈復廬青一兄書〉，《東溟文後集》，《續修四庫全書》，1512/555-556。

¹⁶⁷ 施立業，《姚瑩年譜》，306-307。

¹⁶⁸ 馮桂芬，〈姚石甫觀察小象題辭〉，《顯志堂稿》，《續修四庫全書》，1536/31。

¹⁶⁹ 朱琦，〈癸卯九月朔日集萬柳堂宴姚石甫丈席間話臺灣事慨然有作在座者為陳頌南蘇賡堂兩侍御梅柏言馬湘帆王少鶴三農部何子貞編修主人海秋夫子暨予凡九人〉，《怡志堂詩初編》，《續修四庫全書》，1530/163。

¹⁷⁰ 方東樹，〈寄錢石甫石甫任臺澎道四年召募義勇三萬餘人挫敗英夷英夷憚之不敢近故連年浙粵江南皆喪地失守而臺獨完英夷忌惡之誣訐致抵罪被逮入都〉，《考槃集》，《清代詩文集彙編》，

賦詩吟咏姚瑩事，同聲抱屈¹⁷¹。祁寯藻在述懷詩中，視姚瑩、達洪阿為「孤忠」，含蓄表達此乃難得之海疆功業¹⁷²。夏燮(1800-1875)撰述《中西紀事》云：臺灣之獄由耆英與穆彰阿分居內外主導之，怡良查辦後，以「莫須有」定讞，即受耆、穆兩人指使¹⁷³。包括《夷艘入寇記》、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梁廷枏(1796-1861)《夷氛聞記》等，均有相同論調¹⁷⁴。

在姚瑩殺俘冒功事件中，好友張際亮四處奔走，以冤獄為名，要求平反。姚瑩雖遭羈押，迅即獲釋，張際亮卻因疫病而卒。張際亮之死，令人慨嘆萬千，士人對其兩肋插刀，抨擊朝廷軟弱的態度懷念不已，交相讚譽其忠義之心。何紹基為張際亮所作的挽聯，盛讚他為「真血心男子」，將其比擬為明朝諫臣楊繼盛(1516-1555)¹⁷⁵。葉名澧在張際亮病逝後，賦詩哭悼，除傷逝直諫之友，更讚其為營救姚瑩，跋涉三千里之義行。詩末尤盼夢中相見，來生再續前緣¹⁷⁶。魯一同聽聞張際亮卒於都門，旋賦詩五首以哭之。詩中縷述兩人昔時交遊，情誼深厚，對張際亮熱心為姚瑩奔走平反，尤多所頌揚¹⁷⁷。朱琦為張際亮校正遺集時，讚其為姚瑩申冤的高貴情誼¹⁷⁸。姚燮(1805-1864)將張際亮憂國憂民的情懷與庾信(513-581)、杜甫相提並論¹⁷⁹。孔繼鑠賦詩悼念，嘆息

507/58。

¹⁷¹ 鄧顯鶴，〈公論二首〉，收入：鄧顯鶴，《南村草堂詩鈔》(長沙：岳麓書社，2008)，350-351；戴鈞衡，〈讀史〉，收入：戴鈞衡，《味經山館詩抄》，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5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93。

¹⁷² 祁寯藻，〈書生六首〉，《祁寯藻集》，2/512。

¹⁷³ 夏燮，《中西紀事》(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141。

¹⁷⁴ 參閱：不著撰人，《夷艘入寇記下》，《鴉片戰爭》，6/133-134；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下〉，《魏源集》，上/202-203；梁廷枏(撰)、邵循正(點校)，《夷氛聞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86-89；130-135。

¹⁷⁵ 姚永樸，《舊聞隨筆》，186。

¹⁷⁶ 葉名澧，〈哭張亨甫四首十月初九日卒於松筠庵〉，收入：葉名澧，《敦夙好齋詩初編》，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3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89。

¹⁷⁷ 魯一同，〈聞張亨父卒於都門哭之有作五首〉，《魯通甫集》，232-234。

¹⁷⁸ 朱琦，〈校正亨甫遺集作詩誌哀〉，《怡志堂詩初編》，《續修四庫全書》，1530/164。

¹⁷⁹ 姚燮，〈哭張孝廉際亮四章〉，收入：姚燮，《復莊詩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

未能攜手同享太平盛世¹⁸⁰。劉存仁(1805-1880)過訪張際亮墓，追憶昔日情景，歎惜第一流人才未能發揮所長，徒留遺憾。劉存仁於詩話中論張際亮之詩及其詩論，並追思多位友人與張際亮的交遊¹⁸¹。

(二)主和人士的妖魔化

士人一面讚譽林則徐與姚瑩，一面嚴厲指責朝中主和公卿。尤以力主罷黜林則徐與鄧廷楨的穆彰阿，一意與英夷媾和的琦善，為士人主要抨擊對象。1861年郭嵩燾在日記中，直指琦善、耆英、葉名琛(1807-1859)與僧格林沁等4人，為辦理夷務的四凶。郭嵩燾認為林則徐貽誤事機更甚琦善，然因其心術正直，故未予苛責¹⁸²。然何以郭嵩燾未將穆彰阿列入四凶之內？是否因郭嵩燾曾在1838年赴京會試，結識會試總裁穆彰阿，且穆彰阿為好友曾國藩的座主，有意迴護？答案已沈埋在歷史的角落。

士人手持春秋之筆，神化主戰英雄，妖魔化主和大臣，天平兩極，自有權衡。下文藉由士人對穆彰阿與琦善的評價，論析其對主和人士的態度，甚或對清朝國勢與鴉片戰爭的解讀。

1. 穆彰阿

穆彰阿，郭佳氏，滿洲鑲藍旗人，字耕珊、子樸、鶴舫。1805(嘉慶10)年中進士，點翰林院庶吉士。受清仁宗賞識，充日講起居注官，派任鄉試正副考官，累遷至翰林院侍讀、內閣學士、各部左右侍郎與各旗正副都統等職，

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3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32。

¹⁸⁰ 孔繼鑠，〈哭亨甫八首〉，收入：孔繼鑠(著)、劉承幹(校)，《心嚮往齋詩文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160(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據南林劉氏求恕齋叢書排印)，83。

¹⁸¹ 劉存仁，〈晨過焦山下訪松寥不得因憶故友張亨甫悵然久之〉、〈龍江驛旅夜感舊〉，收入：劉存仁，《岷雲樓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82; 597- 598；劉存仁，《岷雲樓詩話》(刊刻者、年代不詳，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室)，卷3/ 2b- 3b; 5b- 8b。

¹⁸²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1(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505。

然因細故遭清仁宗斥責左遷。終嘉慶朝穆彰阿未晉升高官顯爵。然清仁宗對穆彰阿仍寄予高度期望，諭令留心學習¹⁸³。道光年間，清宣宗重用穆彰阿，出任各部尚書，入值軍機處，多次擔任鄉試、會試、覆試、殿試、朝考、教習庶吉士、散館考差、大考翰詹等重要考試之主考官，讀卷官或閱卷大臣。歷任國史、玉牒與實錄諸館總裁。故爾門生故吏遍布朝野，號為「穆黨」。

鴉片戰爭前後，朝中以潘世恩、祁寯藻、王鼎與穆彰阿等人為首，但實際掌控大權者為穆彰阿，檢索當時士人記述，略可見其權傾一時之氣燄。如趙烈文(1832-1894)於日記中謂，不論用人行政，皆操於穆彰阿，致使士風大變，國事日非¹⁸⁴。汪士鐸描述穆彰阿個性巧佞，「以欺罔蒙蔽為務」¹⁸⁵。孫靜庵云：穆彰阿權傾中外，莫之敢撓。王鼎欲奏劾之，卒以尸諫，然陳孚恩(1802-1866)未敢上奏，轉呈穆彰阿。穆彰阿改以「暴卒」上報，未進奏疏¹⁸⁶。李岳瑞(1862-1927)指陳，穆彰阿用事既專且久，督撫奏事內容無不預聞。尤私揣上意，粉飾太平，下情無法上達，終至爆發洪楊之亂¹⁸⁷。龍啟瑞致書梅曾亮，隱諱傳達廣西巡撫周之琦視穆彰阿意旨行事¹⁸⁸。

而士人再三攻訐者，乃穆彰阿於鴉片戰爭中力主議和。由於大部分士人認為中國應戰、可戰，輿論一面倒向主戰派，詰難主和人士。陳康祺記述穆彰阿當國後，一意主和，耆英、琦善與伊里布(1772-1843)等人怯懦無遠略，和議之舉讓軍民心灰意冷，致使關天培、葛雲飛與陳化成等人捐軀疆場¹⁸⁹。

儘管諸多士人筆下對穆彰阿嚴詞抨擊，現實中卻少有士人明火執仗攻訐其過。1842年東閣大學士王鼎獲知對英和議將成，林則徐遭遣戍伊犁，王鼎

¹⁸³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五)》，32(北京：中華書局，1986)，314/168。

¹⁸⁴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56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43-149。

¹⁸⁵ 汪士鐸(著)、鄧之誠(輯錄)，《汪悔翁(士鐸)乙丙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148。

¹⁸⁶ 孫靜庵，《棲霞閣野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18-19。

¹⁸⁷ 李岳瑞，《悔逸齋筆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194-195。

¹⁸⁸ 龍啟瑞，〈上梅伯言先生書一〉，《龍啟瑞詩文集校箋》，423-426。

¹⁸⁹ 陳康祺(撰)、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上/140。

欲面陳皇帝力爭，然清宣宗命其「休沐養疴」。王鼎返家自縊，期以尸諫奏劾穆彰阿誤國殄民。軍機章京陳孚恩接獲遺摺，轉呈穆彰阿，竟遭湮滅¹⁹⁰。1843年福建道監察御史蘇廷魁為少數勇於對抗穆彰阿者，蘇廷魁以天有異象為由，陳請清宣宗下罪己詔，並要求罷黜穆彰阿。王拯為其撰寫的詩集序言云：蘇廷魁上奏諫言，「直聲震天下」。陳康祺與《清史稿》皆詳述其事：蘇廷魁上奏指斥時弊，清宣宗「覽奏動容，嘉其切直」，一時轟傳朝野。然實錄中卻未見清宣宗「動容」或「嘉許」之情，反頒旨強調：此前皆納諫如流，雖有異象，惟毋須故作姿態，特詔求言。要求官員諫言均須言之有物，切實可行，不可徒託空言，博取名聲¹⁹¹。另一則朝臣揭發穆彰阿的事例為戴熙(1801-1860)，1846年廣東學政戴熙返京述職，清宣宗召對問曰：江西、安徽與江蘇一帶，民情如何？戴熙云：「盜賊蠡起，民不聊生」。清宣宗聞之大駭，謂：如所言屬實，將成何事體，怒詢穆彰阿。穆彰阿答覆：戴熙見皇上年事已高，以此危言聳聽之論驚嚇皇上，求取骨鯁之臣的美名，所言並非實情。戴熙因此遭清宣宗嫌惡，以病告歸¹⁹²。1850年孫鏘鳴(1817-1901)上〈請罷斥穆彰阿疏〉，指斥穆彰阿係秦檜(1090-1155)、嚴嵩(1480-1567)之流，可惜奏疏已經亡佚¹⁹³。

清文宗親政後頒旨斥革穆彰阿，指其「妨賢病國」，貪冒榮寵，並直云穆彰阿在達洪阿、姚瑩殺俘冒功事件中陷害忠良。當潘世恩保奏林則徐時，穆彰阿意圖「偽言熒惑」，著即革職，永不敘用¹⁹⁴。清文宗諭旨一出，愈加確

¹⁹⁰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38/363/11415。

¹⁹¹ 王拯，〈蘇唐堂先生守柔齋續集序〉，收入：蘇廷魁，《守柔齋詩鈔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0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90-591；陳康祺(撰)、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下/591；趙爾巽(等撰)，《清史稿》，38/378/11593-11594；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六)》，38/390/1000-1001。

¹⁹²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4/1506。

¹⁹³ 胡珠生，〈前言〉，收入：孫鏘鳴(撰)、胡珠生(編注)，《孫鏘鳴集》，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2；胡珠生，〈奏疏·編者按〉，《孫鏘鳴集》，上/1。

¹⁹⁴ 清文宗〈罪穆彰阿耆英諭〉，見：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一)》，40/

立穆彰阿的評價。《清史稿》評述穆彰阿，支持對英議和，力主罷革林則徐，以琦善代之。士人無不詆罵。論贊中更指陳穆彰阿柄政之際，損國威，喪國權，和戰不定，釀成日後外患頻仍¹⁹⁵。

2. 琦善

琦善，博爾濟吉特氏，滿洲正黃旗人，世襲一等侯爵。1814年起出任河南按察使後，歷任各省布政使、巡撫與總督要職，兩度授欽差大臣，奉旨辦事。琦善非僅因其為權貴子弟而獲重用，細察其擔任京官時期，以及任河南、山東與兩江地區督撫之政績，堪稱能吏。琦善在吏治革新、賑濟災荒、協辦鹽漕河諸務等，均有顯著成效¹⁹⁶。1819年清仁宗擢升琦善為河南巡撫，勉勵琦善「力矯因循，培植民俗，嚴緝匪類，密訪逆蹤」¹⁹⁷。1824年清宣宗頒旨褒獎琦善「實心任事，才守兼優」，冀望琦善加倍忠君勤政¹⁹⁸。此外，金安清與陳康祺皆記有琦善習刑律之軼事記載：琦善弱冠前以蔭生入刑部，遭漢人老輩所侮，銜恨在心，遂以三百金延聘一吏，三年內盡學其技。故刑名、錢穀、緝捕諸務罕有匹敵者，在其主政下弭盜安民，治軍嚴謹。由此觀之，琦善並非不學無術之紈褲子弟。然性好饋遺，揣摩上意以邀寵眷，故為士人鄙斥¹⁹⁹。

鴉片戰爭中，清宣宗授琦善為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接替林則徐，安撫英人情緒，避免爆發衝突。然士人強烈批評琦善抵粵後一意與英人和談，答允

20/ 294- 295。

¹⁹⁵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38/ 363/ 11415- 11419。

¹⁹⁶ 有關琦善相關政績的討論，參閱：魏秀梅，〈琦善在豫魯的政績(1814-182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上(臺北，1993.06): 463- 503；魏秀梅，〈琦善在兩江的政績(1825-182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臺北，1994.06): 135- 160。

¹⁹⁷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五)》，32/ 355/ 693。

¹⁹⁸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二)》，34/ 64/ 7。

¹⁹⁹ 歐陽兆熊、金安清(撰)、謝興堯(點校)，《水窗春曉》，56；陳康祺(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郎潛紀聞四筆》，106- 107。

義律撤軍、賠款割地之請，訂立〈穿鼻草約〉²⁰⁰。1840年裕謙代署兩江總督，前往上海籌防，上奏克復定海之策，臚列琦善五大罪狀，張皇欺飾，弛備損威，違例擅權，將就苟且與失體招贖等。奏請彈劾琦善，因其已為英人藐玩，難以懾服夷敵²⁰¹。太常寺卿唐鑑亦專摺上奏，指陳琦善意主苟安，在交涉中未能恩威並施，使敵畏服。眼下雙方衝突一觸即發，如雙方開戰，琦善非唯不能懾服敵軍，亦難伸張士氣，故難膺任粵東主將之職²⁰²。唐鑑甚至以全家性命，保舉林則徐帶罪督兵²⁰³。1842年琦善因「擅予香港，擅許通商」，遭「褫職逮治，籍沒家產」後，重獲啓用，授四等侍衛，充葉爾羌幫辦大臣，改熱河都統。消息傳出，引發清議，給諫陳慶鏞表示：琦善係海疆亂事之始作俑者，今海內糜爛至此，皆琦善之過。僅罷斥之已不足振作民心士氣，遑論屢蒙皇恩，賞授要職。不僅琦善，奕經和文蔚(?-1855)亦有罪之人，卻迭受拔擢，何以告慰民心？且琦善於革職之際，仍「意侈體汰，跋扈如常」，徒令士人切齒。奏請收回成命，以伸國法，撫慰輿情。清宣宗覽奏後，擢升之議遂寢，著仍革職，令其閉門思過²⁰⁴。

鴉片戰爭戰敗後，士人將矛頭指向琦善，謂其乃罪魁禍首。如朱葵之賦詩謂：粵事之壞始於琦善主和，繼以奕山、隆文與楊芳等官員怯戰，遂使軍情一誤再誤²⁰⁵。另一首詩則強調，因琦善主和，英夷遂以和議餽之，儘管有人提醒，琦善仍執意和談²⁰⁶。謝蘭生在詩注中云：粵中戰事皆誤於琦善²⁰⁷。

²⁰⁰ 有關琦善與義律之間，議訂《穿鼻草約》相關內容的討論，參閱：莊建平，〈琦善·義律·穿鼻草約〉，《安徽史學》，1(合肥，2000): 45-51。

²⁰¹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38/372/11523-11524。

²⁰² 唐鑑，〈唐鑑奏琦善難為主將摺〉，收入：齊思和(等整理)，《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2(北京：中華書局，1964)，660-661。

²⁰³ 朱葵之，〈罪言四首位卑言高罪也況冷官耶縱言所至不能已已諒之〉，《妙吉祥室詩鈔》，《清代詩文集彙編》，537/198。

²⁰⁴ 陳慶鏞，〈申明刑賞疏〉，《籀經堂類纂》，《續修四庫全書》，1522/479-481。

²⁰⁵ 朱葵之，〈粵事十二首粵事之壞始由琦督主和繼則靖逆奕山參贊文隆楊芳怯戰也一誤再誤可嘆可恨因志之〉，《妙吉祥室詩鈔》，《清代詩文集彙編》，537/204-205。

²⁰⁶ 朱葵之，〈廷議二首琦督主和英夷即以和餽我當事者墮其術中而不自知即有危言之人已無及矣〉，《妙吉祥室詩鈔》，《清代詩文集彙編》，537/197。

李棠階在日記中，嚴詞譴責琦善帶兵無方，「非大漢奸而何？」²⁰⁸

《清史稿》評述琦善「罷戰言和」、「去備媚敵」，係敗戰之因。儘管琦善在鴉片戰爭時遭「褫職逮治，籍沒家產」，甚至議處死刑，惟旋即獲釋。翌年清宣宗擬起用為葉爾羌幫辦大臣、熱河都統等職，御史陳慶鏞上疏反對，復起之旨遂寢。未幾改授駐藏大臣，1846年擢四川總督，清宣宗嘉其於「吏治營伍，實心整頓」，回復頭品頂戴。1852年因言官劾其妄殺，遭革職逮問，定讞發往吉林效力贖罪，然再度迅速釋回，命其署理河南巡撫，並授為欽差大臣，辦理防務。1854年病卒後，追贈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依總督例賜卹，諡文勤。

細察鴉片戰爭後琦善的宦途起伏，雖曾兩度遭革職，一次議處死刑，一次定讞充軍，皆迅速釋回重獲起用，顯見琦善受清宣宗與清文宗倚重程度，與士人之攻訐相對照，甚不相稱。1931年蔣廷黻(1895-1965)撰述〈琦善與鴉片戰爭〉，重新檢視琦善的定位。蔣廷黻一反過去批評鄙視的態度，給予琦善較高評價，認為：林則徐昧於中外形勢，反觀備受時人批評的琦善，雖在軍事方面表現平平，但外交方面卻能審度中外強弱形勢，權衡利害輕重，見識乃在時人之上²⁰⁹。

透過戰和人士的神化與妖魔化，以及士人頌揚、批評之詞，下文將進一步解析：天朝真的崩潰了嗎？

三、天朝真的崩潰了嗎？

部分學者將清朝在鴉片戰爭的挫敗，視為「天朝」崩潰的警鐘²¹⁰。以「倒

²⁰⁷ 謝蘭生，〈海疆紀事〉，《鴉片戰爭文學集》，上/193。

²⁰⁸ 李棠階(著)、穆易(校點)，《李文清公日記》(長沙：岳麓書社，2010)，436。

²⁰⁹ 蔣廷黻，〈琦善與鴉片戰爭〉，收入：汪朝光(主編)，《20世紀中華學術經典文庫·歷史學·中國近代史卷》(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0)，111-127。

²¹⁰ 此類研究當以茅海建教授《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一書最為重要，羅志田教授

放電影」觀之²¹¹，鴉片戰爭確實是清朝歷史發展的轉捩點，甚而是走向衰亡的起點。但如果回到歷史脈絡中，重新審視時人的評述與態度，清朝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後，又是何種面貌？「天朝」真的崩潰了嗎？

在討論士人眼中的天朝形象前，須先探究士人網絡所扮演的腳色及其影響。然梳理士人網絡誠非易事，且其成因甚為複雜，有依附於血緣姻親、同鄉情誼或科舉同年者，志同道合之士的互通聲氣，定期詩會、宴遊與各式節慶活動，均為士人間感情交流之形式。姚瑩自述，1804年後與李宗傳(1767-1840)、方東樹、馬瑞辰(1782-1853)、左朝第、方秉澄、徐璈(1779-1841)、光聰諧、張聰咸(1783-1814)、劉開(1784-1824)、姚全、胡方朔、姚幼樞(1785-1847)等多人，「以文章道義相切劘，吾所為左右採獲以取益者也」。此一網絡即以桐城地緣為核心，姚瑩與劉開坦言「吾黨之盛」、「吾黨之人才嘗盛矣」²¹²。郭儀霄在1834年後將黃爵滋上奏〈為綜核名實仰祈聖鑒事〉，視為振奮「吾黨」人心之一大快事²¹³。金安清的觀察指出：1835(道光15)年後，已隱然形成一個士人網絡，「一時文章議論，掉鞅京洛，宰執亦畏其鋒」。其中包括陳用光、程恩澤(1785-1837)、姚元之(1783-1852)、徐寶善、黃爵滋、朱琦、蘇廷魁、陳慶鏞、何紹基、吳嘉賓、梅曾亮、宗稷辰、孔繼鑠、潘德輿、臧紆青與張際亮等多人²¹⁴。

士人的背景以諫垣、侍郎、翰林與舉人等為核心，此輩議論時局，彈劾權貴，對內積極改革，對外採取強硬態度。1843年蘇廷魁上奏彈劾穆彰阿；

亦有相關書評。參閱：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5二版)；羅志田，〈“天朝”怎樣開始“崩潰”——鴉片戰爭的現代詮釋〉，《近代史研究》，3(北京，1999)：9-24。

²¹¹ 有關「倒放電影」的討論，參閱：羅志田，〈民國史研究的“倒放電影”傾向〉，《社會科學研究》，4(成都，1999)：104-106；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學》，14.4(臺北，2003.12)：182-184。

²¹² 姚瑩，〈吳子方遺文序〉，《東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1512/386；劉開，〈贈吳子方序〉，收入：劉開，《劉孟塗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65。

²¹³ 新村容子，〈1820-30年代北京の士大夫交流(II)——「黃爵滋サークル」から「清流党」へ——〉，《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53(岡山，2010.07)：47-79。

²¹⁴ 歐陽兆熊、金安清(撰)、謝興堯(點校)，《水窗春藝》，80。

陳慶鏞奏陳琦善、奕經和文蔚等人之過；蘇廷魁、陳慶鏞與朱琦三人被稱為「諫垣三直」，加上金應麟(1793-1852)為「四虎」²¹⁵。部分士人雖非位居諫垣之職對社會風俗亦多所批評，極思振作暮氣沉沉的風氣。魯一同謂：天下多「不激之氣」、「不化之習」，學術則多屬「不駭之論」、「不樹之幟」、「不高之牆」。社會上瀰漫著尸位素餐，苟且偷安的風氣²¹⁶。方東樹強調應致力化民正俗，嚴禁鴉片，嚴治吸食者，以嚴刑峻法遏阻士大夫，以達禁絕之效²¹⁷。

隨著鴉片戰爭漸趨白熱化，士人多持為國犧牲，以天下為己任的信念。前述關天培、葛雲飛、鄭國鴻、王錫朋與陳化成等殉難將士，均係如此。林則徐賦詩云，「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²¹⁸。姚瑩在殺俘冒功事件遭逮入都後，作書留別劉鴻翱慨言：世俗紛擾皆因執著功名富貴，輕鄙君臣道義。由於心無俗諦故可坦然面對，苟利國家社稷，身家性命皆在所不惜²¹⁹。惟滿腔熱忱仍不敵清宣宗息事寧人的態度，姚瑩、達洪阿上奏大捷時，清宣宗諭令嘉許，璞鼎查指稱係殺俘冒功時，仍對破夷一事言之鑿鑿。但在璞鼎查再三要求派員調查後，轉而重懲姚瑩、達洪阿，雖然姚瑩表示在奏報之初已據實以告，未有冒功之嫌，但清宣宗仍命其回京候審，是否有意將錯就錯？據姚永樸(1861-1939)所記，清宣宗歎曰：「豈我國不能有一勝仗耶？然不得已命逮訊」²²⁰。如堅信姚瑩等人破夷致勝，何需「不得已命逮訊？」是清宣宗深知國力不足，未敢挑起戰事？抑或示以寬大，急欲息事寧人？不論動機為何，均令士大夫寒心。

士人聚會冶遊時，仍不忘品評朝野大臣或國家大政。James Polachek教授認為此一「春禊圈子」士人，早在1820年代末期即以文學號召志同道合之士

²¹⁵ 陳康祺(撰)、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上/18。

²¹⁶ 魯一同，〈覆潘四農書〉，《魯通甫集》，21。

²¹⁷ 方東樹，〈化民正俗對〉，收入：方東樹，《攷槃集文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9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54-257。

²¹⁸ 林則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雲左山房詩鈔》，《續修四庫全書》，1512/332。

²¹⁹ 姚瑩，〈奉逮入都別劉中丞書〉，《東溟文後集》，《續修四庫全書》，1512/551。

²²⁰ 姚永樸，《舊聞隨筆》，186。

悄然興起²²¹。林則徐遣戍伊犁與姚瑩的殺俘冒功事件，更因網絡渲染成爲全國焦點。赴京候審或發配伊犁途中，受到各地官員熱情款待，張際亮更陪同姚瑩一路行抵北京，盡心奔走營救。雖然輿論的影響難以量化，但清宣宗似無法忽視此一強大力量。事發之初，清宣宗以雷霆之怒斥責林則徐、姚瑩：「無理！可惡！」，「一片胡言」，「欺飾冒功，情殊可惡！……殊屬辜負朕恩，自取罪戾」²²²。最終仍未判處重罪，姚瑩在入獄審訊後，加恩釋放。林則徐雖遭遣戍，伊犁將軍布彥泰待之如上賓，其後次第派任陝甘總督、陝西巡撫、雲貴總督等職。

士人聚會場所以陶然亭、法源寺、龍樹寺、報國寺、崇效寺、萬柳堂和楊繼盛故居松筠庵等地爲多。由於地近宣武門，且有名勝遺跡，成爲士人宴遊吟詠之所²²³。值得吾人注意的是，歐陽修(1007-1072)、蘇軾等人的生日，成爲士人酬唱詩詞之幾。如龔自珍在1823年和陳用光、吳嵩梁、朱方增、徐松、黃安濤、潘曾沂等人，於吳嵩梁寓所舉行詩會，紀念歐陽修生日。1836年梅曾亮、吳榮光(1773-1843)、潘錫恩(1787-1867)、祁寯藻與徐寶善等人，假蘇軾生日，賦詩唱和。林則徐在1842年與鄧廷楨、伊犁將軍、參贊等11人，在鄧廷楨雙硯齋作蘇軾生日會²²⁴。祁寯藻亦載及參與紀念蘇軾、歐陽修生日的活動，如1836年與程恩澤、吳榮光、潘錫恩、徐寶善等人，於蘇軾生日後，祭拜蘇軾，拜讀蘇軾詩集²²⁵。1857年，於歐陽修生日，與白恩佑(1812-?)、王拯在慈仁寺，

²²¹ James M. 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1992), 63-99.

²²² 參閱：來新夏(編著)，《林則徐年譜》，31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48/154。

²²³ 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25；震鈞，〈天咫偶聞〉(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477-484；趙雅麗，〈晚清京師南城政治文化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35-48。

²²⁴ 參閱：樊克政，〈龔自珍年譜考略〉(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223；梅曾亮，〈展東坡生日序〉，《柏枧山房詩文集》，421-422；林則徐，〈壬寅臘月十九日嶰筠前輩招諸同人集雙硯齋作坡公生日詩以紀之〉，《雲左山房詩鈔》，《續修四庫全書》，1512/336-337。

²²⁵ 祁寯藻，〈二十二日春海少司農招同吳荷屋、潘芸閣錫恩兩前輩、徐廉峰編修，集顯處視月齋拜坡公像補作生日，并觀荷屋先生所藏宋槧施、顧合注蘇詩本及《風篁圖》，以“一

向歐陽修遺像行禮致意，賦詩紀念歐陽修壽辰²²⁶。清初頗具爭議的顧炎武，亦在此時成爲士人祭祀對象。魯一同賦詩述及，1856年，與友人在報國寺祭祀顧炎武，並舉行展禊之會²²⁷。此類「顧祠祭」活動，其後持續達70年以上²²⁸。

在士人網絡連結下，益加深化士人的天朝意象。鴉片戰爭前皇帝和朝野士人均以天朝意識出發，評述中英交流。戰爭期間，士人始終懷抱天朝之姿，未曾因一時戰爭失利而動搖。戰爭結束，雙方簽署條約後，仍未減損士人對天朝的信心。士人認爲清廷戰敗乃非戰之罪。翻閱時人記述，士人議論多數傾向：中國應戰、可戰、能戰。加上有漢奸策應，英軍始能攻城掠地，故乃非戰之罪。若能廢黜穆彰阿、琦善與耆英等奸臣，由林則徐、陳化成、關天培與裕謙等勇將領導，擒殺漢奸，誘敵上岸，必能殲滅外夷。且英夷僅係荒外島夷，人數不滿萬餘且跋涉萬里，以天朝壯盛軍容，欲滅「跋浪么魔」，易如反掌。故嚴厲譴責「疆臣大帥，惜命如山，文吏武臣，畏犬如虎」，不顧國仇民怨，逕行割地賠款，比之南宋奸佞所爲更加可恨²²⁹。包括阮元、鄧廷楨、徐繼畲(1795-1873)、汪仲洋和朱琦等人，均認爲：英夷不擅陸戰，兩腿長且僵直，無法騰踊；眼畏日光，正午時不敢睜視。除巨砲外，別無長技，隨身配備之武器僅有小槍、短刀，與我軍擁有的排槍、弓箭和長矛等武器相比，遜色許多。加上地利優勢，英夷上岸後，不足畏懼²³⁰。當英軍攻陷定海，

曲鶴南飛”分韻得“鶴”字》，《祁寓藻集》，2/188-189。

²²⁶ 祁寓藻，〈歐陽文忠公生日，白蘭嶼、王少鶴招集慈仁寺拜公滁州遺像，分韻賦詩得“心”字〉，《祁寓藻集》，2/386-387。

²²⁷ 魯一同，〈四月三日同人祀顧亭林先生於報國寺遂為展禊之會賦五十韻〉，《魯通甫集》，283-284。

²²⁸ 有關顧祠祭與顧炎武在此時復活的相關研究討論，請參閱：James M. 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 205-235; 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間顧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臺北，2008.03): 63-93; 魏泉，〈士林交游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148-176。

²²⁹ 〈全粵義士義民公檄〉，收入：不著輯人，《廣東夷務事宜》，《鴉片戰爭》，3/354。

²³⁰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9/2826-2827; 鄧廷楨，〈鄧廷楨關於鴉片戰爭的書信·七〉，《鴉片戰爭》，2/588; 徐繼畲，〈致趙盤文明經謝石珊孝廉書〉，收入：白清才、

林則徐仍冀望重賞定海民眾能誅滅英夷。因英夷上岸後皆無技能，且「渾身裹纏，腰腿僵硬」，跌倒後無法站起，一名士兵可手刃數名夷人，尋常鄉民亦能斃其性命²³¹。

士人同時指陳清宣宗在鴉片戰爭中遭權臣蒙蔽，無法做出明智決斷，致使清朝未能戰勝夷敵。一首不知名作者的五言詩，充分傳達出此中信息。詩中盛讚林則徐，譽為不怕死，忠勇愛國，智退夷敵的將領，卻遭奸臣誣陷，遣戍伊犁。英夷連陷城池，忠勇將士為國喪生，皆因賣國臣蒙蔽聖君，無法瞭解實情。且奸相秉政，滿朝臣工盡皆阿諛逢迎之輩，無人上奏直諫，君待臣以禮，臣反欺心。其他重臣如潘世恩於國事置若罔聞，王鼎最終忠忿而死，難有作為²³²。

相似評述在詩文中屢見不鮮，如翁心存對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且奸人混跡感到憂心，深恐戰事難平，塗炭生靈。隨著戰事愈演愈烈，蔓延各省，翁心存憂懼諸多軍情真偽難辨，無法確實獲悉前線戰事發展。但翁心存的批評僅止於朝廷官員，斥責：「誰秉國成，遂令天下事至於如此耶」。或痛陳地方官吏「畏夷如虎」，虐民如囚²³³。從翁心存日記知其對「海國」相關知識略有涉獵，如閱楊炳南《海錄》，借閱《籌海圖編》，楊文蓀(1782-1853)贈《海錄》，見閱李曉園臨摹之《海防全圖》等。1849年祁寯藻贈以徐繼畲《瀛環志略》，翁心存將之與《海錄》和《海國圖志》相較²³⁴。但翁心存卻未因此對天朝地位有所動搖，在〈有感〉、〈秋日雜感〉諸詩中，依舊認為清宣宗寬以撫夷，

劉貫文(主編)，《徐繼畲集》，1(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5)，650-652；汪仲洋，〈庚子六月聞舟山警〉，《清詩紀事·嘉慶朝卷》，12/8344-8346；朱琦，〈感事〉，《怡志堂詩初編》，《續修四庫全書》，1530/159-160。

²³¹ 林則徐，〈密陳以重賞鼓勵定海民眾誅滅敵軍片〉，《林則徐集·奏稿》，中/861。

²³² 無名氏，〈五言詩〉，《鴉片戰爭文學集》，上/213-214。

²³³ 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2/476; 496; 537; 539。

²³⁴ 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2/424; 428; 435; 741；有關楊炳南《海錄》之相關討論，參閱：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安京(校釋)，《海錄校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黃順力，〈清代海商眼中的世界——《海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4(廈門，1996)：93-94。

並傳達出對天朝國勢的信心²³⁵。1845年恭慈皇太后(1776-1850)70大壽，翁心存記述城內外張燈結彩，薄海臚歡，猶是太平氣象²³⁶，完全感受不到鴉片戰爭挫敗後的低靡氛圍。陸嵩聽聞和議將成，心有所感賦詩云：英夷船堅砲利使東南半壁爲之傾圮，惟清宣宗念及蒼生，故與英議和，各級官員皆喜形於色。待夷船離去後，中外歡騰，謳歌海內太平²³⁷。尤有論者以爲：簽署和議後，都門旋即恢復昔日文恬武嬉的景象，海疆之事遂成禁忌。茶坊酒肆中，亦不准談論時事²³⁸。

但《澳門新聞紙》卻逕言：中國人皆以爲英夷僅擅長海戰，無法進行陸戰。嗣後，中國人將瞭解到自己的錯誤認知。報導更謂中國武備不堪一擊，係全天下最軟弱之武備。且中國人之言行率多自欺欺人，雖號稱有70萬大軍，卻僅有千餘人堪用，其餘盡皆烏合之衆²³⁹。日本人亦觀察到中國過於自信的危險，略云：二千餘年前，中國文化已燦然可觀，若能駸駸進步，不日即可追上歐美列強。然全中國卻無一洞察時勢者，墨守成規，愚頑倨傲，視外人皆爲蠻夷戎狄，不願向他人學習，致使病入膏肓，坐以待斃²⁴⁰。

由於對鴉片戰爭戰敗因素的錯誤認知，致使士人並未深入檢討究責。鴉片戰爭後士人對清朝的信心未必全面喪失，轉向注重內政、人心等議題。尤以戰後各地大小叛亂接踵而來，孟森形容：「道光之季，兩廣群盜如毛，廣西尤遍地皆匪」²⁴¹。士人於是暫時將夷務問題擱置一旁，將目光投注於內政。本文第五章將針對士人關注人心的面向進行討論。

²³⁵ 翁心存，〈有感〉、〈秋日雜感〉，《知止齋詩集》，《續修四庫全書》，1519/166-168。

²³⁶ 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2/585。

²³⁷ 陸嵩，〈聞和議有成夷船將出江去感而有作〉，《意苔山館詩稿》，《清代詩文集彙編》，570/624。

²³⁸ 不著撰人，《軟塵私議》，《鴉片戰爭》，5/529。

²³⁹ 不著編譯者，《澳門新聞紙》，《鴉片戰爭》，2/438-439;482。

²⁴⁰ 日本人(撰)、湯叡(譯)，《英人強賣鴉片記》，《鴉片戰爭》，6/198。

²⁴¹ 孟森，《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10)，346。

四、小結

本章環繞鴉片戰爭前後士人對涉外事務的清議與相關人物品藻，包括：士人的英國觀，鴉片戰爭的過程，戰敗咎責與頌揚死難將士等。從士人文字中略可歸納出相近記述，包括：對英夷個性的描繪，強調其犬夷之性，唯利是趨，僅恃奇計淫巧等。而有關鴉片戰爭的過程，士人著墨於主和人士誤國，漢奸誤事，英勇有能將士慘遭構陷，致使戰爭一再失利。戰爭下的黎民百姓，飽受夷匪侵擾，官兵迫害與災荒蹂躪，宛若人間煉獄。面對戰爭失利，士人往往將矛頭指向「承平日久」。此時「承平日久」變為負面評價，與昔往謳歌天下太平，重熙累洽的正面態度有顯著差異。士人紛紛指陳：因「承平日久」，故民不習兵，兵不習戰，猝然遇敵，兵民盡皆倉皇失措，爭相逃竄。漢奸亦被視為戰敗主因之一，但也有士人指陳大肆搜捕漢奸的行為，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濫殺無辜，任意誣陷他人等情形所在多有。頌揚死難將士形成風潮，士人藉由高聲讚譽英勇死難將士，表達支持戰爭的態度，冀期激發忠義之氣，喚醒抗夷精神。

延續頌揚死難將士的風潮，主戰人士被刻意神化。本文以林則徐獲罪遣戍與姚瑩殺俘冒功事件為例，縷述兩人赴京候審與遣戍伊犁，沿途士人送行盛況，其中不乏為之抱屈，堅信兩人為贏得戰爭勝利之倚恃。透過本章討論林則徐獲罪遣戍與姚瑩殺俘冒功事件，結合第三章洪亮吉因正言直諫而獲罪遣戍事件，清楚顯現士人網絡自嘉慶迄道光年間，漸趨緊密的發展。循此線索，將可發現，嘉道年間士人已逐漸擺脫清初以降的政治壓力，此前避之唯恐不及的政論話題，成為士人聚會的核心議題，凝聚共識，上奏皇帝，希冀引導士人輿論，左右國家政策方向。

主和人士的妖魔化，是另一股風潮，其中尤以穆彰阿、琦善兩人為甚。清文宗即位後特頒〈罪穆彰阿耆英諭〉，殆有推波助瀾之效，穆彰阿因而成為鴉片戰爭頭號戰犯。惟琦善的情形略有所異，儘管士人紛紛指斥鴉片戰爭

之害始於琦善主和，但清宣宗和清文宗均對琦善青眼有加，雖遭斥革，隨即官復原職，屢獲升遷，與士人的評價殊不相稱。

透過士人對戰和人物的神化與妖魔化，顯示士人面對涉外事務時，秉持強硬態度，要求朝廷不可讓步妥協。儘管鴉片戰爭失利，士人仍未感到挫敗，而以承平日久，漢奸誤國，奸臣當道等因素，解釋戰敗緣由。而信心之來源，乃士人濃烈的天朝想像。

從時人言論可知「天朝」形像依舊深植士人心中，普遍認為清朝可戰、能戰、應戰，且必然戰勝，但因權臣、庸臣與漢奸誤國，致使清朝戰敗，能臣獲罪，忠臣喪命。士人認為只需皇上聖明，懲治主和大臣，革除積弊，即可重振國威。士人多將夷務置於內政脈絡進行論述，認為內政事務處理好，夷務問題自然迎刃而解。魯一同云：「嚴懲官貪，痛核浮蠹，使普天臣庶蒸蒸向風，何虞醜夷黠狡難制！」²⁴²但安內之策為何？在士人議論內政弊病、夷務問題後，歸結出風俗人心淳化的解決之道。而士人提出何策略？本文第五章將對此進行分析與討論。

²⁴² 魯一同，〈與左君第四書〉，《魯通甫集》，371-372。

第五章 化民成俗與詩文救國

1879(光緒5)年，風聞駐英、駐法大使郭嵩燾即將回國返鄉，湖南長沙鄉紳得知消息後大為驚恐，交相指斥郭嵩燾是敗壞人心風俗的罪人。郭嵩燾乘船返抵長沙時，遭鄉紳強硬阻撓，堅持不准其乘坐輪船進入省河。郭嵩燾於是捨船登岸，僅崇星陔和夏獻雲(1824-1888)兩位官員到場迎接，巡撫以下官員皆未現身¹，略可說明一般士庶對沾染洋務之人的嫌惡態度。儘管郭嵩燾對洋務抱持正面態度，強調：正因國人不知洋務、拒談洋務，故爾釀成30年來之大變²。郭嵩燾致仕歸鄉後，並未如鄉紳們所憂心的大力推廣洋務，反而關切人心風俗之所向。

郭嵩燾返鄉後對湖南的人心風俗甚為失望，嘆曰：「各省人心風俗，尤以湖南為最壞」，並認同黃彭年(?-1890)所言：「道光以前風氣不如此，此由亂後各省避地湖南，集江、浙各省壞風氣而成」；「省城人心之深曲，不顧大局，而惟一念之私，盤結以求必遂，其端皆起自士大夫，而遂成為風俗」；「人心止各顧其私誼，無為大局起見者，此中國人心風俗所以日趨於偏私偷薄而不復可挽救也」³。郭嵩燾在與姚岳望討論洋務時，強調：實行洋務以追求富強，然富強必本於人心風俗。以今日之人心風俗，能否追求富強，尙需三思⁴。其

¹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3(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853-854。

²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3/862-863。

³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3/863; 889; 892。

⁴ 郭嵩燾，〈復姚彥嘉〉，收入：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4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61-263。

後，郭嵩燾致書李鴻章，論析何以礦務推展數十年仍無成效？其故乃在：「國家大計必先立其本，其見爲富彊之效者，末也。本者何？紀綱法度、人心風俗是也」⁵。因此，郭嵩燾認爲救治國家的重點，在人心風俗，而整頓人心風俗應從學校出發。

將時間拉回嘉道咸年間，在士人紛紛議論內政弊病、夷務問題後，指陳解決之道乃風俗人心的淳化。汪士鐸以史爲例說明天下治亂與人心風俗密切相關，謂「天下治亂生于人心，人心好惡根諸風俗」，並列舉斯時「禍變不銷，兵革不息」之十大因素：人滿爲患、將帥無人、求才之詔未急、官軍事事不如賊匪等⁶。孫鼎臣在《孫芝房侍講芻論》篇首開宗明義揭櫫：「人心者，風俗之本也。風俗者，治亂之源也」，痛斥人心風俗流失陷溺，皆肇因於漢學之盛。孫鼎臣將漢學比擬爲戰國之楊墨、晉宋之老莊，詳細闡釋學術與人心風俗的關係，且將治亂之源與人心風俗緊密結合。其後，孫鼎臣云今日大患在士氣不振，士氣乃國家之元氣，惟士氣非一蹴而得，需花費數十百年培養，方可略見成效。觀前明故事，明成祖(1360-1424)後，暴君、秕政、強敵、權臣近倖等交相侵擾，明朝仍未遽亡，端賴隆盛士氣，「骨鯁正色之臣，雖排斥誅鉏而不盡；忠肝赤心之士，雖放流戮辱而不衰。廷杖之血未乾，而昌言踵至；獄戶之尸方出，而讜謀復進」。此皆明太祖知士氣乃立國之本，故著意培植。清廷不明就裡，「徒見其末流之失，朋黨交訐」，以機權摧折士人之氣，力矯前明覆轍。當前「世道降而風俗衰，士不知名節之可貴久矣，天下氣靡然漸滅，不鼓舞激勸之，猶藉口明季之失以言爲忌，不可痛哉」⁷。無獨有偶，林昌彝在與溫訓(1787-1857)討論風俗轉移時，同樣指摘：清廷爲防範明末流弊而矯枉過正，形成無士氣、乏人才、士人不務學術、不敢議論時事

⁵ 郭嵩燾，〈致李傅相〉，《養知書屋文集》，《續修四庫全書》，1547/288-290。

⁶ 汪士鐸(著)、鄧之誠(輯錄)，《汪悔翁(士鐸)乙丙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105。

⁷ 孫鼎臣，〈論治一〉、〈論治四〉，《孫芝房侍講芻論》(咸豐十年五月刊于武昌節署，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卷1/1a-5a; 15a-17a。

弊病的風俗⁸。

1850年，廣西學政孫鏘鳴奏陳應：法祖制以振因循，久委任以專責成，厲風化以興人材，肅紀律以飭營伍，方能解決國家諸多弊病。孫鏘鳴在「厲風化以興人材」一條中指出，國家正急需經濟之士與氣節之士，而經濟與氣節皆出於學問。近來「士習空疏，鮮務實學，識見囿於卑近，利欲錮於人心，風俗日非，耻尚失所，以剛介為駭俗，以通脫為宜時，以隱忍為知幾，以謬誇為多事」，故人才日漸稀少。冀望皇帝「敦尚經術，獎勵名節，以風示天下」，風俗純，人心正，人才自然浮現⁹。

1828-1830年間，賀熙齡(1788-1846)出任湖北學政，為免士子沾染惡習，耽溺逸樂，特撰〈訓士文〉與諸生共勉。文中賀熙齡標舉正心術、端學術與正文體等三大端：心術正則行事正；士人應仔細研讀經史、朱子《小學》、《近思錄》等書，將其「逐字逐句向自己身心一一體貼」；文體正可發揚聖賢旨意，且「為文不過理氣法三者。理則周程張朱之理也，法則王唐歸翟之法也，氣則秦漢唐宋古文大家之氣也」¹⁰。細察賀熙齡所論實即以人心、學術與文體，為今日之藥石。

本章將探尋嘉道咸年間士人關懷時代之塗徑，從士人對人心風俗的觀察和對應之策切入，並聚焦士人對學術與文體的變革，以具體的書籍編纂為核心，析論士人如何透過選編詩文集傳達微言大義，轉化人心風俗。

⁸ 林昌彝，〈與溫伊初論轉移風俗書〉，收入：林昌彝(著)、王鎮遠、林虞生(標點)，《林昌彝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310-313。

⁹ 孫鏘鳴，〈應詔陳言疏〉，《孫鏘鳴集》，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2-5。

¹⁰ 賀熙齡，〈訓士文〉，收入：賀熙齡(撰)、雷樹德(校點)，《賀熙齡集》(長沙：岳麓書社，2010)，4-6。

一、整厲風俗與矯正人心

1741年清高宗頒授諭旨云：風俗人心係治國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之根源¹¹。清仁宗在1800年與1818年兩度頒發詔書，闡述因恭閱1741年清高宗諭旨，心有所感，進而強調：「自古國家長享太平，未有不加意於人心風俗者。而人心之所以正，風俗之所以醇，則繫乎政教之得失」，而化民成俗須上行下效，期望君臣同心協力，以達圖治求寧之效¹²。1813年清仁宗三復斯言：「治民之道，教化為先」¹³。

標舉人心風俗為治國首務乃清朝祖訓，1714(康熙53)年清聖祖有鑑於坊間小說淫辭，荒唐俚鄙之書泛濫，要求大小臣工議覆禁革之法，詔諭：「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為本，欲正人心，必崇尚經學，而嚴絕非聖之書，此不易之理也」¹⁴。1720(康熙59)年諸王大臣奏請舉行慶賀御極60年典禮，清聖祖以「人心風俗未盡淳，官箴政事未盡理」為由，謝絕相關慶賀典禮¹⁵。1726年清世宗諭曰：「朕宵旰勤勞，勵精圖治，諄諄以正人心、端風俗為首務。而欲人心風俗同歸於善，必先去其營求請託之私，而後可以成公平之化」¹⁶。舉凡涉及邪教妖言、盜賊匪類、士人結黨營私等，清世宗皆將其緊扣人心風俗，希冀群臣仰體聖意，實心任事，以求端正人心，移風易俗¹⁷。

1670(康熙9)年清聖祖為安定社會、教化人心，頒布16條聖諭¹⁸。其後各地

¹¹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二)》，10(北京：中華書局，1986)，146/1105-1107。

¹²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73/973-974；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五)》，32/350/619-620。

¹³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四)》，31/279/814-815。

¹⁴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6/258/552。

¹⁵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6/287/796。

¹⁶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一)》，7/49/734-735。

¹⁷ 見：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一)》，7/61/939；7/71/1060-1061；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二)》，8/82/81-82；8/86/145；8/87/171-174；8/93/246-248；8/107/413-414。

¹⁸ 16條聖諭，分別是：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

官員每逢初一、十五，需向地方士紳、百姓宣講聖諭內容。1724年清世宗進一步闡發16條聖諭，為每條聖諭撰寫600字左右的釋文，編為《聖諭廣訓》。《聖諭廣訓》頒布後，士人針對其內容，加以詮釋或撰述更為通俗的作品，以及改寫成適合當地的方言版本、滿文或蒙文本，以利推廣宣傳。1672_(康熙11)年浙江巡撫范承謨(1624-1676)刊行《上諭十六條直解》，為首部詮釋《聖諭廣訓》的著作；1681年梁延年編輯《聖諭像解》，全書以插圖為主，除以文字詮釋16條聖諭外，選取相關合適故事繪成圖像，加深民眾印象；1723年陝西鹽運分司王又樸(1681-1760)將16條聖諭翻譯為白話文，後人將之與16條聖諭和《聖諭廣訓》合刊為《聖諭廣訓衍》；咸同年間，另一部更淺白的著作《聖諭廣訓直解》，成為宣講聖諭的重要參考書籍¹⁹。

清仁宗和清宣宗不時要求各地大小官員，認真執行宣講《聖諭廣訓》，以整頓士習文風，導正日趨卑下的社會風俗，俾使百姓共知向善²⁰。除宣講《聖諭廣訓》外，地方官員並且頒布勸諭告示，冀期化民成俗。如張履將擔任江蘇省句容訓導頒諭文字編為《容山教事錄》，針對：士子品性、學術、

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善良、誠匿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見：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一)》，4/34/461。

¹⁹ 據周振鶴教授研究指出，《聖諭廣訓衍》和《聖諭廣訓直解》的差異，不僅在於白話文程度的高低而已，其中對於「孝」的詮釋，亦有明顯歧異。簡而言之，《聖諭廣訓直解》提倡、推廣的是「愚孝」，《聖諭廣訓衍》中並未出現類似觀念。加上《聖諭廣訓衍》未見咸豐朝以後的版本，而《聖諭廣訓直解》則未有道光朝之前的刊本。故周振鶴教授推斷：「在王朝鼎盛時期，還允許有王又樸根據皇帝意思發揮的那樣比較開明的孝道，太平天國革命發生以後，統治者更加認識到箝制兵民思想的緊迫性，《直解》的刊行恐怕是有意來代替《廣訓衍》的」。見：周振鶴，〈聖諭、《聖諭廣訓》及其相關的文化現象〉，收入：周振鶴(撰集)、顧美華(點校)，《聖諭廣訓：集解與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581-632；所引在607。

²⁰ 相關詔書，如：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一)》，28/56/733-734；28/68/912-913；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二)》，29/112/490-491；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四)》，31/272/698-699；31/279/814-815；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一)》，33/44/780-781；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五)》，37/269/134-135；37/327/1133-1134。

百姓風俗、禁演淫戲、禁止婦女觀看戲劇表演等，一一撰文訓示。李璋煜(1784-1857)和沈兆澐(1783-1876)在題序中，揭示化民成俗的重要性，並以崇經術、勵士品和成風俗為三大目標²¹。沈兆澐在詩中，屢屢表示：出任地方官員，當注重觀風整俗²²。久任地方要職的李璋煜與張履，均疊頒告示勸諭士人百姓。李璋煜，字方赤，山東諸城縣人，曾任江蘇鹽法道、廣東惠潮嘉道、浙江按察使、廣東按察使、廣東布政使和江蘇布政使等職，為政著重於改善地方風俗民情，端正士習文風。蘇廷魁為李璋煜《視已成事齋官書》題序時，盛讚李璋煜負有經世之才，「究患地方利病、人心風俗得失之由，以變化轉移為己責，大旨歸於明法興教，俾士民相勸勉而戒姑息」²³。李璋煜的勸諭告示內容鉅細靡遺，充分展現其關注士民各項生活細節，以端正人心風俗。

在李璋煜頒布的諸多告示中，以針對士習文風的勸諭內容為重要主軸。李璋煜在〈諄諭士民示〉詳細闡明為政理念與疊頒告示之苦心，自陳：凡與地方利弊，民生休戚相關之事，莫不認真訪察且隨即付諸實行，俾使官民無隔閡，不受胥吏阻撓，揭櫫治民之道首重教養，「使之崇禮義，抑貪詐，即為教」，「使之尚節儉，戒浮囂，即為養」。而有鑑於民間風俗華奢、被劫奪、好逸游與重利忘義，李璋煜倡導節靡費、勤緝捕、禁標廠和勸讀小學，期望紳耆商民仰體其求治之心，摯盼父老代為「訓誨其子弟，勸勉其鄉人」²⁴。在〈敦勉士民示〉中，李璋煜指出地方治理難易之緣由，肇因於「人心之日趨於利」，諸多亂象由此而生²⁵。依循李璋煜在〈諄諭士民示〉的內容，審視其他告示，發現其間確有脈絡可尋，相關告示內容多針對奢靡、盜匪、逸游

²¹ 張履，《容山教事錄》(清道光戊戌華陽精舍刊本，藏於臺灣大學圖書館)。

²² 如：沈兆澐，〈癸巳十一月受代赴蘇作〉、〈初蒞江甯題民事堂〉、〈再題民事堂用王梅溪韻〉、〈感宣和禁習詩賦事成五古一首〉，收入：沈兆澐，《織簾書屋詩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9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35-236; 241; 244。

²³ 蘇廷魁，〈序〉，收入：李璋煜，《視已成事齋官書》，收入：楊一凡、王旭(編)，《古代榜文告示彙存》，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165-170。

²⁴ 李璋煜，〈諄諭士民示〉，《視已成事齋官書》，《古代榜文告示彙存》，9/ 575-577。

²⁵ 李璋煜，〈敦勉士民示〉，《視已成事齋官書》，《古代榜文告示彙存》，9/ 553-554。

與重利等議題而發，治本之法則為勸讀詩書。

如針對漸趨奢靡的風俗，李璋煜在告示中，勸諭士民百姓於嫁娶喪葬與齋醮活動等，皆應黜奢崇儉，力挽頹風。並且明定相關禮制規定，要求民眾遵守。尤指揚州三大積習：競奢而不習儉、喜爭而不講讓、好虛而不務實，皆肇因於重利，李璋煜冀期士庶悔悟改過，革除積習²⁶。在治安方面，李璋煜呼籲匪徒自新認罪，告誡鄉紳毋得包庇犯罪族人，否則將連坐懲處。並密切關注任何可能形成的犯罪集團，如聚集於郊區或墳墓周遭的「天花會」，勸諭百姓不得入會，聚眾滋事²⁷。李璋煜留心觀察百姓生活惡習，勸諭戒除。任滿離開揚州時，李璋煜列舉：聚集茶館，惹事生非；習於華侈，競相仿效；婦女女紅不勤等，為揚州三大積習，勸諭士庶力圖改善²⁸。其他包括崇祀淫神、械鬪、殺生或輕生諸事，均廣加勸諭。甚至編為俚歌傳唱鄉里，以為勸戒惡習²⁹。民眾好訟，越級控訴之惡習，亦令李璋煜甚為頭痛，「捏控者不圖審，審則證佐集而虛情多露；唆訟者不欲結，結則怨畔消而需索無由，遂爾抗傳匿審，拖累無窮，于風俗民心大有關係」，故屢頒告示，冀期革除積習³⁰。針對江南地區頗為風行的梨園文化，李璋煜多有微詞，謂其內容淫穢，有傷

²⁶ 如：李璋煜，〈崇儉示〉、〈申明禮制示〉、〈剔除積習示〉、〈勸民崇儉示〉，《視已成事齋官書》，《古代榜文告示彙存》，9/183-192; 213-216; 639-640。

²⁷ 如：李璋煜，〈榜示惡人諭〉、〈榜惡人示〉、〈曉諭匪徒改行示〉、〈諄諭匪徒改行示〉、〈通飭嚴辦竊盜札〉、〈禁匪徒藉端勒索示〉、〈曉諭案犯吳章行等投首示〉、〈諄諭毋庇族匪示〉、〈嚴飭自新示〉、〈通飭清理監獄札〉、〈嚴拏搶竊兇詐匪徒示〉、〈諭渡船查捕盜匪示〉、〈禁天花會示〉、〈弭盜示〉，《視已成事齋官書》，《古代榜文告示彙存》，9/311-316; 347-349; 355-356; 365-366; 377-385; 387-388; 395-398; 555-556; 563; 579-581; 625-626; 635-636; 643-648。

²⁸ 李璋煜，〈揚俗三弊示〉，《視已成事齋官書》，《古代榜文告示彙存》，9/269-271。

²⁹ 李璋煜，〈禁殘殺物命示〉、〈勸民勿輕生示〉、〈再禁供奉邪神示〉、〈崇正黜邪示〉、〈通飭查辦尼菴示〉、〈禁止械鬪示〉、〈禁同族互鬪示〉、〈俚語勸民歌十六首〉、〈戒民俚語〉、〈曉諭愚民重生示〉，《視已成事齋官書》，《古代榜文告示彙存》，9/277-280; 307-310; 317-321; 357-361; 449-451; 453-454; 481-501; 629-630。

³⁰ 李璋煜，〈嚴拏訟棍示〉、〈禁越控示〉、〈勸諭息訟示〉、〈嚴禁刁訟示〉、〈訪拏訟棍衙蠹示〉，《視已成事齋官書》，《古代榜文告示彙存》，9/475-479; 601-603; 605-607; 649-650。

善良風俗，茶館內之彈唱盲詞小說，亦多邪淫，男女聚集於此，易生變亂。不肖人士在梨園茶館外賣淫拉客，傷風敗俗，故嚴厲禁絕奸媒勾串販賣，並灌輸婦女廉恥心和從一而終的名節觀。其他諸如搖攤聚賭，假借迎神花會活動和開設會廠，進行賭博或夜半出游等，皆貼告示勸諭，嚴加禁絕³¹。惟李璋煜認為治本之法，為熟讀聖賢書籍，即連根除匪徒之道，亦在「端蒙養、重師儒，鄉盡知書，士多習禮」。綜觀李璋煜勸諭士民熟讀詩書的告示，可看出其特別重視《孝經》，強調：「知髮膚之不敢毀傷而人惜死，知節用之足以奉養而人戒貪，蒙以養正，聖功之始基在此，風俗之轉移亦在此」。多篇告示，皆要求士民勤讀《孝經》，並頒布課讀章程，明定相關推廣，獎勵辦法，供百姓遵循³²。

陶澍、俞德淵和李彥章(1796-1836)等人，亦均重視地方風俗和士人習氣。如陶澍留心漕運、海運與票鹽等政務，告示中不乏相關勸諭內容，期望相關人員與百姓嚴格遵奉，萬勿以身試法³³。士習文風乃勸諭核心之一，陶澍對山西晉陽書院頒布告示：士習淳漓與否關乎民風，而化民成俗必先導正士習。今之士子即為明日官吏，冀望士子習勞耐苦、潔身自愛無背義趨利，以對抗日後繁重案牘和脂膏誘惑。其後，又對蘇州紫陽、正誼書院頒發告示，要求書院士子循名責實，刻苦立志，知恥植品，熟讀四書五經，戒除士人聚處一堂，互為標榜，陰相詆毀或逐遊嬉戲等惡習³⁴。陶澍藉由告示安撫被水

³¹ 李璋煜，〈禁奸媒串賣示〉、〈禁賭示〉、〈正風俗示〉、〈禁夜游示〉、〈申明城門夜禁示〉、〈禁花會示〉、〈禁尼僧代打花會示〉，《視已成事齋官書》，《古代榜文告示彙存》，9/ 281- 282; 291- 293; 295- 297; 299- 300; 303- 305; 503- 505; 507- 509。

³² 李璋煜，〈勸學示〉、〈潮郡訓蒙諸弊〉、〈勸讀孝經小學示〉、〈勸讀孝經示〉、〈勸讀孝經小學示〉、〈課讀孝經小學章程〉、〈諄諭勸學示〉、〈與紳士論治本書〉、〈責成勸學諭〉、〈示相江書院生童〉，《視已成事齋官書》，《古代榜文告示彙存》，9/ 519- 523; 525- 527; 529- 530; 533- 534; 537- 538; 545- 546; 551- 552; 569- 570。

³³ 陶澍，〈巡漕告示〉、〈籌辦海運曉諭沙船告示〉、〈票鹽由場局收垣發販章程告示〉、〈票鹽簡明章程告示〉、〈嚴禁沿途匪棍擾累票鹽示諭〉、〈嚴禁八灘等處票鹽轉尖入黃示諭〉，收入：陶澍，《陶文毅公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0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96- 599; 602- 603; 612- 617。

³⁴ 陶澍，〈山西晉陽書院告示〉、〈蘇州紫陽正誼兩書院告示〉，《陶文毅公全集》，《續

災民，要求災民切勿自甘惰廢，遷徙流離，官府允將盡心撫卹，禁絕不肖人士為害地方。呼籲紳商士民皆能發揮人溺己溺的態度，踴躍捐輸，賑濟災民³⁵。而俞德淵頒布〈諭江甯府諸生〉，剴切曉諭士子應遵守禮義，嚴禁興訟，以符國家期許。至於設立茶館、賭博和聚眾角力玩樂等，俞德淵皆以有礙人心風俗，危害社會秩序為由，諭示禁絕³⁶。

李彥章，字蘭卿，福建侯官人，歷任江西吉安府知府、江蘇常鎮道和山東鹽運使等職，工詩善書精鑒藏。任官期間，屢頒告示，內容以士習文風和勸農事為主。李彥章再三說明朝廷重農立場，希望農民勤於農事，遵循教導，維持善良風俗，並且「捐俸建亭，專為讀法勸農之所，隨時宣讀聖諭，體察民情」。李彥章頗為留意水利設施建設，勸導民眾開挖陂塘、井水，以備不時之需，平日則需勤於維護³⁷。與士習文風相關的勸諭告示，尤係李彥章重視的施政環節。注重培訓書院生童，禁絕考試舞弊，導正士子習氣或勸設義學等，李彥章皆剴切陳言，冀期轉化風尚。李彥章勸諭：「士為四民之首，一舉一動即關繫於風俗人心，朝廷於此求人才，鄉黨尤以此觀風氣」。然書院恒虛應故事，怠於進取，甚至牽連訟案，要求士子革除積習，端正志向，勤於治學。李彥章臚列書院諸生惡習，諭示禁絕：詐冒宜禁以徵實學，場規宜肅以崇體制，衣冠宜正以肅禮容，身心宜檢以勵氣節。為提倡地方文風，

修四庫全書》，1503/ 600- 602。

³⁵ 陶澍，〈安徽水災告示一道光三年〉、〈安徽水災告示二〉、〈安徽水災告示三〉、〈安徽水災告示四〉、〈安徽水災告示五〉、〈安徽水災告示六〉、〈沿江被水成災勸捐告示一道光十一年〉、〈沿江被水成災勸捐告示二〉、〈沿江被水成災勸捐告示三〉、〈三省水災勸捐告示道光十三年〉，《陶文毅公全集》，《續修四庫全書》，1503/ 603- 611。

³⁶ 俞德淵，〈諭江甯府諸生〉、〈禁添設茶館示〉、〈禁賭博示〉、〈禁機匠匪徒人等聚集滋事示〉，《默齋公牘》（道光庚子冬鐫，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卷下/ 16a- 23a; 26a- 28a。

³⁷ 李彥章，〈定期勸農示〉、〈勸農示〉、〈勸興水利示〉、〈定期勸農示道光七年〉、〈勸農示道光七年〉、〈賓州定期勸農示〉、〈賓州勸農示〉、〈示期勸農示道光八年三月〉、〈勸諭農民示道光八年三月〉、〈慶遠勸農示〉、〈慶遠府勸諭農民示〉，收入：李彥章，《潤經堂自治官書》，收入：楊一凡、王旭（編），《古代榜文告示彙存》，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31- 36; 51- 56; 69- 78; 89- 99; 119- 121; 127- 131; 141- 150。

李彥章出資興建陽明、西邕書院，勸諭士民廣設義學以興教化³⁸。

沈垚在士人勤頒勸諭告示的風氣下，於獲贈張履《容山教事錄》後，覆書云：諭帖告示之文體雖以至俗為佳，然「俗體尤當出以雅馴」，正如韓愈(768-824)所作案牘之文，「皆離奇簡奧，無一率易之筆」，姚燧(1238-1313)奉詔撰述之文，「皆淵雅得訓誥之遺時」。諭帖告示當「稟經酌雅，簡鍊整肅，無一苟者」，並「參以昌黎之變化，牧庵之駿厲，方不媿為儒者之言」。如銖兩未相稱，不宜輕易付梓，何如將刻印經費轉助貧士。沈垚指出乾嘉士人好刻詩集，時下士人好刻告示，在在凸顯世俗日趨卑下³⁹。其觀察固立言有本，但能刻印告示者，乃通過科考派任為官者，如沈垚一生困於舉業，僅能在詩文書信中發表議論。且告示內容針對特定地方事務所論，須兼顧通俗性，方能達其勸諭目的。士人在平日詩文書信中，對時下人心風俗有更為直接的記述。但人心風俗甚為抽象，既無實際具體樣貌，亦難準確感知量化，如龔自珍所云：「古人之世，儻而為今之世；今人之世，儻而為後之世；旋轉簸盪而不可已。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⁴⁰。為表達內心感受，士人運用各種方式，描繪人心日趨卑下，風俗愈漸涼薄之情狀。其中尤以奢靡重利之風，最為士人詬病。

嘉慶年間，洪亮吉上陳〈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已指出時下風俗日趨卑下，「士大夫漸不顧廉恥，百姓則不顧綱常」，奔競、好利之風由此而生⁴¹。在〈珥塘荆氏族譜序〉中，洪亮吉強調風俗美惡與士大夫息息

³⁸ 李彥章，〈觀風考試示〉、〈勸士示〉、〈考試嚴禁懷挾傳遞等弊示〉、〈定期考試兩書院生童示〉、〈勸諭多設義學示〉、〈郡試曉諭漢土各童生示〉、〈甄別兩書院生童示〉、〈調署慶遠府觀風示〉、〈慶遠府慶江書院課士示〉，《潤經堂自治官書》，《古代榜文告示彙存》，9/23-30; 37-49; 79-87; 115-118; 137-139; 151-152。

³⁹ 沈垚，〈與張淵甫〉，收入：沈垚，《落帆樓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463-464。

⁴⁰ 龔自珍，〈釋風〉，收入：龔自珍(著)、王佩誥(校)，《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128-129。

⁴¹ 洪亮吉，〈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收入：洪亮吉(撰)、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1(北京：中華書局，2001)，223-230。

相關，回顧東漢與西晉風俗，皆由士大夫致之。「治天下之有法，必自士大夫之各修其家法始。故觀一世之治亂，以風俗之媿惡卜之，觀風俗之媿惡，又以士大夫之家法修與不修為斷」。故洪亮吉將士大夫之家法，視為轉移風俗之器具⁴²。洪亮吉謂廉恥之士最為難得，並以東漢故事為例，強調「重廉恥之士，風俗所轉移也」，欲救今日「風俗之弊、性情之失」，捨重廉恥一途，別無他法⁴³。且視飲食衣服為風俗之本，因其皆為日常生活所需，過度斤斤計較於美食華服，將對社會造成極大負面影響，士人如能以身作則，擲節飲食衣服，不尚奢靡，庶可端正風俗⁴⁴。

林昌彝在論析魏晉風俗時云：「天下之大勢在人心，而天下之人心在風俗，風被於上，俗漸於下，其權在於朝廷之好尚」⁴⁵。其後，在與溫訓討論轉移風俗時，殆從歷史因革切入，剖析人心風俗之現況。林昌彝指摘：清廷為矯正前明弊病，卻矯枉過正，致使「大臣無權，而率於畏倖；臺諫不爭，而習為緘默」，舉世皆競逐於科第、貨財，遂成好諛嗜利之風俗，「惟嗜利，故自公卿至庶民，惟利之趨，無所不至；唯好諛，故下於上，階級一分，奔走趨承，有諂媚而無忠愛」。由於風俗關乎國家治亂至深且劇，「風俗正然後倫理明，倫理明然後忠義作，平居則皆知親其上，而不相欺負；臨難則皆知死其長，而無敢逃避」。欲正風俗，當興教化。在上位者能以身訓人、以身率人，必能感化公卿士庶。風俗淳厚方將有人才為國效力，此乃當前首要之務⁴⁶。管同(1780-1831)甚至建議裁減科舉各額，由於士人人數過多，一般民眾不知其故，「切齒痛恨，歸咎於士習之衰」。為今之計，應「寡取士，裁其額，遠其期」，士人少則愈顯尊貴，士風亦隨之轉變，國家養士之資增多，可減少士人為謀取財貨，「爭訟詐欺、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有益國計民生⁴⁷。

⁴² 洪亮吉，〈瑯塘荆氏族譜序〉，《洪亮吉集》，1/216-217。

⁴³ 洪亮吉，〈廉恥論〉，《洪亮吉集》，1/239-240。

⁴⁴ 洪亮吉，〈服食論〉，《洪亮吉集》，1/240-241。

⁴⁵ 林昌彝，〈魏晉風俗論〉，《林昌彝詩文集》，242-243。

⁴⁶ 林昌彝，〈與溫伊初論轉移風俗書〉，《林昌彝詩文集》，310-313。

⁴⁷ 管同，〈說士上〉、〈說士下〉，收入：管同，《因寄軒文二集》，收入：《續修四庫

沈垚在與友人信札中，談及寄居北京的經驗，言詞尖銳，「都下惟利爲最重」，「天下皆欺人之人，天下皆求利之人」，「今日風氣備有元成時之阿諛，大中時之輕薄，明昌貞祐時之苟且，海宇清晏而風俗如此，實有書契以來所未見」，「都下人物祇是無性情節，概今所以發靡騁之歎者，亦廉恥道喪、風俗頹敗故也」，「居都下六年，求一不愛財之人而未之遇」⁴⁸。宗稷辰形容當前風俗，「舉世混混焉，驚科目、致仕宦，而置理道於不談」⁴⁹。魯一同與左君談論時政，將問題歸咎於奢靡風俗與胥吏過多⁵⁰。在回覆潘德輿的信函中，魯一同指出：人事、人才與人心係天下三大患，其中尤以人心之患至關重大。邇來「文人無磅礴鬱積之浩氣，而徒有爭先討好之小識」與「趨名啗利之一念」，治本之法當從人心著手，人心正，則人才足、人事成，天下之事皆不足爲憂⁵¹。

重視人心風俗非獨嘉道年間之士人專有，即便像郭嵩燾者流，曾派駐西方國家，親眼見識西方世界的士人，返國後仍選擇以矯正人心風俗爲端正社會之法。郭嵩燾返回故里長沙後，積極參與教育事業，訓勉諸生：「今且問人心風俗何以日壞，其本源何在？在人心不肯向學而已」，道咸以降，「正氣日微，人心風俗亦愈益壞，無可改移」⁵²。

士人慨嘆人心風俗日壞之餘，也關注到缺乏轉移風俗的人才問題，甚至全面檢討人才是否符合當前社會需求。如朱鳳鳴從歷史經驗出發，指陳：「天下不患有難移之風，特患無移風之人」⁵³。1846年曾國藩在談論風俗與人才

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0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467-468。

⁴⁸ 沈垚，〈與張淵甫〉，《落帆樓文集》，《續修四庫全書》，1525/461; 462; 463; 465。

⁴⁹ 宗稷辰，〈送潘四丈東游序〉，收入：宗稷辰，《躬恥齋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7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17。

⁵⁰ 魯一同，〈與左君第二書〉，收入：魯一同(著)、郝潤華(編校)，《魯通甫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27-30。

⁵¹ 魯一同，〈覆潘四農丈書〉，《魯通甫集》，363-365。

⁵²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4/205；汪榮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339-354。

⁵³ 朱鳳鳴，〈世變風移〉，收入：朱鳳鳴，《尚書題論》(族弟錦雲刊本，光緒玖年癸未新

時，強烈凸顯人心的主導能力，認為「一二人之心之所嚮」，即可轉化風俗之厚薄。因「撓萬物者莫疾於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⁵⁴。孫鼎臣同樣強調：「天下之不治，非無法之過，無人才之過也」，且人才之所出，端視所教之學和所取之法。故建議將當今急務，禮樂兵刑，財賦河渠與邊塞之事，立為專學，選取有才之士，以備國用⁵⁵。魏源所論更直指士人之病：士人咸以農桑為俗務，政事為粗才，好言玄虛之理，不知「俗學之病人更甚于俗吏」，「腐儒之無用亦同于異端」。若錢穀簿書不可為學問，浮藻餽釘即可為聖學？釋老之學不能治國家天下，心性迂談即可治理乎？⁵⁶沈垚的批評亦不遑多讓，嚴詞抨擊時下讀書人僅知小學與金石之學的皮毛，竟敢號稱通儒。不知小學乃治經門戶，金石唯證史之一端。又或略窺語錄未讀經史；東鈔西撮之考證學家自謂淹雅，「竟無一章一句之貫通」；「最下者，文理不通，虛字不順，而秦權漢瓦晉甓唐碑撮拾瑣屑，自謂考據金石，心極貪鄙，行如盜竊」。甚至認為清人學問遠遜明人，雖能詳細考辨手指紋路，指甲厚薄長短，卻無法辨識手足，遑論人體全貌。不若明人於細節雖有窒礙，卻能「心體通明」，「宰世應物」，為官亦多有實政。沈垚對科舉考試殆已喪失信心，逕謂：唯有賄賂一途，方能金榜題名⁵⁷。龔自珍、曾國藩與陳康祺等人，皆痛陳嘉道以降，科舉考試只看重書法工拙與否的弊病⁵⁸。陳澧亦批評科舉無法拔擢符合時代所需人才，指摘「天下人才敗壞，大半由於舉業」，「文章之弊，至時文而極，時文之弊，至今日而極」，考官為防止士人抄襲舊文，遂肆意割裂經書，「題不成題，文不成文」。且士人對「諸經先儒之注疏，

鐫，藏於日本東洋文庫），40a-41a。

⁵⁴ 曾國藩，〈原才〉，收入：曾國藩（著）、王澧華（校點），《曾國藩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96-197。

⁵⁵ 孫鼎臣，〈論治三〉，《孫芝房侍講芻論》，卷1/10a-14a。

⁵⁶ 魏源，〈默觚下·治篇一〉，收入：魏源（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魏源集》，上（北京：中華書局，2009三版），35-38。

⁵⁷ 沈垚，〈與張淵甫〉，《落帆樓文集》，《續修四庫全書》，1525/461；464-465；467。

⁵⁸ 相關討論，可參閱：劉俊起，〈清代中晚期科舉考試偏重書法風氣之考察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

諸史治亂興亡之事蹟，茫然不知，而可以取科名、得官職」，將如何為治？應略改科舉之法，「以能援據諸儒之說、引證諸史之事者為上」，開讀書風氣，使「經史之學盛，文章之道昌，如是，士習醇而人才出矣」⁵⁹。1866年郭嵩燾與丁日昌(1823-1882)綜論時勢，大膽評析：「乾嘉以前，人才盛矣。而時際承平，雍容文酒而已有餘，雖才無所表現。道光以後，則直相與釀亂而已矣，人才實不多見」⁶⁰。

魏源、沈垚、陳澧與孫鼎臣等人強烈批評嘉道以降的學術風氣、科舉弊病與人才荒等現象，文字中雖略有怨懟之氣，惟所論不無見的。正因有此不滿之氣，故除有部分士人另闢蹊徑，鑽研河渠漕運、財賦幣制與西北史地之學，回應國家急務外，亦出現理學復興運動，以唐鑑、倭仁、吳廷棟、曾國藩、李棠階與何桂珍等人為核心，身體力行，服膺理學思想。曾國藩六弟曾國華(1822-1858)，卻憂心此一理學團體有漸成朋黨之嫌⁶¹，略可佐證曾國藩等人往來之頻繁。在唐鑑帶領下，除研讀理學家著述外，平日奉行嚴格理學生活，如每日撰寫日記，省思已過；與師友互相校讀日記，「諸友會課，皆已到，互看日錄，對坐收斂」⁶²。與倭仁過從甚密的吳廷棟，逕言「世運之轉移在人材，而人材之奮興關乎風俗，風俗之盛衰繫乎人心，人心之邪正由於學術」，明確將世運、人才、風俗、人心與學術，相互連結⁶³。何桂珍則闡明「天下之治亂視乎人心之邪正，而實係乎學術之純疵」的道理⁶⁴。故唐鑑、倭仁、

⁵⁹ 陳澧，〈科場議一〉、〈科場議二〉、〈科場議三〉、〈與胡伯蓊書〉，收入：陳澧，《東塾集》，收入：陳澧(著)、黃國聲(主編)，《陳澧集》，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77-82; 175。

⁶⁰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2/370。

⁶¹ 曾國藩，〈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收入：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長沙：岳麓書社，1985)，54。

⁶² 李棠階(著)、穆易(校點)，《李文清公日記》(長沙：岳麓書社，2010)，203。

⁶³ 吳廷棟，〈復洪琴西孝廉書壬戌〉，收入：吳廷棟，《拙修集》(同治10年六安求我齋刊，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室)，卷9/29b。

⁶⁴ 何桂珍，〈進呈訓蒙千字文疏〉，收入：何桂珍，《何文貞公遺書》(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73-78。

吳廷棟、何桂珍與李棠階等學者，倡議崇尚正學風氣，冀期轉移人心和士習文風，因應時局挑戰⁶⁵。

已出仕士人藉由刊刻勸諭告示的實際行動，作為整厲風俗與矯正人心的方法。未出仕的士人則透過師友網絡相互規勸、砥礪，強調以身作則，從端正自我心術開始，進而在詩詞文章，牧民為政上有所貢獻。藉詩文書信抒發心得，在師友網絡中形成一股風潮。尤有甚者，則積極纂輯詩文，以宣揚理念，擴大影響力。

二、文以載道與經世思潮

1847年梅曾亮覆書朱履云：「竊以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吾言於此，雖其事之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故撰文與為官皆需應世而變，因時制宜⁶⁶。沈垚與張履信札則指陳：學術與時運密切相關，並慨嘆今日「學術之衰，人心之壞」已極，「天下皆欺人之人，天下皆求利之人」⁶⁷。李棠階認為：今日之學者不務孝弟、為仁，僅追求裝綴時文，富貴聞達，巧言令色以悅人。出仕後只求滿足一己私欲，致使民不聊生，「盡逼成大亂景象，不盡驅民為賊不止」。凡此種種，「要皆由學

⁶⁵ 有關理學思想的後續發展，相關研究討論，請參閱：Mary Clabaugh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中譯本：房德鄰(等譯)，《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史革新，*《晚清理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李細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李細珠，〈倭仁與道咸同時期的理學〉，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思想家與近代中國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58-90；龔書鐸(主編)、張昭軍(著)，*《清代理學史》*，下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112-195。

⁶⁶ 梅曾亮，〈答朱丹木書〉，收入：梅曾亮(著)、彭國忠、胡曉明(校點)，*《柏硯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7-38。

⁶⁷ 沈垚，〈與張淵甫〉，*《落帆樓文集》*，《續修四庫全書》，1525/462。

術之誤至此」⁶⁸。陳澧將天下治亂，歸咎於士習文風，指斥「天下亂由於學術衰，學術衰由於懶讀書，懶讀書，亂天下矣」，故「救世事之亂，尤必須學問」⁶⁹。溫訓亦有相近論述：「天下之治亂生于人心，人心之邪正由于道術，道術不一則人心邪」⁷⁰。魯一同為潘德輿撰述行狀，追憶其治學宗旨「以為挽回世運莫切於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經術，其用在有剛直之氣，以起人心之痼疾，而振作一時之頑懦鄙薄，以復於古」⁷¹。1872(同治11)年林昌彝為劉存仁《岷雲樓文鈔》題序，將文章與世運盛衰相結合，強調文章的理與氣至關重要，文體可變，然理與氣不可變，故盛讚劉存仁之文頗有韓愈古文遺風，「是能得理與氣之精，而具真雅真潔者也」⁷²。

透過上述士人言論，清楚呈顯士人將世運盛衰寄託於文章的想法，深信傳布文章可轉化風俗，振起世運。欲倡導經世思潮，則纂輯經世文章；欲推廣忠孝節義精神，則編纂忠孝人物之文集，刊而廣布，可令讀者心嚮往之。相較於歷代，清廷官方或私人編選歷史文獻總集和時人文集的數量，遠甚各朝，包括《全唐文》、《全唐詩》、《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嚴可均編選《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李祖陶(1776-1858)纂輯《國朝文錄》、朱珔(1769-1850)選輯《國朝古文彙鈔》、曾燠輯錄《國朝駢體正宗》等。甚至從《永樂大典》輯出亡佚之書，如徐松(1781-1848)輯出《宋會要》、《宋中興禮書》和《中興禮書續編》等⁷³。凡此種種，略可透露士人對纂輯書刊的喜好程度。編

⁶⁸ 李棠階(著)、穆易(校點)，《李文清公日記》，874。

⁶⁹ 陳澧，〈與黃理厓書〉、〈與桂皓庭書(十七)〉，《東塾集》，《陳澧集》，1/164-165；433；陳澧(著)、黃國聲(選錄)，《東塾讀書論學札記》，《陳澧集》，2/376。

⁷⁰ 溫訓，〈訖邪〉，收入：溫訓，《登雲山房文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6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6-68；所引在66。

⁷¹ 魯一同，〈安徽候補知縣鄉賢潘先生行狀〉，《魯通甫集》，160-164。

⁷² 林昌彝，〈序〉，收入：劉存仁，《岷雲樓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02。

⁷³ 有關《永樂大典》的相關研究，參閱：顧力仁，《永樂大典及其輯佚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再版)；張金梁，〈《永樂大典》纂修人研究〉，《文獻》，1(北京，2009.01)：128-138；張升，《《永樂大典》流傳與輯佚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而有關清代士人輯佚書籍的研究討論，可參閱：胡喜云、王磊，〈清代輯佚

纂者在不同時代氛圍，修纂刊布書籍，或重新編選、組合收錄文章，皆有特定意涵。如顧炎武《日知錄》不同版本的刪改情形，自章太炎(1869-1936)提出質疑後，長期受到學者關注⁷⁴。下文將以賀長齡纂輯《皇朝經世文編》，經世文章的浮現與復活，以及「士大夫之學」的動態形塑為例，說明士人如何運用編纂文集，傳達文以載道的理念。

(一) 賀長齡、魏源與《皇朝經世文編》

爲因應明代中晚期以降的時代變局，自嘉靖年間開始，士人紛紛纂輯時人奏疏或議論文章，冀期裨於實用。如張瀚(1511-1593)《皇明疏議輯略》、張鹵(1523-1598)《皇明嘉隆疏抄》、萬表(1498-1556)《皇明經濟文錄》、馮應京(1555-1606)《經世實用編》等。1638(崇禎11)年陳子龍(1608-1647)、徐孚遠(1599-1665)、宋徵璧(1602-1672)編輯《皇明經世文編》，正文504卷，補遺4卷，總計收文逾3,000餘篇，將奏疏與文章合而爲一。多篇序文均敘及《皇明經世文編》是爲彌補時人知古不知今的盲點，以爲當前經世濟民之藥方⁷⁵。

清初經世思想雖稍略頓挫，卻未曾消逝。黃克武教授的研究揭示：經世

學研究綜述》，《圖書與情報》，1(蘭州，2009): 136-140；郭國慶，〈輯佚與清代圖書編纂〉，《江西圖書館學刊》，40.3(南昌，2010.08): 118-121。

⁷⁴ 相關《日知錄》版本內容的刪改問題，可參閱：章太炎，〈序一〉，收入：黃侃、張繼(同校)，《日知錄校記》(臺北：崔震華，1955再版)，1-2；陳雪云，〈清廷毀書的罪證——論河南省圖書館館藏四庫全書《日知錄》《明文海》抽毀本的價值〉，《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23(天津，2004): 50-52；周新鳳，〈《日知錄》文淵閣本抽毀稿解析〉，《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30(天津，2005): 52-53；張京華，〈前言〉，收入：顧炎武(著)、張京華(校釋)，《日知錄校釋》，上(長沙：岳麓書社，2011)，10-18。

⁷⁵ 如：張國維，〈序〉，收入：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22(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7-11；張溥，〈序〉，《皇明經世文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22/22-25；馮明玠，〈序〉，《皇明經世文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22/30-34；陳子龍，〈序〉，《皇明經世文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22/38-42。相關討論，可參閱：楊豔秋，〈明代後期的“經世文”彙編〉，《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聊城，2005): 42-45; 52；區志堅，〈從明人編著經世文編略探明代經世思想的涵義——兼論近人對經世思想之研究〉，《中國文化研究》，23(北京，1999春): 92-99。

思想有如伏流般，深潛士人心中，並非平地一聲雷驟然出現，即使在乾隆年間，國勢正盛，觀察敏銳的士人陸燿(1723-1785)，仍冀望匡俗濟時。1776(乾隆41)年山東按察使陸燿蒐羅清初以降400餘篇文章，分成12項類目，共30卷，輯成《切問齋文鈔》。其特點在：分類方式迥異《皇明經世文編》以人繫文的方式，較能清楚呈現編者的關懷核心。而陸燿以理學精神為主，對考據和詞章之學有所評駁，凸顯調適和轉化趨向，作為經世思想的主軸⁷⁶。道光年間李棠階猶多次翻閱《切問齋文鈔》，略可說明其影響深遠⁷⁷。

延續《切問齋文鈔》的經世思想⁷⁸，1826年賀長齡委託魏源編纂《皇朝經世文編》，翌年告成印行。《皇朝經世文編》收錄2,241篇文章，分為八大綱，共63項細目，總計120卷，可謂卷帙浩繁。魏源在序文中，以「事必本夫心」、「法必本於人」、「今必本夫古」與「物必本夫我」，揭櫫選纂經世文編的意涵⁷⁹。魏源闡釋纂輯五大原則，「審取」強調學術係全編綱領，故置於首位，縷言應留意時勢變遷，僅選取切中時弊，當務之急的議論，以供參酌。「廣存」說明係採集思廣益，毋加偏廢之旨。「條理」則表明是編排比，冀期綱舉目張，事繁理蹟，收觸類旁通之效。「編校」強調收錄之作，殆皆取其經世之益，以求救時。「未刻」則可窺知魏源經世思想體系，除纂輯《皇朝經世文編》，尚擬選編《會典提綱》、《皇輿圖表》、《職官因革》與《明代經世》等書，包含制度、地理與借鏡前明得失等，以期「自葉流根，循源達渤，質之往古如貫串，措之當世若指掌」。魏源進一步說明：「欲識濟時之要務，須通當代之典章；欲通當代之典章，必考屢朝之方策」，舉凡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水利農工等，均應明其流變，庶能詳知病徵，對症下藥⁸⁰。

⁷⁶ 有關《切問齋文鈔》的研究討論，可參閱：黃克武，〈理學與經世——清初「切問齋文鈔」學術立場之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6(臺北，1987.06): 37-65。

⁷⁷ 如：李棠階(著)、穆易(校點)，《李文清公日記》，85; 87。

⁷⁸ 有關《皇朝經世文編》延續《切問齋文鈔》的研究討論，見：龔來國〈清“經世文編”研究——以編纂學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4)，23-24。

⁷⁹ 魏源，〈皇朝經世文編敘〉，《魏源集》，上/156-158。

⁸⁰ 魏源，〈皇朝經世文編五例〉，《魏源集》，上/158-161。

《皇朝經世文編》的編目方式與《切問齋文鈔》相近，卻又不盡相同。《皇朝經世文編》分爲學術、治體、吏政、戶政、禮政、兵政、刑政與工政等八大綱。綱下再細分各項類目，共63項。因魏源強調「萬事莫備于六官」，故以吏戶禮兵刑工爲綱，概括實務涉及之經世內容。此種編目方式或許受到《大清會典》影響，從魏源闡述典章制度的重要性，以及擬纂《會典提綱》，略可說明兩者的關連性⁸¹。曾國藩在自述學術脈絡時，將《大清會典》與《皇朝經世文編》視爲經濟之學的入門書，或可佐證時人對這兩部書的觀感⁸²。

魏源在完成《皇朝經世文編》後，「念今昔病藥之相沿，常以對治而益著」，於1837年另行纂輯《明代食兵二政錄》，收錄前明食政，如理財、養民、賦役、稅課、荒政與鹽法等，計13類；以及兵政，如兵制、京營、屯餉、茶馬、防守九邊形勢、西南土司與盜賊等，計24類，共78卷。清初諸帝率皆以明爲鑑，力矯前明之失，以爲治國之策。值此多事之秋，面對諸多前代所無之弊，如河患、河費；貨幣漏海外，漕漕日敝，官民以此日困；科舉以聲韻訓詁相高，翰林以書藝工敏，部曹以胥吏案例爲才，舉天下人才盡出於無用之途。魏源認爲參酌前明得失，尋求爲治之法，不失爲解決之道，並指出明代之得在「清仕途，培士氣」，儘管太監亂政，大兵大役加派於民，北韃南倭疊相侵擾，國仍存不遽亡，略有指摘當前弊病，警惕士人之意⁸³。1842年魏源爲湖北省崇陽縣知縣師長治撰寫墓誌銘時，猶自強調國家大政係食與戎⁸⁴。

從《皇朝經世文編》及其擬編書目，加上《明代食兵二政錄》，在在顯示魏源希望藉由輯錄前明與本朝文章，尋求救治時弊之藥石。而賀長齡的確將《皇朝經世文編》視爲解決現實社會弊病的參考書，如與蔣攸銛議論治理

⁸¹ 相關討論，參閱：百瀨弘，〈大清會典の編纂に関する一考察〉、〈清末の經世文編に就いて〉，收入：百瀨弘，《明清社会經濟史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80），187-203。

⁸² 曾國藩，〈求闕齋日記類鈔〉，收入：李翰章（編纂）、李鴻章（校勘）、寧波（等校注），《足本曾文正公全集》，8（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4873-4874。

⁸³ 魏源，〈明代食兵二政錄敘〉，《魏源集》，上/161-166。

⁸⁴ 魏源，〈湖北崇陽縣知縣師君墓誌銘〉，《魏源集》，上/338-340。

水利相關事務時，提及曾在文編中讀過相關對策，或可酌參⁸⁵。《皇朝經世文編》刊行後，翻刻與續纂者所在多有，引發士人共鳴，掀起經世風潮⁸⁶。

(二)經世文章的浮現與復活

清中葉以降，除大型經世文章彙編外，士人持續以各種方式提倡經世思想，冀期實踐移風易俗之想望，尤以刊刻晚明文集，宣揚經世思想和忠義精神，以及撰述切中時弊之文，為重要途徑。下文將以黃汝成(1799-1837)、顧沅、潘錫恩、包世臣與孫鼎臣等人為例，進行說明。

黃汝成，字庸玉，太倉嘉定人。幼承家學，「器局瓌偉而才識敏達善讀書」。14歲已博涉能文，20歲為縣學稟膳生，益有文名，凡天文輿地、歷律訓詁、水利河渠、漕運賦稅、鹽鐵錢幣等，均多所涉獵。好友毛嶽生(1791-1841)惜其未能顯達，見用於世，39歲即驟逝。黃汝成曾議敘得通判銜，後入費為縣學官，選為安徽泗州直隸州訓導，以丁憂未能赴任⁸⁷。黃汝成遺著除《袖海樓文錄》6卷外，用力精深者，當為集釋顧炎武《日知錄》，校補戴震(1724-1777)《古今歲時考》和錢大昕(1728-1804)《古今朔時考》。其治學途徑雖近漢學考證之路，然文錄中所存文字，「於當世得失，鄉國利病尤考之詳而論之切，慨然思有所表樹以自顯於世而濟於物」⁸⁸，略可說明黃汝成借考證以發揚經世

⁸⁵ 賀長齡，〈上蔣礪堂節相書〉，收入：賀長齡，《耐菴文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29-430。

⁸⁶ 有關《皇朝經世文編》引發的風潮，相關討論，可參閱：沈豔，〈晚清經世文編現象的歷史文化透視〉，《江漢論壇》，1(武漢，2000)：58-62；沈豔，〈晚清經世文編的文化特色與文化本質〉，《清史研究》，1(北京，2000)：69-74；沈豔，〈晚清獨特的文化景觀——經世文編的相與賡續〉，《孔孟學報》，78(臺北，2000.09)：321-344；沈豔，〈近代“經世文編”賡續潮流述論〉，《史學月刊》，3(開封，2004)：108-115；沈豔，〈試論近代續“經世文編”文化熱潮的成因〉，《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2.4(武漢，2005.07)：489-492；李鵬程，〈晚清“經世文編”現象研究〉，《中州學刊》，151(鄭州，2006.01)：182-185。

⁸⁷ 有關黃汝成的生平，見：李兆洛，〈家傳〉，收入：黃汝成，《袖海樓雜著》(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1a-2b；毛嶽生，〈墓誌銘〉，《袖海樓雜著》，1a-2b。

⁸⁸ 蔣彤，〈文錄序〉，《袖海樓雜著》，1a-2a。

之微意。

黃汝成集釋《日知錄》前，已有閻若璩(1636-1704)、李光地(1642-1718)、惠棟(1697-1758)、莊存與(1719-1788)、全祖望(1705-1755)、王鳴盛(1722-1797)與趙翼(1727-1814)等人，爲之注疏補錄。學者多著重闡揚顧炎武考經證史的功力，如閻若璩針對《日知錄》涉及上古、漢唐制度，經史禮樂等內容略事補正⁸⁹。但與顧炎武立志撰述《日知錄》的本意，「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撥亂滌汙，法古用夏，啓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大相逕庭⁹⁰。

1834年黃汝成集釋《日知錄》之初衷迥異前賢，在答覆李兆洛書信中坦言：近來喜好顧炎武《日知錄》，「以其書于經術文史、淵微治忽，以及兵刑、賦稅、田畝、職官、選舉、錢幣、鹽鐵、權量、河渠、漕運與他事物繁蹟者，皆具體要」⁹¹。在《日知錄集釋》序文中，黃汝成指斥當前流行的考證學風，讚揚顧炎武撰述《日知錄》，能會通經史載錄之微言大義與良法善政，並探明禮樂德刑本源，質文否泰之遷嬗，「凡關家國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變之道，詞尤切至明白。其餘考辨，亦極賅洽」。黃汝成以1695(康熙34)年潘耒(1646-1708)刻本爲底本，綜合閻若璩、沈彤(1688-1752)、楊寧與錢大昕四家校本，一一校釋，編爲《日知錄集釋》，計32卷。序文末黃汝成再三強調，顧炎武「負經世之志，著資治之書」，且留心時務，遂撰成《日知錄》。儘管世嬗歲遷，然「論治體要道，經術文章，器識雖殊，穿并則一」⁹²。黃汝成表明集釋《日知錄》係爲經世致用，欲參酌顧炎武之論，以爲今日藥石。

1835年黃汝成因覓得《日知錄》原寫本，與潘耒刻本詳加比對，辨證異

⁸⁹ 參閱：閻若璩(撰)、吳玉搢(編)，《潛邱劄記》，收入：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5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494-506。

⁹⁰ 顧炎武，〈又與人書二十五〉、〈又與楊雪臣書〉，收入：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樂保羣、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

⁹¹ 黃汝成，〈答李先生申者書〉，《袖海樓雜著》，文錄四/2a-3b。

⁹² 黃汝成，〈黃汝成劄〉，《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1-9。

同，得700餘條，撰成《日知錄刊誤》2卷。1836年又以嘉興陸筠(1647-1708)精校本與《日知錄集釋》校訂，編為《日知錄續刊誤》2卷。黃汝成自陳孜孜矻矻於訪求刻本，校訂刊誤，乃為使《日知錄集釋》臻於完善，「可傳信于天下後世者也」⁹³。

道光以降，士人刊刻明人文集，宣揚節義精神；再現明人忠勇愛國故事，激發民眾攘夷之氣。1840年因英夷侵擾定海、吳淞江，葛雲飛與楊慶恩先後死節，宗稷辰於宣武門外建「正氣閣」，崇祀倪元璐(1593-1644)、施邦曜(1585-1644)與周鳳翔(?-1644)等11名前明忠義志士，並同祀葛雲飛與楊慶恩。翌年春天，宗稷辰邀集陳慶鏞、梅曾亮、朱琦、何紹基、孫鼎臣、趙振祚與邵懿辰等人，祀於正氣閣，宣揚正氣精神⁹⁴。1846年梅曾亮撰〈正氣閣記〉，強調忠義正氣亙古常新，無分前明或本朝事例，均堪為典範⁹⁵。

1843年與1848年，顧沅、潘錫恩皆以正氣為名，次第輯刊《乾坤正氣集》。顧沅，字澧蘭，號湘舟，蘇州人，不求仕進，不以科學之學為學，然頗受陶澍、林則徐等人賞識。1843年，顧沅蒐羅商周以降及至晚明數百家忠義之士的詩作，刊刻印行。王鑾在序文中強調：士人應「蒐輯舊聞，激揚名教，發潛德，闡幽光，以正人心，以勵風俗」，是書「警昏矇，興豪傑，扶世教，揚風雅，其功豈淺鮮哉」⁹⁶。陳鑾(1786-1839)題序列舉史上多位捨身取義的仁人志士，褒揚其行，稱許顧沅《乾坤正氣集》之輯，大有益於人心⁹⁷。祁寯藻同樣讚揚顧沅輯錄商周以來忠臣義士之詩，有裨名教⁹⁸。略可說明士人值此板蕩之際，希冀藉由忠義之氣以振奮人心的想望。考察顧沅輯錄之前明士

⁹³ 黃汝成，〈日知錄彙纂序〉、〈日知錄續彙纂序〉，《袖海樓雜著》，文錄二/7a-8a; 11a-12a。

⁹⁴ 宗稷辰，〈躬恥齋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7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22-223。

⁹⁵ 梅曾亮，〈正氣閣記〉，《柏硯山房詩文集》，254-255。

⁹⁶ 王鑾，〈序〉，收入：顧沅(輯)，《乾坤正氣集》(吳坤修刊，清同治六年新建吳氏皖城刊本，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1a-2a。

⁹⁷ 陳鑾，〈序〉，《乾坤正氣集》，1a-2a。

⁹⁸ 祁寯藻，〈序〉，《乾坤正氣集》，1a-1b。

人，多係賜諡忠烈、文忠，如王行儉(?-1645)、張煌言(1620-1644)、劉同升(1597-1645)與劉振之(1586-1641)等人，乾隆年間再追諡與忠義相關諡號，顯見清廷正面肯定其忠義之行⁹⁹。

1846年姚瑩覆書答謝陳子農致贈重刻方孝儒(1357-1402)《遜志齋集》時，提及：清朝刻印書籍數量遠邁前代，且人才、學問和文章皆極盛，惟在上位者未能提暢振作，士人埋首科舉利祿，故獨缺氣節之士。為今之計，當以編纂前代忠孝氣節人物之生平事業與詩文作品，大量印行宣傳，使人人得以閱讀，受其啟發。時潘錫恩正纂輯《乾坤正氣集》，蒐羅刊刻周秦以至明季忠烈名賢遺集，發揚忠義節烈，冀期「上報國家，下勵風俗」¹⁰⁰。

1848年潘錫恩《乾坤正氣集》輯錄101位殺身成仁志士的文集，其中明人占72位，顯係以明朝故事為主軸。選錄的72位明人中，有33人的著作曾被列為禁書，其中有17部作品的現存版本出自《乾坤正氣集》，尤可說明《乾坤正氣集》輯錄前明士人文集的時代性¹⁰¹。書中凡例表明《乾坤正氣集》乃「藉文存人，故哀然鉅集采錄其氣節及有關繫諸篇」，若「其人以忠烈著稱，雖文之無關氣節者，亦必全載」。顧沅在序文中，盛讚集內諸公志節「皆得天地之正氣」，為斯世斯人之楷模，「異世猶足動人景仰」。潘錫恩則縷述纂輯緣由，說明：是集收錄之人，「皆忠孝節義，身際艱難，不貪富貴，殺身成仁」。希冀藉由刊布《乾坤正氣集》，發揚正氣，扶植綱常名節。是集得以問世，潘錫恩不敢居功，言明若無姚瑩的奔走敦促，成書之日恐將遙遙無期。且《乾坤正氣集》能順利輯錄眾多前明士人文集，得益於顧沅家中藏有許多

⁹⁹ 有關清廷表彰前明忠義之士或對降清官員的態度轉變，相關研究討論，可參閱：陳永明，〈降清明臣與清初輿論〉、〈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與乾隆對南明殉國者的表彰〉、〈《貳臣傳》、《逆臣傳》與乾隆對降清明臣的貶斥〉，收入：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2-67; 183-259。

¹⁰⁰ 姚瑩，〈謝陳子農送重刻遜志齋集書〉，收入：姚瑩，《東溟文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58-559。

¹⁰¹ 相關資料，見：岡本さえ，〈卷末付表1：禁書著者一覽表〉、〈卷末付表2：禁書名一覽表〉，收入：岡本さえ，《清代禁書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578-734。

前明忠義諸公遺集¹⁰²。由此透露前明記憶仍暗藏士人心中，未因文字獄全然消逝，在適當時機，前明士人再度粉墨登場，重新回到歷史舞臺。潘錫恩在《乾坤正氣集》鏤板告成後，謝病歸里，未及印行。直至1866年，在吳坤修協助下，始得順利刊行；1881(光緒7年)恭鋺再次翻刻印行。1867年吳坤修(1816-1872)重刊顧沅輯錄之《乾坤正氣集》，撰序強調：「天下所恃者惟人心，人心所重者惟忠義」，故重刻《乾坤正氣集》以維持世教，俾使詩文毋得偏廢，「諸賢精忠大節與日月爭光者，從此昭垂於天壤間」¹⁰³。顯見刻印前人詩文集，宣揚忠義精神，下迄同光年間(1862-1908)仍方興未艾。

除彙編與集釋前明士人著作外，部分士人尤積極蒐羅刊印前明士人遺著，如黃汝成協助刊刻孫元化(1582-1632)遺集，宗稷辰重刻施邦曜遺集。孫元化，字初陽，南直隸松江府嘉定縣人，1612(萬曆40年)舉人，從徐光啓(1562-1633)習數學、火器，助袁崇煥(1584-1630)鎮守寧遠，屢挫清軍。後因孔有德(?-1652)叛明倒戈，孫元化被逮，押回京師審訊，首輔周延儒(1593-1644)、徐光啓營救未成，遭棄市。黃汝成讚譽孫元化「少負經濟才，頗長于用兵，于火器尤精。戰勝守固決策幾先，往往不豪髮爽」，惜遭奸人構陷，諱飾其戰功¹⁰⁴。施邦曜，字爾韜，浙江餘姚人，1619(萬曆47年)進士。施邦曜堅不附和魏忠賢(1568-1627)，歷任地方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南京、北京光祿寺卿和南京通政使等職，卓有政聲。明思宗(1611-1644)自縊殉國後，施邦曜服毒殉國，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諡忠介，清朝賜諡忠愍。宗稷辰慕其學術精深，行止遺風，惜其著述亡佚。因見同里沈復燾(1779-1850)手中藏有舊刻施邦曜遺集，喜不自勝，助其重刻¹⁰⁵。

清廷嘗將孫元化《西法神機》與施邦曜《啓楨野乘》列為禁書，顯見兩

¹⁰² 顧沅，〈序〉，收入：潘錫恩(輯)，《乾坤正氣集》，1(臺北：環球書局，1966)，1-2；

潘錫恩，〈序〉，《乾坤正氣集》，1/3-5。

¹⁰³ 吳坤修，〈重刊顧刻乾坤正氣集序〉，《乾坤正氣集》，1a-1b。

¹⁰⁴ 黃汝成，〈書明孫初陽中丞遺集後〉，《袖海樓雜著》，卷3/1a-2a。

¹⁰⁵ 宗稷辰，〈重刻施忠愍公遺集序〉，《躬恥齋文鈔》，《清代詩文集彙編》，576/255。

人並非全無禁忌。然黃汝成與宗稷辰在1825、1849年刊布兩人遺集，其動機殊堪玩味。其一，與道光年間的時代氛圍宜有密切關連，如仍處於清廷嚴密掌控之下，黃汝成與宗稷辰在刊布前必當躊躇不決，遑論頌揚孫元化與施邦曜。其二，孫元化精於火器、數學，施邦曜不附和權貴的鯁直氣節與忠義殉國形象，皆為道光朝士人極欲提倡的重點。通過這些零星線索，隱約可見士人正一步步挑戰政府底線。而點燃抗敵愛國之心的最佳助燃劑，即為明清鼎革故事。但最終反而使得清廷玩火自焚，卻非當時士人可逆料¹⁰⁶。

顧沅與潘錫恩先後纂輯《乾坤正氣集》，分別收錄歷朝詩詞文章，且以明朝為主，借用前明舊事，惕勵時人。其後張應昌輯錄本朝故事，編為《國朝詩正氣集》。是集同樣標舉忠孝節義精神，蒐羅逾萬首詩篇，冀期「振世扶綱常」。可惜因戰亂亡佚，未能一窺全豹¹⁰⁷。從顧沅和潘錫恩輯錄前明故事編為《乾坤正氣集》，以史為鑑，到《國朝詩正氣集》以本朝為例，皆呈顯士人喚醒士庶的用心。

在復活明人故實之際，部分士人著眼於當前社會弊病，撰述經世文章，以救治國家。1844年包世臣自刊著述《安吳四種》，書中收錄多種涉及經世思想的文章，彙集：《中衢一勺》、《藝舟雙楫》、《管情三義》與《齊民四術》等。在〈安吳四種·總目敘〉中，包世臣憶述：自1797(嘉慶2)年起負笈出遊，足跡遍及兩湖、四川、江浙等地，親眼目睹鹽漕河與盜賊等諸多社會弊病，亟思救治，故集結刊行舊著詩文，「備有心世道者采覽」。1825年完成的《中衢一勺》，針對海運、河漕與水利等問題提出對策。包世臣詳細分析海運的利弊得失，力倡改行海運，以紓民困。包世臣在《齊民四術》標舉農、禮、刑、兵等四大綱目，以為治民要點，書中針對農務、禮俗、刑名與兵事等，

¹⁰⁶ 相關研究的延伸討論，可參閱：王汎森，〈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收入：陳弱水(主編)，《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12)，415-449。

¹⁰⁷ 張應昌，〈自題國朝詩正氣集此集稿本亂後已失〉，收入：張應昌，《彝壽軒詩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62。

詳加辨析。包世臣自陳：雖已老邁、值廢棄之餘，「然生平所學，或亦有足裨當路君子之節取者，生民之難庶其小有瘳乎」¹⁰⁸。1858年孫鼎臣將《芻論》書稿寄給曾國藩，懇請惠予裁定。書中所論殆屬闡發當前弊病，包括：治術、鹽務、漕運、錢幣、兵制；通論唐代以降大政事務，明代賦餉等。凡此種種，略可說明士人除藉明代舊事諷諭清代社會，亦逐漸將眼光投向當前社會，積極議論時事，提出更加符合時代所需之藥石。

士人在此時代氛圍與學術思潮激盪下，受到何種影響。下文將以曾國藩為例說明。

(三)士大夫之學的動態樣貌¹⁰⁹

曾國藩生於1811年，主要成長在道光朝，1833年考取秀才，1838年中進士，開啓宦途，至咸豐朝始揚名天下。嘉道咸年間的時代風潮，在曾國藩身上留下無法抹滅的烙印。下文將以曾國藩為線索，追尋嘉道咸年間的學術脈動。

1838年曾國藩通過會試，取得殿試三甲42名。該科考官為穆彰阿，曾國藩成為其得意門生¹¹⁰。曾國藩先後擔任翰林院庶吉士、檢討、侍講、文淵閣

¹⁰⁸ 包世臣，《安吳四種》（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鄭大華，〈論包世臣在嘉道經世思潮中的歷史地位——兼與龔自珍、魏源之比較〉，《思想家與近代中國思想》，20-57；鄭大華，〈包世臣與嘉道年間的學風轉變〉，《安徽史學》，4（合肥，2006）：42-48；倪玉平、高曉燕，〈《安吳四種》的版本及其價值〉，《石家莊學院學報》，13.5（石家莊，2011.09）：22-26。

¹⁰⁹ 陳澧嘗針對時下學術風氣，提出「士大夫之學」與「博士之學」，並區分兩者的高下。余英時教授曾據此進行闡釋。參閱：錢穆，《學籥》（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蘭臺出版社，2000），63-73；余英時，〈曾國藩與「士大夫之學」〉，收入：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臺北：三民書局，2004二版），1-24。

¹¹⁰ 有關穆彰阿對曾國藩的幫助，野史中有一段生動描繪：「穆彰阿嘗汲引曾文正公國藩，每於御前奏稱曾某遇事留心，可大用。一日，文正忽奉翌日召見之諭。是夕，宿穆邸，及入內，內監引至一室，則非平時候起處。踰亭午矣，未獲入對。俄內傳諭：『明日再來可也。』文正退至穆宅。穆問奏對若何，文正述後命以對，並及候起處所。穆稍凝思，問曰：『汝見壁間所懸字幅否？』文正未及對。穆悵然曰：『機緣可惜。』因躊躇久之，

校理、侍講學士、內閣學士加禮部侍郎銜、禮部右侍郎署理兵部右侍郎。京官時期是曾國藩人生的重要轉捩點，受到學術浪潮的推擠，乘勢而起。1840年曾國藩受姚鼐(1731-1815)啓發，略窺爲學之道¹¹¹。曾國藩因與好友邵懿辰談論理學，開始研讀薛瑄(1389-1464)、李光地、陸隴其(1630-1692)與張英(1637-1708)等理學家著作¹¹²。其後，從學於太常寺卿唐鑑，和倭仁、吳廷棟、何桂清等人治義理之學¹¹³。此時曾國藩獨尊理學，1843年致諸弟信中闡明：義理、考據與詞章之學，以義理之學最大，其餘皆無足取¹¹⁴。

1846年曾國藩因身體不適，居報國寺，閉門靜坐，並攜段玉裁(1735-1815)《說文解字注》一書，以供披覽，治學方向始變。劉傳瑩(1818-1848)造訪寺舍時，兩人整日討論考據之學¹¹⁵。其後，曾國藩戮力研讀考證學家著作，如王引之《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王念孫(1744-1832)《讀書雜誌》，趙翼《陔餘叢考》，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段玉裁《六書音韻表》，錢大昕《聲類》與江藩(1761-1831)《漢學師承記》等書。略可說明，曾國藩已多方涉獵考證學，迥異此前的鄙夷態度¹¹⁶。1859年曾國藩給曾紀澤(1839-1890)信函中談治學之道云：學術風氣，漢至唐略同，宋至明略同，而清朝自成一格。究其實即由顧炎武、閻若璩、戴震、江永(1681-1762)、段玉裁與王念孫等人，引領之漢學考證學風，故有志讀書，不可不知考證學家之治學門徑¹¹⁷。同年曾國藩爲孫鼎臣《孫芝房侍講芻論》題序，針對孫鼎臣抨擊考證學風乃敗壞社會之因，加以辯駁。曾國藩

則召幹僕某，諭之曰：『汝亟以銀四百兩往貽某內監，屬其將某處壁間字幅，炳燭代錄，此金為酬也。』因顧謂文正，仍下榻於此，明晨入內可。洎得觀，則玉音垂詢，皆壁間所懸歷朝聖訓也。以是奏對稱旨。並諭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誠然。』而文正自是駸駸嚮用矣。見：徐珂(編撰)，《清稗類鈔》，3(北京：中華書局，1984)，1404。

¹¹¹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曾國藩詩文集》，292；曾國藩，〈致劉孟容〉，《足本曾文正公全集》，4/1859-1861。

¹¹²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日記一》(長沙：岳麓書社，1987)，49-51；92。

¹¹³ 曾國藩，〈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曾國藩全集·家書一》，46-49。

¹¹⁴ 曾國藩，〈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曾國藩全集·家書一》，52-58。

¹¹⁵ 黎庶昌(等撰)，《曾文正公年譜》，《足本曾文正公全集》，1/79-80。

¹¹⁶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日記一》，335；349；373。

¹¹⁷ 曾國藩，〈論紀澤〉，《曾國藩全集·家書一》，476-477。

認為：「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且孫鼎臣所論將個案普遍化，並非實際全貌¹¹⁸。為劉傳瑩撰述家傳時，曾國藩再次為漢學考證辯護，強調考證學「起自一二博聞之士，稽核名物，頗拾先賢之遺而補其闕」，及至末流，「以非毀宋儒為能，……以與朱子相攻難」。若能審慎利用「漢學家之能，綜核於倫常日用之地，以求一得當於朱子」，或有裨於世¹¹⁹。考察曾國藩對考證學的態度，從鄙視、無足取，到不可不知，甚至為其辯駁，其間轉變至明且劇。1862年曾國藩追憶：「余於道光末年，始好高郵王氏父子之說」¹²⁰，可為其對考證學好惡轉折之佐證。

由曾國藩治學途徑來看，可略窺士人網絡之影響，其始受姚鼐啟發，略窺桐城古文義法與治學門徑。在邵懿辰、唐鑑與倭仁帶領下，究心研讀理學思想，奉行不渝。又受劉傳瑩影響，重新認識考證學，鑽研漢學，視之為不可不知的治學門徑之一。在曾國藩身上，明顯可見新學問的動態形塑過程，透過師友網絡的影響和督促，擴大其學術面向。且此一新學問為嶄新之綜合體，儘管內容不外漢宋之學或其他舊有學術，但經過不同士人的選取、糅合，成為一門新學術，且被視為具有救治時代弊病之效。曾國藩自述其學術思想內涵包括：義理、詞章、經濟與考據之學，四者缺一不可，並將四者比附為孔門之德行、言語、政事與文學四科。曾國藩臚列十種書作為四門學術之入門：四書、《近思錄》、曾氏讀古文鈔、曾氏讀詩鈔、會典、《皇朝經世文編》、《易經》、《詩經》、《史記》與《漢書》等，強調十種書皆須爛熟，以為學術根基¹²¹。

曾國藩提倡之學術內容，實乃嘉道咸年間以降學術思潮之產物。考據學係乾嘉學術主流，自不待言。義理學乃理學核心，嘉道以降蔚為風潮，略有與漢學分庭抗禮之勢。詞章學在桐城文人姚鼐、梅曾亮、管同、方東樹與姚

¹¹⁸ 曾國藩，〈芻論敘〉，《孫芝房侍講芻論》，1a-4a。

¹¹⁹ 曾國藩，〈漢陽劉君家傳〉，《曾國藩詩文集》，242-244。

¹²⁰ 曾國藩，〈論紀澤〉，《曾國藩全集·家書二》，809。

¹²¹ 曾國藩，〈求闕齋日記類鈔〉，《足本曾文正公全集》，8/4873-4874。

瑩等人提倡下，賦予詞章新的生命力，使之與時代緊密結合。曾國藩在擔任京官時期，深受師友影響，醉心義理學，兼或鑽研詞章之學。然曾國藩對身處的時代環境，尤念茲在茲，1851年上奏〈敬呈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痛陳：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士風氣漸趨浮華，翰詹考差皆以工小楷，巧試律者為上，不復重視文義深淺。直諫振興人才，「必使士大夫考古來之成敗，討國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試律、工巧之風，乃可以崇實而黜浮」¹²²。故曾國藩在其糅合之新學術中，加入經濟之學，實乃切合道咸以降之時代脈動。

三、革新詩風與詩史映世

在士人重新發揚文以載道，倡議改變文體以導正社會風尚之際，革新詩風也成為關注焦點。賦詩吟詠乃傳統士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環節，舉凡親情抒發，師友唱和，宴遊記述或官場酬酢等，皆賦詩以記。林昌彝為同鄉謝秋楮刺史《蓉初詩集》寫序時，點出古人在各類公私場合，朋友交游贈答，親戚歡好和樂，政治得失與民俗臧否，皆發而為詩，故聖人特重詩教。謝秋楮從政多年，對政治得失、民俗臧否了然於胸，「故其於詩，能治其性情以感發志意」¹²³。賀熙齡強調：詩即史也，《詩經》三百篇，可知政治得失，風俗美惡。儘管今日「作者林立，窮工鬥巧，美善兼賅」，然詩與史兩分，更無關國政民風¹²⁴。略可說明士人關注詩風，冀期詩作成為導正人心風俗之重要利器。

1831年張際亮致潘德輿信，痛斥乾嘉以降詩風：時人賦詩多藉以營求顯貴、掩飾輕薄，僅「供人之玩好」，「蕩人之心魄」，故「失是非，導諂諛，

¹²² 曾國藩，〈敬呈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曾國藩全集·奏稿一》（長沙：岳麓書社，1985），24-27。

¹²³ 林昌彝，〈蓉初詩集序〉，《林昌彝詩文集》，290-291。

¹²⁴ 賀熙齡，〈詠史備要序〉，《賀熙齡集》，34。

獎貪淫，喪禮義，久之而害於風俗人心」¹²⁵。因張際亮深信，「學者貴會通，通於詩者，乃通於政。觀杜詩，彼其所諷切陳述，可謂深通政體矣」¹²⁶。在與徐寶善函札中，張際亮則批評乾隆以降多位頗負盛名之詩人，「於風雅之旨，正多未逮」，包括：沈德潛、朱筠(1729-1781)、袁枚(1716-1797)與蔣士銓(1725-1784)等人，指責：「問其志，漠然無所存；觀其詩，了然無可歌可泣之致。則亦苟且剽竊而已，大雅曷尙焉？」其不滿情緒，躍然紙上。「念詩道榛蕪，欲相與大聲疾呼，振起龍瞶」，張際亮希望徐寶善、黃爵滋等人勇於任事，重振詩風¹²⁷。姚瑩為鄭開禧詩集寫序，提及：「夫詩者，心聲也。人才學術之所見端，亦風俗盛衰之所由系」，值此多事之秋，詩詞似非先務。但作詩若能「持正人心，諷頌得失，實有切於陳告訓誡之辭者」，或有裨於國家社會¹²⁸。

除個人之力或師友相互提醒，纂輯詩文總集亦為士人矯正風俗，轉化人心的方法。松村昂教授的《清詩總集敍錄》重現清朝士人編纂詩文總集之盛況，雖有沈德潛文字獄案，仍無損士人纂輯詩文總集的活動。不論全國或地域性範圍的詩文總集數量，皆有顯著成長¹²⁹。透過纂輯詩文，更能凸顯詩文特性與宗旨，有助於形塑士人心中良善的社會風尚。如朱琦為符葆森纂輯《國朝正雅集》題序云：上自王公大臣，下至田間野老、羈人逸士，殆皆賦詩以達其性情，「其傳者或以專集或零章斷句，非裒而輯之則無以觀當時風尚，而極一代著作之盛」¹³⁰。

為捕捉嘉道咸年間以降的時代氛圍，本節選取《熙朝雅頌集》、《國朝正雅集》與《國朝詩鐸》進行討論，並分析參與編輯工作人員的相關網絡。《熙

¹²⁵ 張際亮，〈答潘彥輔書〉，收入：張際亮(著)、王颺(校點)，《思伯子堂詩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349。

¹²⁶ 張際亮，〈答姚石甫明府書〉，《思伯子堂詩文集》，下/1337。

¹²⁷ 張際亮，〈與徐廉峰太史書〉，《思伯子堂詩文集》，下/1351。

¹²⁸ 姚瑩，〈鄭雲麓詩序〉，《東溟外集》，《續修四庫全書》，1512/445。

¹²⁹ 松村昂，《清詩總集敍錄》(東京：汲古書院，2010)。

¹³⁰ 朱琦，〈序〉，收入：符葆森(編)，《國朝正雅集》(清咸豐六年京師半畝園刊本，藏於臺灣大學)，13a-14b。

朝雅頌集》收入清初至嘉慶初年滿洲、蒙古、漢軍八旗旗人詩作；《國朝正雅集》收錄自1736(乾隆元)年至1858年間，2,000餘位詩人，8,000餘首詩作；《國朝詩鐸》收錄起自明末清初迄同治年間(1862-1874)之詩，並包括少數明遺民所作。儘管三部詩集收錄詩作之時代，非獨限於嘉道咸年間，但鐵保、符葆森和張應昌等人，皆活動於嘉道咸年間，且師友門生和親朋故舊不乏重要官員、文人，與時代同脈搏共呼吸，略可反映其時代特性。

(一)鐵保與《熙朝雅頌集》

鐵保，棟鄂氏，字冶亭，號梅庵，滿洲正黃旗人。父祖輩多為武將，唯鐵保性好讀書，1772(乾隆37)年中進士，授吏部主事，後襲恩騎尉世職。因獲大學士阿桂(1717-1797)賞識，屢蒙薦舉，遷郎中、少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內閣學士與禮部侍郎等職。1799年因奏劾過當，遭清仁宗斥責，左遷內閣學士，後派為盛京兵部、刑部侍郎兼奉天府尹，尋召為吏部侍郎，出任漕運總督。1802年調任廣東、山東巡撫。因辦理漕運得宜，獲賞太子太保，因水淺船遲，革職留任。1805年擢為兩江總督，又因蘇州知府周鏞和安徽巡撫初彭齡(?-1825)失職，鐵保失察連坐。1809(嘉慶14)年以河工日壞、吏治日弛，鐵保獲罪遣戍烏魯木齊。逾年獲給三等侍衛，充葉爾羌辦事大臣，尋改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吏部侍郎和禮部尚書等職。1813年伊犁將軍松筠(1754-1835)彈劾鐵保於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期間枉殺回民，清仁宗覽奏後大怒，將鐵保褫職發往吉林效力。1818年召為司經局洗馬。道光初年以疾乞休，1824年病卒¹³¹。

鐵保歷任中央、地方官職，然最為人稱道之處，乃其擅文學、工詩詞且善書法。鐵保詩名頗盛，與百齡(1748-1816)、法式善並稱「三才子」。三人同為旗人，分屬漢滿蒙三族。鐵保與百齡為科舉同年，與法式善尤相識逾30載。

¹³¹ 鐵保，《梅庵年譜》，收入：鐵保，《惟清齋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7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7-181。

三人不時招飲宴遊，賦詩唱和，旅居外地則寄詩述懷，充分說明三人交情甚篤¹³²。書法方面，鐵保和劉墉(1719-1805)、王文治(1730-1802)、梁同書(1723-1815)、翁方綱(1733-1818)等人齊名。門人徐端(1751-1812)高聲頌揚鐵保，謂其兼有書家、詩人與經世之材，且其詩文頗具經世思想。阮元對鐵保的詩文多所讚譽。吳鼎更云鐵保之詩，「本乎性情之正，兼乎忠孝之全也」¹³³。

1794-1795年間，清高宗諭令紀昀和鐵保擔任續纂《八旗通志》總裁官。受限體例，《八旗通志·藝文志》僅能臚列相關詩文書目，且多數詩文為鈔本，如未妥善保存，縱使留下書目，亦恐將亡佚。鐵保不願坐視珍貴詩文散失，擬將詩文內容另行彙編成冊，「不負國家振興文教，嘉惠士林」深意。鐵保委請朱珪、紀昀和彭元瑞(1731-1803)等人一同校閱，法式善、陳希曾(1766-1816)、汪廷珍、汪滋畹和吳鼎等協助編次，蒐羅滿洲、蒙古與漢軍八旗中，名公鉅卿、紳士布衣和閨閣等，計200餘位旗人詩作，編為總集，「仰體

¹³² 如：鐵保，〈冬日邀百菊溪法時帆文芝厓諸君子石經堂小集〉、〈次韻答時帆學士寓居滌陽僧舍〉，《惟清齋全集·梅庵文鈔》，《續修四庫全書》，1476/ 302; 312; 百齡，〈秋夜偕時泉庶子飲法學士時帆齋中即次時泉見贈原韻〉、〈上元夜坐即事簡時泉庶子並寄冶亭同年二首〉、〈次答鐵冶亭侍郎見懷〉，收入：百齡，《守意齋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7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70; 174; 195; 法式善，〈冶亭鐵保侍郎自滌陽寄懷姜度香晟侍郎詩盛推達齋侍郎畫并及鄙詩次冶亭韻兼呈達齋〉、〈雪後冶亭侍郎招同菊溪侍郎芝岩文寧編修暨閩峯玉保閣學集石經堂和冶亭韻即效其體〉，收入：法式善，《存素堂詩初集錄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7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78; 483; 法式善，〈題交遊尺牘後現在之人〉，收入：法式善，《存素堂詩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43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53; 法式善，〈春夕懷人三十二首〉，收入：法式善，《存素堂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43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96; 法式善，〈梅庵詩鈔序〉，收入：法式善，《存素堂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7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97。

¹³³ 徐端，〈梅庵詩鈔序〉，《惟清齋全集·梅庵詩鈔》，《續修四庫全書》，1476/ 271- 272; 阮元，〈梅庵詩鈔序〉，《惟清齋全集·梅庵詩鈔》，《續修四庫全書》，1476/ 272- 273; 吳鼎，〈梅庵詩鈔序〉，《惟清齋全集·梅庵詩鈔》，《續修四庫全書》，1476/ 273- 274。

聖天子教育八旗之恩，鄉前輩貽穀後進之意」¹³⁴。1804年書成後，鐵保進呈御覽，清仁宗閱後賜名《熙朝雅頌集》，撰序文嘉許鐵保編纂之功。清仁宗盛贊是編收錄詩作，皆有關風俗人心，字裡行間透露忠愛之忱、英靈之氣和勇壯之詞。纂輯旗人詩作非為存其詩文，愛其詩律，而係存其人，「愛其品端心正，勇敢之忱洋溢於楮墨間」。惟清仁宗不忘以申：崇文之餘，不可偏廢習武，期勉八旗子弟勿忘父祖開創之艱，效法父祖公忠體國之熱忱¹³⁵。謝恩疏中，鐵保延續清仁宗所論，表達必當遵循肆武習勞之祖訓，並凸顯文以載道的目的，所載之道正是當時旗人欠缺的忠勇節義精神¹³⁶。

1803年川楚教亂初告平定，軍事武力、官員吏治與經濟財政等諸多弊病，一一浮現，清仁宗對八旗衰弱深表震怒。儘管此前已有輯錄旗人詩文集先例，如康熙年間瑪爾渾(?-1709)輯錄《宸襟集》，文昭(1681-1732)纂輯《宸萼集》，收錄之詩皆為清朝宗室所作¹³⁷。乾隆年間則有卓奇圖《白山詩存》、伊福納《白山詩鈔》，乃較完整收錄旗人詩作之總集¹³⁸。但川楚教亂甫告平定，清仁宗面臨八旗軍隊戰力衰退，對頌揚旗人文采的詩集作品不甚以為然。故清仁宗著重闡發《熙朝雅頌集》具有激發旗人忠勇節義之氣，文字詞藻與詩文格律則非該書重點。

鐵保身為旗人一分子，且父祖多為武將，對旗人忠勇之氣日漸流失應有所體察。儘管鐵保在原序中，強調是書纂輯係不忍坐視珍貴詩文集散失亡

¹³⁴ 鐵保，〈選刻八旗詩集序集成賜名熙朝雅頌集〉，《惟清齋全集·梅庵文鈔》，《續修四庫全書》，1476/231-232。

¹³⁵ 清仁宗，〈熙朝雅頌集序〉，收入：清仁宗，《御製文初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清仁宗御製文》，1(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5/47-48。

¹³⁶ 鐵保，〈恭進八旗詩鈔賜名熙朝雅頌集御製序文具摺謝恩疏〉，《惟清齋全集·梅庵文鈔》，《續修四庫全書》，1476/185-187。

¹³⁷ 相關討論，見：朱則杰、周于飛，〈瑪爾渾《宸襟集》與文昭《宸萼集》——兩種清朝宗室詩歌總集及其編者考辨〉，《社會科學戰線》，1(長春，2011.01): 173-176。

¹³⁸ 相關討論，見：朱則杰、李美芳，〈卓奇圖《白山詩存》與伊福納《白山詩抄》——兩種早期八旗詩歌總集及其編者考辨〉，《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1.3(杭州，2011.05): 91-96。

佚，卻也自陳《熙朝雅頌集》係仿效唐代殷璠編選《河嶽英靈集》之遺意¹³⁹。殷璠於唐開元天寶年間(713-756)選錄24家盛唐詩人，共234首詩，為當代人輯錄當代詩文的重要先例。殷璠編選《河嶽英靈集》，除讚揚聖朝之美，尚有闡述個人詩文理念與引導詩歌創作方向的目的。殷璠重視的詩文理念可歸納為風骨與興象，強調詩歌文字應蘊含對讀者正面的感染力，反映出明亮、向上，不可阻遏之磅礴氣勢。興象則是文字須揉合情思景物為一，讓讀者閱讀文字後，能有身歷其境的氛圍¹⁴⁰。故鐵保纂輯《熙朝雅頌朝》，或有藉此展現八旗子弟忠義節烈之氣，令時人懷想八旗軍容壯盛之姿。

《熙朝雅頌集》中選錄詩作多強調其鼓吹風雅，根柢忠孝或有盛唐之風等。如吞珠(?-1718)的詩風被評為：根柢忠孝，準則風騷¹⁴¹；博爾都(1649-1708)之詩，被評為：暢發心志、載道之言¹⁴²；鄂貌圖(1614-1661)之詩被評為：「典雅流麗，有盛唐作者之風」¹⁴³。論者視《熙朝雅頌集》之編選，實深具政治教化意涵¹⁴⁴。無論宣揚政治教化或激發忠勇節義之氣，鐵保忠實呈顯所選詩作的時代氛圍，並映照出當前最為缺乏的忠勇之氣。鐵保或有仿效殷璠之用意，藉由《熙朝雅頌集》引導詩風，重新喚起旗人忠義之氣。從鐵保個人詩文中，亦可窺知一二。鐵保反覆闡述詩境的重要性，「詩隨境變，境遷則詩亦遷」，今日詩家雖多，詩境卻日漸窄小，僅拾人牙慧，殊乏個人性情、詩境¹⁴⁵。〈秀鍾堂詩鈔序〉再次重申《熙朝雅頌集》乃仿效《河嶽英靈集》而作，

¹³⁹ 鐵保，〈選刻八旗詩集序集成賜名熙朝雅頌集〉，《惟清齋全集·梅庵文鈔》，《續修四庫全書》，1476/231-232。

¹⁴⁰ 有關殷璠與《河嶽英靈集》的相關研究討論，可參閱：王克讓，《河嶽英靈集注》(成都：巴蜀書社，2006)；李珍華、傅璇琮，《河嶽英靈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2)。

¹⁴¹ 鐵保(編)，《熙朝雅頌集》(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167。

¹⁴² 鐵保(編)，《熙朝雅頌集》，185；周芳，〈茫茫亭內茫茫吟——清初博爾都悼亡詩藝術淺析〉，《滿族研究》，102(瀋陽，2011): 84-88。

¹⁴³ 鐵保(編)，《熙朝雅頌集》，328。

¹⁴⁴ 王兵，〈傳統詩教與清廷政教的共謀——以孫銘和鐵保的御敕清詩選本為批評視角〉，《滿族研究》，3(瀋陽，2011): 108-114。

¹⁴⁵ 鐵保，〈梅庵詩鈔自序〉、〈續刻梅庵詩鈔自序〉，《惟清齋全集·梅庵文鈔》，《續修四庫全書》，1476/232-234。

且「詩之爲道所以言性情也，性情隨境遇爲轉移」，故忠實表現內心情感，方爲詩之真諦¹⁴⁶。鐵保認爲詩貴氣體深厚，如氣體不厚，雖極力雕琢亦難有當；而虛語敷衍，不據實而書，詩文必落前人窠臼，應直書所見，陳述時代境界，方爲好詩¹⁴⁷。

值得進一步追索的是，鐵保在1789年首度充任會試副考官，1792年任江南鄉試正考官，1793年充會試副考官，1794年擔任山東鄉試正考官，1798年任順天鄉試副考官。五度出任鄉、會試考官，使得鐵保門生遍布朝野，其中不乏日後位居要津或頗負盛名之學者，如潘世恩、阮元、王芑孫、吳燾、汪廷珍、英和、那彥成、曾燠與吳錫麒(1746-1818)等人。阮元和曾燠擔任地方督撫期間，廣招才俊之士，幕府內人才濟濟，協助其進行各項文化事業¹⁴⁸。曾燠任官揚州，常與名流吟詠唱和，並選輯刊刻《邗上題襟集》，在衙齋西北隅，築「題襟館」，作爲與賓客幕友賦詩唱和之所¹⁴⁹。許乃普云：題襟館招募之人才盛極一時¹⁵⁰。透過曾燠及多位賓客幕友以題襟館爲聚會場合之詩作，略可窺知士人日常多樣性的文化活動，諸如：友朋夜飲時，曾燠出示珍藏的元明人書畫，與眾人分享，並以抽籤方式題詩吟詠書畫珍品；冬至後曾燠於題襟館與友朋消寒小飲，與會士人分韻賦詩紀之；曾燠招飲友朋於題襟館，賞菊、觀梅或品茗等¹⁵¹。

¹⁴⁶ 鐵保，〈秀鍾堂詩鈔序〉，《惟清齋全集·梅庵文鈔》，《續修四庫全書》，1476/234-235。

¹⁴⁷ 鐵保，《梅庵年譜》，《惟清齋全集》，《續修四庫全書》，1476/164。

¹⁴⁸ 有關阮元和曾燠的幕府食客，協助進行文化活動之相關研究討論，可參閱：李炳泉，〈阮元督粵幕府考論〉，《煙臺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8.4(煙臺，2001.12): 18-25；李瑞豪，〈曾燠幕府與清中期的駢文復興〉，《中國韻文學刊》，23.3(湘潭，2009.09): 51-56。

¹⁴⁹ 郭堃，〈賓谷先生莅揚州以來一時名流倡和成快先生擇其尤者鑲板以行題曰邗上題襟集茲復於衙齋西北隅築題襟館爰賦詩紀事〉，收入：郭堃，《種蕉館詩集》(清光緒二十一年刊本舫樓藏板，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卷1/5a-5b。

¹⁵⁰ 許乃普，〈國朝文錄序〉，收入：李祖陶(輯)，《國朝文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66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97-298。

¹⁵¹ 王芑孫，〈與穀人夜飲題襟館因贈賓谷二首〉、〈題襟館同課思雪用東坡祈雪霽豬泉詩韻〉、〈題襟館同課海棠木瓜三十韻〉、〈再集題襟館主人出所藏元明人書畫分詠拈得戴文進五柳高士圖〉，收入：王芑孫，《淵雅堂編年詩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部分士人因同為鐵保門生，形成學術網絡，相互提攜，詩文唱和。如吳肅、王芑孫皆曾在曾燠幕府工作¹⁵²，互為彼此的詩文集題序，呈顯網絡的密切互動與深厚情感。阮元在序文中讚譽汪廷珍能以道義自處，名揚海內¹⁵³。吳錫麒對曾燠通達顯貴後，不忘詩文詞章，與賓客幕友吟詠唱和，興築題襟館招徠名士，對文風提倡頗有助益。王芑孫頌揚曾燠詩文精妙，吳肅推崇曾燠的駢體文，「以為其體正而詣深」¹⁵⁴。

由表1“鐵保門生故舊詩文集題序”可略窺其相關網絡，且可由此衍申至其他網絡，如鐵

作者	詩文集	撰序者
鐵保	《梅庵全集》	汪廷珍、阮元、英和
	《梅庵詩鈔》	百齡、吳錫麒、阮元、吳肅、王芑孫、曾燠(後跋)
汪廷珍	《實事求是齋遺藁》	阮元
楊芳燦	《芙蓉山館全集》	法式善
王芑孫	《淵雅堂編年詩藁》	鐵保
曾燠	《賞雨茅屋詩集》	吳錫麒、王芑孫
	《賞雨茅屋外集》	吳肅
吳錫麒	《有正味齋詩集》	法式善
	《有正味齋駢體文》	曾燠
法式善	《存素堂詩初集》	袁枚、吳錫麒、洪亮吉、楊芳燦
洪亮吉	《卷施閣文乙集》	袁枚

保、百齡與法式善三位才子交情匪淺，共同朋友不在少數；吳肅輯錄邵齊燾(1718-1769)、洪亮吉、吳錫麒、劉星煒(1718-1772)、袁枚、孫星衍(1753-1818)、孔廣森(1751-1786)和曾燠等8人之駢體文，題曰《八家四六文注》。楊芳燦和洪亮吉、

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8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43-545；郭瑩，〈賓谷先生長至後四日題襟館消寒小飲會者十四人以杜詩刺繡五紋一聯分韻得繡字〉、〈賓谷先生招飲題襟館看菊〉、〈題襟館品茶〉，《種蕉館詩集》，卷1/12a-12b；卷2/7b-8a；卷3/5b-6a；吳肅，〈題襟館種梅同人賦詩各以其姓為韻〉，收入：吳肅，《吳學士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8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45；曾燠，〈題襟館種梅〉、〈銷寒集題襟館分詠〉，收入：曾燠，《賞雨茅屋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6；35。

¹⁵² 尚小明(編著)，《清代士人游幕表》(北京：中華書局，2005)，128。

¹⁵³ 阮元，〈序〉，收入：汪廷珍，《實事求是齋遺藁》，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4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75-276。

¹⁵⁴ 吳錫麒，〈序〉，《賞雨茅屋詩集》，《續修四庫全書》，1484/1-2；王芑孫，〈序〉，《賞雨茅屋詩集》，《續修四庫全書》，1484/2-3；吳肅，〈序〉，收入：曾燠，《賞雨茅屋外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25。

吳鼎時常往來；王芑孫在〈歲暮懷人六十四首〉中，憶述法式善、吳錫麒、洪亮吉、孫星衍、曾燠、張問安與張問陶等多位友人¹⁵⁵。

(二) 符葆森與《國朝正雅集》

除專門纂輯旗人詩文之總集外，漢族士人群體是多數詩文總集的主要作者。清中葉以降的士人詩文總集最完備者，首推符葆森1857年刊行的《國朝正雅集》。惟對符葆森生平所知有限，僅知其字南樵，江蘇江都人，1851年考取舉人，家貧，為衣食奔走四方。工詩賦，好交友，寓於崇實家，與陶樾(1772-1857)、張祥河(1785-1862)、朱琦、葉名澧、孔憲彝、劉熙載(1813-1881)、王拯、劉存仁、蔡壽祺等人，往來論詩，交誼深厚¹⁵⁶。

符葆森在《國朝正雅集》自序縷述纂輯緣起：符葆森從陳文述(1771-1843/1775-1845)口中聽聞法式善、曾燠與鄭祖琛(1784-1851)等人，皆有裒輯當代詩文作品，以承繼沈德潛(1673-1769)《國朝詩別裁集》，稿歸陶澍。然事隔多年，陶澍已逝，未見刊行。符葆森爰此立志纂輯詩文總集，紹繼前輩志業。因其功名未顯，阮囊羞澀，蒐羅資料期間備嘗艱苦。張祥河、沈兆霖(1801-1862)、朱琦和崇實等人在題序中，均提及符葆森憑藉一己之力，四處訪求，借閱、抄錄詩文。凡例坦言書籍多商借而來，倉促之間，無暇仔細繕寫校閱，訛脫白字在所難免，尚祈方家不吝指正。1853年太平天國軍隊進犯揚州，初稿20餘卷，險遭兵火之禍。其後在張維屏、陶樾與張祥河等人敦促和資助下，順利付梓¹⁵⁷。《國朝正雅集》計分百卷，收錄詩作起於1736年，迄於1856年左右，計2,000餘位詩人，8,000餘首作品。書名命曰《國朝正雅集》有諸多涵義，符葆森自陳：雖上接《國朝詩別裁集》，卻不敢名為續編，原擬題為《寄心

¹⁵⁵ 王芑孫，〈歲暮懷人六十四首〉，《淵雅堂編年詩叢》，《續修四庫全書》，1480/532-539。

¹⁵⁶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19(北京：中華書局，1987)，6052-6053。

¹⁵⁷ 有關陶樾對符葆森輯刊《國朝正雅集》的協助，另可參閱：符葆森，〈輓詩〉，收入：陶樾，《紅豆樹館詩稿》(咸豐七年刊本，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4b-5a。

集》，以示心有所寄。然友人咸認為「所取之詩體正而意雅，可挽詩之流失，而有功於百年內者」，訂名為《國朝正雅集》¹⁵⁸。

《國朝正雅集》收錄8篇題序，包括：陶樸、祁寯藻、張祥河、花沙納、瑞常(?-1872)、沈兆霖、朱琦與崇實。序文中率皆由闡發書名談起，續論詩教與人心風俗，並給予《國朝正雅集》高度評價。張祥河在序文中強調：「詩者文之一事，本諸情性而充之以學，各就其意所欲言而發」，且受風會轉移影響，「文有殊形而理無二致」，故《國朝正雅集》選錄之詩皆與世道人心相關。相較於王昶(1725-1806)《湖海詩傳》僅收錄與之交游的士人詩作，王豫(1768-1826)《羣雅集》、《羣雅二集》止於嘉慶朝，符葆森《國朝正雅集》無論收錄人選或起迄時間，均較為完備¹⁵⁹。花沙納序文著重闡發：符葆森選詩標準本於溫柔敦厚，《國朝正雅集》大有裨於詩教¹⁶⁰。瑞常開門見山坦言：「善者足以感，而惡者足以懲，厚人心美風俗詩之本教」，將詩教與世運緊密連結，稱譽《國朝正雅集》為當代《詩經》，可探問詩之本源，昌明詩教¹⁶¹。朱琦論析符葆森纂輯之詩「發乎情止乎忠孝，……上以通道德而俯以維風化」，可為乾隆以降百餘年之重要文獻¹⁶²。

藉由符葆森纂輯《國朝正雅集》的事例與友人相關回應，有兩點值得措意：其一，士人哀輯詩文總集傳統持久不墜，明遺民吳肅公(1626-1699)為好友宗子發纂輯《明十二家詩集》題序云：「今詩道之熾，即里儒村豎，皆能口吟筆畫，鐫布都士，與士大夫爭聲譽」¹⁶³。吳肅公所言或有誇大之辭，然輯

¹⁵⁸ 符葆森，〈自序〉，《國朝正雅集》，17a-19b；張祥河，〈序〉，《國朝正雅集》，5a-6b；沈兆霖，〈序〉，《國朝正雅集》，11a-12b；朱琦，〈序〉，《國朝正雅集》，13a-14b；崇實，〈序〉，《國朝正雅集》，15a-16b；符葆森，〈例言〉，《國朝正雅集》，4a-5a。

¹⁵⁹ 張祥河，〈序〉，《國朝正雅集》，5a-6b。

¹⁶⁰ 花沙納，〈序〉，《國朝正雅集》，7a-8a。

¹⁶¹ 瑞常，〈序〉，《國朝正雅集》，9a-10a。該編序文係由劉存仁代筆，見：劉存仁，〈國朝正雅集序代瑞少宰〉，《杞雲樓文鈔》，《清代詩文集彙編》，619/483。

¹⁶² 朱琦，〈序〉，《國朝正雅集》，13a-14b。

¹⁶³ 吳肅公，〈明十二家詩集序〉，收入：吳肅公，《街南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4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清康熙二

錄詩文總集之風氣，自明末清初以降，未嘗消退。據謝正光、潘承玉與朱則杰等教授於北美洲、日本、臺灣和中國圖書館蒐羅所得，清初士人選編詩集數量即有61部¹⁶⁴。其中尤以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具承先啓後的關鍵地位。

沈德潛，字槁士，號歸愚，江南長洲人。1739(乾隆4)年，以67歲高齡中進士，選庶吉士，散館後授翰林院編修。清高宗以其年老，恩眷頗隆，略有勵士之意，故旋遷內閣學士，上書房行走，禮部侍郎等職。1754(乾隆19)年沈德潛開始編纂《國朝詩別裁集》，1757(乾隆22)年完成批選，1759(乾隆24)年付梓。沈德潛在序文中將《國朝詩別裁集》與錢謙益(1582-1664)《列朝詩集》、朱彝尊(1629-1709)《明詩綜》相比擬。在凡例中略謂：詩教當以溫柔敦厚爲宗，故是選乃係「以詩存人，不以人存詩」，且「詩必原本性情，關乎人倫日用，及古今成敗興壞之故者，方爲可存」¹⁶⁵。《國朝詩別裁集》初刻本收錄詩作起自清初迄於1757年左右，計993位詩人，4,099首詩，共36卷；重刻本，收錄詩作止於1760(乾隆25)年左右，計996位，3,952首詩，共32卷；欽定本，刪減至927位詩人，3,000餘首詩，共32卷¹⁶⁶。沈德潛之《國朝詩別裁集》總結清初以降，迄於乾隆年間的詩作，可謂上承明末錢謙益《列朝詩集》和朱彝尊(1629-1709)《明詩綜》之遺緒，下啓王昶《湖海詩傳》，王豫《羣雅集》、《羣雅

十八年吳承勳刻本)，146-147。

¹⁶⁴ 參閱：謝正光，〈試論清初人選清初詩〉，《漢學研究》，15.2(臺北，1997.12)：171-184；謝正光、余汝豐(編著)，《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潘承玉，〈《清初人選清初詩匯考》六補〉，《古籍整理研究學刊》，5(長春，2002.09)：64-71；朱則杰，〈《清初人選清初詩匯考》“待訪書目”考論〉，《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5.1(杭州，2005.01)：82-88；朱則杰，〈《清初人選清初詩匯考》“待訪書目”補遺〉，《文學前沿》，(北京，2007)：80-90；朱則杰，〈《清初人選清初詩匯考》原錄序跋補遺〉，《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1.2(南昌，2008.04)：42-45；劉和文，〈《清初人選清初詩匯考》原錄序跋補闕〉，《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2.3(南昌，2009.06)：98-102。

¹⁶⁵ 沈德潛，〈序〉、〈凡例〉，收入：沈德潛(輯評)，《國朝詩別裁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5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清乾隆二十五年教忠堂刻本)，130-134。

¹⁶⁶ 松村昂，《清詩總集彙錄》，209-219。

二集》和符葆森《國朝正雅集》之志業¹⁶⁷。

1800年吳顥輯刊《國朝杭郡詩輯》，意在補充《國朝詩別裁集》甚少選錄浙江杭州府籍詩人作品之缺憾，並接續1761(乾隆26)年清高宗欽定《國朝詩別裁集》後，未及選錄的詩作，輯錄1,409位杭州詩人作品，共16卷。1803年王昶編纂《湖海詩傳》紹承半世紀以來，未刊行詩文總集之空白。1809年王豫哀輯《羣雅集》40卷，1811年續編《羣雅二集》9卷，皆秉持沈德潛溫柔敦厚，順成和動之宗旨。法式善認為應將《湖海詩傳》和《羣雅集》、《羣雅二集》，合而觀之，以探尋清朝唐宋詩派發展脈絡¹⁶⁸。

符葆森在自序中提及法式善、曾燠、鄭祖琛與陶澍等人，均有意編纂詩文總集，紹繼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陶樸、花沙納、沈兆霖與崇實等人之題序，對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選錄詩人，作品數量，起迄時間和詩作宗旨，給予高度評價。無論選錄詩人地域或起迄時間，符葆森《國朝正雅集》較王昶《湖海詩傳》和王豫《羣雅集》、《羣雅二集》，更能延續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的纂輯精神。凡此種種，略可說明哀輯詩文總集的傳統賡續未失。

其二，翁介眉認為：清初以降，「詩之盛也，莫今日若。詩之濫也，亦莫今日若。惟其盛，故不能無濫。惟其濫，則不得無選，而別其次第之體裁」¹⁶⁹。魏憲(1628-?)在〈詩持三集自序〉說明：「作詩非難也，選詩難，選亦非難也，選今人之詩難。同生天壤，不能無所愛憎，而去取實愛憎之媒」，尚有覓之

¹⁶⁷ 有關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之研究討論，可參閱：王煒，〈《清詩別裁集》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劉靖淵，〈詩中有人，詩外有事——兩個版本《國朝詩別裁集》比較中的清代詩史案研究〉，《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2.3(濟南，2007)：41-47。

¹⁶⁸ 松村昂，《清詩總集敘錄》，301-306; 325-329; 344-349。有關清朝唐宋詩派之爭，相關研究，請參閱：郭前孔，《中國近代唐宋詩之爭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0)；易聞曉、張劍(主編)，《道咸“宋詩派”詩人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¹⁶⁹ 翁介眉，〈序〉，收入：蔣鑰、翁介眉(輯)，《清詩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3(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清康熙二十年鏡閣刻本)，353。

無由，名實不符與掛一漏萬等諸多難處¹⁷⁰。故士人評選時人詩文總集，皆非無病呻吟，蓋蘊含深遠寓意於其中。尤以涉及人心風俗之詩教，為選編者再三揭示的核心宗旨。

1734(雍正12)年陳以剛、陳以樞和陳以明合編《國朝詩品》，「皆取發明經傳，及有關於世道人心者，其靡麗新聲，雖妙絕一時亦置而勿錄」¹⁷¹。沈德潛纂輯於乾隆年間的《國朝詩別裁集》，隱隱透露社會失序之徵兆，故強調人心風俗淳美的重要性。陶樑於1839年纂輯刊行《國朝畿輔詩傳》，該書以北京為限，收錄1646(順治3)年至1837年北京875位詩人作品，編為60卷。凡例中明言：「如忠義節烈之事垂之歌詠，足以翊名教而植綱常，有關世道人心尤非淺鮮，亟應采輯以廣流傳」，故「是集雖主選詩，義在存人」¹⁷²。其用心不言而喻。咸豐年間，符葆森繼承前輩志業編纂《國朝正雅集》時，面臨更嚴峻之時代變局，題名曰「正雅」，直接將寓意化為書名。

(三)張應昌與《國朝詩鐸》

張應昌纂輯的《國朝詩鐸》，不同於上述《熙朝雅頌集》、《國朝正雅集》與《國朝畿輔詩傳》，以人繫詩的呈現方式，而將詩作打散，依據主題內容重新編排，分為26卷，計153項類目，逾2,000餘首詩。張應昌透過153項類目，費心重整逾2,000餘首詩作，以呈顯時代面貌。

張應昌，字仲甫，號寄庵，浙江歸安人，其父張師誠歷任各省按察使、布政使和巡撫等職，政聲卓著，屢獲恩眷。張應昌雖為官宦子弟，然孝行馴謹，毫無貴氣，舉止宛若寒儒。1810年中舉後，任內閣中書，入實錄館負責

¹⁷⁰ 魏憲，〈詩持三集自序〉，收入：魏憲(輯)，《詩持全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3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清康熙枕江堂刻本)，385。

¹⁷¹ 松村昂，〈清詩總集彙錄〉，175-178。

¹⁷² 陶樑，〈國朝畿輔詩傳凡例〉，收入：陶樑，《國朝畿輔詩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68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10-11。

謄錄清仁宗實錄，因病致仕歸鄉。張應昌返鄉後以編著書籍為主。1855年初刊《春秋屬辭辨例編》，該書費時30年，蒐羅各家辨證《春秋》之作。諸友人對張應昌之治學精神，甚為崇仰敬佩¹⁷³。張應昌也補正沈名蓀、朱昆田(1652-1699)纂輯之《南北史識小錄》。張應昌晚年編有《國朝詩鐸》和《國朝詩正氣集》兩部詩集。《國朝詩正氣集》以收錄吟詠忠孝節義詩作為主，蒐羅逾萬首詩篇，冀期「振世扶綱常」，惜因戰亂亡佚¹⁷⁴。

1856年張應昌開始編纂《國朝詩鐸》工作，1869年竣工付梓。朱緒曾(1805-1860)闡述：自古以來重視詩教，清朝承此傳統，更「求其有裨風化，感發人心者」。張應昌纂輯《國朝詩鐸》，「專擇其關乎警覺之義者，錄於篇，名之曰鐸，以宣民隱，以資吏治，以厚風俗，以清政原，可以勸可以懲」，冀期「上之以裨聖天子明目達聰之化，下之以作愚氓發聾振聵之資」¹⁷⁵。應寶時(1821-1890)閱讀《國朝詩鐸》初稿後，嘆曰：「此天下不可無之書」，不僅有功於詩教，更是「鏡得失，察治忽」，諷世之作。是集收錄之詩皆有關人心世道與吏治，「以事標類，以類統詩，以詩存人」。因有感於張應昌經世之心，應寶時慨然出資助其刊行¹⁷⁶。王慶勳(1814-1867)略云：詩賦與政事、民風密切相關，頌揚張應昌纂輯《國朝詩鐸》采錄國朝攸關政事得失和民風媿惡者，以為世人警省¹⁷⁷。

張應昌在〈自序〉自問自答：《詩經》豈無「直言諷刺之作」？因深受杜甫〈潼關吏〉、〈石壕吏〉諸篇，以及白居易(772-846)、張籍(767-830)與王建(767-830)

¹⁷³ 吳鍾駿，〈序〉，收入：張應昌，《春秋屬辭辨例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3；朱緒曾，〈序〉，《春秋屬辭辨例編》，《續修四庫全書》，145/4；羅以智，〈序〉，《春秋屬辭辨例編》，《續修四庫全書》，145/5-6。

¹⁷⁴ 張應昌，〈自題國朝詩正氣集此集稿本亂後已失〉，《彝壽軒詩鈔》，《續修四庫全書》，1517/162。

¹⁷⁵ 朱緒曾，〈朱序〉，收入：張應昌(輯)，《國朝詩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6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29-330。

¹⁷⁶ 應寶時，〈應序〉，《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330-331。

¹⁷⁷ 王慶勳，〈王序〉，《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332。

等人新樂府詩風影響，故四處訪求當世杜甫、白居易、張籍與王建之詩。將是集命為《國朝詩鐸》，「以是為適人之警路，以是佐太史之陳風」，庶能興起讀者「好善惡惡之心」¹⁷⁸。張應昌於〈凡例〉中坦言：《國朝詩鐸》非為品評詩文格律、探討詩風理論而編，係為吏治民風，警世醒民而輯¹⁷⁹。《國朝詩鐸》內容以描寫社會弊病、災荒肆虐、戰火摧殘和生靈塗炭等主題為核心。如朱鶴齡(1606-1683)記述1670(康熙9)年，匯入太湖的溪水暴漲，淹毀附近農田民宅，卻未見官府伸出援手，只見老翁婦孺四處逃竄，無以為家¹⁸⁰；杜濬(1611-1687)則述及同一年揚州被災慘況¹⁸¹。顏光敏(1640-1686)對連年荒歉，小麥頻遭蟲害頗感無奈，冀期害蟲毋復來食倉中粟，飛去遮住欽差座騎¹⁸²。蔣廷錫(1669-1732)描繪康熙年間吳中地區被水多載，蠶、麥、豆、秧、米和柴均已荒歉¹⁸³。沈德潛賦詩慨歎三吳地區前年大旱，去年大水，今年亦霖雨不休，所有作物皆已泡水腐爛，無法收割，破舊房楹在風雨吹襲下，隨時將倒塌¹⁸⁴。而蔣士銓則描寫農夫為免餓死，忍痛賣牛，僅得三貫錢。富人藉由收購耕牛謀取暴利，寧將剩菜剩飯餵食雞豬，不願分與路旁乞食之人¹⁸⁵。

考察張應昌輯入《國朝詩鐸》的詩文內容，以戰爭和災荒相關議題占絕大多數。從單一類目來看，「兵事」75首和「災荒總」64首，分居1、2名。綜合相關議題，與戰爭相關的卷11、12、13，合計235首，和災荒有關的卷14、15、16，加總達241首，更勝戰爭議題，清楚呈顯張應昌的關懷核心。

¹⁷⁸ 張應昌，〈自序〉，《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332- 333。

¹⁷⁹ 張應昌，〈國朝詩鐸凡例〉，《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333- 334。

¹⁸⁰ 朱鶴齡，〈湖翻行康熙庚戌六月十二日〉，《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650。

¹⁸¹ 杜濬，〈揚州草〉、〈揚州炭〉、〈揚州春〉，《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633。

¹⁸² 顏光敏，〈麥雨歎〉，《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632。

¹⁸³ 蔣廷錫，〈六荒詩吳中水災數載因作是詩樂天云見之切不覺言之直也〉，《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634- 635。

¹⁸⁴ 沈德潛，〈愁霖歎〉，《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653。

¹⁸⁵ 蔣士銓，〈典牛歌〉、〈賣牛圖歌〉，《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374; 637。

卷次	類目	數量(首) ¹⁸⁶	卷次	類目	數量(首)	
卷 1	歲時	12	卷 18	循良歌頌	12	
	輿地	15		酷吏	1	
	政術總	7		清廉	3	
	善政	21		貪黷	5	
卷 2	財賦	7		權奸	3	
	米穀	25		世祿	7	
	漕政	23		仕宦	8	
卷 3	漕船	9		卷 19	考試	10
	海運	4			愛訓士	13
	錢法	8			勸民	9
	鹽筴	17	迎送伺應		6	
關征	19	諂媚諛頌	5			
卷 4	貢獻	11	卷 20	富貴貧賤	54	
	海塘	7		忠臣	40	
	河防江防橋梁	30		孝子	36	
卷 5	水利	29		友悌	12	
	農政田制	13		貞節	44	
卷 6	田家	58		義行	22	
	樹藝	18		靈異物性	19	
卷 7	蠶桑	32		卷 21	高隱	2
	木棉	15			曠達	18
	紡織	8			止足	7
卷 8	丈量	4	驕倨		5	
	催科	22	奢侈		15	
	稅斂	14	吝嗇		4	
	力役	36	惑溺		4	
卷 9	科派	22	純繆		3	
	擾累	20	勇伎		3	
	捕捉	4	凶惡		6	
	捉騾車	2	家訓	15		
	捉船	13	格言名論	22		
	官馬	8	果報	4		
卷 10	馬草	9	卷 22	讀書	21	
	刑獄	43		交際	20	
	盜賊	45		施予	3	
卷 11	兵事	75		崇儉	1	
	武功	7		節飲	4	
卷 12	將帥	38		遠色	4	
	兵卒	43		戒氣	1	
卷 13	軍餉	4		嗜古	5	
	軍器	7		賭博	5	
	屯田	2		風俗	12	

¹⁸⁶ 有關《國朝詩鐸》收錄詩文數量的計算標準：第1，以詩題為主，一個詩題若包含數首詩作，仍以一首計算；第2，同一首詩出現在不同類目，僅計算一次。

	邊防	1		祭祀	3
	苗獠	6		婚嫁	16
	島夷	24		喪葬	34
	懷遠	4		掩埋	8
	會匪	7		行旅	20
	捻匪	1		亂離	8
	棚客民	5		疾病	7
	左道	2		醫術	8
	民變	2		鬼神	60
	彈亂	7		燒香	4
卷 14	災荒總	64	卷 24	戒殺	29
卷 15	水災 <small>海嘯、湖翻、江溢、河決、淮決、潮災</small>	35	卷 25	愛物	11
	旱災 <small>禱雨、喜雨</small>	21		商賈	7
	風災	4		淘金	2
	雹災	2		采礦	2
	雪災	2		采銅鉛鐵	6
	雷異	1		采石	2
	日食	1		采木	1
	地震	5		采煤炭	5
	火災	12		采薪	2
蟲災 <small>鴨食禾</small>	5	瘠土貧民	2		
卷 16	捕蝗	20	卷 26	婦女	51
	伐蛟	8		夫婦	13
	捕虎	3		憫孤兒	4
	勘災查戶口	12		戒溺女	5
	賑飢平糶	43		憫婢 <small>細婢虛婢</small>	10
	蠲免	3		馭僕	2
卷 17	流民	28	蕩子狎客	5	
	鬻男女 <small>鬻婦</small>	31	倡優	19	
卷 18	用人	6	宦寺	10	
	察吏	1	異民	1	
	官箴	8	釋道	12	
	大吏	3	物產	9	
	守令	12	鴉片煙	19	
	吏胥差役	11	總計	2,096	

在災荒議題選輯上，張應昌充分映照黎民百姓面臨災荒，為求生存的艱困情景。清中葉以降，災荒情況愈加頻繁，百姓生活日漸艱難。柳樹芳(1787-1850)賦詩記述1814、1819年大旱災情，譴責胥吏奸猾嗜利，危害更甚旱災。賑濟災民的社會形同虛設，貧苦無依的百姓僅能自求多福¹⁸⁷。曾燠〈哀鴻詩二首〉

¹⁸⁷ 柳樹芳，〈苦旱行〉、〈苦旱吟〉，《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447- 448; 666。

藉鳥喻人，棄雛鳥於道，食已死同類充飢以求自保，哀鴻遍野的景象躍然紙上¹⁸⁸。樂鈞(1766-1816)的〈觀音土行〉，諷刺荒歲之際，窮人能飽食觀音土，不必期望富人施捨¹⁸⁹。曹楸堅(?-1859)描繪1824年因地方官深恐剛完工的洪澤湖隄壩潰決，未採行任何防護措施，任由大水漫延下游七州縣。災民僅能賣牛、賣兒女，拆屋為薪勉力求生¹⁹⁰。郭儀霄(1775-1859)與曹惠馨詩作，描述1831年的大水患，三郡23州縣盡皆淹沒入水中，數十萬百姓轉徙求生，途中更需慎防奸民劫奪，對災民而言無疑雪上加霜¹⁹¹。迄1832、1833年，災情仍未稍緩，依舊有大量災民食不飽衣不寒，路旁棄兒無人救助，多如烏鴉的飢民聽聞增設粥廠，競相奔至，惟粥廠缺乏政府支援和富人捐助，遲遲無法施放賑粥，飢民只得繼續啃食樹皮餅¹⁹²。

戰爭議題是《國朝詩鐸》另一主軸；「兵事」中多首詩作述及川楚教亂，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事件。伍承組在〈感憤詩〉中，細數清中葉以降大小戰事，痛陳官兵吸食鴉片，劫掠百姓的惡行¹⁹³。徐鑠慶記述畢沅功績，堆積如山的骸骨，役夫勞苦，釋放誤遭匪賊擄走之良民，以及汪志伊(?-1818)廣設賑廠救濟災民等，勾勒川楚教亂後人間煉獄般的情景¹⁹⁴。馬允剛賦詩呈顯川楚教亂中，官方利用築寨方式，逐步進剿匪賊。然此前民舍被焚，百姓逃竄，

¹⁸⁸ 曾燠，〈哀鴻詩二首〉，《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638。

¹⁸⁹ 樂鈞，〈觀音土行〉，《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640。

¹⁹⁰ 曹楸堅，〈愍災詩六首道光甲申冬高堰十三堡決後以次繕完禦黃壩堵閉兩年丙戌夏洪澤湖水長當事懼隄工不保遂啟五壩過水揚郡七州縣當下游者田廬盡沒較嘉慶丙寅決荷花塘害尤劇余客海陵人烟蕭寥萬室波蕩加之盲風怪雨無節觸悽慘之懷寫流離之狀因事命歌焉〉，《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644- 645。

¹⁹¹ 郭儀霄，〈哀鴻歎道光辛卯夏江西湖北水災男女數十萬轉徙道路死者枕藉〉，《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643；曹惠馨，〈紀災詩道光辛卯〉，《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648- 649。

¹⁹² 曹惠馨，〈後紀災詩道光壬辰〉，《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649；湯國泰，〈道光癸巳書事八勸歌〉，《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646- 647。

¹⁹³ 伍承組，〈感憤詩〉，《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560- 562。

¹⁹⁴ 徐鑠慶，〈峴山高〉、〈檢骸骨〉、〈役夫歎〉、〈釋囚人〉、〈請展賑〉，《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550- 551。

沔縣慘遭匪賊蹂躪¹⁹⁵。

在「將帥」與「兵卒」中，張應昌收錄多首詩作，歌頌川楚教亂身先士卒的將領，與在鴉片戰爭中英勇抗敵的死難將士，或表揚默默無聞的兵卒。如黃承吉(1771-1842)讚揚明亮在川楚教亂中指揮若定，英勇殲敵；屠倬與趙函則記述張永祥擅使鐵槍，率領鄉勇300人擊退教匪5,000餘人¹⁹⁶。孔繼鑠哀悼王錫朋、鄭國鴻與葛雲飛，在抗英戰役中英勇戰歿；夏之盛賦詩記述定海戰役，將士奮勇抗夷，仍不敵奸夷財誘，同袍倒戈，加上孤城無援，有功不賞，有罪必罰，只能以死報國¹⁹⁷。薛時雨(1818-1885)，許楣、張興烈和陳春曉等人的詩作，述及咸豐以降各地團練鄉勇；陳春曉指稱鄉勇較之於匪賊，更為恐怖、可惡¹⁹⁸。

張應昌特闢「島夷」一項，專門輯錄與英人相關史事。從擔憂西夷來華，介紹教堂、西洋器物、輪船，乃至於中英商貿，開戰對峙等內容，不一而足，顯見張應昌對西洋事物頗為留意。趙函賦詩哀悼虎門、廈門、舟山、蛟門、甬東、乍浦、吳淞、滬瀆、京口和金陵等十處淪陷故事，並追悼戰歿將士，包括：陳連升、陳舉鵬、關天培、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裕謙與余步雲等人。十首詩合而觀之，堪稱鴉片戰爭始末記，詩中記述官兵畏縮逃竄，百姓無所適從。加上漢奸受英夷利誘，致使戰爭失利¹⁹⁹。

¹⁹⁵ 馬允剛，〈築寨行〉，《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551- 552。

¹⁹⁶ 黃承吉，〈明將軍破賊歌教匪擾孝感明將軍亮一鼓破之數年漢陽人誦德不衰歌以美之〉，《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583；屠倬，〈張鐵槍歌〉，《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583- 584；趙函，〈鐵槍歌贈張永祥〉，《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586。

¹⁹⁷ 孔繼鑠，〈哀舟山三總戎殉節詩辛丑英夷犯舟山總戎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同日戰歿詩以哀之用陶詩詠三良韻〉，《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586；夏之盛，〈殘兵行辛丑定海之敗〉，《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597。

¹⁹⁸ 薛時雨，〈辦團練〉、〈募鄉勇〉，《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600；許楣，〈鄉勇歎〉、〈糧勇歎〉，《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600- 601；張興烈，〈新樂府悲民團〉，《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598；陳春曉，〈鄉勇叛〉，《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594- 595。

¹⁹⁹ 張應昌(輯)，《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608- 618; 629- 630。

嘉道咸之際，國家社會面臨鹽漕河三大政，銀錢議題，官箴吏治和人心風俗等問題，張應昌皆選錄相關詩作。然詩文內容泰半以描繪民生疾苦，斥責官吏怠惰為主。如陳文述〈記道光戊戌江南徵漕事〉、屠倬〈恤漕〉、薛時雨〈漕倉行〉、姚燮〈糧船行〉等，均有相同調性²⁰⁰。「胥吏差役」中，收錄詩作率皆嚴詞抨擊胥吏蠹行，形容胥吏刁悍狡詐，猶如噬人之虎²⁰¹。《國朝詩鐸》集末張應昌別立「鴉片煙」，該類目所收詩作，集中討論鴉片的歷史、流傳、吸食及其造成的諸多危害。如陳文述與胡琨詳述鴉片起源，傳入中國和流布歷程²⁰²。樂鈞和宋翔鳳(1779-1860)描寫吸食鴉片的方法，「牀頭一燈光熒熒，兩人長枕同橫陳。竹管製作卜字形，管穴中容煙一粒，一粒一人相遞吸，吸煙人如螿蟲螿」。吸食之後，「謂可散鬱紆，又足平輕躁，更云去夙疾，精神振衰耄」，「但云服之體輕健，彭祖秘術不足羨」²⁰³。

綜上所述，張應昌抱持強烈時代關懷，針對當前國家社會遭遇的諸多問題，盡皆一一蒐羅，忠實呈顯其警醒士庶的用心。揆諸清中葉以降繁多詩集纂輯，雖均隱含諷喻、惕厲之微言大義，然皆未如張應昌《國朝詩鐸》毫無掩飾的指摘。有異於以人繫詩之纂輯方式，《國朝詩鐸》選取153項主題，將相應詩作一一排比，帶給讀者更大衝擊，無怪乎應寶時讀後，發出「此天下不可無之書」的慨嘆。張應昌的《國朝詩鐸》在嘉道咸年間，有不容忽視的地位，允為詩史。

²⁰⁰ 陳文述，〈記道光戊戌江南徵漕事〉，《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395；屠倬，〈恤漕〉，《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396- 397；薛時雨，〈漕倉行〉，《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397- 398；姚燮，〈糧船行〉，《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7/ 404。

²⁰¹ 如：鄭燮，〈悍吏〉，《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8/ 45；羅天尺，〈虎差詩〉，《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8/ 45- 46；楊芳燦，〈堡渠長〉，《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8/ 46；郭儀霄，〈老太公〉，《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8/ 47。

²⁰² 陳文述，〈鴉片煙〉，《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8/ 292；胡琨，〈哀鴉片〉，《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8/ 294- 295。

²⁰³ 樂鈞，〈嶺南樂府鴉片煙〉，《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8/ 291；宋翔鳳，〈鴉片館〉，《國朝詩鐸》，《續修四庫全書》，1628/ 291- 292。

四、小結

1903(光緒29)年,《國民日日報匯編》刊載一篇名為〈近四十年世風之變態〉的文章,內容縷述1860年代至20世紀初的世風演變。文中將此40年劃分為6個階段,每個階段選取一部風行於世的作品以為代表,《格致彙編》、葛士濬(1848-1895)輯《皇朝經世文續編》、《盛世危言》、《時務報》、《清議報》和《新民叢報》。該文說明所選作品之寓意,依序為:製造、洋務、時務、變法、保皇與立憲等²⁰⁴。這6部作品是否能準確代表1860年代至20世紀初的世風演變,容或有待商榷。但讀完該文後,令人不禁想進一步探問,如將時序往前推移,嘉道咸年間的世風,究係何種樣貌?

透過本章之析論,嘉道咸年間不論官方或士人皆對時下人心風俗深表不滿,尤以奢靡風氣最為措意。身負牧民重任的官員,在傳統教化思想薰陶下,屢頒告示勸諭百姓戒除奢侈積習。在諸勸諭告示中,官員藉其布達政令,整飭士習文風,勸讀聖賢之書或緝捕盜匪等。未出仕之士人,藉詩詞文字頻頻發出慨嘆,冀期警醒士庶。不論批判奢靡、重利風氣,嚴詞抨擊人心風俗日趨卑下,對當前科舉制度缺乏時代所需人才的強烈不滿,皆忠實呈現於詩文中。

岡本さえ教授認為:時至19世紀,禁書已然放鬆,惟漢人士大夫面臨十分荒涼的中國學術界,舉凡歷史、政治、科學或國際情報等出版物,幾乎消失殆盡²⁰⁵。在此情況下,士人為解決當前社會危機,不得不重新整理舊有思想資源,冀期成為解決弊端的指南,纂輯文獻乃士人初步之努力。清仁宗、清宣宗與清文宗對人心議題均甚為關切,再三諭示化民成俗須施以教化,崇尚正學,方能轉化人心。然嘉道咸之際,官方已鮮少進行大規模編修書籍活

²⁰⁴ 佚名,〈近四十年世風之變態〉,收入:《國民日日報匯編》,收入:張枬、王忍之(主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冊(北京:三聯書店,1960),740-744。

²⁰⁵ 岡本さえ,《清代禁書の研究》,573。

動。代之而起者係由士人個人或集眾人之力，編纂書籍，而纂輯之書皆具明確宗旨和目的。正如朱琦在《國朝正雅集》序文中所言：士人以詩謠表達性情，唯有裒而輯之，方可「觀當時風尚，而極一代著作之盛」。透過詩文總集的修纂，乃能一窺士人詩文救國的態度，呈顯嘉道咸年間的時代風貌。

嘉道咸年間的士人詩文救國運動，賀長齡與魏源纂輯之《皇朝經世文編》，具有承先啓後的重要地位。該書除蒐羅當代士人有關經世論著外，亦加入前明士人著述，其中不乏清廷禁忌人物。士人築「正氣閣」，編纂《乾坤正氣集》，雖謂彙集自古以來具有正氣之詩文，惟以明朝士人為主軸，前明忠義故事再度回到世人眼前。尤有甚者乃直接裒輯前明忠義之士文集，作為鼓舞當前社會的催化劑，如倪元璐、施邦曜與周鳳翔等人之文集，皆在士人訪求下再版或初刊。清朝士人賦予前明士人時代新義，並將其抗清忠義，轉化為時下士庶之攘夷精神。然學術風潮的轉變非一蹴可幾，而有其動態過程。曾國藩的學思歷程充分展現嘉道咸年間的學術風潮，以及士人在師友網絡影響下捲入其中，進而繼續推動此風潮。

除編選前明與國朝經世文章，復活前明士人文集，士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環節乃賦詩吟詠，無論抒發心情，議論時事，酬酢師友或連絡感情，皆形諸詩賦。故追尋詩文總集的脈絡，更能發掘時代風貌。儘管沈德潛因《國朝詩別裁集》將錢謙益置於卷首，並收錄錢名世、吳偉業、龔鼎孳和屈大均等人詩作，遭清高宗斥責，沈德潛去逝後且引發文字獄案，生前所獲榮典皆遭褫奪，罷祠削謚，仆其墓碑，更諭令悉數銷毀《國朝詩別裁集》刻版。直至1779年，清高宗將沈德潛列為五詞臣末，始獲平反。然沈德潛一案，並未消弭士人纂輯詩文總集的熱情，士人紹承沈德潛的志業，續編詩集。

鐵保和陶樑在蒐集資料時，均面臨資料散失的危機，故乃加緊纂輯詩文，避免亡佚。在主客觀因素下，嘉慶年間，士人開始編纂清初以降詩集。如鐵保在川楚教亂甫告平定時刊行《熙朝雅頌集》，藉由頌揚昔日旗人的忠義氣節，以為時人借鏡。以鐵保為線索，隱約可見門生故舊網絡的痕跡，網絡中之師友多積極入世，意欲有所作為，在洪亮吉遣戍伊犁事件中，亦見吳

肅、法式善、阮元和張問陶等人踪跡。其後符葆森和張應昌擴大輯錄範圍，不再侷限旗人詩作，且詩集主軸不僅止於忠義精神，更涉及人心風俗。張應昌的《國朝詩鐸》指出當前社會弊病，可謂嘉道咸年間之詩史，分門別類置入士人詩作，令讀者感同身受，彷彿親歷其境。

即使如郭嵩燾嘗親眼目睹西方世界之士人，返國後痛心故里吏治敗壞，風俗澆薄，仍標舉整頓人心風俗為首要之務，積極投入相關工作，略可說明清中葉以降，士人時代關懷的主流思想。嘉道咸年間的士人再三強調人心風俗之重要性，以編纂經世文章和詩文總集的方式，冀期轉化風俗，端正人心，此時代世風，猶在士人間繼續傳承。





第六章 結論

本文嘗試回答：清嘉道咸時期，士人如何掌握時代脈動，及其時代關懷為何？然本文並非嘉道咸年間士人言論總集或百科全書，因此，無意也無法兼顧此時士人涉及的所有內容。即便如此，與此相關之議題極為龐雜，甚難一一細述，故以鳥瞰方式呈現其中較為關鍵的部分，希冀凸顯清中葉以降的時代變化，並以實例進行解說，捕捉嘉道咸時期的風貌，與士人的時代關懷。

在進入士人時代關懷的討論前，本文從官方視野出發，探尋清仁宗、清宣宗和清文宗三位皇帝對國家社會現況的掌握，歸納時代嬗變的核心主軸。第二章嘗試從清仁宗、清宣宗與清文宗三位皇帝的詩文、詔諭、實錄中，歸結當前國家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包括：旗人問題、內政弊病、涉外事務、人心風俗日趨卑下等，並略述皇帝的態度及其處置之法。清初諸帝眼見旗人入關後，迅速喪失滿族傳統風俗，故致力維繫滿族的獨特性，包括再三強調清語騎射與質樸風俗係滿族根本，嚴禁滿人沾染漢人文弱、奢靡習氣。邁入19世紀後，「人口」成為清朝官方急待克服的重要課題。乾隆年間起，「承平日久，生齒日繁」成為重要關鍵字，激增的人口帶給清廷極大困擾，對內政產生不少負面影響，本文略以災荒、吏治、鹽漕河、銀貴錢賤、礦務等議題為例證，呈顯日趨紊亂的局勢。正當諸帝分心處理內政之際，外患已步步進逼。由於缺乏對戰經驗，且對夷敵虛實茫然不知，故多採取逃避態度。儘管諸帝均已感知內政與涉外事務皆發生嚴重弊病，再三諭示臣民應同心協力整治國家。最後，猶訴諸風俗人心的淳化，冀期導正社會歪風。

岸本美緒教授認為，17世紀清朝肇建之初面臨的問題包括：民族、宗教與國家統合；市場經濟與財政；以及身分、社會團體、政治秩序等三大問題¹。並指陳清世宗在曾靜案中，撰述《大義覺迷錄》回應清朝在民族議題、經濟政策、政治體制等面向的統治，且清世宗試圖將其理念化為國家政策²。透過本文第二章的析論，略可發現經過乾隆朝的時代變遷，再度讓這三大問題重新浮出檯面。降至19世紀，清廷依舊遭遇同樣考驗：民族議題逐步擴大為華洋衝突；經濟政策擴大為全面性賦稅與銀貴錢賤等問題；政治體制亦演變為官胥的整體腐敗和蠹害。顯見上述相關問題至關重要，從17世紀清朝建國迄19世紀中葉，歷經二百餘年變遷，仍係政府無法迴避的重大議題。

循此線索，將視角轉移至士人身上，考察士人對此核心主軸的觀察與回應。第三章討論士人對相關內政議題的多旋律線關懷，士人紛紛從不同觀點描繪當前社會樣貌。如洪亮吉、龔自珍、尹壯圖等人，從生齒日繁、吏治廢弛、人心奢靡、風俗澆薄等角度切入，指陳自1790年起清朝已出現衰世景象。魯一同和郭嵩燾則從頻仍的災荒，觀察出1831年乃清朝由盛轉衰的重大轉捩點。無論從哪個角度切入，士人率皆強調：因承平日久，官民喪失因時制宜、革故鼎新的勇氣，舉國上下瀰漫著因循態度，致使諸多弊病積重難返，其中尤以人口問題為士人關注的重要焦點。人口問題不但影響環境生態，亦對國家制度和政府管理產生衝擊，輕則相互告官控訴，重則引發分類械鬥，細察其導火線皆與人口問題密切相關。有限且日趨飽和的土地，無法負荷高速成長的人口，人民為求生存四處流徙，由於缺乏妥善規劃，移住民不僅對新地區的環境、經濟、治安，產生諸多負面影響，甚至爆發嚴重衝突，增加政府治理的負擔。由於官吏本身已弊病繁多，士人屢屢針對官制、胥吏、陋規等問題進行討論，試圖提出治本之道。士人對政府效率，官員胥吏的素質等，

¹ 岸本美緒，〈「近世化」論と清朝〉，收入：岡田英弘(編)，《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232-239。

² 岸本美緒，〈一八世紀の中国と世界〉，收入：岸本美緒，《風俗と時代観——明清史論集1》(東京：研文出版，2012)，111-143。

均大力抨擊。儘管清宣宗即位之初，嘗試變革陋規弊病，然旋遭反對。各種稅收的陋規、浮收問題，深深影響整體經濟財政，其中銀錢尤為一大難題。

第四章環繞鴉片戰爭前後，士人對涉外事務的清議與相關人物之品藻為主軸。遭遇來自海上的夷敵，乃清廷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經驗，故士人對英人的認識與描述，影響後續和戰態度。儘管少數士人在相關論著中稱讚英人的船隻、火器、機械極為精良，但近乎眾口鑠金，強烈厭惡英人犬夷之性、唯利是趨、僅恃奇計淫巧。故面對英人挑釁，清廷應有十足勝算，能輕易擊退夷敵，彰顯天朝國威。但戰局的發展出乎士人意料，無辜百姓遭受戰火肆虐，引發士人側隱之心。為尋求戰敗咎責，士人強烈批評主和人士誤國，漢奸誤事，英勇有能將士慘遭構陷，大力頌揚死難將士，冀期激發忠義之氣，喚醒群眾抗夷精神。在此同時，掀起一股神化主戰士人的風潮，林則徐與姚瑩被形塑成抗敵攘夷的英雄人物。在此氛圍下，儘管遭遇戰爭挫敗的事實，士人卻有「非戰之罪」的感嘆，對天朝形象依舊充滿信心。透過士人網絡，一再強化權臣、庸員、漢奸誤國的論述，並強調只需皇上聖明，懲治主和大臣，革除積弊，當能重振國威。紀念顧炎武、蘇軾和歐陽修的活動，以及在特殊地點聚會，成為士人議論時事，維持天朝想像，凝具共識的重要途徑。士人更抱持安內即可攘外的心態，將夷務問題置於內政脈絡下進行論述。

面對內外交逼的困境，無論安內或攘外，部分士人提出的治本之法，均回歸人心風俗。第五章從士人勤頒勸諭告示，以求化民成俗的實際執行層面切入。在批評人心風俗日趨卑下之餘，士人觀察出缺乏符合時代所需人才的問題，因而觸及人才培育與學術風氣的討論。除頒布勸諭告示以整治人心風俗外，運用詩詞文字的力量振奮士氣，挽救世運，尤為士人心心念念之志業。於是士人積極編纂經世文編，或針對當前鹽漕河諸弊撰述文稿，以為治國之藥石。前明士人的經世論著與忠義故事，也成為清朝士人的救國素材，經由四處訪求後再版或初刊，重新賦予新的時代意義，並轉化其抗清忠義，藉以喚醒士庶的攘夷精神。惟學術風潮的轉變非一蹴可幾，而係一種動態過程。觀察此時學術風潮，隱約可見其動態樣貌，士人側身其中，很難不受影響。

以曾國藩為例，其思想形塑深受時代思潮影響，不論詞章、考據、義理或經濟之學，皆與嘉道咸時代密切相關。師友網絡亦啓了關鍵作用，在網絡推動下，曾國藩捲入其中，持續擴大網絡的影響力。而詩賦之影響尤不容忽視，士人積極革新詩風，並透過纂輯詩集，提倡忠義精神、昌明詩教和警醒士庶。鐵保在川楚教亂甫告平定時，刊行《熙朝雅頌集》，特意頌揚昔往旗人的忠義氣節，作為時人借鏡。符葆森和張應昌擴大輯錄範圍，不再侷限旗人詩作，且詩集主軸不僅止於忠義精神，更涉及人心風俗的面向。張應昌《國朝詩鐸》可謂嘉道咸年間的詩史，分門別類指摘當前社會弊病，再置入士人詩作，讀起來令人有身歷其境的真切感受。

綜觀嘉道咸年間，士人關懷時代的焦點仍以內政為主，故本文借用多旋律線的概念，呈顯士人對人滿之患、官箴吏治，鹽漕河大政、銀錢經濟等議題的討論。其後，因鴉片戰爭之故，涉外相關事務成為士人關懷時代的另一條主軸。部分士人進行若干外國事務的引介工作，卻有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看世界，且戴上厚重的儒家眼鏡，以傳統中華思想理解世界，排列世界秩序。惟士人認為根絕夷務問題的解決之道須從內政著手，徹底改革的方法當以人心風俗為要，回歸人性與天良。孫鼎臣撰述之《孫芝房侍講芻論》即為最佳佐證，略可代表時下士人重視人心風俗的態度。該書開頭六篇〈論治〉的主題，依序闡述：人心風俗、佛教思想、科舉考試、士氣，州縣官吏、銀錢議題，充分說明孫鼎臣認為治理國家當由此六大面向著手。其後，再針對他認為較為重要的部分，鹽、漕、幣、兵、官制等，深入討論。後續討論中，不時提及諸多革新治本之法，當從正人心、淳風俗開始。

除憑藉一己之力，嘉道咸年間士人時代關懷的另一條重要途徑乃師友網絡的連結，及其形塑之輿論。嘉慶年間洪亮吉針對當前內政諸多弊病，大膽諫言，嚴詞抨擊，因而獲罪遣戍伊犁。然入獄後與遣戍途中，許多師友、官員、百姓，皆為其打氣，並表態支持。道光朝發生林則徐和姚瑩因對抗英夷，遭遣戍或蒙受冤屈事件。士人網絡戮力聲援，相較於洪亮吉案，士人更勇於表達支持立場。而在遣戍伊犁和押送候審途中，師友故舊和地方官員率皆熱

情款待。兩人平反後，受到英雄式歡迎，邀宴不斷，眾人爭相一睹風采。凡此種種，皆可說明士人自嘉道之際始，逐漸擺脫清初以降的政治壓力，此前避之唯恐不及的政論話題，成為聚會的核心議題，士人積極參與議論時政，藉以表達自身態度，且凝聚共識，上奏皇帝，希冀引導士人輿論，左右國家政策方向。

此外，師友故舊相互為彼此刊刻的詩文集題寫序跋，或在特定節日、地點進行相關紀念儀式，宴遊作樂，飲酒品茗，尤為士人網絡連結的重要方式。本文論析士人經常在蘇軾或歐陽修的生日當天，邀集友朋聚會，吟詠唱和，以資紀念。間或成立祭祀顧炎武的團體，表達追思懷想之意。本文以鐵保為線索，勾勒其門生故舊彼此提攜，聚會雅集和相互標榜等情形。細察鐵保多位門生故舊的詩文集序跋作品，可發現多由同一網絡的士人相互題寫，文中或稱讚作者為人品格高尚，精神可感；或頌揚詩文內容精妙，契合時代風潮。士人均希望藉由刊行詩文集發揮影響力，達到移風易俗、匡正人心之目的。士人網絡在平時透過宴集，題寫詩文序跋等方式聯絡感情。一旦遭遇重大事件，群起發聲，表達立場，縱論時事，形成輿論風潮。

面臨時移世變，在師友網絡的相互影響下，士人漸從訓詁鉅釘的故紙堆中走出，各出機杼回應變局。雖然部分士人的時代關懷之道，略有幾分考證學遺風，如利用考據學方法，重新認識西北史地³。誠如岡本さえ教授所形容，儘管政府對禁書管制漸趨放鬆，但19世紀的士人面臨荒涼之學術界，只能從最熟悉的考證學遺產著手，蒐羅傳統學術、歷史知識與當代掌故，從中尋求對應時局的線索，賦予新的時代意義。隨著時代巨輪的轉動，依恃遵循理學安身立命的士人，使同治朝內憂外患的困境獲得舒緩。故部分士人冀期加強理學力量，訴諸人心，以根絕社會亂象。惟有部分士人倡議應與世界接軌，學習西方技藝。

³ 相關研究討論，可參閱：郭麗萍，《絕域與絕學：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7）；賈建飛，《清代西北史地學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1866年12月和1867年1月，以倭仁、奕訢為代表的兩大陣營，就同文館是否應增設天文算學館，與招生資格是否應擴及正途人員，展開言詞交鋒，由最初的政治制度問題，演變為學術思想、義利之辨和夷夏之分的攻防⁴。在這場爭議中，未有一方獲得壓倒性勝利，但以倭仁為首的理學派，取得較多士人支持，奕訢抱怨：「自倭仁倡議以來，京師各省士大夫，聚黨私議，約法阻攔，甚且以無稽謠言，煽惑人心」⁵。綜觀倭仁在同文館爭議中堅持的論點，其核心始終環繞在維持人心與夷夏之防，並由此出發擴及各層面。倭仁在奏疏中強調的「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⁶，乃其思想內涵最真切的描述。倭仁認為學術、人心、風俗、人才、世運，皆環環相扣，故「正學術，養人才，求直言，化畛域，裁冗食，警游惰，重本黜末，崇實黜華」方為當務之急⁷。

這種要求回歸人心，強調義理的論述，難以抵擋日趨強大的西力東漸。1861年馮桂芬撰述《校邠廬抗議》，書中諸多議論涉及吏治、夷務、經濟等面向。成長於嘉道咸年間的馮桂芬，在主張變革科舉取士，用人行政與鹽漕賦稅制度之餘，提出「采西學」、「製洋器」的建議，成為日後洋務運動的先行者。1889(光緒15)年翁同龢(1830-1904)向清德宗(1871-1908)推薦此書⁸，1898(光緒24)年孫家鼐(1827-1909)奏請清德宗，諭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須針對《校邠廬抗議》一書回覆意見，提出可供參酌之處與相關執行辦法⁹。1888(光緒14)年葛士

⁴ 有關奕訢兩次的上奏內容，請參閱：奕訢，〈奕訢等奏擬設館學習天文算學摺〉、〈奕訢等奏酌擬學習天文算學章程呈覽摺〉、〈同文館學習天文算學章程摺〉，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李書源(整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5(北京：中華書局，2008)，1945-1946；1982-1985。

⁵ 奕訢，〈奕訢等奏再議覆倭仁招考天文算學請罷前議摺〉，《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5/2029-2031；所引在2030。

⁶ 倭仁，〈倭仁奏正途學習天文算學為益甚微所損甚大請立罷前議摺〉，《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5/2009-2010；所引在2009。

⁷ 倭仁(著)、張凌霄(校注)，《倭仁集注》(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卷4/191。

⁸ 翁同龢(著)、陳義杰(整理)，《翁同龢日記》，4(北京：中華書局，2006)，2256。

⁹ 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廷簽議「校邠廬抗議」檔案彙編》，1-25(北京：線裝書局，2008)。

濬在《皇朝經世文續編》中新增「洋務」一類，1897(光緒23)年陳忠倚的《皇朝經世文三編》，1902(光緒28)年何良棟的《皇朝經世文四編》，皆摻入許多西學思想資源。說明經世文編針對時代所需，逐漸加入新知識，殆與1827年賀長齡、魏源刊行的《皇朝經世文編》判若鴻溝。

雖然激烈且全面抵制西學、洋務的論調，自咸同以降已無法符合社會實際需求。但重視人心，以人心為一切根本的論述，並未全然消失。1894(光緒20)年唐文治(1865-1954)上奏〈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摺〉，陳請應「毅然獨斷，破除常格，改易新政」，即使開罪名教，亦應習西學、辦洋務，但仍呼籲正人心與維持士習文風的重要性，否則一味學習西法，中國將「去人倫，無君子」¹⁰。唐文治進而要求士人應以「理學為體，經濟為用」¹¹，在在顯露其正人心不忘務經世，務經世不忘正人心的思想。1921年唐文治創辦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仍再三強調人心的重要性，及其與學術、國家的密切關係¹²。或可說明嘉道咸年間學術文化思潮的脈動，迄民國初年依舊有跡可尋。

最後，讓吾人再次回到嘉道咸年間，以祁寯藻的一段自白作為結束。1861年祁寯藻在日記中回顧天下大勢，追憶從1850年粵西賊匪亂起後，東南半壁盡皆陷落，慘遭匪徒蹂躪。加上粵閩土寇、雲南回匪、貴州苗匪等肆虐，致使全國生靈塗炭。幸賴駱秉章(1793-1867)、胡林翼與僧格林沁等人，統兵追剿賊匪，始得保全。然1860年夷匪竟突入京師，焚燬皇家御所，此誠千古以來罕有之變。於是鴉片弛禁，流毒中原，洋教傳布海內，乃「亘古以來未有之大變」。故祁寯藻強調：不吸鴉片，不習洋教者，始為聖朝良民志士。唯祁寯藻仍慶幸當前係「年豐俗美，兵燹不及」。不日，聽聞太平天國行將覆滅，

¹⁰ 唐文治，〈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摺〉，收入：唐文治，《茹經堂奏疏》(臺北：環球書局，1970)，1/2255-2257; 2266-2270。

¹¹ 唐文治，〈思辨錄劄記·續思辨錄題詞〉，收入：王桐蓀、胡邦彥、馮俊森(等選注)，《唐文治文選》(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194。

¹² 相關研究討論，可參閱：唐屹軒，《無錫國專與傳統書院的轉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8)。

慨云：此乃「中興氣象日新」，「再覩昇平，雖死不恨矣」¹³。這位橫跨嘉道咸三朝的重臣、帝師，在歷經內外交迫的世變後，依舊對未來充滿信心，深信昇平之世即將來臨。儘管國家正面臨前所未有之大變，仍訴諸士人良心，拒信洋教、排拒夷務，斯乃聖朝良民志士。祁寯藻在日記中的這段自白，略可為嘉道咸時期士人的時代關懷，留下一個貼切的註腳。



¹³ 祁寯藻，《息園日記》，收入：祁寯藻(著)、《祁寯藻集》編委會(編)，《祁寯藻集》，1(太原：三晉出版社，2011)，255; 257。

徵引書目

一、檔案

1. 花沙納，〈奏爲請急停捐納舉人生員成議酌行鈔法以培國本〉，《軍機處檔摺件》，086128號。
2. 楊文定，〈奏請行鈔法以裕庫藏平銀價而厚民生〉，《軍機處檔摺件》，087471號。
3. 蔡賡颺，〈奏請飭禁杭湖兩府棚民墾種山場湖田〉，《軍機處檔摺件》，066866號。

二、專書

1. 《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校)，《魏源全集》，1-20，長沙：岳麓書社，2004。
2. Chang Hsin-pao,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中譯本：張馨保(著)、徐梅芬(等譯)，《林欽差與鴉片戰爭》，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3. Elliott, Mark C.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New York: Longman, 2009.
4. Elman, Benjamin A.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中譯本：趙剛(譯)，《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5. Elman, Benjamin A.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中譯本：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6. Fairbank, John 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0- 11, Late Ch'ing 1800-1911*.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7. Fairbank, John 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中譯本：杜繼東(譯)，《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8. Fay, Peter Ward. *The Opium War, 1840-1842: Barbarians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War by Which They Forced Her Gates Aj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5.
 9. Grantham, A. E. *A Manchu Monarch: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a Ch'ing*. Arlington, V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6.
 10. Gützlaff, Karl Friedrich August. *The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with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Including a Sketch of the Principal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During the Last Fifty Years*.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65, Cornhill, 1852.
 11. Hevia, James Louis.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中譯本：鄧常春(譯)，《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12. Lin Man-Houng(林滿紅), *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中譯本：林滿紅、詹慶華(等合譯)，《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
 13. Naquin, Susan, Rawski, Evelyn S.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中譯本：陳仲丹(譯)，《十八世紀中國社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14. Philip L. Ralph, Edward McNall Burns(著)、文從蘇(等譯)，《世界文明史·後篇》，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9。

15. Polachek, James M. *The Inner Opium War*.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1992.
16. Wright, Mary Clabaugh.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中譯本：房德鄰(等譯)，《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17. 卜正民(著)、黃中憲(譯)，《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17世紀全球貿易》，臺北：遠流出版社，2009。
18. 上海書店出版社(編)，《清代文字獄檔(增訂本)》，上海：上海書店，2011。
19. 上海圖書館(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圖志》，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1。
20. 大谷敏夫，〈清代政治思想と阿片戦争〉，京都：同朋舎出版，1995。
21.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
22.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奏稿》，上、中、下，北京：中華書局，1965。
2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24. 中國史學會(主編)，《第二次鴉片戰爭》，1-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1979。
25. 中國史學會(主編)，《鴉片戰爭》，1-6，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1，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2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廷簽議「校邠廬抗議」檔案彙編》，1-25，北京：線裝書局，2008。
2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1-55，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2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1-3，北京：中華書局，1984。
30. 中華書局(編)，《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1-8，北京：中華書局，1979。
31.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1-60，北京：中華書局，1986。
32. 中華書局編輯部、李書源(整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1-10，北京：中華書局，2008。
33. 尹壯圖，〈尹楚珍先生年譜〉，收入：《叢書集成續編》，31，上海：上海書店，1994。

34. 井上裕正，《林則徐》，東京：白帝社，1994。
35. 井上裕正，《清代アヘン政策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4。
36. 今井駿(等著)，《中国現代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84。
37. 孔繼鑠(著)、劉承幹(校)，《心嚮往齋詩文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160，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據南林劉氏求恕齋叢書排印。
38. 方東樹，《半字集·考槃集·王餘集·儀衛軒遺詩·攷槃集文錄》，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0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9. 方東樹，《攷槃集文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9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0. 方濬師(撰)、盛冬鈴(點校)，《蕉軒隨錄·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
41. 木下鉄矢，《清朝考證學とその時代：清代の思想》，東京：創文社，1996。
42.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43. 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44. 王克讓，《河嶽英靈集注》，成都：巴蜀書社，2006。
45. 王芑孫，《淵雅堂編年詩藁·傷補未定藁·淵雅堂外集·讀賦卮言·淵雅堂詩文續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8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6. 王拯，《龍壁山房詩草·龍壁山房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5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7. 王柏心，《百柱堂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8. 王茂蔭，《王侍郎奏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500-50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9. 王重民(主編)，《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9再版。
50. 王家儉，《魏源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
51. 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4。
52. 王桐蓀、胡邦彥、馮俊森(等選注)，《唐文治文選》，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
53. 王景賢，《伊園文鈔·伊園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9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54. 王雲五(主編)，《道咸同光四朝奏議》，1-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55. 王慶雲，《石渠餘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56. 王錫祺(編輯)，《補編再補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1-10，臺北：廣文書局，1964。
57.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1-20，北京：中華書局，1987。
58. 王澐，《鈔幣芻言·鈔幣芻言續刻》，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8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59. 包世臣，《安吳四種》，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60.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輯)，《清代文字獄史料彙編》，1-14，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
61. 史革新，《晚清理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62.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淦(譯)，《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臺北：時報文化，2005。
63.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淦(譯)，《曹寅與康熙》，臺北：時報文化，2012。
64.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淦、吳家恆(譯)，《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臺北：時報文化，2002。
65. 白清才、劉貫文(主編)，《徐繼畬集》，1-4，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5。
66. 石橋崇雄，《大清帝国への道》，東京：講談社，2011。
67. 吉澤誠一郎，《清朝と近代世界19世紀》，東京：岩波書店，2010。
68. 早野惠，《清英近世談》，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850，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
69. 朱梅光，《近代中國外交史學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12。
70. 朱琦，《怡志堂詩初編·怡志堂文初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1. 朱葵之，《妙吉祥室詩鈔·壽閒齋吟草》，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2. 朱鳳鳴，《食字齋文集·尙書題論》，族弟錦雲刊本，光緒玖年癸未新鐫，藏於日本東洋文庫。
73. 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74. 百齡，《守意龕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7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5. 百瀨弘，《明清社会經濟史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80。

76. 亨特(著)、馮樹鐵、沈正邦(譯)，《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77. 何仁山，《鋤月山房文鈔·艸艸堂詩艸》，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8. 何炳棣(著)、葛劍雄(譯)，《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北京：三聯書店，2000。
79. 何晏(注)、邢昺(疏)、朱漢民(整理)，《論語注疏》，上、下，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1。
80. 何桂珍，《何文貞公遺書》，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81. 何紹基(撰)、龍震球、何書置(校點)，《何紹基詩文集》，1-2，長沙：岳麓書社，2008。
82.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83. 吳廷棟，《拙修集》，同治10年六安求我齋刊，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室。
84. 吳肅公，《街南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4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清康熙二十八年吳承勳刻本。
85. 吳嘉賓，《求自得之室文鈔》，同治丙寅刊於廣州，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室。
86. 吳福環，《清季總理衙門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87. 吳慶坻(著)、劉承幹(校)、張文其、劉德麟(點校)，《蕉廊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0。
88. 吳肅，《吳學士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8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9.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1-12，北京：中華書局，1980。
90. 呂斌(編著)，《龍啓瑞詩文集校箋》，長沙：岳麓書社，2008。
91. 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運(修訂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92. 李典蓉，《清朝京控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93. 李岳瑞，《悔逸齋筆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94. 李杭，《小芋香館遺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8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95. 李彥章，《潤經堂自治官書》，收入：楊一凡、王旭(編)，《古代榜文告示彙存》，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96. 李春光(纂)，《清代名人軼事輯覽》，1-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97. 李星沅，《李文恭公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8. 李珍華、傅璇琮，《河嶽英靈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2。
99. 李祖陶(輯)，《國朝文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669-167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0. 李常慶，《四庫全書出版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101. 李細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102. 李景文(點校)，《汴梁水災紀略》，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
103. 李棠階(著)，穆易(校點)，《李文清公日記》，長沙：岳麓書社，2010。
104. 李鼎聲，《中國近代史》，收入：《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民國叢書》第四編，78，上海：上海書店，1992。
105. 李璋煜，《視已成事齋官書》，收入：楊一凡、王旭(編)，《古代榜文告示彙存》，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106. 李翰章(編纂)、李鴻章(校勘)、寧波(等校注)，《足本曾文正公全集》，1-8，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107. 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上、中、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108. 杜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再版。
109. 沈兆澐，《織簾書屋詩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9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10. 沈垚，《落帆樓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11. 沈筠(編錄)，《乍浦集詠》，道光丙午四月，藏於日本東洋文庫。
112. 沈維鏞，《補讀書齋遺藁》，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13. 沈德潛(輯評)，《國朝詩別裁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5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清乾隆二十五年教忠堂刻本。
114. 汪士鐸(著)，鄧之誠(輯錄)，《汪悔翁(士鐸)乙丙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115. 汪廷珍，《實事求是齋遺藁·實事求是齋遺藁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4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16. 汪榮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117. 汪熙，《約翰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18. 來新夏(編著)，《林則徐年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2版。
119. 來新夏(編著)，《林則徐年譜新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
120. 來新夏，《清人筆記隨錄》，北京：中華書局，2005。
121. 和田春樹(等編集)，《岩波講座·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東アジア世界の近代19世紀》，東京：岩波書店，2010。
122. 周沐潤，《柯亭子詩初集·柯亭子詩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23. 周星譽，《東鷗草堂詞》，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7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4. 周振鶴(撰集)、顧美華(點校)，《聖諭廣訓：集解與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125. 周騰虎，《餐芍華館詩集·餐芍華館遺文》，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6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26. 孟森，《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10。
127. 季壓西、陳偉民，《從「同文三館」起步》，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
128. 宗稷辰，《躬恥齋文鈔·躬恥齋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76-57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29. 尙小明(編著)，《清代士人游幕表》，北京：中華書局，2005。
130. 岡本さえ，《清代禁書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
131. 岡田英弘(編)，《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
132. 岸本美緒，《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経済変動》，東京：研文出版，1997。
133. 岸本美緒、宮嶋博史，《明清と李朝の時代》，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8。
134. 岩下哲典，《江戸の海外情報ネットワーク》，東京：吉川弘文館，2006。
135. 岩下哲典，《幕末日本の情報活動——「開国」の情報史》，東京：雄山閣，2008增補版。
136. 易聞曉、張劍(主編)，《道咸“宋詩派”詩人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137. 林士鉉，《清代蒙古與滿洲政治文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9。
138. 林昌彝(著)、王鎮遠、林虞生(標點)，《林昌彝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39. 林則徐，《雲左山房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

- 彙編》，54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40. 林則徐，《雲左山房詩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41. 林學忠，《從萬國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國際法的傳入、詮釋與應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42. 松村昂，《清詩總集鈔錄》，東京：汲古書院，2010。
143. 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存素堂詩初集錄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7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44. 法式善，《存素堂續集·存素堂詩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43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45. 祁寯藻(著)、《祁寯藻集》編委會(編)，《祁寯藻集》，1-3，太原：三晉出版社，2011。
146. 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上、下，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147. 侯楨，《古抒秋館遺藁》，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6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48. 俞正燮，《癸巳類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15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49. 俞德淵，《默齋公牘》，道光庚子冬鐫，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
150. 姚永樸，《舊聞隨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151. 姚瑩，《東溟文集·東溟外集·東溟文後集·東溟文外集·後湘詩集·後湘二集·後湘續集·中復堂遺稿·中復堂遺稿續編》，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52. 姚瑩，《東溟奏稿》，收入：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45，臺中：文听閣圖書公司，2007。
153. 姚燮，《復莊詩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32-153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54. 宣昌緒，《留讀齋詩集》，收入：文清閣(編)，《稀見清人別集百種》，34，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155. 故宮博物院(編)，《味餘書室全集定本》，1-2，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156. 故宮博物院(編)，《清仁宗御製文·養正書屋全集定本》，1-2，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157. 故宮博物院(編)，《清仁宗御製詩》，1-7，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158. 故宮博物院(編),《清宣宗御製文·清文宗御製詩文·清穆宗御製詩文·清德宗御製詩文》,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159. 故宮博物院(編),《清宣宗御製詩》,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160. 故宮博物院(編),《清高宗御製文》,1-2,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161. 施立業,《姚瑩年譜》,合肥:黃山書社,2004。
162. 柯悟遲、陸筠(撰)、祁龍威(校註),《漏網嗎魚集·海角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163. 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1-3,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164. 段超,《陶澍與嘉道經世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165. 洪亮吉(撰)、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1-5,北京:中華書局,2001。
166. 范文瀾,《中國近代史》,收入:《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民國叢書》第四編,78,上海:上海書店,1992。
167.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5二版。
168.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豐皇帝突訃》,北京:三聯書店,2006。
169. 倭仁(著)、張凌霄(校注),《倭仁集注》,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
170. 倪玉平,《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171. 唐文治,《茹經堂奏疏》,臺北:環球書局,1970。
172. 唐屹軒,《無錫國專與傳統書院的轉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8。
173. 唐啓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174. 唐鑑(撰)、李健美(校點),《唐鑑集》,長沙:岳麓書社,2010。
175. 夏燮,《中西紀事》,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
176. 孫玉庭,《延釐堂集》,1872年孫毓漢校刊本,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
177. 孫延釐(撰)、徐和雍、周立人(整理),《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178. 孫義鈞,《好深湛思室詩存》,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5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79. 孫鼎臣,《孫芝房侍講芻論》,咸豐十年五月刊于武昌節署,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
180. 孫曉芬(編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

181. 孫靜庵，《棲霞閣野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182. 孫鏘鳴(撰)、胡珠生(編注)，《孫鏘鳴集》，上、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183. 徐中約(著)、計秋楓、朱慶葆(譯)，《中國近代史》，上、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184.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1-13，北京：中華書局，1984-1986。
185. 徐時棟，《烟嶼樓詩集·烟嶼樓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5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86. 徐鼎(撰)、劉榮喜(校注)，《未灰齋詩文集》，成都：巴蜀書社，2009。
187. 烏有生、嶺田楓江、橋本貞秀，《海外新話》，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849，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
188. 秦仲蘇(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
189. 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1-5，北京：中華書局，2011。
190. 翁心存，《知止齋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91. 翁同龢(著)、陳義杰(整理)，《翁同龢日記》，1-6，北京：中華書局，2006。
192. 袁綬，《瑤華閣詩草·瑤華閣詞鈔·瑤華閣詞補遺·閩南雜詠》，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93. 袁翼，《邃懷堂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6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94. 高翔，《乾隆下江南》，中和：雲龍出版社，1991。
195. 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196. 崑岡(等修)、劉啓端(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798-8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97. 張升，《《永樂大典》流傳與輯佚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198. 張成權，《王茂蔭與咸豐幣制改革》，合肥：黃山書社，2005。
199. 張金鏞，《躬厚堂詩錄·躬厚堂詩初錄·絳跣山館詞錄·梅花閣遺詩·躬厚堂雜文》，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00. 張問陶(著)、成鏡深(主編)，《船山詩草全注》，1-4，成都：巴蜀書社，2010。
201. 張國剛(等著)，《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202. 張國剛，《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爭：明清傳教士與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03.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204. 張集馨(撰)、杜春和、張秀清(點校)，《道咸宦海見聞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
205. 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206. 張壽安，《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207. 張壽安，《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
208. 張維屏，《紀昀與乾嘉學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8。
209. 張際亮(著)、王懿(校點)，《思伯子堂詩文集》，上、中、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10. 張劍，《莫友芝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8。
211. 張履，《容山教事錄》，清道光戊戌華陽精舍刊本，藏於臺灣大學圖書館。
212. 張履，《積石文藁·積石詩存》，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7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13. 張應昌(輯)，《國朝詩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627-162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14. 張應昌，《春秋屬辭辨例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5-14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15. 張應昌，《彝壽軒詩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16. 張豔麗，《嘉道時期的災荒與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17. 張枏、王忍之(主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冊，北京：三聯書店，1960。
218. 梁廷相(撰)、邵循正(點校)，《夷氛聞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219. 梁啓超(著)、朱維錚(校注)，《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220.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21. 梁章鉅(撰)、陳鐵民(點校)，《浪跡叢談·續談·三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
222. 梅曾亮(著)、彭國忠、胡曉明(校點)，《柏硯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23. 清世宗，《大義覺迷錄》，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224. 符葆森(編)，《國朝正雅集》，清咸豐六年京師半畝園刊本，藏於臺灣大學。
225. 莫友芝(著)、張劍、陶文鵬、梁光華(編輯校點)，《莫友芝詩文集》，上、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226. 許明龍，《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
227. 許棫，《東夫山堂詩選》，收入：文清閣(編)，《稀見清人別集百種》，17，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228. 許楣，《鈔幣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8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29. 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長沙：岳麓書社，2010。
230. 郭前孔，《中國近代唐宋詩之爭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0。
231.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1-4，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232. 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養知書屋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4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33. 郭麗萍，《絕域與絕學：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7。
234. 郭堃，《種蕉館詩集》，清光緒二十一年刊本舫樓藏板，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
235. 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22，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
236. 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37. 陳其元(撰)、楊璐(點校)，《庸閒齋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
238. 陳康祺(撰)、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上、下，北京：中華書局，1984。
239. 陳康祺(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郎潛紀聞四筆》，北京：中華書局，1990。
240. 陳逢衡(記)、荒木譽(訓點)，《英咭喇紀略》，江戶：書林和泉善兵衛，1853，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
241. 陳詒先、陳冷汰(譯)，《清室外紀》，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242. 陳慶鏞，《籀經堂類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22-15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43. 陳曉華，《《四庫全書》與十八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244. 陳澧(著)、黃國聲(主編)，《陳澧集》，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45. 陸以湉(撰)、崔凡芝(點校)，《冷廬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4。
246. 陸嵩，《意苕山館詩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7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47.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1983三版。
248. 陶樑，《紅豆樹館詩稿》，咸豐七年刊本，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
249. 陶樑，《國朝畿輔詩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68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50.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02-150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51. 傅恒(編纂)，《皇清職貢圖》，出版地不明：出版者不明，1761，藏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252. 彭大成、韓秀珍，《魏源與西學東漸：中國走向近代化的艱難歷程》，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253.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2002。
254. 曾小萍(Madeleine Zelin)(著)、董建中(譯)，《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255. 曾國藩(著)、王澧華(校點)，《曾國藩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56.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日記一》，長沙：岳麓書社，1987。
257.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奏稿一》，長沙：岳麓書社，1985。
258.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長沙：岳麓書社，1985。
259. 曾燠，《賞雨茅屋詩集·賞雨茅屋外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60. 湯金釗，《寸心知室存稿·隨筆·文端公自訂年譜·寸心知室存稿續編》，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0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61. 程鴻詔，《有恒心齋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7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62. 菊池秀明，《清代中国南部の社会変容と太平天国》，東京：汲古書院，2008。
263. 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

264. 賀長齡，《耐菴文存·耐菴詩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65. 賀熙齡(撰)、雷樹德(校點)，《賀熙齡集》，長沙：岳麓書社，2010。
266.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鎖國時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識：世界地理·西洋史に關する文献解題》，東京：乾元社，1953。
267. 馮桂芬，《顯志堂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35-153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68. 黃大受(主編)，《黃爵滋奏疏(附許乃濟奏疏)》，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63。
269. 黃大受(輯)，《黃少司寇(爵滋)奏疏》，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
270. 黃汝成，《袖海樓雜著》，1-2，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
271. 黃侃、張繼(同校)，《日知錄校記》，臺北：崔震華，1955再版。
272. 黃金臺，《木雞書屋文鈔·木雞書屋文二集·木雞書屋文三集·木雞書屋文四集·木雞書屋文五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6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73. 黃彥(編)，《孫文選集》，上、中、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274.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275. 黃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隨人聖庵摭憶》，上、中、下，北京：中華書局，2008。
276. 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北京：三聯書店，2010。
277. 楊杭軍，《走向近代化：清嘉道咸時期中國社會走向》，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278. 楊芳燦，《芙蓉山館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7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79. 楊柏嶺(著)，《近代上海詞學繫年初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80. 楊國強，《晚清的士人與世相》，北京：三聯書店，2008。
281. 楊國楨，《林則徐傳(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82. 楊國楨，《林則徐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83. 楊榮，《蜨庵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5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84. 溫訓，《登雲山房文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6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85. 葉名澧，《敦夙好齋詩初編·續編》，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3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86.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板橋：稻鄉出版社，2002。
287. 葛以簡、葛以敦(編)，《凌臺府君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143，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288. 裕謙，《勉益齋偶存稿·勉益齋續存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7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89. 詹惠媛，《《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體制研究》，永和：花木蘭文化，2009。
290. 賈建飛，《清代西北史地學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291. 鄒小站，《西學東漸：迎拒與選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292. 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以1815至1900年西方歷史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93. 鈴木中正，《中国史における革命と宗教》，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4。
294. 鈴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東京：燎原株式会社，1971。
295. 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296.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97. 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林則徐與鴉片戰爭研究論文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298. 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編)，《鴉片戰爭在閩、臺史料選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299. 種菜翁，《海外新話拾遺》，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849，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
300. 管同，《因寄軒文初集·因寄軒文二集·因寄軒文集補遺》，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0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01. 裴芹，《古今圖書集成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
302.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560-56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03. 趙雅麗，《晚清京師南城政治文化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
304. 趙爾巽(等著)，《清史稿》，1-48，北京：中華書局，1976-1977。
305. 齊思和(等整理)，《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1-6，北京：中華書局，1964。

306. 劉小萌，《清代八旗子弟》，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
307.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308. 劉存仁，《配雲樓文鈔·配雲樓集·配雲樓二集·配雲樓三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09. 劉存仁，《配雲樓詩話》，刊刻者、年代不詳，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室。
310. 劉開，《劉孟塗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5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11. 劉蓉，《養晦堂文·詩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312. 劉衡，《蜀僚問答》，收入：陳生璽(輯)，《政書集成》，10，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313.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63。
314. 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編)，《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78。
315. 樊克政，《龔自珍年譜考略》，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316. 歐陽兆熊、金安清(撰)、謝興堯(點校)，《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
317. 潘錫恩(輯)，《乾坤正氣集》，1-40，臺北：環球書局，1966。
318. 蔣廷黻(著)、謝鐘璉(譯)，《蔣廷黻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
319. 蔣攸銜，《繩榘齋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320. 蔣攸銜，《繩榘齋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48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21. 蔣鑰、翁介眉(輯)，《清詩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3，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清康熙二十年鏡閣刻本。
322. 諸橋轍次(編)，《大漢和辭典》，1-13，東京：大修館書店，1955。
323. 鄭銳達，《移民、戶籍與宗族：清代至民國期間江西袁州府地區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9。
324. 鄧廷楨，《雙硯齋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25. 鄧顯鶴，《南村草堂詩鈔》，長沙：岳麓書社，2008。
326. 醉夢痴人，《海外餘話》，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854，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

327. 震鈞，《天咫偶聞》，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328. 魯一同(著)、郝潤華(編校)，《魯通甫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329. 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道光朝卷》，14，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330. 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嘉慶朝卷》，1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331. 錢仲聯(編著)，《近代詩鈔》，1，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332.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333. 錢穆，《學籥》，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蘭臺出版社，2000。
334. 錢寶琛，《存素堂詩藁·存素堂文藁·補遺·存素堂集續編·頤壽老人年譜》，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5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35. 閻若璩(撰)、吳玉搢(編)，《潛邱劄記》，收入：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5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336. 戴鈞衡，《味經山館文抄·味經山館詩抄》，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5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37. 濱口富士雄，《清代考據學の思想史的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1994。
338. 謝正光、余汝豐(編著)，《清初人選清初詩藁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339. 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安京(校釋)，《海錄校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340. 謝興堯(供稿)，《臺人輿論》，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8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341. 謝蘭生(編校)，《景忠錄》，收入：《叢書人物傳記資料類編·仕宦卷》，4，北京：國家圖書館，2010。
342. 魏秀梅，《陶澍在江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343. 魏泉，《士林交游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344. 魏源(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魏源集》，上、下，北京：中華書局，2009三版。
345. 魏憲(輯)，《詩持全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3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清康熙枕江堂刻本。
346. 羅惇衍，《羅文恪公遺集》，刊刻者、年代不詳，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部。
347. 嚴如煜(輯)，《三省邊防備覽》，出版地不明：來鹿堂，道光庚寅仲夏月重鐫，藏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348. 嚴鈞，《香雪齋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7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49. 蘇廷魁，《守柔詩鈔初集·守柔齋詩鈔續集·守柔齋行河草》，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60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50. 鐵保(編)，《熙朝雅頌集》，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
351. 鐵保，《惟清齋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147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52. 顧力仁，《永樂大典及其輯佚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再版。
353. 顧沅(輯)，《乾坤正氣集》，吳坤修刊，清同治六年新建吳氏皖城刊本，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354. 顧炎武(著)、張京華(校釋)，《日知錄校釋》，上、下，長沙：岳麓書社，2011。
355.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樂保羣、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中、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56. 顧雲，《益山文錄·益山詩錄》，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75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57. 龔自珍(著)、王佩誥(校)，《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358. 龔書鐸(主編)、張昭軍(著)，《清代理學史》，上、中、下，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
359. 龔纓晏，《鴉片的傳播與對華鴉片貿易》，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
360. 塩谷世弘，《宕陰存稿》，東京：山城屋政吉、岡田屋嘉七等，明治三庚午年仲夏刻成，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
361. 浜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362. 浜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97。

三、論文

1. 〈三元里平英團史實調查會記錄〉，收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近代史資料》，1(北京：科學出版社，1954)，1-5。
2. Perdue, Peter C. "Insiders and Outsiders: The Xiangtan Riot of 1819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 Hunan,” *Modern China*, 12.2 (Apr., 1986), 166- 201.
3. Polachek, James M. “Literati Groups and Literati Politics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h.D. dissertation, 1977.
 4. 山本英史，〈「衙蠹」のいみするもの——清初の地方統治と胥役〉，收入：細谷良夫(編)，《清朝史研究の新たなる地平》(東京：山川出版社，2008)，140- 162。
 5. 川島真，〈おわりに——新しい「胎動」〉，收入：岡本隆司、川島真(編)，《中国近代外交の胎動》(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203- 211。
 6. 川島真，〈中国における万国公法の受容と適用——「朝貢と条約」をめぐる研究動向と問題提起——〉，《東アジア近代史》，2(東京，1999.03): 8- 26。
 7. 井上裕正，〈James M. Polachek著*The Inner Opium War*〉，《東洋史研究》，52.3(京都，1993.12): 507- 567。
 8. 片岡一忠，〈洪亮吉傳(初稿)(一)〉，《歴史人類》，20(茨城，1992.03): 43- 73。
 9.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學》，14.4(臺北，2003.12): 177-194。
 10. 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臺北，2008.03): 63- 93。
 11. 王汎森，〈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收入：陳弱水(主編)，《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12)，353- 392。
 12. 王汎森，〈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收入：陳弱水(主編)，《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12)，415- 449。
 13.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99年度第2次學術講論會，2010.01.25。
 14. 王聿均，〈清代中葉士大夫之憂患意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1(臺北，1982.07): 1- 11。
 15. 王兵，〈傳統詩教與清廷政教的共謀——以孫毓和鐵保的御敕清詩選本為批評視角〉，《滿族研究》，3(瀋陽，2011): 108- 114。
 16. 王健文，〈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帝制中國初期的華夏意識〉，《新史學》，16.4(臺北，2005.12): 195- 220。
 17. 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收入：王國維(著)、彭林(整理)，《觀堂集林》，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720- 721。
 18. 王淑芬，〈清代治山防洪環保策略之探討：以長江流域為中心〉，《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 學報》，19.1(臺北，2006.03): 51- 78。
19. 王智仁，〈清代內閣俄羅斯文館之研究〉，臺北：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20. 王煒，〈《清詩別裁集》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21. 王澤民，〈認知與建構：清代新疆語言政策的歷史考察〉，《黑龍江民族叢刊》，115(哈爾濱，2012): 115- 118。
 22. 王鶴鳴、施立業(整理)，〈近代安徽災荒繫年錄〉，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7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189- 196。
 23. 王蘧常，〈陳化成將軍年譜(連載七)〉，《上海文博論叢》，3(上海，2007): 67- 70。
 24. 王蘧常，〈陳化成將軍年譜(連載二)〉，《上海文博論叢》，4(上海，2005): 78- 81。
 25. 王蘧常，〈陳化成將軍年譜(連載三)〉，《上海文博論叢》，1(上海，2006): 78- 83。
 26. 王蘧常，〈陳化成將軍年譜(連載五)〉，《上海文博論叢》，4(上海，2006): 68- 71。
 27. 王蘧常，〈陳化成將軍年譜(連載六)〉，《上海文博論叢》，1(上海，2007): 82- 84。
 28. 王蘧常，〈陳化成將軍年譜(連載四)〉，《上海文博論叢》，3(上海，2006): 64- 67。
 29. 王蘧常，〈陳化成將軍年譜〉，《上海文博論叢》，3(上海，2005): 70- 73。
 30. 田中正美，〈阿片戰爭前における「漢奸」の問題〉，《東京教育大学文学部紀要》，46(東京，1964.03): 1- 37。
 31. 安岡昭男，〈日本における万国公法の受容と適用〉，《東アジア近代史》，2(東京，1999.03): 45- 64。
 32. 安藤潤一郎，〈清代嘉慶・道光年間の雲南省西部における漢回対立——「雲南回民起義」の背景に関する一考察——〉，《史學雜誌》，111.8(東京，2002.08): 46- 71。
 33. 朱則杰，〈《清初人選清初詩匯考》“待訪書目”考論〉，《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5.1(杭州，2005.01): 82- 88。
 34. 朱則杰，〈《清初人選清初詩匯考》“待訪書目”補遺〉，《文學前沿》，(北京，2007): 80-90。
 35. 朱則杰，〈《清初人選清初詩匯考》原錄序跋補遺〉，《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1.2(南昌，2008.04): 42- 45。
 36. 朱則杰、李美芳，〈卓奇圖《白山詩存》與伊福納《白山詩抄》——兩種早期八旗詩歌總集及其編者考辨〉，《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1.3(杭州，2011.05): 91- 96。
 37. 朱則杰、周于飛，〈瑪爾渾《宸襟集》與文昭《宸尊集》——兩種清朝宗室詩歌總集及其編者考辨〉，《社會科學戰線》，1(長春，2011.01): 173- 176。
 38. 朱維錚，〈導讀：晚清的“自改革”與維新夢〉，收入：朱維錚、龍應臺(編著)，《維新舊

- 夢錄：戊戌前百年中國的“自改革”運動》(北京：三聯書店，2000)，21- 72。
39. 何雙生、劉德麟，〈清代官修的外交檔案資料彙編——《籌辦夷務始末》〉，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學林漫錄》，5(北京：中華書局，1982)，207- 216。
 40. 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收入：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87- 119。
 41.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收入：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121- 156。
 42. 余英時，〈曾國藩與「士大夫之學」〉，收入：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臺北：三民書局，2004二版)，1- 24。
 43. 呂小鮮(選編)，〈嘉慶朝江西萬載縣土棚學額紛爭案〉，《歷史檔案》，1(北京，1994.01): 12- 26; 42。
 44. 李云泉，〈清代前期的外交機構與外事管理〉，《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0.5(濟南，2005): 80- 83。
 45. 李炳泉，〈阮元督粵幕府考論〉，《煙臺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8.4(煙臺，2001.12): 18- 25。
 46. 李國祁，〈道咸同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下(臺北，1986.12): 17- 65。
 47. 李國環，〈陳化成與吳淞戰役考實〉，《史林》，4(上海，1996): 35- 41。
 48. 李細珠，〈倭仁與道咸同時期的理學〉，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思想家與近代中國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58- 90。
 49. 李瑞豪，〈曾燠幕府與清中期的駢文復興〉，《中國韻文學刊》，23.3(湘潭，2009.09): 51-56。
 50. 李鵬程，〈晚清“經世文編”現象研究〉，《中州學刊》，151(鄭州，2006.01): 182- 185。
 51. 杉山清彥，〈大清帝国史研究の現在—日本における概況と展望—〉，《東洋文化研究》，10(東京，2008.03): 347- 372。
 52. 沈葆楨，〈臺地後山請開舊禁摺〉，收入：沈葆楨，《福建臺灣奏稿》，收入：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48(臺中：文叢閣圖書公司，2007)，191- 194。
 53. 沈豔，〈近代“經世文編”賡續潮流述論〉，《史學月刊》，3(開封，2004): 108- 115。
 54. 沈豔，〈晚清經世文編的文化特色與文化本質〉，《清史研究》，1(北京，2000): 69- 74。
 55. 沈豔，〈晚清經世文編現象的歷史文化透視〉，《江漢論壇》，1(武漢，2000): 58- 62。
 56. 沈豔，〈晚清獨特的文化景觀——經世文編的相與賡續〉，《孔孟學報》，78(臺北，2000.09):

- 321- 344。
57. 沈豔，〈試論近代續“經世文編”文化熱潮的成因〉，《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2.4(武漢，2005.07): 489- 492。
58. 汪士鐸，〈孫芝房侍講芻論序〉，收入：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967- 969。
59. 周芳，〈茫茫亭內茫茫吟——清初博爾都悼亡詩藝術淺析〉，《滿族研究》，102(瀋陽，2011): 84- 88。
60. 周健，〈陋規與清嘉道之際的地方財政——以嘉慶二十五年清查陋規事件為線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5(臺北，2012.03): 115- 158。
61. 周國棟，〈兩種不同的學術史範式——梁啟超、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比較〉，《史學月刊》，4(開封，2000): 110- 117。
62. 周新鳳，〈《日知錄》文淵閣本抽毀稿解析〉，《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30(天津，2005): 52- 53。
63. 岡本隆司，〈中国近代外交へのまなざし〉，收入：岡本隆司、川島真(編)，《中国近代外交の胎動》(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1- 19。
64. 岡本隆司，〈清末の対外体制と対外関係〉，收入：飯島渉、久保亨、村田雄二郎(編)，《中華世界と近代》(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15- 35。
65. 岡本隆司，〈朝貢と互市と會典〉，《京都府立大学学術報告・人文》，62(京都，2010.12): 17- 47。
66. 岸本美緒，〈一八世紀の中国と世界〉，收入：岸本美緒，《風俗と時代観——明清史論集1》(東京：研文出版，2012)，111- 143。
67. 岸本美緒，〈清朝とユーラシア〉，收入：歴史学研究会(編)，《近代世界への道——変容と摩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5)，11- 42。
68. 岩井茂樹，〈帝國と互市——16-18世紀東アジアの通交〉，收入：籠谷直人、脇村孝平(編)，《帝国とアジア・ネットワーク：長期の19世紀》(京都：世界思想社，2009)，30-59。
69. 拉賓·帕維爾，〈清朝俄羅斯文館(18世紀初-19世紀中葉)〉，《歷史檔案》，1(北京，2011): 52- 60。
70. 林孝庭，〈朝貢制度與歷史想像：兩百年來的中國與坎巨堤(1761-196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4(臺北，2011.12): 41- 82。
71. 林啓彥、林錦源，〈論中英兩國政府處理林維喜事件的手法與態度〉，《歷史研究》，

- 2(北京, 2000): 97- 113。
72. 武内房司, 〈《民族図説》の成立とその時代——一九世紀初伯麟《雲南人種図説》に見るシブソンパンナーの辺疆風景〉, 收入: 長谷川清、塚田誠之(編), 《中国の民族表象——南部諸地域の人類学・歴史学的研究》(東京: 風響社, 2005), 29- 55。
73. 邵鴻, 〈利益與秩序——嘉慶二十四年湖南省湘潭縣的土客仇殺事件〉, 《歷史人類學學刊》, 1.1(香港, 2003.04): 83- 98。
74. 金容九(著)、月脚達彦(譯), 〈朝鮮における万国公法の受容と適用〉, 《東アジア近代史》, 2(東京, 1999.03): 27- 44。
75. 施志汶, 〈臺灣史研究的史料運用問題, 以清代渡臺禁令為例〉, 《臺灣史蹟》, 36(南投, 2000.06): 148- 189。
76. 胡文生, 〈梁啓超、錢穆同名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比較〉, 《中州學刊》, 145(鄭州, 2005.01): 158- 162。
77. 胡喜云、王磊, 〈清代輯佚學研究綜述〉, 《圖書與情報》, 1(蘭州, 2009): 136- 140。
78. 倪玉平、高曉燕, 〈《安吳四種》的版本及其價值〉, 《石家莊學院學報》, 13.5(石家莊, 2011.09): 22- 26。
79. 倪惠穎, 〈論乾隆朝不同文章流派的衝突與互動——以畢沅幕府為中心〉, 《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39.3(南昌, 2008.05): 114- 118。
80. 宮崎市定, 〈清代の胥吏と幕友——特に雍正朝を中心として—〉, 收入: 宮崎市定, 《宮崎市定全集》, 14(東京: 岩波書店, 1991), 173- 205。
81. 宮崎市定, 〈清朝における国語問題の一面〉, 收入: 宮崎市定, 《宮崎市定全集》, 14(東京: 岩波書店, 1991), 282- 337。
82. 宮崎市定, 〈清朝文化とその背景〉, 收入: 宮崎市定, 《宮崎市定全集》, 14(東京: 岩波書店, 1991), 265- 281。
83. 徐興慶, 〈德川幕末知識人吸收西洋文明的思想變遷〉, 《臺大歷史學報》, 40(臺北, 2007.12): 149- 199。
84. 袁劍, 〈“國語”興亡——清朝“滿語思路”的流變略論〉, 北京: “社會、經濟、觀念史視野中的古代中國”國際青年學術會議暨第二屆清華青年史學論壇, 2010.01.16-17。
85. 區志堅, 〈從明人編著經世文編略探明代經世思想的涵義——兼論近人對經世思想之研究〉, 《中國文化研究》, 23(北京, 1999春): 92- 99。
86. 張小李, 〈乾隆學語言〉, 《紫禁城》, 3(北京, 2011): 48- 49。

87. 張岩，〈對清代前中期人口發展的再認識〉，《江漢論壇》，1(武漢，1999): 65- 69。
88. 張金梁，〈《永樂大典》纂修人研究〉，《文獻》，1(北京，2009.01): 128- 138。
89. 張研，〈清代自然環境研究〉，《史苑》，8(北京，2005):
<http://www.historychina.net/magazinefree/html/13/73/content/148.shtml> (中華文史網)
90. 張瑞龍，〈清中葉嘉道年間學術思想研究綜述〉，《漢學研究通訊》，27.4(臺北，2008.11): 1- 11。
91. 張銓津，〈鴉片戰爭時期的「漢奸」問題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6。
92. 曹天生(整理)，〈王茂蔭未刊稿三種〉，收入：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文獻》，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27- 336。
93. 梁洪生，〈從「異民」到「懷遠」——以「懷遠文獻」為重心考察雍正二年寧州移民要求入籍和土著罷考事件〉，《歷史人類學學刊》，1.1(香港，2003.04): 29- 66。
94. 梁啓超，〈新史學〉，收入：梁啓超，《飲冰室合集》，1(北京：中華書局，1989)，9/ 1-31。
95. 梁繼，〈張照與乾隆關係考述——以書法為視角〉，《學術交流》，173(哈爾濱，2008.08): 176- 179。
96. 莊建平，〈琦善·義律·穿鼻草約〉，《安徽史學》，1(合肥，2000): 45- 51。
97. 郭松義，〈玉米、番薯在中國傳播中的一些問題〉，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論叢》，7(北京：中華書局，1986)，80- 114。
98. 郭國慶，〈輯佚與清代圖書編纂〉，《江西圖書館學刊》，40.3(南昌，2010.08): 118- 121。
99. 陳秀武，〈《萬國公法》在明治初期的日本〉，《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38(長春，2009): 18- 23。
100. 陳雪云，〈清廷毀書的罪證——論河南省圖書館館藏四庫全書《日知錄》《明文海》抽毀本的價值〉，《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23(天津，2004): 50- 52。
101. 陳景潮，〈開種苞蘆利害論〉，收入：陳常鐸(修)、臧承宣(等纂)，《光緒分水縣志》，1(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臺一版，據清光緒32年刊本影印)，176- 177。
102. 陳熙遠，〈皇帝的最後一道命令——清代遺詔製作、皇權繼承與歷史書寫〉，《臺大歷史學報》，33(臺北，2004.06): 161- 213。
103. 森永恭代，〈清代四川における移民開墾政策——清朝政府から見た「湖広填四川」〉，《史窓》，68(京都，2011.02): 187- 209。
104. 森睦彦，〈『海国図志』の舶載から翻刻まで〉，《蘭學資料研究會研究報告》，206(東

- 京，1968.03): 55- 64。
105. 華立，〈清代甘肅·陝西回民的新疆進出——乾隆期の事例を中心に〉，收入：塚田誠之(編)，《民族の移動と文化の動態——中国周縁地域の歴史と現在》(東京：風響社，2003)，21- 67。
106. 馮爾康，〈述道光朝社會問題〉，《南開史學》，1(天津，1991): 1- 32。
107. 馮爾康，〈從召見臣工看道光帝、咸豐帝的理政和性格——以召見張集馨、段光清為例〉，《江漢論壇》，4(武漢，2005.04): 81- 88。
108. 馮爾康，〈道光朝存在的社會問題〉，《南開學報》，4(天津，1991): 25- 33。
109. 黃一農，〈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兩國的觀禮之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78.1(臺北，2007.03): 35- 106。
110. 黃一農，〈龍與獅對望的世界——以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後的出版物為例〉，《故宮學術季刊》，21.2(臺北，2003冬): 265- 297。
111. 黃克武，〈《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112. 黃克武，〈理學與經世——清初「切問齋文鈔」學術立場之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6(臺北，1987.06): 37- 65。
113. 黃克武，〈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臺北，1986.09): 83- 96。
114. 黃秀政，〈清代治臺政策的再檢討：以渡臺禁令為例〉，《文史學報》，20(臺中，1990.03): 49- 66。
115. 黃順力，〈清代海商眼中的世界——《海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4(廈門，1996): 93- 94。
116. 新村容子，〈「宣南詩社」に関する覚書〉，《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51(岡山，2009.07): 290- 276。
117. 新村容子，〈1820-30年代北京の士大夫交流(I)——「黃爵滋サークル」の集会を中心として——〉，《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52(岡山，2009.12): 31- 65。
118. 新村容子，〈1820-30年代北京の士大夫交流(II)——「黃爵滋サークル」から「清流党」へ——〉，《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53(岡山，2010.07): 47- 79。
119. 新村容子，〈1820-30年代北京の士大夫交流(III)——道光十五年(1835)、黃爵滋「敬陳六事疏」を中心として——〉，《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54(岡山，2010.12): 69- 85。

120. 新村容子，〈1820-30年代北京の士大夫交流(IV)——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四日「江亭展禊」を中心として——〉，《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55(岡山，2011.07): 45- 65。
121. 楚金(瞿宣穎)，〈道光學術〉，收入：太平山人(等撰)，《道光朝銀荒問題：中和近代史論文集》(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4)，6- 19。
122. 楊聯陞，〈國史諸朝興衰芻論〉，收入：楊聯陞，《國史探微》(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21- 42。
123. 楊豔秋，〈明代後期的“經世文”彙編〉，《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聊城，2005): 42- 45; 52。
124. 源了圓，〈幕末・維新期における『海国図志』の受容—佐久間象山を中心として—〉，《日本研究》，9(京都，1993.09): 13- 25。
125. 源了圓，〈幕末日本における中国を通しての「西洋学習」——『海国図志』の受容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源了圓、嚴紹盪(編)，《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第3卷・思想》(東京：大修館書店，1995)，322- 361。
126. 葛劍雄，〈清乾隆年間尹壯圖上疏事件始末〉，《探索與爭鳴》，7(上海，1996.07): 43-46。
127. 解揚，〈近三十年來有關中國近世「經世思想」研究評述〉，《新史學》，19.4(臺北，2008.12): 121- 151。
128. 鄒振環，〈丁韜良譯述《萬國公法》在中日韓傳播的比較研究〉，《韓國研究論叢》，7(上海，2000): 258- 278。
129. 鄒振環，〈清代前期外語教學與譯員培養上的制度性問題——與俄國、日本的比較〉，《社會科學輯刊》，168(瀋陽，2007): 160- 167。
130. 裴率度，〈江西巡撫裴率度奏銅鼓民人謀叛現獲究審摺〉，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2(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1991)，107- 108。
131. 齊思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燕京社會科學》，2(北京，1949.10): 1- 35。
132. 齊思和，〈魏源與晚清學風〉，收入：齊思和，《中國史探研》(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599- 651。
133. 劉良駒，〈請飭定銀錢畫一章程疏〉，收入：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6703- 6709。
134. 劉和文，〈《清初人選清初詩匯考》原錄序跋補闕〉，《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2.3(南昌，2009.06): 98- 102。
135. 劉俊起，〈清代中晚期科舉考試偏重書法風氣之考察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碩士

學位論文，2002。

136. 劉海峰，〈穆彰阿與道光朝政治〉，廈門：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137. 劉源，〈“湖廣填四川”與四川流民問題〉，《清史研究》，1(北京，1994): 39-44。
138. 劉蜀永(整理)，〈璞鼎查中文告示一則〉，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7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26-28。
139. 劉靖淵，〈詩中有人，詩外有事——兩個版本《國朝詩別裁集》比較中的清代詩史案研究〉，《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2.3(濟南，2007): 41-47。
140. 劉暢、趙雯雯、蔣張，〈毓慶宮〉，《紫禁城》，7(北京，2009): 14-19。
141. 劉廣京，〈變法的挫折——同治六年同文館爭議〉，收入：劉廣京，《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403-418。
142. 劉廣京、周啓榮，〈《皇朝經世文編》關於經世之學的理論〉，收入：劉廣京，《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77-186。
143. 潘光哲，〈《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與晚清中國士人「認識世界」的「知識基礎」〉，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論文，2001.11。
144. 潘光哲，〈「奴隸地位」和「半獨立國」：孫中山對中國「國際地位」的論述〉，《孫學研究》，6(臺北，2009.05): 33-59。
145. 潘光哲，〈孫文の「次殖民地」イメージ〉，《孫文研究》，45(神戸，2009.03): 40-60。
146. 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16.3(臺北，2005.09): 137-170。
147. 潘光哲，〈張自牧論著考釋劄記——附論深化晚清思想史研究的一點思考〉，《新史學》，11.4(臺北，2000.12): 105-121。
148. 潘承玉，〈《清初人選清初詩匯考》六補〉，《古籍整理研究學刊》，5(長春，2002.09): 64-71。
149. 蔣廷黻，〈琦善與鴉片戰爭〉，收入：汪朝光(主編)，《20世紀中華學術經典文庫·歷史學·中國近代史卷》(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0)，111-127。
150. 蔣廷黻，〈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清華周刊》，37.9-10(北京，1932): 5-14。
151. 鄭大華，〈包世臣與嘉道年間的學風轉變〉，《安徽史學》，4(合肥，2006): 42-48。
152. 鄭大華，〈論包世臣在嘉道經世思潮中的歷史地位——兼與龔自珍、魏源之比較〉，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思想家與近代中國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0-57。

153. 鄭維寬，〈清前中期“湖廣填四川”的生動例證——衡陽鄧氏家族的移民史〉，《尋根》，5(鄭州，2010): 132- 138。
154. 鄧實，〈國學今論(續)〉，收入：國粹學報社(編)、黃節(主編)，《(景印)國粹學報舊刊全集》，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495- 504。
155. 鄧實，〈國學今論〉，收入：國粹學報社(編)、黃節(主編)，《(景印)國粹學報舊刊全集》，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397- 410。
156. 曉棠，〈《劬農紀典》冊與乾隆御筆書法(下)〉，《藝術市場》，3(北京，2006): 78- 79。
157. 曉棠，〈《劬農紀典》冊與乾隆御筆書法(上)〉，《藝術市場》，1(北京，2006): 88- 89。
158. 曉棠，〈《劬農紀典》冊與乾隆御筆書法(中)〉，《藝術市場》，2(北京，2006): 80- 81。
159. 盧元偉，〈歷史記憶的建構及其限制——以林則徐英雄形象的建構為例的考察〉，《中國圖書評論》，9(瀋陽，2006.09): 65- 70。
160. 盧伯煒，〈清代道光六年漕政改革的意義〉，《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蘇州，2005.11): 100- 105。
161.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5(臺北，2012.03): 1- 76。
162. 謝正光，〈試論清初人選清初詩〉，《漢學研究》，15.2(臺北，1997.12): 171- 184。
163. 謝宏維，〈化干戈為玉帛：清代及民國時期江西萬載縣的移民、土著與國家〉，《歷史人類學學刊》，3.1(香港，2005.04): 79- 82。
164. 謝宏維，〈棚民、土著與國家——以清中期江西省萬載縣土棚學額紛爭案為例〉，收入：方志遠(等著)，《國家制度與古代社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147- 151。
165. 韓承樞，〈評介兩岸學界近十年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史原》，23(臺北，2011.09): 205- 238。
166. 魏秀梅，〈琦善在兩江的政績(1825-182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臺北，1994.06): 135- 160。
167. 魏秀梅，〈琦善在豫魯的政績(1814-182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上(臺北，1993.06): 463- 503。
168. 羅志田，〈“天朝”怎樣開始“崩潰”——鴉片戰爭的現代詮釋〉，《近代史研究》，3(北京，1999): 9- 24。
169. 羅志田，〈民國史研究的“倒放電影”傾向〉，《社會科學研究》，4(成都，1999): 104- 106。
170. 羅志田，〈道咸“新學”與清代學術史研究——《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導讀〉，《四

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46(成都，2006): 5- 15。

171. 羅檢秋，〈嘉道年間京師士人修禊雅集與經世意識的覺醒〉，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92- 317。
172. 闕紅柳，〈傳教士眼中的清代君主——以郭實臘《道光皇帝傳》為中心〉，《歷史檔案》，2(北京，2009): 48- 53。
173. 龔來國，〈清“經世文編”研究——以編纂學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4。
174. 龔義龍，〈清代“湖廣填四川”移民浪潮時間考證〉，《長江師範學院學報》，27.6(重慶，2011.11): 7- 14; 158。

